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勃列日涅夫传



序

1982 年 11 月

纷纷扬扬的雪片，送来了第 65 个十月革命节。首都莫斯科作为苏联的政治中心，庆祝活动自然最隆重。在 11 月 7 日的前几天，莫斯科市区主要街道和要举行庆祝活动的场所按照传统方式装饰起来。街道两旁主要建筑物上，饰以红布扎成的花形和大幅标语，街头树立着巨幅的宣传画。红场一边的大楼上，高高悬挂着一排巨幅画像，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画像挂在中间。右侧并排悬挂的一幅同样大小的画像，长方型脸膛，没留胡子，两道浓重的粗眉，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正用谈不上有神但却安详的目光注视着远方。这就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再往两旁，是十几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画像，不过，他们的画像看上去要比中间的两幅略小一些。当勃列日涅夫大权在握以后，有的人想出一句非常简练的话歌颂他：“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现在，画像的规格和摆放位置，似乎在有意识地突出两个伊里奇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尽管第一个伊里奇领导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时，第二个伊里奇还是一个不满 11 岁的孩子。

按惯例，首都的庆祝活动主要有三项：庆祝大会、红场阅兵和庆祝宴会。这种重要场合，除非有特殊情况，苏联党政领导人是都要露面的，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还要发表讲话。庆祝大会定于 11 月 5 日下午召开，阅兵式在 11 月 7 日上午 10 时至 12 时举行，1 小时后是庆祝宴会。勃列日涅夫不仅应该自始至终出席上述活动，而且还要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此外，他还要在这几天中会见一批又一批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党和国家代表团。紧张的活动安排，特别是在严寒中进行的阅兵式，对高龄而且身体欠佳的勃列日涅夫，不能不说是一次考验。

身患多种疾病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仍活动于苏联政治舞台的中心，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越来越与他掌握的权力不相称。表情呆板，反应迟钝，说话含混不清，行动僵硬迟缓，这种状态的确让人很难不加疑问地把他与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画等号。在苏联当时的政治体制下，高级领导人活着而丧失权力的，只有一种情况：失败，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在作为党的领袖的 18 年中，勃列日涅夫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斗争，然而他一直没有成为失败者。随着他执政的时间一年年延长，他渐渐成了一种象征，就像年年这个时候挂在莫斯科市内显著位置的画像一样，只是告诉人们这是谁，而不管他有多大年纪，身体是否健康。更何况，在苏联相对封闭的政治环境中，像十月革命节这样重要的纪念日，本身就是反映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主要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备受观察家们的关注。

11 月 5 日下午 5 时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始的庆祝大会，正式拉开了此次活动的帷幕。5 时整，身穿深色西装的勃列日涅夫率先步入主席台，后面是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及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走得很慢，向着起立鼓掌的代表们缓缓地挥手。强烈的灯光下，他的脸颊看不出血色，别在胸前的五枚金星奖章，随着身体的运动闪出刺眼的光点。大会由莫斯科市长普罗梅斯洛夫主持，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作了长篇报告。报告人还没讲到 10 分钟，敏感的观察家们便发现了第一个不同于去年的地方：报告中

用了整整一段话赞扬勃列日涅夫。说他对创造性地制定和实现党的内外政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因而在国内外赢得了普遍赞扬，享有最高威望。格里申的讲话被场内响起的掌声打断，戴着耳机的勃列日涅夫没什么反应，整个报告过程中他的嘴像大多数老人一样，不停地下意识张合着。

11月7日上午10时，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他由两名年轻的军官搀扶着，一阶一阶地登上列宁墓。国防部长、苏联元帅乌斯季诺夫发表了简短讲话后，阅兵式开始。几千名军校学员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军人列队通过红场。之后，214辆装甲车、坦克和装着火箭的卡车，隆隆驶过。接着，由莫斯科各区组成的群众游行队伍走过列宁墓。在雪后的寒风中，勃列日涅夫脸上仍然没什么表情，只是他那只时时费力抬起挥动的手臂提醒着人们，那不是一座雕像，而是一个热量快要耗尽的老人……

中午1时，庆祝宴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宴会厅开始。勃列日涅夫致祝酒辞。他依然如人们已经熟悉的那样，眼睛紧盯着手中的讲稿念，只不过不该停顿的地方停顿的次数更多，发音更加含混不清。当他念完最后一句——为列宁的党、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苏联每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时，善于观察的人发现，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在他麻木的脸上一闪而过。不过，当时恐怕没人想到，这篇祝酒辞就是他留下的最后一篇公开讲话。

三天后，苏联官方宣布，勃列日涅夫于11月10日上午8时30分在莫斯科逝世。随后公布的勃列日涅夫死因和病情医学鉴定书说，他患有主动脉粥样硬化并伴有腹主动脉瘤、狭窄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心脏病及心律不齐、心肌梗塞后心肌瘢痕性病变。以这样的身体状况去应付上述繁忙的庆祝活动，对一个很快就76岁的老人来说，结果就是悲剧性的。

第二天，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讣告及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书，报纸配发了勃列日涅夫的大幅照片。同时还宣布组成以尤·弗·安德罗波夫为主席的治丧委员会。决定12、13、14、15日在全国志哀。12—14日，勃列日涅夫的灵柩按照惯例安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各界人民将在这里向总书记遗体告别。

12日13时，人们一批批走过用红黑两色纱幔装饰的圆柱大厅。已故总书记灵床上方垂悬着红旗，四周放满了苏联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亲友们送的花圈。勃列日涅夫的巨幅遗像挂在大厅正面帷幔的中央，下面是每隔三分钟轮换一次的仪仗队士兵。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一生中所获得的几十枚各种勋章、奖章摆放在灵床前显著位置上。苏联党政领导人轮流分站两旁守灵，身穿黑色衣装的维克托莉娅·彼得罗芙娜坐在灵柩旁，不时用雪白的手帕擦擦眼角。在前来告别的人流中，也有一些妇女流出眼泪，但大多数人只是神情严肃地从死者旁边默默走过。

11月15日莫斯科时间11时许，安葬仪式开始。最先从工会大厦里抬出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巨幅遗像，接着是众多的花圈，随后是50多名将级军官手捧别放在大红缎垫上的勋章奖章列队而出。勃列日涅夫的灵柩由六名年轻军官抬出。两天前刚刚在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新任总书记的尤·安德罗波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吉洪诺夫一左一右扶灵而行，后面是全体政治局委员。红黑两色的灵柩被放在炮车上，由一辆装甲车牵引从工会大厦向红场缓缓移动。灵车在红场绕行一周，停在列宁墓正前方，仪仗卫兵打开棺盖。待苏联领导人登上列宁墓后，追悼会开始。安德罗波夫致了悼词；苏共中央政

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德·乌斯季诺夫，苏联科学院院长阿·亚历山德罗夫，莫斯科计算分析机器厂磨工维·善什卡廖夫，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委第一书记阿·戈尔季延科依次讲了话。然后领导人又走下列宁墓，跟随灵柩来到列宁墓后、克里姆林宫墙下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墓地。这里已经埋下了以往的九名领导人，而勃列日涅夫的墓穴，特意被安排在正中央：右边是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五人的墓地，左边是捷尔任斯基、加里宁、斯大林、苏斯洛夫四人的墓地。下葬前，维克托莉娅·彼得罗芙娜和勃列日涅夫的女儿们一边抽泣一边向遗体告别。然后灵柩由六名仪仗士兵缓缓放入墓穴。这时，在军乐队演奏的苏联国歌声中，礼炮齐鸣，汽笛响起，勃列日涅夫的亲属和苏联领导人依次抓起一把土，撒向墓穴。看着纷纷扬扬的泥土从一只只手中落下，在场的人和通过电视注视葬礼的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句话：一个时代结束了。

墓穴上厚厚的花岗岩石盖，犹如一个巨大的句号，重重地画在了历史上。肉体上的勃列日涅夫从此消失了。几天以后，他那饰着黑红两色纱带的巨幅画像，也被悄悄地从原来的地方取走，而且肯定明年不会再挂了。尽管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是自斯大林逝世近 30 年来苏联最隆重的一次，尽管他的同事们为他打破常规，把墓穴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墓地的正中央，但这并没能让勃列日涅夫在精神的世界中永存。也许，他留给他的人民的那种衰老、迟钝、步履蹒跚的形象过于深刻了，以至于很难在人民心中赢得像格里申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前几天所说的那种尊敬和威望。他在生前最后一次红场阅兵式上，检阅了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正是这支武装力量在他前任和他本人的努力下，成了使苏联能与美国抗衡的保证，成了使苏联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础。他葬礼上军官们手捧的那一枚枚奖章、勋奖，不全是为满足他晚年的癖好特意颁发的，毕竟其中有一部分是他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勤奋工作的见证。他执政了 18 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也是继列宁、斯大林之后，第三个死在工作岗位上的领袖。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让苏联人像当年失去列宁、斯大林那样，为他的逝世感到一种震撼般的悲恸。这可以说是一种反差，一种对比鲜明且又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的反差。这种反差在勃列日涅夫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以至于人们都要禁不住问一个为什么。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容易，但是，这个答案如果有，那它肯定存在于他生命的轨迹划过的那段时空里。

勃列日涅夫传

第一章第聂伯河畔的石城之子

广袤丰腴的乌克兰大地上，一条大河自北向南，蜿蜒曲折，纵贯而过。宽阔的河道汇拢起两岸纵横交错的支流，荡着滚滚波浪在黑土褐岩、灌丛草原上一泻千里。它宛若一条大动脉连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血管，为繁衍生息在她怀抱里的万物生灵，注入生机与活力。这就是第聂伯河，一条孕育了古代基辅罗斯文明、哺育着两岸众多民族的母亲河。

从历史名城基辅顺第聂伯河而下，在接近大河转弯处另一座大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同时与这条大河和苏联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用著名的“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姓命名这座不太有名的中等城市，固然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它的知名度，但真正使它身价陡增、名声大振的还要属勃列日涅夫，因为这个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第四个领导者，就出生在这里。

1936 年以前，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一直叫卡缅斯科耶，意即有“岩石的”或“石头的”地方。在它东面是全苏最大的煤矿所在地顿巴斯，西面是有名的铁矿区克里沃罗日那。连接两个矿藏地的铁路又正好经过离两个矿区差不多等距的卡缅斯科耶，加上后者紧依第聂伯河，可以利用这条大动脉把炼出的钢材便宜地运到沿岸各地，因此这里便被俄国的和外国的工业家们看中。19 世纪 80 年代末，法国、比利时合营的南俄公司，在卡缅斯科耶点燃了乌克兰最初的两座鼓风炉。从此，这里渐渐成了南俄冶金业集中的地区。到了 20 世纪初，卡缅斯科耶的人口已由 2000 多人发展到了 18000 多人。昼夜不停地从高炉和转炉中喷出的黑灰色烟柱，翻滚在它的上空。晚上，出炉的铁水又把一团团桔红色的光芒抹上夜幕，洒向第聂伯河宽阔的河面……这种景象甚至引起了正在专心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列宁的注意，在他的名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就出现过卡缅斯科耶的名字。

就在卡缅斯科耶的鼓风炉点燃没多久，一个名叫雅科夫·勃列日涅夫的农民，带着全家离开库尔斯克省斯特列茨克县勃列日涅沃村的老家，来到这里当了工人。这便是后来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祖父。雅科夫的儿子伊里亚·勃列日涅夫继承父业，也是一名轧钢工人。他与同车间的一个老工人的女儿娜塔莉娅结婚。娜塔莉娅于 1906 年 12 月 19 日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列昂尼德，再加上父名和姓，未来总书记的全称就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几年后，伊里亚·勃列日涅夫夫妇又相继有了次子雅科夫和女儿薇拉。

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出生时，他家在卡缅斯科耶定居差不多 30 年了。作为俄罗斯族人，他们在这个乌克兰的城镇里还只占少数。好在卡缅斯科耶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犹太人、德国人和捷克人都有，非乌克兰人在此地并不受歧视和排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父亲不仅有固定的工作，而且还粗通文墨，漂亮能干的母亲，也略懂读写，因此，他们对长子的希望就不单单是让他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个稳重而严肃的人。他不娇惯子女，也不惩罚他们。除了像大多数轧钢工人一样高大强壮外，他还

列宁在书中统计了 103 个欧俄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的材料，卡缅斯科耶是其中之一。见《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二版，第 557 页附录三。

总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即便在家里也把脸刮得干干净净，衣衬整洁。由于他性格直爽，为人处事不要手腕，得到工友们的尊敬。他常用这样的话教育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许下了诺言，就要履行。要是对一件事有怀疑，就应该直说；如果你害怕，就不要去做；一旦做了，就不要胆怯。如果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就坚持到底。”十月革命胜利后，列昂尼德的父亲成为三班工作制中一个班的定料员，这是一个需要丰富的生产知识和仔细计算才能胜任的职务，结果他干得不错。30年代，他还被评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但他没能看到自己长子的飞黄腾达，去世时还不满60岁。

列昂尼德的母亲要长寿多了，直到70年代90岁高龄才去世。长大成人并且地位日渐显赫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母亲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她操劳一生，默默承担着抚养子女、操持家务的繁重劳动，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妇女质朴善良的本色，就是在她的儿子成了“大人物”以后，也依然如此。她在相当一段时间拒绝搬到莫斯科去住，而且也拒绝搬到当地政府为她提供的宽敞明亮、设备齐全的住宅去，甚至当她提着篮子去商店购物、别人让她不排队先买时，她都要生气。身为“大人物”的母亲，总有些人千方百计想走她的“后门”，遇到这种事情，她常常举起那双粗糙的手说：“瞧，我有两只手。只要我能做到，我会用它尽力帮你的忙。但我不能吩咐儿子干这干那。”她也为成为“大人物”的儿子担心，当她第一次看到儿子在莫斯科郊区富丽豪华的别墅、成排的外国高级轿车时，叫着儿子的爱称，不安地问道：“廖尼亚，你不担心吗？布尔什维克突然下台了怎么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满8岁。俄国卷进了大战，祸根种下了。但也正是战争爆发前后这几年，卡缅斯科耶的冶金业达到高峰。生产的迅速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有知识的人才。在卡缅斯科耶，当时有四所学校：工厂办的两年制小学、供外国小孩上学的学校、女子中学和正规的古典中学。古典中学原本不收工人子弟，经过大战前几次革命的冲击，古典中学的大门也开始对工人子弟打开了一道缝：择优录取少部分工人子弟入学。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很可能是在念完两年小学之后，于1915年考入了古典中学，他是同时录取的七名工人子弟之一。古典中学的课程很多，德语、法语，拉丁语、俄语语法与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地理，艺术等，都属必修课。在众多的课程中，列昂尼德比较喜欢历史和数学，历史教员科瓦列维奇是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唯一提到的这所中学里的教师，当然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时期为邓尼金匪帮杀害。其他课程列昂尼德成绩平平，特别是外语尤为吃力，因此，他算不上优秀的学生。但他也没有因学习跟不上而辍学。对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学习还有另外的一个“动力”，按当时的规定，他们这些所谓的“官费生”，如果学习成绩优良，可以免除64个金卢布的学费。这笔钱对他父亲那样的工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难怪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说，他长大以后，才知道父母为让他受真正的教育曾下了多大的决心。

在中学上了两年，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接踵而至的国内战争把俄国推进了一个动荡的时期。第聂伯河畔成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德国军队、白卫军、土匪武装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较量的战场。卡缅斯科耶也被卷入了战乱。这里的工厂由于缺少煤和原料以及许多外国工程师弃职避乱，绝大部分陷于瘫痪。城里90%的居民靠工厂的工资生活，工厂停工使他们的境况每况愈下。少得可怜的配给面包并非家家都能买得到，人们只好用值钱的东

西跟郊区的农民换食物，一旦找不到让农民感兴趣的东西了，就只有挨饿。1921年春，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卡缅斯科耶每天有十几具饿殍横尸街头。这段时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父亲回到库尔斯克省的农村老家务农，加上老家亲戚的接济，勃列日涅夫一家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才没发生什么意外。就在这年夏天，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从已被改为第一劳动中学的原古典中学毕业了。在大大简化的毕业典礼上，校方招待毕业生的，是一杯放上学生自己带来的白糖开水。

15岁的列昂尼德很难找到工作。正巧，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彼得罗夫在冶金厂废弃的房子里开办了一所“冶金职业学校”，于是他便成了该校的第一批学生。最艰难的日子慢慢过去了，新经济政策开始显露成效。与日渐活跃、充满生机的农村相比，卡缅斯科耶的冶金业的恢复要慢得多。一面是热火朝天的农村，一面是冰冷的鼓风炉和杂草丛生的工厂，这两种景象对一个15岁的少年所产生的吸引力肯定截然不同。农村的恢复发展，农业经济的活跃，需要一大批农业干部，同时需要培养新一代农村工作者。这些因素合在一起，第一次帮助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选择了生活道路。1923年夏，他告别了故乡亲人，前往库尔斯克，进入设在这里的土地管理与土壤改良技术学校学习。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职业的和政治的两条道路同时在年轻的勃列日涅夫脚下铺开了。

四年技校学习生活结束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为一名土地管理工作。他先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个县工作，之后又来到白俄罗斯的奥尔沙附近的科哈诺沃当土地测量员。尽管勃列日涅夫在这里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一次简朴的晚会上，他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维克托莉娅·彼得罗芙娜。这位未来的第一夫人当时是名护士，随父母从别尔哥罗德迁居此地，而且还是犹太人。不过当时这一切对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员勃列日涅夫来说，构不成与这位姑娘接近并相爱的任何障碍。

1928年，勃列日涅夫又被派到乌拉尔工作，先是在米哈伊洛夫斯克，然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以西的比谢尔季，并成为比谢尔季区的土地局主任。第二年10月9日，他被联共（布）比谢尔季区常委会吸收为预备党员，记载着日后该党总书记跨入党的行列的文件材料，是上述区常委会的第44号记录。50多年后，斯维尔德洛夫州委把这份记录寄给勃列日涅夫，勾起后者对往事的回忆，那一天的情景似乎又浮现在这个70多岁老人的眼前：“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一天！从表面上看，什么都没有变：秋天，下着雨，灰暗的天空，乌拉尔农村不通车的乡间道路依然如故。……而实际上一切都变了：去迎接困难，去干事业和去迎接忙碌的日子的已经不仅仅是土地测量员勃列日涅夫，而是伟大政党的一个全权代表……”两年后，即1931年10月24日，勃列日涅夫的预备期结束，他领到了第1713187号党证，成为联共（布）正式党员。在1983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曾谈到他对党的认识与感受：“对我来说，党、为党的事业服务是整个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意识到自己是这个伟大整体的一

1926年制定的联共（布）党章规定，候补党员分三类，（1）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2）农民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手工业者；（3）其他（职员等）。不同类别的候补党员候补期不同，第一类人至少6个月，第二类人至少1年，第三类人至少2年。勃列日涅夫是技术工作者，属第三类范畴，因此他的候补期为2年。另外党章还规定，党员的党龄从成为正式党员时算起。

部分……我就难以度日。……假如没有我们的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不管刚刚拿到党证的勃列日涅夫当时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他后来所说的这些，应当承认，他说的是事实。的确，没有党就没有勃列日涅夫后来所获得的一切。由此看来，他那没有多少文化的老母亲出于母爱所讲出的担忧，倒真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勃列日涅夫成为预备党员的1929年，在苏联现代史上被称为“大转变的一年”。它因同年11月3日斯大林发表的同名文章而得名。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进行坚决进攻作为这种转变的标志。一个星期后，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会，主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集体农庄的建设。全会决议确认了苏联已经进入对农村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时期，提出密切注意集体化问题是各级苏维埃最重要的任务。于是，一场向农业集体化疾速推进并同时消灭农村中剥削阶级势力的进攻号角吹响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农业干部，一个一只脚刚刚跨进党的门槛的青年，不可能而且也不会置身在这场铺天盖地的运动之外。勃列日涅夫自己曾谈起过他在1929至1931年间在乌拉尔的经历和见闻。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当时这场运动相当积极的参加者，因为正是在这两年中，他不仅当选为比谢尔季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代表，成为该区土地局主任，很快又被选为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最后，1931年初，升任乌拉尔专区土地管理局副局长，从比谢尔季来到乌拉尔专区的首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这一年他24岁，对于这样的年龄，副局长的职位是相当高的了。

看来，勃列日涅夫在乌拉尔一帆风顺，前程似锦。按照正常逻辑，他应该在这个党员数量比较少、正展开大规模建设的地区呆下去，利用已打开的局面谋求更大的发展。但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只干了几个月的勃列日涅夫忽然离开了乌拉尔，回到了他的家乡卡缅斯科耶，在第聂伯钢铁厂里当了一名工人。据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里的解释，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他认为集体化事业已经取得了不可逆转的进展，而工业则羽毛未丰，因此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前沿在工业战线，几乎所有勃列日涅夫的传记作家都对此解释不以为然。但在缺少确凿的材料证明这次反常调动的情况下，所有别的解释又都只能是一种猜测。不过了解一下当时大的政治背景也许对思考这一问题多少有些帮助。1930年到1931年，正是集体化运动出现严重反复的两年。斯大林的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说对了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但却开错了药方，把责任推到了地方干部身上。这些地方干部一方面看到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丧失殆尽，如勃列日涅夫所在的乌拉尔专区集体化的水平从1930年3月1日的68.6%，下降到6月1日的26.6%；另一方面，他们受到上下两方面的指责，承担了极大的压力。而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又要求再次加快集体化速度，刚刚降温的运动又要急风暴雨般地展开。这场运动的结局如何？会不会再次成为“替罪羊”？这些问题是摆

美国的约翰·多恩伯格、原西德的米夏埃尔·莫罗佐夫、俄罗斯的罗伊·麦德维杰夫等都对勃列日涅夫的这次调动作了种种推测。多恩伯格列出不下五种可能，如自己的选择、官僚的差错、被家乡的高级官员看中，以及被莫斯科农业大学开除或退学。莫罗佐夫说勃列日涅夫是个善观时代动向的人，因此他明白在乌拉尔这样一个农业越来越被挤到第二位的地区，农业干部获得荣誉和升迁机会越来越小，而风险则相应增大。麦德维杰夫从几个乌拉尔人那里得到一种解释，说勃列日涅夫积极参加了剥夺富农的工作，了解到了其中的“阴暗面”，因而想趁早逃避。但上述说法均无材料证实。

在每一个具体工作者面前的很现实的问题。同时，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那句有名的口号：“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要求布尔什维克去掌握科学技术，成为专家和内行。领袖的身份和口号式的语言就是最强有力的导向，与捉摸不清、变化无常的农业相比，工业似乎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了。那首很快风靡全苏的《人人想当工程师》的歌曲，拨动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心弦。在30年代的苏联，党员干部自由选择工作岗位相当困难，但响应党的号召是天经地义的。借助当时大的政治环境、顺应刚刚兴起的社会潮流，勃列日涅夫一定是抓住了某个机会，顺利地完成了他生活道路上一次极不寻常的转向。

回到卡缅斯科耶后，勃列日涅夫白天在工厂里当钳工，晚上在当地冶金学院夜校学习。他很快便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先被选为系党小组长，然后是工会主席，跟着又当上了学院夜校的党委书记，并同时担任两个行政职务——冶金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和冶金夜校校长。勃列日涅夫并非搞教育的出身，而且当时他自己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把多项与教育有关的职务委任于他，说明在“技术决定一切”口号下，教育，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已成为各级组织一项特别迫切的任务。而勃列日涅夫被迅速选来充当本地区完成这一任务的骨干，至少证明了他不是由于在乌拉尔犯了什么错误才被迫离开那里的。

身兼数职使勃列日涅夫在大学学习的最后两年过得很紧张。同时，由于他在冶金学院和夜校所具有的地位，也使他得以结识一批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是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和稍后的“干部决定一切”的受益者，他们是30年代最受重视和尊敬的党的技术干部中最朝气蓬勃的一代。随着3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大清洗运动对比他们年长的干部的冲击，他们中的不少人先后被迅速提拔到了卡缅斯科耶市及所在的叶卡杰琳诺斯拉夫州的党政领导岗位上，五六十年代又有几人上升到中央领导岗位。当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后，他的这些同学便被委以重任，构成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第聂伯帮”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然，上大学时的勃列日涅夫还想不到为自己日后执掌党的大权作准备。他面临的迫切任务是顺利从冶金学院毕业，拿到工程师职称，因为这才是那个年代最有用的“敲门砖”。1935年1月底，他如愿以偿。他的毕业设计《捷尔任斯基工厂高炉瓦斯静电净化设计》通过了答辩，理论部分和设计部分均为优秀，他被授予了热动力工程师职称。就这样，经过五年寒窗，农业技校毕业生、土地测量工作者勃列日涅夫成了冶金工程师和全苏第二大钢铁厂——捷尔任斯基钢铁厂动力车间的领班。时代决定个人的命运，个人命运反映时代的特征。勃列日涅夫人生的最初几步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动力车间工作了一年之后，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第二次远离故土，到贝加尔湖以东的赤塔去。他被征召入伍，要在那里服满所规定的兵役。

根据1925年9月颁布的义务兵役法，国家每个19岁到40岁的男性公民均应服兵役。服役期包括三部分：征集前训练、现役和预备役。征集前的训练由各基层组织就地进行。现役分为三种：常备部队、地方部队和军外军事训练。常备部队按兵种不同服役期从2年到4年不等，一般规定陆军诸兵种服役期2年、空军3年、海军4年。第二年，苏联又对上述兵役法作了补充规定，即在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和毕业的公民，也要接受军事训练和服现役。只不过由于对大学生普遍进行了理论课程和两个月实际操练的高

级征集前训练，他们毕业后服现役的期限缩短为一年，而且经考核后还可取得预备役相应的军事职称。这可算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点政策倾斜。当年 29 岁的勃列日涅夫不论从哪方面讲，都没有理由不履行服兵役——当然是现役——的义务。

30 年代前半期，国际形势日趋紧张。日本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控制了中国东北，对在这里与中国有着几千公里共同边界线的苏联形成巨大威胁。1933 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不仅公开宣扬要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而且逐步付诸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一方面加快进行经济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另一方面也抓紧对武装力量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已经陈旧和落后的武器装备，组建更符合未来现代化战争要求的新兵种和部队。因此，像勃列日涅夫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的技术知识分子，正是部队非常需要的。按照受教育程度，勃列日涅夫被分配到离赤塔不远的外贝加尔装甲坦克学院。那时的装甲坦克兵，与航空兵、炮兵一样，是苏联政府下决心大力发展的兵种。

经过 40 个昼夜的行驶，军列把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一些新兵送到赤塔附近的佩夏卡。在荒凉的黄土地上，长长的铁丝网和木桩围着数排低矮的灰色棚屋，棚屋前面是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面被坦克履带碾轧得坑洼不平。空地的另一边是一道堑壕和半人高的石墙，几辆“T-26”和 BT-4 型坦克蒙着深绿色帆布停在那里。远处，重叠的荒山像一道巨大的屏障，把这座小小的兵营与外界隔绝开了。勃列日涅夫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为期一年的军旅生活。

最初几个月的训练是枯燥艰苦的。无论什么天气，新兵们都要赤膊上操，每天进行长时间的队列训练以及野外行军。新兵训练结束。坦克驾驶、战术及武器装备等科目的训练紧接其后。当时用于训练的“T-26”轻型坦克是苏联在 1931 年研制的，并在 1934 年对其进行了重大改进，被列为诸兵种合成兵团在战斗中主要的支援兵器。但这种坦克对某些地形不能很好适应。据勃列日涅夫回忆，他所在的坦克学院第一营营长科普佐夫有一次指着离营房不远的一条河对勃列日涅夫他们说：

“你们在这里的都是工程师。请你们解答一道题。你们会驾驶坦克开过平原，翻越障碍，攀登山岗斜坡，可是你们考虑过没有，怎样才能驾驶坦克通过这条河呢？”

勃列日涅夫几个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言以对。但他们马上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利用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可见，征召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服役，并能利用他们所学过的知识，就可以在让他们履行自己公民义务的同时，作出更多的有益于国防建设的贡献。

看来，勃列日涅夫在服役期间表现还不错，他不仅是这批新兵中第一批被任命为排长中的一个，而且不久又担任了连的政治指导员。这项任命是否考虑到了他服役前的工作经历不得而知，但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卫国战争中从军时的身份，他一直是一支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者。

一年的服役期转眼过去，1936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复员后再次返回他的家乡——坐落在第聂伯河畔、拥有全苏第二大钢铁厂的那座城市。这座城市几个月前刚刚换了一个新名字：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从 18 世纪叫起的

卡缅斯科耶随之成为历史，渐渐地被人忘记了。

勃列日涅夫仍然当他的工程师，同时担任冶金夜校的校长，不过这所学校已改为冶金技校了。这个职位算不上显赫，如果勃列日涅夫真想从政，这个起点是无论如何不能算高的。假若一切正常，苏联国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不发生特别变故，勃列日涅夫在政治权力阶梯上能上升到他日后达到的高度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恰恰在 30 年代中后期，一场“大清洗”运动狂风暴雨般展开了。首当其冲的是党、苏维埃、军队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清洗的方式，除了把他们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外，还有无情的肉体消灭。

在乌克兰，清洗进行得尤为剧烈和残酷。乌克兰共产党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自己的特点，它的主体是由布尔什维克和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成。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且独立性较强，直到 1920 年该党才迫于形势与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合并，但其民族主义意识和独立倾向仍时有表现。这让强调党内统一和集权的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领导层感到不悦与担忧。1937 年 3 月，随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共产党第二号人物波斯杜谢夫被贬职，清洗在乌克兰开始了。5 月中旬，基辅军区司令员、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亚基尔将军被解除旧职另任新职，但尚未上任便被逮捕，很快被处决了。8 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到乌克兰首府基辅，指责乌克兰党政领导未能完成清除“人民敌人”的任务，要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选举跟随他前来的、当时任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接替科西奥尔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后，他建议乌克兰中央委员全体 102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去莫斯科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陈述他们的观点。除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柳勃钦科拒绝前往而开枪自杀外，其余 101 人到达莫斯科。结果只有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等三人幸免于难，其他人都被从政治上或肉体上消灭了。在对乌克兰党政最高领导层清洗的过程中，乌克兰几乎所有的州、市、区的党政领导，以及工厂、高等院校、文艺界的领导人都受到牵连，上上下下的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职位，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它势必要由新人来填补。勃列日涅夫幸运地搭上了这班不按原定时间表运行的快车。

1937 年 5 月，勃列日涅夫被选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通俗一点说，他当上了家乡城市的副市长，主管市政建设方面的工作。对于新的工作，勃列日涅夫并非完全是外行，早在七年前，他就在乌拉尔担任过比谢尔季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这次的选任极有可能是考虑了他过去工作的经历，同时，他是一名“红色工程师”这一点也起了作用。因为当时任该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的特罗菲莫夫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党员，他对有一名具有工程师职称的副手非常高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勃列

有在卡缅斯克工作过。但他在 1924 年 2 月和 3 月先后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金属工业最高政府委员会主席。在他主持和督促下，设在卡缅斯科耶的南方最大的钢铁厂——第聂伯钢铁厂迅速恢复了生产。捷尔任斯基在俄共（布）第 14 次代表会议作的《关于金属工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第聂伯工厂的重新开工。捷尔任斯基逝世后，第聂伯工厂首先更名为捷尔任斯基工厂，而该厂又是卡缅斯科耶市的主体与象征。

勃列日涅夫家乡所在的州，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就是依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姓命名的。

日涅夫在尽力履行他的职责，而且应当承认，在市政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就并不困难。最让勃列日涅夫感到满意的，是他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争取到一笔拨款，开辟了一条贯穿全城的无轨电车路线。与此同时，一座漂亮的少年宫大楼在 62 天平地而起，巨大的体育场破土动工，带有阳台和大玻璃窗的一幢幢四层住宅楼成为上百户市民的新居，还有平坦宽阔、散发着沥青味的马路，小巧别致、绿木掩映的街心花园。这一切加上穿梭往返在这座古老城市中的红色车身的无轨电车，让人感受到了城市的发展，感受到了现代城市的气息，但对主管这些建设工作的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勃列日涅夫知道多少、了解多少，就很难说了。这不能归咎于居民的麻木和无知，在那个年代，领导们换得太快了，新上任的父母官们没过多久便被分流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成为“人民的敌人”，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另一部分人则被提升到上一级领导岗位上，去面临新的考验和分流。无论哪种人，记住他们的名字似乎都没有多大意义，只用“不幸的”和“走运的”两个词，便概括所有的人了。如果说勃列日涅夫给当时的家乡人民留下什么印象的话，最正常不过的是他被归入后一个词所囊括的那些人中了。

的确，勃列日涅夫是幸运的。他不仅在大清洗于乌克兰开始之际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还能在随后掀起的清洗高潮中免受冲击与牵连。再有，就在勃列日涅夫任职八个月后，一个将对他的政治生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来到了乌克兰，这就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938 年 1 月 28 日的《真理报》登出了这个以乌克兰新的最高领导人的照片和一条简讯：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已选举赫鲁晓夫同志为代理第一书记。当然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任命，因为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这时实际上已不存在了。但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是在对乌克兰原领导层大清洗之后接管乌克兰的，既然是接管，那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党政管理系统，尤其是受破坏最大的党的领导机关。通过正常的选举方式选择干部当时还不可能，但许多工作又必须立即开展，于是有了一种使用干部的新“模式”：代理。既然第一书记可以代理，各级领导又何尝不行呢？在党的机关干部普遍缺乏又不能按正常程序补充的情况下，成为机关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的机遇是很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熟人的推荐。在自己家乡城市的上一级即州一级党的领导机关中，勃列日涅夫正好有熟人，一个是格鲁谢沃伊，另一个是阿尔菲罗夫。这两人都与勃列日涅夫同岁，同是他在卡缅斯科耶冶金学院的校友，只不过他们比勃列日涅夫早毕业一年，但毕业后又都在同一个工厂里当工程师，是勃列日涅夫的好朋友。在勃列日涅夫担任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期间，阿尔菲罗夫和格鲁谢沃伊先后担任过该市党的领导人。阿尔菲罗夫来到州委机关没多久，勃列日涅夫在 1938 年 5 月也离开了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来到州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从搞苏维埃工作转入从事党的工作，负责州党委宣传部。第二年初，格鲁谢沃伊也来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任州党委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也在这时又向上提升了一级，成为州党委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

党的领导在苏联 70 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是高于一切的。这种领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因此，把负责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思想领导的重任委托给不到 33 岁的勃列日涅夫，说明机遇对他的垂青，也说明他在前一段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符合要求的那种干部。这种干部要对党的事业绝

对忠诚，要对党的各项政策永远持积极拥护的态度，要不辞辛苦地埋头于本职工作，当然还要能及时领会并贯彻上级领导的意图。工人家庭出身、在大清洗中不仅自己而且亲人都未受到冲击的勃列日涅夫，自然对党忠心耿耿。他精力充沛，为人随和，有着与农民、工人以及部队官兵打交道的经历，这对他比较成功地扮演宣传鼓动员的角色都有不小的帮助。当然，做思想工作、搞宣传，不像进行市政建设那样显山露水，成果看得见摸得着，这恐怕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和他的传记作者们在谈及他这段工作的政绩时都泛泛而论的原因了。但他的成绩还是能反映出来。据一名 30 年代曾居住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人回忆说：“30 年代后期，是一个喜洋洋的时代——人造的喜洋洋。我们读喜洋洋的书，听喜洋洋的演说，看喜洋洋的电影。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说的同一回事：斯大林是最聪明、最仁慈、最勇敢、最有见识和最先知先觉。他是我们的父亲，他的心里充满了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创造的生活是好到不能再好了。我们就是被灌输这种东西，最后也相信了。”营造一种喜洋洋的社会氛围不困难，把这一切解释为党和斯大林的英明伟大也不很难，关键是让人们面对身边许多与这种氛围格格不入的事物还要对此深信不疑！看来，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做到了，因为人们“最后也相信了”党的灌输。可见，勃列日涅夫除了有幸赶上好的机遇外，他也不是个庸才，至少从根据当时的需要而定出的标准来看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形势的又一次突变，勃列日涅夫会在这个职位上继续于下去。1939 年 9 月 1 日，德军入侵苏联的邻国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苏联没有立即参加反希特勒战争，但也未能置身战争之外。它在对波兰、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大大加强国防建设和备战的力度。而与此关系密切的冶金工业集中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作为国防大棋盘上的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是要先动起来的。巧的是，这一动恰恰又动到了勃列日涅夫头上。

第二章穿过战争硝烟

浓烈的战争硝烟在欧洲上空飘荡。波兰不到一个月亡国；北欧的丹麦、挪威，法国的邻邦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相继沦亡；当法国政府的全权代表查理·亨茨格用微微颤抖的手在《法德停战协定》上签字的时候，大半个欧洲在硝烟中成了希特勒德国的战利品。然后，希特勒又把眼睛盯上了巴尔干。不过，巴尔干仅仅是一块跳板，一旦他冲向并踏上这块跳板，其最后的落脚点就已经确定了，哪怕他在空中做出再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

苏联——跳板后面唯一的落脚点！苏联领导人对国家面临的处境并非浑然不知，只是抱有侥幸心理，希望希特勒德国冲向苏联的起动迟一点，助跑慢一点，甚至腾空的时间也尽可能长一点。这种希望并不是为了无所事事，而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为承受重击做准备。加快国防工业的发展速度，无可争议地成为备战工作的核心内容。为加速国防工业建设，苏联一方面在侵略者无论从西方或是从东方进行空袭都无法达到的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和东部以及中亚等地，新建扩建一批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大型企业，形成具有重要国防意义的工业基地；另一方面，还命令部分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转产军用产品，并在1939年9月，对工业进行了局部动员试验，制定出一系列进一步改进工业军事动员工作的措施。作为当时苏联南方冶金工业中心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也在1940年初接到联共（布）中央的指令，要求把该州的一部分企业立即转为生产军事装备，如阿尔乔姆工厂制造战斗机零件，共产国际工厂制造迫击炮，而勃列日涅夫家乡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钢铁厂生产炮弹。为了加强对国防工业生产的领导，莫斯科还专门发来密电，要求在州党委会中设立主管国防工业的州委书记一职。

州委第一书记扎迪昂钦科主持召开了常委会议，宣读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来电后，提名勃列日涅夫为这一新设书记职务的候选人，理由是，这一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重视，要求承担此职务的人不仅应是受过技术训练、熟悉冶金工业的专家，而且还应是善于做人的工作的组织家，当然还要精明强干。最后表决时，与会常委一致投票赞成托季奥琴科的提议。

至少在1941年2月联共（布）第18次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州一级主管国防工业的书记还只设一人。因此他要管的不仅仅是那些已经转产军用物品的工厂企业，还要过问本地区内所有与国防建设有关的企业生产情况并就此对上级机关负责。就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委任给勃列日涅夫的这个新职位，并不是轻松且容易出成绩的工作。相反，是一件苦差事。在大战爆发、加快国防建设已提上日程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金属以满足国防需要。然而，苏联1939年生铁和钢的产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略有下降，这就使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了。为扭转这种状况，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不仅制定了完成钢铁和轧材生产预定计划的措施，对有关企业的领导和党的负责干部提出严厉批评和警告，而且对工人和职员的劳动时间和劳动纪律也做出明文规定，把7小时工作制改为8小时工作制，6天工作周改为7天工作周，禁止工人和职员擅自离开企业和机关，等等。实行这些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无疑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而身处来自上面的压力和来自下面的阻力之间的，自然少不了这位主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国防工业的书记。此外，勃列日涅夫还要完成另一项棘手的工作，这就是必须向因加强了

劳动强度而怨声载道的工人们解释清楚，既然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了边界及友好条约，为什么还要为生产枪炮子弹让他们加班加点？换言之，这个条约可信不可信？在当时，这的确是个难题。众所周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一直在公开宣传上称自己是该条约的坚定维护者，其用意是要尽量不给希特勒造成指责苏联、乃至侵略苏联的借口。直到 1941 年 6 月 14 日，可以说到了苏德战争爆发前的最后时刻了，塔斯社仍然发表消息，表明苏联一直忠实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任何有头脑的人又都不能不对它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可以在心里想，可以在私下说，唯独不能在公开场合讲，而这对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让他们为国防建设心甘情愿地做贡献，多少是不利的。隔着一层纸去与人沟通，对自己不相信的还必须要说相信并且让别人也相信，这并不是每一个 30 多岁的青年人都能做到的。勃列日涅夫努力这样做了，尽管很难，但必须这样干，否则他的政治前途就完了。

一次，大约是 1940 年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召开例行的宣讲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该州各地各行各业的宣讲员 400 余人。已是负责国防工业的州委书记勃列日涅夫受命作有关爱国主义的报告。这是当时普遍采取的进行战备动员的形式。大概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提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时，有个名叫萨赫诺的宣讲员站起来说道：“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应该做解释工作，说明互不侵犯条约是真实的，谁不相信，谁就是散布挑拨性言论。可是，人民并不太相信啊。我们怎么办呢？还要不要解释？”

这个问题问得十分突然，而且表达了在座相当一部分宣讲员的意见。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勃列日涅夫身上，等待他的回答。回避是不可能了，当时的环境又不允许长时间斟酌，勃列日涅夫略一停顿，然后说：“一定要解释。同志们，我们要一直解释到法西斯德国彻底垮台为止！”

这大概就是扎迪昂钦科推荐勃列日涅夫时说 he 精明和善于做人的工作的诠释吧。一方面，他有清醒的原则意识，在什么场合该如何做、如何说他是清楚的。在人民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是对希特勒德国“不太相信”（这种不相信在勃列日涅夫的家就有）的情况下，他还要求“一定要解释”，因为这是党的既定政策，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原则问题，他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触雷”，即使有另一种想法也不能说。另一方面，他也多少知道只讲一些空话、套话反而让人们不好接受，还要照顾人们仇视法西斯的心理，这种心理自希特勒上台，特别是经过有成千上万苏联志愿人员参加的西班牙内战被培养起来了。与培养这种心理的时间相比，苏德友好的时间太短了。因此，他强调德国的“彻底垮台。”

对希特勒及法西斯德国的仇视，在 30 年代中后期已经深入苏联人心了。勃列日涅夫生活的这个纯粹的工人家庭亦不例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勃列日涅夫的父亲，这位老工人和他后来成为总书记的大儿子的一段对话，让后者在老年仍然念念不忘。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那天我下班回家，习惯地对父亲谈起厂里的事。但父亲却想着别的什么事。他打断我的话说：

‘廖尼亚，你说世界上哪座山最高？’

‘埃佛勒斯特峰。’

‘那么它有多高？’

我慌了：莫非他在考我？

我对他说：‘记不准了，将近 9000 米吧……你问这干吗？’

‘埃菲尔铁塔呢？’

‘我看有 300 米高。’

父亲半天不作声，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然后说：

‘廖尼亚，你听我说，要是叫我们造铁塔，我们会造得更高的。只要给我们钢材，我们能造 600 米高。’

‘父亲，你这是要干什么？’

‘在塔顶搭个绞刑架，吊死希特勒。要让大家老远就能看到战争贩子的下场。看来，世上的希特勒不止一个，也许有好些个。这样就连吊死他们的地方都有了。嗯？你看怎么样？’”

勃列日涅夫没记下他当时的反应，也许，他被父亲这近乎童话般的想象逗笑了。是啊，那毕竟是在 30 年代，希特勒大举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还没有制定、更没有付诸实施呢。但是到了 1941 年 6 月 22 日，如果勃列日涅夫再想起已经故去父亲的这段话，他绝对笑不起来了，没能被吊死的希特勒终于把战争强加给了苏联……

1941 年 6 月 21 日这天，虽然是星期六，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机关仍同平常一样繁忙。上午处理了一些例行事务后，勃列日涅夫便来到州党委会议室，参加对派往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进行审查。审查由代理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格鲁谢沃伊主持，从下午 3 点钟开始，对 150 名干部逐个进行谈话，然后由与会的常委们对每个人作出评定，并根据被审查者的不同情况，决定把其派往何种兵种。从地方党政机关向部队选派政工干部，是战备动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审查持续了 11 个小时，结束时已是 6 月 22 日凌晨 1 点了。从会议室出来，勃列日涅夫又来到格鲁谢沃伊的办公室，他们要核对某些项目的建设进度和重要产品生产情况的报表，共同签字之后报送莫斯科。自 3 月份开始，这种报表要由州委每天上报，而且要随时准备送交斯大林查阅，所以无论是格鲁谢沃伊还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书记勃列日涅夫，每天就是再累再忙，这件事是绝对不能拖延的，而且对其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个数字都要仔细斟酌、核对。

莫斯科和斯大林如此关心这个州的生产情况，并非没有理由。到战争爆发前。该州地域内建有 16 座高炉和 36 座平炉、56 台轧钢和轧管机、77 座铁矿。1940 年，这个州生产出 318 万吨生铁、301 万吨钢、221 万吨轧材，这 3 个数字分别占全苏相应产品总数的 20%，16.5%和 18.2%。此外，对国防工业具有重大意义的锰矿也在全苏名列前茅。这样一个州自然要被莫斯科和斯大林重视，而身为该州国防工业主要领导的勃列日涅夫也就必须要付出十二分的勤奋和努力。

核对完报表，勃列日涅夫又马上驱车赶往正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郊修建的军用机场工地。这是一个由中央控制的重要工程项目，正在日夜不停地加紧施工。处理完机场施工的工作，天快要亮了。对勃列日涅夫，或者说对已经习惯了斯大林式的作息时间表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才到了休息的时间。勃列日涅夫准备回家睡觉，可是当汽车经过州委大楼时，忽然发现格鲁谢沃伊的汽车停在楼前，再透过车窗往楼上一看，格鲁谢沃伊的办公室亮着灯。勃列日涅夫心里清楚，正常的情况下格鲁谢沃伊这时应该在家里睡

觉，现在他来到办公室，肯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他忙让司机停车，刚从车上下来，就看见格鲁谢沃伊队窗口探出头冲勃列日涅夫做手势让他马上上楼。勃列日涅夫睡意全无，三步两步跑到楼上，疾步走进格鲁谢沃伊的办公室，州委另一位书记杰缅捷夫也在这儿。格鲁谢沃伊表情严峻，低声一字一顿地说：

“我刚从第七步兵军司令部回来，多勃罗谢尔多夫将军给我看了从莫斯科红军总司令部发来的明码电报，说希特勒德国已经入侵苏联……”

“战争？！”勃列日涅夫与杰缅捷夫相视而语。

格鲁谢沃伊看着他们，沉重地点了下头。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所在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在战争爆发当天就陷于战火之中，共和国首府基辅遭到德军的轰炸，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虽然没有立即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但要一下子把全州的生产、生活转入战时轨道，有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人们去做。动员参军，组织军需用品生产，在各地区经济联系被破坏的情况下实行生产自给，当然还有随之开始的把重要的工厂、设备和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区，等等，都急如星火。根据联共（布）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皮瓦克的指示，州委所有工作人员都穿上了军装，并依不同级别佩带上相应的领章。这样州委的几位书记之间的原有分工已经不存在了，常常是一个命令下来，大家分头行动，全力落实。

当时，动员参军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部队亟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去担当新组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工业区，产业工人多，党员的比重较大，红军总司令部专门派一个军官小组，准备从这里至少选拔两万名共产党员入伍。战争环境当然不允许讨价还价，可当时共产党员在各自的单位里都占据着关键岗位，其中绝大多数是生产的行家里手，把这样的人过多地从生产岗位上抽走，势必会对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各市、区对此都有一定的顾虑。州委书记们只好分头到各市、区做工作。勃列日涅夫被派到新莫斯科斯克市，他先督促市委第一书记彼得洛夫最大限度地把党员送入部队，然后又向州党委提出，说鉴于新莫斯科斯克市由于抽走了大批党员，亟需补充党员，因此他建议从州内其他党员较多的市、区党组织中抽调 500 名党员补充新莫斯科斯克市。州委觉得这一建议合情合理，一致通过了。结果各方都感到满意：军方以新莫斯科斯克市得到大批的党员，彼得洛夫又从其他市、区得到补充的新党员，而那些被派往新莫斯科斯克市工作的党员们也不应该有多大抱怨，与上前方相比，这个调动近多了……这就是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式的工作方法，他善于在讨得皆大欢喜的同时把事情办了。

针对南方日益严峻的形势，1941 年 6 月 21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决议，决定组建南方方面军。新组建的方面军司令部中本身缺少有经验的政工干部，而 7 月中旬联共（布）中央决定在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后，使方面军党政机关愈发显得人员不足。正是从这时起，大批地方的党政高级领导干部开始进入作战部队。勃列日涅夫也就是在这时，1941 年 7 月中旬，离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来到南方方面军政治部工作。如果不算战前那一年的义务服役期，他的军人生涯从这时才算正式开始。当时，

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里说他在战争当天就报名上前线并得到批准，不符合事实。他直到 7 月中旬才正式入伍。但在战争爆发最初几天，他的确穿上了军装，不过并未入伍。

对部队中的政工干部授予的军衔与军事指挥员不同，勃列日涅夫被授予的军衔是旅级政治委员。

南方方面军是由莫斯科军区野战领导机关组建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伊·弗·秋列涅夫大将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员，副国防人民委员、一级集团级政治委员亚·尹·扎波罗热茨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格·季·希舍宁少将任参谋长，师级政治委员费·尼·沃罗宁任政治部主任。这些都是勃列日涅夫的上级首长。据勃列日涅夫时代出版的一本军史说，在1941年9月中旬以前，勃列日涅夫在一个直属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负有特殊使命的小组里工作。从各种材料上看，这个小组的使命之一很可能就是协调方面军所辖部队与所在地区地方党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协助调动地方各种力量配合部队作战。这样，有一点可能澄清了，勃列日涅夫进入部队之初，从事的是与他原有职务（州委书记）关系密切的具体工作，他既没有立即成为方面军政治部的领导，更不是掌握方面军最高权力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即便他后来被任命为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仍然进入不了方面军一级的最高决策核心。

这段时间，勃列日涅夫不仅与州委保持着电话联系，及时通报前线的局势，而且还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派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参予处理一些需要军地双方协作解决的问题。7月中下旬，前线的局势继续恶化，南方方面军的部队仍无法阻止德军的强大攻势，战线距第聂伯河越来越近了。7月1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准备把党组织转入地下和建立游击队的命令送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两天后，勃列日涅夫奉命通知州委，方面军决定在该州建立防线。8月7日一早，勃列日涅夫赶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任务是两个：加快动员后备役部队和加快该地区防线建设的速度。当时的州委第一书记格鲁谢沃伊后来描述了那天的情景。对勃列日涅夫，他写道：

“他重又与我们见面了。像以前一样，拿着军装，戴着团级政治委员的领章。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脸晒黑了，也瘦了点，显得挺干练。他一面用手推捋着总是从高高的额头上滑下来的浓黑的头发，一面愉快地微笑着与老熟人们握手、拥抱，但从两眼黑黑的眼圈，从紧张的眼神还是能让人感到，在他平静的外表后面隐藏着的焦虑和不安。”

勃列日涅夫用他带来的军用地图——这种地图格鲁谢沃伊第一次看见——简单介绍了前线的形势，他指着地图告诉他的这些原来的同事们，情况已发展得非常困难，特别是方面军的右翼，敌人在乌曼一带包围了第6和第12两个苏军集团军，德军的意图是粉碎西南方面军左翼后以主力突入南方方面军后方，而南方方面军司令部已没有可资利用的后备力量，所以要避免陷入被合围的境地，就必须把方面军的部队撤退到新的防线。大本营已同意从自己的后备人员中拨给南方方面军10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的建制，这些师要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组建。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由这些师组成一个后备役集团军，并对它寄予厚望。后备役集团军的野战领导机关就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州委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帮助后备役集团军。

见1982年由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出版的《为祖国而战的第18集团军》。该集团军战争初期被编入南方方面军战斗序列，后勃列日涅夫任该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格鲁谢沃伊此处所说大概有误。多种材料证实，勃列日涅夫在战争初期为旅级政委，因此他应佩带旅级指挥人员的领章，即领章上各有一颗菱形星。

勃列日涅夫还询问了有关居民、工厂和新式武器装备撤退的情况，以及转入地下的党组织的准备情况。随后，他在格鲁谢沃伊陪同下，视察了在第聂伯河上架设浮桥的工作。他又来到彼得罗夫斯基冶金厂，这里正在制造装甲车。当天他又赶往他的家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了解捷尔任斯基工厂撤退情况，顺便再到驻扎在该市的第 273 步兵师看看。他们傍晚返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二天，又到部署在第聂伯右岸的第 275 步兵师的防线上转了一天。每到一处，勃列日涅夫都要找人谈话，了解人们的思想、要求，当然他也介绍一下前线的形势，鼓动人们的劳动和战斗情绪。每天晚上，他都要到州委通过电话把视察了解到的情况，详细汇报给方面军军事委员扎波罗热茨。

尽管方面军司令员秋列涅夫将军竭尽全力想守住第聂伯河一线，保住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但德军不惜一切代价的进攻和苏军最高指挥机关的错误，这一努力最终落空。8 月 25 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失守。

在 1941 年剩下的几个月中，勃列日涅夫仍然没有上前线参加战斗。他工作的性质使他只能在后方，或者确切地说，是在第二线履行军人的职责。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还保留着一份勃列日涅夫这年 10 月 21 日写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汇报了方面军政治机关在协助司令员、指挥部指挥军事行动时所做的工作，以及在把兵工厂撤往东方上给予地方政权机关的强有力帮助情况，等等。此外，两名《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科多夫和梁斯科夫斯基在后来出版的《不朽》一书中，还记下了 1941 年 11 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向他们讲述了在保卫罗斯托夫的战斗中，第 56 集团军一个炮兵营的 16 个人苦战德军第 14 坦克师，击毁了敌人 12 辆坦克后全部光荣牺牲的事迹。勃列日涅夫亲自把两名记者带到第 56 集团军进行采访。据说，在这时进行的保卫顿巴斯战斗中曾在苏军中引起巨大反响的鞑靼作家鲍里斯·戈尔巴托夫的《致同志们的信》，也是勃列日涅夫建议方面军报纸印刷了 30 多万份散发的。格鲁谢沃伊这时也见过两次勃列日涅夫。一次是 9 月下旬在第聂伯河左岸别斯查克村，“消瘦、两眼因睡眠不足而发红，脸色灰暗”的勃列日涅夫急匆匆地赶往一个刚刚从右岸撤下来的师里“帮助师指挥员和政工干部，鼓舞战斗士气”；另一次是在 12 月份的斯大林格勒，勃列日涅夫奉命到此来分配方面军政治部的后备干部，并把他们送达指定的部队……

这当然不是勃列日涅夫这段时间的全部工作，但从这几个侧面不难看出一个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工作的性质。在那异常艰难的战争初期，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的政工干部虽然用不着上前线浴血奋战，但在当时总的环境下，工作也绝不轻松，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精力。

到战争结束时，勃列日涅夫身上佩带着七枚勋章。其中有 2 枚红旗勋章、1 枚红星勋章、1 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1 枚二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等。除红星勋章外，其他几种勋章都明确规定是授予直接参加战斗并有突出表现的军人的。这就是说，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不仅鼓动别人、而且也亲身参加过战斗，并且表现不错。与胜利阅兵式上那些年岁相当、胸前缀满勋章的将军们相比，勃列日涅夫少将的确算不上军功卓著，然而正是由于少，这几枚勋章对勃列日涅夫来说才更显得珍贵。

1941 年 9 月中旬，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

直到 1944 年 11 月 2 日，勃列日涅夫才获得少将军衔，晋升得较慢。这与他工作的性质有一定关系。

1942年初，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之后，随即展开全线反攻，试图一鼓作气彻底扭转苏德战场战局。勃列日涅夫所在的南方方面军，尽管在前一阶段受到极大削弱，也奉命转入反攻。南方方面军受领的主要任务是与其右翼的西南方面军一起，在哈尔科夫东南的巴拉克列亚到阿尔乔莫夫斯克之间发起突击，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总方向发展进攻，最终目的是把顿巴斯地区的德军围歼在亚速海沿岸。这一战役任务让无论是在人员还是在装备上对敌都不占优势的西南和南方方面军去完成，无疑困难重重。1月28日，苏军发起进攻，在100公里正面上突破德军防御，顽强地向西和西南推进90—100公里，夺回了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等城市。两个方面军总的任务未能完成，但南方方面军的部队还是打了几个漂亮仗，得到最高统帅大本营的肯定。在这次后来被称为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进行的十几天中，已任南方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勃列日涅夫几乎一直穿梭于各前线部队之间，履行鼓动、宣传之责。保留下来的一份档案证明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这次战役中勃列日涅夫的表现评价不低：“在第6、第12和第57集团军时，勃列日涅夫同志经常深入战斗连队，鼓动红军战士、政治工作者和指挥员去粉碎法西斯分子。勃列日涅夫同志是一名勇敢的战斗政治工作者。”因此，他与一批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一起受到奖励，获得了他的第一枚红旗勋章。

5月中旬，南方和西南两个方面军组织的哈尔科夫战役失败，两个方面军再次遭到重创，不仅使年初取得的战果丧失殆尽，而且开始了溃退，德军疾速推进，占领了克里木半岛、顿河畔罗斯托夫，进入了北高加索，一步步逼近了伏尔加河边的斯大林格勒。南方方面军在一系列苦战之后元气大伤，除个别部队尚有些战斗力外，绝大部分集团军都已空有其名，甚至连有组织的撤退都无法做到。7月28日，最高统帅部撤销了南方方面军的建制，把它与北高加索方面军合并组成北高加索方面军。但北高加索方面军建制仅维持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9月1日，它又被撤销，其部队转属外高加索方面军，组成该方面军的黑海军队集群。

南方方面军建制撤销后，勃列日涅夫留在北高加索方面军政治部工作。是否继续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一个多月工作的中心内容有案可查，即全力贯彻执行最高统帅斯大林7月28日下达的有名的第227号命令。这个命令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不准再后退一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继续任部队溃退下去只能加速苏联的灭亡，这一道理并不难懂。但在当时异常残酷的形势下，要把它变成那些无论从精神还是肉体上都濒临崩溃的军人的行动，又谈何容易！这时，除下死命令之外，唯一能够指望的恐怕就是代表党对军队领导的政工干部了。于是方面军政治部和各集团军政治部向各部队派去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他们与基层连队的指导员和指挥员一起，向战士们宣讲命令内容，帮助部队加强纪律，消除惊慌失措情绪，惩处具有这种情绪的人员。为了加强前线部队的政治部门，方面军和集团军政治部还从后方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中紧急抽调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直接补充到前线，同时还由方面军和各集团军的政工人员组成4支特别突击队，每队500人，加强在危险方向上作战的部队，勃列日涅夫就是这4支突击队的组建人之一。各集团军也接到方面军政治部的指示，要求他们也要组建突击队。例如，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梅尼科夫8月17日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信，让他赶快组建突击队。短时间内，第18集团军便组建了50个突击队，每个有100名党团员参加。这些突击队的任务不是

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而是深入敌后展开侦察活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破坏敌人的技术装备。

北高加索方面军改编为外高加索方面军黑海军队集群后，勃列日涅夫任该集群政治部副主任。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黑海集群的部队在黑海东北岸的新罗西斯克和图阿普谢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这两个地方在勃列日涅夫的军事生涯中占有特殊地位。勃列日涅夫与在图阿普谢防御战中担任主力的第18集团军正是从这时起建立起日益密切联系的，并最终成为该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与它一同转战各地，直到战争结束。在苏军陆海空三军众多部队中，这是唯一一支被勃列日涅夫视为“老家”的部队。而在新罗西斯克，又有一处让勃列日涅夫终生难忘、而后又被宣传得尽人皆知的地方——“小地”。从勃列日涅夫回忆录里记叙战争经历的那一章特意用“小地”冠名上，就不难掂出它在勃列日涅夫军事生涯中所拥有的分量。

伴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结束，1943年初，高加索的战局发生转折，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外高加索方面军所属部队也纷纷转入反攻。1月5日，外高加索方面军黑海集群指挥部制定了解放新罗西斯克并把德军驱逐出塔曼半岛的作战计划。此次作战主要由第47集团军和黑海舰队部分兵力共同完成。新罗西斯克环采麦斯卡亚海湾而建，海湾和流入海湾北端的采麦斯河把流域分成东西两大部分。德军控制的西岸，地势较高，可以居高临下监视和压制苏军在东岸的行动，也使黑海舰队的活动受到牵制。因此，方面军和黑海集群指挥部决定，在从陆上进攻的同时，派出登陆部队，在新罗西斯克西南方向登陆，以对敌形成反牵制，掩护海湾，减缓陆上部队行动的困难。登陆部队由两部分组成，主要登陆部队在新罗西斯克西北30公里的南奥泽列伊卡（又译南湖）地区上岸；为掩护主要登陆部队还组成辅助登陆部队佯攻新罗西斯克南郊的斯塔尼奇卡。正是这种登陆计划和这个叫斯塔尼奇卡的地区，最终造就了那块让勃列日涅夫和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小地”。

登陆行动预定于2月4日1时30分开始，参加辅助登陆的是从黑海舰队新罗西斯克基地各部队中选出的志愿人员。事先对他们进行了特殊训练，临出发前又组织了宣誓。勃列日涅夫作为黑海集群政治部副主任目睹了这次不同一般的宣誓。指挥员库尼科夫少校没有急于让大家宣誓，而是让他们最后仔细考虑10分钟再来站队。谁要是对自己缺乏信心，觉得经受不了即将开始的殊死搏斗，可以不来站队，返回自己的部队。当10分钟后重新集合清点人数时，只少了两个人。

由于风浪很大，主要登陆部队被迫推迟了登陆时间，而且在开始登陆后，部队无法整建制地渡海。相反，辅助登陆部队渡海比较顺利，登陆点出乎德军意料，在只牺牲一人的情况下，占领了斯塔尼奇卡地区的一块不大的登陆场，缴获4门火炮并马上调转炮口向德军开火。第二、第三批志愿人员随后也在此地登陆。到4日凌晨，已有870人登陆，登陆场扩大到正面4公里、纵深2.5公里。“小地”就这样诞生了。在以后的225个昼夜中，德军向这块最大时长6公里、宽4.5公里的地区倾泻的炮弹和炸弹，据说平均到每个苏军小地守卫者身上，可达1250公斤。这里边，勃列日涅夫多少也分摊到一些。

2月中旬，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加强新罗西斯克方向的进攻力量，把第18集团军调往这里。4月1日，原黑海集群军事委员会委员科洛宁少将和黑

海集群政治部副主任勃列日涅夫上校 一同被派往第 18 集团军，前者成为该集团军军事委员，后者成为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此前，即 3 月 24 日，第 18 集团军中的第 16 和第 20 步兵军组成了登陆集群，由格列奇科少将指挥，整个集团军连同在作战上归其指挥的黑海舰队新罗西斯克基地部队，部围绕配合登陆集群展开军事行动。这样人们慢慢把第 18 集团军称之为登陆集团军了。作为该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的日常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登陆有关，而与登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海峡对岸那块小小的登陆场——“小地”，自然也就包括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了。在“小地”存在的 7 个多月中，他不止一次来到这里，其中就有那次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历险。

那是 4 月 17 日夜，勃列日涅夫随同支持“小地”的部队和物资从奥斯沃多夫码头出发，乘黑夜渡海前往“小地”。勃列日涅夫搭乘的“里查”号，是条破旧的拖网船，驶在这支船队的最前面。快接近“小地”所在的采马斯卡亚湾时，“里查”突然触雷，船体被炸裂，与领航员一同站在驾驶台右侧甲板上的勃列日涅夫，随着一声巨响和冲天而起的火光，被气浪抛到半空。

“我没有感到痛，也没有想到死。”勃列日涅夫后来回忆说，“人们有时写道，人在这种时刻，会想起自己的亲人，会在他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他的一生，开始明白自己一生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勃列日涅夫很现实，他没有考虑那些复杂的问题：“在这一刹那，我的脑海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千万别再落到甲板上。”

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一条也许不太优美、但却很幸运的弧线后，没有落在甲板上，而是落在了水里，这对在第聂伯河畔长大的他来说，的确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勃列日涅夫没费多大劲便游到了随后驶到的小艇边，被人拉了上去。

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勃列日涅夫大难不死，甚至都没受伤。所以上岸以后，有人看见他时，他“兴高采烈”，只是能看出“他给冰凉的海水冻得够呛”。当一名船长让一个小水手冒着敌人的机枪射击到停在岸边的船舱里取来酒让勃列日涅夫喝点暖暖身子时，“勃列日涅夫大笑起来，喝了酒，说了声谢谢”，同时又责备船长不该让一个孩子冒险去取酒。这时，德军向苏军阵地发起进攻，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几名军官一起抓起手提机枪和手榴弹投入了战斗。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有这样的经历和举动简直太平凡了，与那些整月整年生活在枪林弹雨中的第一线指战员的经历相比，的确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不过，就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类似的经历并不多见。身为政治部主任，他更多、更经常的工作内容是与前线士兵和指挥员们谈话，召开集团军范围内各级党团组织会议，吸收新党员入党，收集编发英雄事迹和宣传鼓动材料，向上级机关上报与政工工作有关的材料（其中有一份由勃列日涅

1943 年 1 月初，红军改军衔，佩带新式肩章。政工人员原来的军衔被取消，改为相应的指挥人员军衔，佩带统一的肩章。旅级政治委员可获少将衔，也可获上校衔，勃列日涅夫得的是后者。

政治部主任一职在集团军指挥领导系统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不在集团军最高决策层之列。他不是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只有由司令员、副司令员、军事委员、参谋长及各兵种司令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集团军的重大军事行动并对集团军的命运负责。集团军政治部主要负责党团组织、鼓动宣传、报刊等方面的工作。

据罗伊·麦德维杰夫说，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战争期间，没受过一次伤。

夫起草、不少人用鲜血在上面签名的告全体战士书，还直接寄给了斯大林），编印集团军的报纸《祖国旗帜报》，等等。集团军政治部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自1943年5月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调整红军中党团组织结构和加强方面军、集团军和师报纸作用》的决议，到同年9月初这段时间，集团军中已建立起了331个基层党组织、603个连级党组织和292个基层团组织、492个连级团组织，共14206名党员、8069名团员。这些党团员中的近70%被编入为解放新罗西斯克而组建的登陆部队，60%的党团员参加了同年9月9日至16日进行的新罗西斯克战役。用第18集团军军史上的话说，“这种党团员成分是连队高战斗力的重要条件”。

1943年9月16日，新罗西斯克全部解放。20时整，莫斯科124门大炮齐鸣礼炮12响，向解放该城的部队致敬。一大批表现英勇的指战员获得奖励，其中最突出的还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长长的各种勋章和奖章获得者名单中，可以找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他获得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解放了新罗西斯克之后，第18集团军又与北高加索方面军其他部队一起解放了塔曼半岛，然后挥师西进，参加解放克里木半岛的战役。正当第18集团军的部队登陆刻赤半岛与德军展开激战的时候，1943年11月15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下达命令，再次撤销北高加索方面军建制，所辖第56集团军改为独立滨海集团军，第18集团军则转入大本营预备队，并到新地区待命。11月17日，第18集团军接到总参谋部命令，将集团军调往梅利托波尔地区接受人员、技术装备和武器补充。24日，大本营又命令第18集团军转隶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运载集团军人员和物资的军列转向基辅方向。11月的最后一天，第18集团军的第一批部队从南向北疾驰上千公里后，到达基辅以西和西南10公里左右地区。这时的基辅，形势十分紧张。

由瓦图京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于11月3日发起基辅进攻战役，10天内不仅解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而且从德军手中夺回了基辅以西的两个重镇法斯托夫和日托米尔。但德军在迅速调集了兵力之后大举反攻，20日重新占领日托米尔，并继续扑向基辅。11月下旬，战线距基辅只有60公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才紧急决定把刚刚在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打了漂亮仗的第18集团军调到基辅城下，以解燃眉之急。在这里，勃列日涅夫又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12月11日，德军再次向日托米尔—基辅的公路发起狂攻，意在控制公路后沿最便捷的道路冲向基辅。12日凌晨，德军已攻到日托米尔以东的科罗斯特舍夫地区的斯塔维谢村，眼看就要切断公路，距第18集团军司令部也只有几公里了。后援部队最快也要在一小时后才能到达突破地区，作为紧急措施，勃列日涅夫建议把司令部所有军官立即投入到突破口参加战斗。几分钟后，大约30名军官集合完毕，勃列日涅夫给他们指明每人应去的地点后，带着副官克拉夫丘克、一名冲锋枪手和一名司机，乘车赶到了前沿阵地。

“整个战争期间，我不止一次地看见敌人距离这么近，然而这次夜战，却格外深刻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里讲到了这次战斗，“希特勒匪徒借着照明弹的闪光，一会儿利用地势趴下，一会儿从一个小丘跃到另一个小丘。……能阻止他们前进的主要是我们的一挺机枪。敌人一扑

北高加索方面军于1943年1月下旬重新组建。2月初，第18集团军所在的黑海集群转隶该方面军司令部。

上来机枪就响了。……突然机枪不响了，只有一条稀疏的散兵线还在射击。德国人不再卧倒了，他们嚎叫着，直着腰不停地射击，壮着胆子向堑壕奔来。可是我们的机枪却默不作声，有个士兵把死去的机枪手拖到一边，我就不失时机地向机枪扑去。”

勃列日涅夫说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顶住！但子弹快要打光了。克拉夫丘克回忆说：

“勃列日涅夫抓起最后一条子弹带时，他命令我去沿着堑壕通知大家把手榴弹留到最后再用，并作好肉搏准备。我数了数战壕里还剩下十来个人……我看得很清楚，我们最多还有 10 到 15 分钟可活——即活到勃列日涅夫的机枪哑掉、纳粹进攻者涌入堑壕为止。”

就在这时，幸运之神再次降临，苏军的远程炮和卡秋莎向突破口开火了。过了几分钟，援兵上来了。当看到堑壕里那些在迅速、熟练地各就各位的士兵时，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感觉就是“觉得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是那么可亲可爱”！由于有这样一场战斗，这个原来并不出名的村子斯塔维谢，到了 70 年代突然知名度大增，人们在这里竖起了一块纪念碑，包括一些将军在内的凭吊者络绎不绝。勃列日涅夫也因在这些战斗中的表现，被授予 1 枚二级波格丹·梅赫利尼茨基勋章。

1944 年上半年，第 18 集团军仍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内作战。7 月 30 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考虑到苏军已进入喀尔巴阡山的山地地区作战，需要进行专门的准备、装备和管理，决定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左翼部队重新组建乌克兰第四方面军，自 8 月 5 日起，第 18 集团军第三个集团军列入其编制。方面军司令员是曾任黑海集群司令员和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的彼得罗夫上将。第 18 集团军随方面军先后参加了东喀尔巴阡战役和西喀尔巴阡战役、摩拉瓦—俄斯特拉发战役以及布拉格战役，行程 400 多公里。集团军所属部队曾进入三个邻国——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作战期间，由斯沃博达将军指挥的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 1 军曾在第 18 集团军编制内作战。

在大反攻的日子里，勃列日涅夫的工作内容有所扩大。除了集团军内的政治工作外，他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收复的地区恢复党组织，安排当地居民的生活，处理和协调军队与地方间的关系。例如，在解放了外喀尔巴阡地区之后，勃列日涅夫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对这些地区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其中包括召开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共产党员代表会议、青年联盟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第一届人民委员代表大会等，并由集团军政治部协助出版《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报》。此外，恢复收复地区经济也列入了集团军政治部门的工作日程。对工程师出身的勃列日涅夫来说，恢复工业企业更让

苏联实行“公开化”后，也有人对此战的一些细节提出疑问。一个自称参加了这次战斗的老战士科梁日金致信罗伊·麦德维杰夫，说在勃列日涅夫带来政工人员时，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独立第 38 野战工程机关的警卫队和指挥部工作人员已经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勃列日涅夫等人起的作用是“次要的，没有决定意义”。另外，对勃列日涅夫是否有机会经常参加类似的短兵相接的战斗，原乌克兰地下工作者、1944 年加入第 18 集团军并成为师政治处主任的戈里高连科在回忆录《地下遇到的只有魔鬼》中证实，在他与上司勃列日涅夫的多次共事中，他知道勃列日涅夫到离前沿最近的一次是距军事分界线 3 公里的地方。

1943 年 8 月 2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对恢复从德寇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经济宣布了几条紧急措施。

他感兴趣。在红军解放了斯洛伐克的克日马罗克后，勃列日涅夫曾协助恢复了几个工业企业，其中有一家纺织厂，这家纺织厂后来生产出的布匹，被用来为苏军制作夏装、内衣等军用品。这多少也算是勃列日涅夫的“分内”事了。正是在1944年11月2日，喀尔巴阡战役结束时，勃列日涅夫被授予他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最高军衔：少将。至于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军衔——苏联元帅，还要等30多年后，即1976年5月，勃列日涅夫近70岁时才得到。

空前激烈和残酷的卫国战争，经历了1416天之后，终于结束了。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胜利阅兵式。10个方面军和1个海军的受阅部队，以方面军作战地域从北至南的排列顺序，从列宁墓前走过。在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受阅部队中，有刚被任命不久的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少将。39岁的勃列日涅夫一身戎装，踏着进行曲，正步行走在红场上。经过列宁墓时，他像队中的所有人一样，向高高的主席台上那些穿着军装和便装的领导人们致以热情的注目礼。

第三章复兴热土上的的州委书记

战争结束后，勃列日涅夫没有立即脱下军装转入地方，仍然留在部队中从事党政工作。但国内的整个形势变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完全转到了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上来了。不要说对一名原来就在地方工作的党的干部，就是对任何一名有基本工作能力的人，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都会对其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使你不能、也无法长时间置身其外。

战争的破坏的确触目惊心。在苏联境内，战火或完全、或部分破坏了1710座城镇，7万多个乡村，600万栋以上房屋；约3.2万个大中型企业和6.5万公里铁路被毁；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拖拉机站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加上约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及更大数量的家畜家禽死于战乱和被掠走，农业经济也可谓惨遭浩劫。据粗略统计，战争期间遭抢掠和破坏的公共和私人财富损失按战争期间价格标准计算，达6790亿卢布。如果再加上军费支出和由于收入减少造成的间接损失，那么苏联总的物质损失按同一价格标准则达到了25690亿卢布。在全苏各加盟共和国中，乌克兰的损失又是最大的，占总损失的10%强，达2850亿卢布，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在战争爆发前后很短的时间里，除了苏联政府主动撤走和转移的近500家大型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部分技术装备外，留下的一切几乎都变成了废墟。著名的煤矿区顿巴斯，在德军撤退后，有314座使用中的矿井和31座建设中的矿井被毁，占全矿区矿井总数的94%。在勃列日涅夫当州委书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战前拥有的16座高炉被完全毁掉了13座，剩下的3座也遭到严重破坏；另外，36座平炉有29座已面目全非，56台轧钢机报废了29台，其余的也大多残缺不全……

破坏的严重意味着恢复与重建工作的艰巨。早在1943年8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恢复从德寇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经济的紧急措施》，紧急措施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恢复被解放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学冶金出身的勃列日涅夫暂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随着解放地区的扩大，特别是战争结束后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全面展开，对干部和技术人员的需求、尤其是对有专业特长的干部的需求，与日俱增。勃列日涅夫正是符合这种需要的人选之一。但作为高级政工人员，他的去留要由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和联共（布）中央主管干部的部门决定。

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46—1950年）》，其中提到要“在南方恢复冷轧薄板的生产”。而当时南方生产冷轧薄板的基地，就是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毗邻的扎波罗热州的扎波罗热钢铁厂，它是苏联在30年代建成的最大的冶金联合企业。另外，20年代提出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中的重点工程，也被称为工业化第一项工程的第聂伯水电站，就建在该州境内，电站的那座由千百盏电灯装点起来的弧形拦河大坝，早已作为一种工业强大的象征，在全苏家喻户晓了。当然，不论是扎波罗热钢铁厂还是第聂伯水电站，都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在全国掀起的恢复与重建高潮中，扎波罗热州却没能走在前面。对此，《真理报》在同年七八月份，接连刊登通讯和文章进行了点名批评，锋芒直指区委、市委和州委。联共（布）中央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认为有必要对

该州工作进行整顿并改组领导班子。结果，勃列日涅夫被选中来完成这项使命。

看来，对勃列日涅夫的选择一开始是比较匆忙的。据勃列日涅夫自己说，他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马上就来到了扎波罗热州府所在地扎波罗热市，当时身上还穿着军装。最初给他的指示是让他了解该州的情况，特别要注意工程建设和农业。他在工厂和城市的废墟中巡视了一天，不时把眼前的景象与记忆中的战前那座美丽、热闹的城市进行比较，留给他的印象是相当悲观的。战前的扎波罗热市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并不陌生，距他工作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时，他对作为竞赛伙伴的扎波罗热市的绿荫如盖的街心公园、赏心悦目的广场和喷水池、漂亮规整的住宅大楼，以及树木葱茏的宽阔的列宁大街，留有美好印象；扎波罗热钢铁厂和第聂伯水电站的拦河大坝的宏伟气势，也每每在他的记忆里定格成一幅幅壮丽的画面……而现在，这座城市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没有电，到处是直竖着的混凝土桩子、碎砖烂瓦、垃圾堆、歪七扭八的梁架和荒草丛生的农田。现在还不清楚勃列日涅夫是如何向上级汇报他所看到的一切的，不过，他的汇报只能加强联共（布）中央和乌共（布）中央改组扎波罗热州委领导班子的决心。在扎波罗热州委第六次全会召开前夕，中央就已决定推荐勃列日涅夫任州委第一书记，并由他主持全会。在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州委全会的选举实际上只是履行手续罢了：1946年8月30日，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州委第一书记。

从战前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主管宣传的州委书记到现在任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也算是在政治生涯中又迈上了一层台阶。而且，他任职的这个地方又非同一般。扎波罗热州面积2.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00万，在乌克兰25个州中，面积排第9位，人口第8位，总的说算不上一个大州。但由于它拥有全苏最重要的冶金企业和水电站，其经济地位和价值在乌克兰乃至全苏都举足轻重，因而备受关注，尤其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州里当第一把手，对任何人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走马上任之后，摆在勃列日涅夫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按照传统的分工，州委第一书记除了要全面领导州的工作外，还要管农业、宣传鼓动、计委、共青团、干部，以及负责国家安全和内务部在州里各局的工作、检察机关工作，等等。在这些工作中，勃列日涅夫集中精力抓了两方面，一是州里重大工程项目，二是人或者说干部。前者是衡量他政绩的首要指标，后者则是他巩固权力以及寻求更大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修复扎波罗热钢铁厂和第聂伯水电站，是两个影响巨大的项目，勃列日涅夫当然知道它们的分量及其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意义，因此在这上面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利用战争期间当政治部主任锻炼出来的特长，组织宣传鼓动工作，召开各种会议，发展党员，等等。当然也没忘记寻找得力助手。当时，他在建设工程上的左膀右臂是扎波罗热钢铁厂厂长库兹明和扎波罗热建筑托拉斯经理迪姆希茨。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库兹明中等身材，胖敦敦的，戴一副夹鼻眼镜，说话柔声细气，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战前就任该厂厂长，并成功地组织了工厂的东迁，在车里雅宾斯克州的马格尼特卡，

用该厂运来的设备很快建起了轧钢车间，生产出亟需的合金钢装甲。因此，库兹明在生产业务上和在工人中享有极大威望。与温和敦厚、持重稳健的库兹明不同，维尼阿明·埃玛努伊洛维奇·迪姆希茨性格豪爽、干事喜欢大刀阔斧，有时甚至武断。在当时那种百废待兴的局面下，有这么股敢说敢干、雷厉风行的劲头，往往能解决大问题。勃列日涅夫对迪姆希茨的办事能力格外看重，而迪姆希茨对州委第一书记的工作也是鼎力相助，俩人成了莫逆之交。尽管迪姆希茨的犹太出身对其仕途并不有利，但他却能在60年代初就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并先后兼国家计委和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当政后，迪姆希茨仍然是领导集团中职位最高的犹太人。除上述两人外，总调度员格里戈里·卢别涅茨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一个重要帮手。这个年轻人当时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他的办公室里装有十多部电话，通过电话和不停地巡视，他把整个工地各处的工程进度及材料供应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在每天下午5点的例行汇报时，没有什么问题能问倒他。而且，以前一用就灵的借口，如什么东西供应不足、什么东西没有及时运到等，在他准确无误的资料面前变得毫无意义了。此人后来当上了乌克兰共和国的重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

尽管有了不错的助手，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工作也不敢懈怠，但扎波罗热州的重建工程进度仍不能让中央满意。1947年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前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的那篇以“铁幕”著称的讲话，使苏联与西方从战后逐渐冷淡乃至紧张起来的关系公开化、表面化了。苏联对丘吉尔的讲话一方面进行了斥责，另一方面在国内也作出反应，即要求加快重建工作的速度。1947年3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提前完成重建工作的命令，接着又颁布了关于加快设备安装的命令；4月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建筑工程党委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要从政治上保证重建工作的完成。由于扎波罗热在全苏经济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在上述三个文件中都提到了它，但不是表扬而是批评，说负责扎波罗热重建工作的党委未能跟上形势，重建工程速度不能令人满意，命令要加快工程速度，生产钢板的扎波罗热厂要赶在当年秋季投产。就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公布的当天夜里，斯大林给勃列日涅夫打来了电话，据后者说，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给人的感觉是“不久前还看做是成就的一切，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几乎成了败绩”。

平心而论，要求一个上任刚刚半年的州委书记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把千头万绪的工作理顺，并且要能适应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的需要，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但斯大林的工作风格，特别是对下级的要求，往往是不考虑类似这种客观因素的。勃列日涅夫作为一个负责州里全面工作的第一书记，既然现在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无法、也不敢推卸责任，惟有按照上面的指令，督促下面拼命干。

中央作出上述决议之前，勃列日涅夫基本上是隔几天去扎波罗热钢铁厂工地一次，后来他干脆在一座被炸毁一半的变电站中为自己清理出一间办公室，放上桌椅、床铺，架上电话，住在现场监督工程进度。这期间，为了加快进度，他大事小事一齐抓。他不仅主持常委会，研究制定各种政策、措施，

斯大林与勃列日涅夫的这次谈话，除了勃在回忆录中提及外，尚未见到别的记载。若真有此事，恐怕是斯大林与自己的隔任继承人之间的第一次直接通话。

而且亲自过问一些具体问题。比如，由于扎波罗热这时到处都在搞恢复建设，工程铺的面很大，使建筑材料供应一度很紧张，砖和水泥成了当时的紧俏货。州常委会不得不在 1947 年 3 月和 5 月两次讨论了砖的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还有一次，扎波罗热钢铁厂的建设工程要实行两班工作制，以便加快建设速度，但由于灯泡缺乏，晚间照明成了问题，夜班工人无法施工。当时扎波罗热州没有生产灯泡的工厂，这一问题无法在州内解决，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又无别的供货渠道，于是勃列日涅夫只好亲自给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写信，请求中央帮助，供应 3000 只灯泡。三天后，日丹诺夫作了肯定的答复，并很快送来了灯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扎波罗热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援。上万名建设者被从全苏各地调到扎波罗热参加钢铁厂和水电站的重建工作。国内 70 多个城市的 200 多家工厂企业在生产上述重建工程所需的订货。高尔基市提供卡车，阿尔汉格尔斯克运来枕木，雅罗斯拉夫尔生产指定的电机，巴库和格罗兹尼供给沥青，莫斯科负责提供各种机床，库兹涅茨克运来钢轨，木材来自白俄罗斯，金属构件则来自邻州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甚至车间、水电站重建的各种设计图也由基辅、哈尔科夫、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地的设计部门设计。工程所涉及的不同行业部门的负责人也纷纷来到扎波罗热，像苏联重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尤金、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相，电站部部长诺维科夫更是这里的常客，有时候在工地上竟会同时出现来自莫斯科的四五位部长。

建设者们的劳动热情、奉献精神以及聪明才智在加速重建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建设者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正像当时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得那样，在重点工程上，一个突击工作年，不是 365 个工作日，而是 365 个昼夜。许多人常常是一连几天不离开工地，困了就找个僻静点的地方睡三四个小时，然后再干。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为了修复已经下沉并倾斜的 3 号高炉，工程技术人员们打破常规，把 9 台功率为一二百吨的液压千斤顶放在高炉下，然后切割开炉身外壳，用起重机吊起，再用千斤顶把炉身扶正、加固，最后把切割开的炉壳衬上钢板焊牢。整个修复过程用了不到 6 小时，而按常规操作，最快也得两个月。还有在修复轧钢车间时，钢结构安装局的工程技术人员们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们把被德军炸塌的巨大车间划成几大块，每块大约包括 12 根柱子，其间的各种管道、钢梁等加在一起至少有 1000 吨。他们设计了一种套管伸缩起重装置，它像一只强有力的手臂，抓住事先切割成块的车间屋顶向上拉起，七扭八歪的柱子被抻直，桁架和钢梁基本复位，横竖管道也被拉起，最后把整个车间再连为一体。这项最复杂的工程，起码提前一年完成了。面对奇迹般重建起来的扎波罗热钢铁厂的首批工程，苏联著名冶金专家、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国家验收委员会主席伊·帕·巴尔金提笔在工程验收书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建筑工人和安装工人在这里建成的工程如此巨大，不论按规模，或是就解决技术课题而言，均是无与伦比的。”

1947 年 6 月 30 日对每一个扎波罗热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天。随着一声“开炉”的命令，煤气工拧开了热风阀门，总工长把点燃的火把投入炉膛，炉火燃起，主厂房上的汽笛长鸣，宣告扎波罗热钢铁厂的第二次诞生。终于，随着氧气切割器烧穿出铁口，一条泛着耀眼白光的铁水裹着灼人的热气消消流出，迸溅着火星，越流越多，越流越猛，汨汨注入硕大的铸罐，炉旁的工人与所有到场的人，欢呼着，拥抱着，任热泪横流……

又过了一个月，扎波罗热钢铁厂的板坯初轧机轧出了第一批钢板；8月底，热轧车间通过了国家验收；9月28日，冷轧车间投产，至此，这座闻名全国的大厂又复活了。同时，第聂伯水电站的重建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自1947年3月第一联合机组开始为工业供电后，到当年底，已恢复了差不多一半的供电能力。10月3日，《真理报》头版刊登了致斯大林的信，报告扎波罗热重建工作取得的成绩。信的最后按照40年代的标准格式写着：“我们亲爱的父亲和领袖，我们的朋友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在同一版上，斯大林也按照习惯做法，祝贺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取得的“伟大的生产胜利”。不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授予在扎波罗热重建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以国家最高奖励——列宁勋章。勃列日涅夫榜上有名。这是他一生中获得的4枚列宁勋章中的第一枚，因此对他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意味着中央对他在扎波罗热工作的肯定和表彰。

褒奖并没有局限于一枚勋章，1947年11月下旬，勃列日涅夫被调往邻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1月21日，他被乌共（布）该州州委会选为第一书记。这样，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罗热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后，又来到一个新的职位上，尽管都是州委第一书记，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面积比扎波罗热大近5000平方公里，人口多近一倍，是乌克兰大州之一，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中心之一，因此，调任该州的第一书记，实际上是一种奖赏。更何况，勃列日涅夫的家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在这个州，战前他就是在这个州任州委主管宣传的书记，他对这里的一切远比对扎波罗热熟悉。他是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列宁勋章“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了。

促成勃列日涅夫此次调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恢复与重建工作不满意，原州委第一书记帕·安·纳伊杰诺夫当然要为此负责。当时主持乌克兰工作的又是以“铁腕人民委员”著称的拉·卡冈诺维奇，这样，纳伊杰诺夫的去职就很自然了。

勃列日涅夫在这个职位上呆了两年多，他吸取了纳伊杰诺夫的教训，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在这里开展工作比在扎波罗热要容易些，一来他的前任为他打下了一定重建工作的基础，他只需在此基础上发展就是了；二来他也积累了当州委第一书记的经验；最后，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在共和国上上下下，甚至在莫斯科都有一些熟人。他们当中有的是他政治上的提携者，有的能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一定的帮助，有的则愿意在他领导下干出一番成绩。不要小看这种人际关系的作用，在苏联那种体制下，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往往起到特殊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熟人中，对勃列日涅夫政治前途影响最大、起关键性作用的，首推尼基塔·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长勃列日涅夫13岁。如果说祖籍，两个人都是库尔斯克省（今库尔斯克州），不同的是勃列日涅夫的祖父早早地离开了老家，迁居到了卡缅斯克（即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而赫鲁晓夫一直在库尔斯克的农村中度过了童年。当勃列日涅夫还刚刚从家乡的冶金学院毕业、拿到工程师文凭时，赫鲁晓夫就已经成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了。1938年1月，在大清洗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赫鲁晓夫来到基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成了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那时勃列日涅夫还只是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的一名副主席。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当时不可能有直接联系。但赫鲁晓夫从莫斯科带来的

几个助手却对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其中有在 1938—1939 年间先后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德·斯·科罗特钦科、谢·鲍·扎迪昂钦科以及第二书记列·罗·科尔涅茨等。科罗特钦科与科尔涅茨很快升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和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正是在他们离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被提拔到了州委，先是当宣传部长，不久又成了主管宣传工作的州委书记。当然，正如前面说过的，勃列日涅夫的这次升迁也靠了他的两个同乡和同学格鲁谢沃伊和阿尔菲罗夫的帮助，但他们当时能做的只是向上级机关推荐勃列日涅夫，而没有决定人事安排的权力。按照惯例，各级领导在正常离开现任职位之前，都要对以后的领导班子的人选做出安排。这样，真正有权决定提拔勃列日涅夫的，恰好就是刚刚离开州委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们。

卫国战争前，赫鲁晓夫到底在多大程度知道勃列日涅夫，两人之间的工作关系究竟有多少，尚无材料可查。但在卫国战争中，具体说至少是在 1943 年 11 月到 1944 年 8 月这段时间，他们两人有了直接的工作关系。这时，勃列日涅夫当政治部主任的第 18 集团军被列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编制内作战，而当时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领导政工工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正是赫鲁晓夫。第 18 集团军是在基辅战役的关键时刻调上来的，在保卫日托米尔至基辅公路的战斗中表现英勇，这一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不能不注意到。同时，勃列日涅夫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一名军官应有的作用，被授予二级波格丹·梅赫利尼茨基勋章，对此赫鲁晓夫更不会不知道。基辅解放后不久，赫鲁晓夫便离开部队，转入地方，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后改为部长会议）主席，从事乌克兰的恢复工作。当 1946 年 8 月人们提议由尚在喀尔巴阡军区当政治部主任的勃列日涅夫任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时，赫鲁晓夫肯定没有对这个姓名感到陌生。1947 年由于农业歉收，赫鲁晓夫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而这一年他所提拔的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罗热干得不错。这多少给处在政治危机中的赫鲁晓夫一点安慰。勃列日涅夫调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不到一个月，赫鲁晓夫也重返乌克兰，再度出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职位不但没有变动，而且由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转为正式委员，这表明他已被确认为赫鲁晓夫麾下的一员骨干了。对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给予力所能及的呵护。1948 年，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想搞一次工农业成就展览会，展览会搞得过于豪华、铺张，莫斯科似乎发现了什么苗头，派来了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为首的调查组。勃列日涅夫眼看凶多吉少。这时赫鲁晓夫出面给斯大林打电话，说展览会是按照赫本人的指示筹办的，因此他负全部责任。在变幻莫测、风急浪高的政治漩涡面前，羽毛尚未丰满的勃列日涅夫，绝对需要一个更能经得住吹打的政治导师的指点、提携与保护。对当时的勃列日涅夫来说，赫鲁晓夫无疑就是这样一位恩师。

除赫鲁晓夫外，战前就看重勃列日涅夫的科罗特钦科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科尔涅茨为第一副主席。勃列日涅夫在第 18 集团军时的战友、也是“小地”上的患难之交安·格列奇科将军任基辅军区司令员，也是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他的朋友和同事在乌克兰的为数众多，格鲁谢沃伊是乌克兰汽车运输工业部部长；尼·安·谢洛科夫也是勃列日涅夫的老同事，战前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任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市长，现在是乌共

（布）中央的部长；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罗热时的第一副书记安·帕·基里连科任尼古拉耶夫州党委第一书记；阿尔菲罗夫也在乌共（布）中央任部长，主管人事工作，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也能找到不少的“同乡”，其中有些人地位不见得很高，但却占据了比较关键的职位，这也是他这个地方“父母官”的一项资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期间，勃列日涅夫虽然没有取得什么突出、惊人的成绩，但也没让他的提携者失望。1948年，他领导的这个州是第一个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州。也正是在他上任后，该州首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市容得到比较大的治理，被战争破坏的街道、花园、居民住宅楼不仅废墟被彻底清理干净，而且按照当时较高的标准重新修建。为让一些工厂企业拿出钱来投资市政建设，勃列日涅夫曾亲自带队，驱车两个多小时，到他离开没多久的扎波罗热参观取经。扎波罗热市内那一幢幢白色带大玻璃窗的住宅大楼，一条条笔直宽阔的大街，一座座带有铁栅栏的街心花园，准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位第一书记喜欢什么，要求什么。回来的路上，有两个厂长决定，他们要按扎波罗热的图纸给本厂盖楼。

像在扎波罗热一样，勃列日涅夫很注意培养和充实自己的干部队伍，尤其注意培植那些称得上是“亲信”的干部。在干部实行上级任免制的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当一个领导掌握了一定的任免干部的权力后，他会利用这一权力提拔、任用自己喜欢的干部。被提拔和任用的干部由于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也就只对上级负责，按上级领导的意图行事。由于对干部任用直接关系到上级领导的意图能否顺利贯彻，或者说关系到上级领导的权力能否得到承认与体现，因此又是直接关系到一个领导干部的权力基础是否稳固，所以，每一个在这种干部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干部都懂得其中的奥妙，都接受这种现实，当然也都遵照这样的传统办事。勃列日涅夫是这种干部体制的受惠者，也是它的执行人。在勃列日涅夫掌握全苏最高权力的18年期间，在苏联党和苏维埃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册上，有不少是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如果再查一下他们的履历，便会发现，他们有的人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州委第一书记时在这里工作过，以后随着勃列日涅夫地位不断升迁而飞黄腾达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就是一个代表。

吉洪诺夫比勃列日涅夫年长一岁，入党却比他晚了九年，直到卫国战争开始前一年才得到党证。在勃列日涅夫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吉洪诺夫还是该州尼科波尔南方钢管厂的厂长。这个厂在该州算得上是大厂，换言之，它对州里的生产，当然也就对领导人的政绩具有重要影响。在把原来的州委第一书记纳伊杰诺夫撤换后，各级干部都在怀着复杂的心情观察新上任的第一书记，揣度他的一举一动，为自己的命运担心，因此怎样与这些人打交道，就是一个工作艺术问题了。处理好了，不仅可以稳定这些人的情绪，使生产不受过多影响，而且还能抓住人心，培养忠实于新领导的力量。在扎波罗热的阅历使勃列日涅夫处理起这一问题并非毫无经验，他在回忆录中以多少有点自我欣赏的口气谈到了与几个大厂厂长，包括吉洪诺夫在内，第一次打交道的情景。

当时州的收割工作已经开始，而分摊给各工厂的运输车辆却迟迟不能到位，几个大厂的厂长也在千方百计的拖延，实在拖不过去，就派去一些破旧的车辆应付差事。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后，开始用他的方法处理问题。

“我坐下来拿起电话话筒，请总机给我接尼科波尔钢管厂厂长尼·亚·吉

洪诺夫。我向他问了好，并且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一定到您那儿去，但要稍迟几天。现在我想请您帮个忙，今年的庄稼很好，已经成熟了。我知道，您是一位负责的厂长，你们厂搞得不错。如果你们能支援一下收割工作，我们就非常感谢了。不过，请您派好的司机，派管用的车子。’

‘我可以拨出 15 辆。’他想了一想说。

‘请您再考虑一下，跟大家商量商量。要是粮食收不上来，那太可惜了……’”

和其他的厂长也进行了类似的通话。没有材料记载这些厂长们在听到州委第一书记如此客气的请求之后心里是种什么感觉，不过据勃列日涅夫说，各厂均派出了好车，数量也比去年几乎多了一倍。对此，勃列日涅夫深有感触：“能够做到这一点，全靠平心静气和通情达理的谈话。”

的确，勃列日涅夫不是那种严厉的领导人，不是那种极有个性并且把它反映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的头儿，即便是日后他握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时也是如此。人们也许会因他缺少魄力和决断认为他平庸甚至无能，但他的这种方法并非行之无效。没有个性有时候恰恰就是最大的个性，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看来，此后吉洪诺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积极追随者，因为在勃列日涅夫倡导的重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区和修建工厂小区的运动中，吉洪诺夫表现积极。在其他的厂长们只是在随勃列日涅夫参观完扎波罗热后、才决定盖楼铺路建街心花园时，吉洪诺夫早就大干起来，不仅把拨给他 70 万卢布花得精光，而且实际所用几乎超过此数额两倍。在勃列日涅夫看来这是个成绩，在州里起了带头作用，但莫斯科的主管部门却不这样认为。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相来到吉洪诺夫的工厂视察，一路上部长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申斥吉洪诺夫：

“你是什么人，洛克菲勒吗？给你钱是叫你干这个的？”他指着新修的马路说，“财政部已经打电话给我了，他们也知道这条马路了，拿你怎么办呢？”

一旁的勃列日涅夫急忙插话对捷沃相说：

“州委也知道了，但不修这条路，就不可能开夜班。他可不是为自己呀，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他没有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去。我们把这条路是作为人民的一项建设事业来完成的，您以为怎样？”

勃列日涅夫以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工作”和“人民”为盾牌，为吉洪诺夫“挡住了一场风暴”。躲过这场风暴的吉洪诺夫，自然会对勃列日涅夫的知遇之恩和鼎力相助有新的认识和评价，从而进一步把自己的荣辱及其政治前途与勃列日涅夫联系在一起，所以至死吉洪诺夫都是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从未背叛过他。可见，保护下属也是“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不小的学问。同时，保护下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干部制度下，下级的失误和错误，严重时完全有可能葬送直接上级的前程。因此，勃列日涅夫在亮出上述盾牌时，也不能伤害了来自莫斯科要员的自尊，并且巧妙地暗示了在他支持和领导下取得的政绩。对这样拿着他批的钱去为工作、为人民办事的厂长和州委第一书记，捷沃相还能说什么呢？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也许更有意义的是，这件事在州里传开了，而且“传得很快”，“在别处也引起了反响”。到底是什么“反响”，勃列日涅夫没说，但肯定

不是对他不利的，因为，他很快又被提升了。

第四章十六分之一

1950年3月，四年一次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在全苏展开。选举按事先划定的选区进行。每个选区都有由中央审定的候选人名单，达到一定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均被分别列入不同选区的候选人名单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本身就是一个选区，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赫然写在候选人名单上。审定的候选人从来没有落选过，因此勃列日涅夫顺利当选为新一届即第三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最高苏维埃定于6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会议，但在此之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交给勃列日涅夫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让他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去了解情况并对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尼·格·科瓦尔进行帮助。对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地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任免程序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央准备撤换该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的前兆。果然，当勃列日涅夫参加完最高苏维埃会议并比别的代表在莫斯科多逗留了近一个月后再次来到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首府基什尼奥夫时，他很快在中央的建议下被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全会推选为第一书记。尽管在苏联6个加盟共和国中，摩尔达维亚的面积和人口都排在倒数几位，但由100多个州委第一书记中的一个变为16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中的一个，这一变化无论怎么讲都是实质性的。从此，勃列日涅夫步入了为数不多的直接对斯大林负责的高级干部行列。这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飞跃，而当时，1950年7月，他还不满44岁。

摩尔达维亚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西南端，介于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除了西边与罗马尼亚接壤外，其余三面均与乌克兰相邻。其面积3.3万平方公里，仅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大不到2000平方公里。1950年时，共和国居民为230万人。在近代史上，围绕着构成摩尔达维亚的两块土地——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俄国与奥地利、土耳其、波兰之间展开激烈的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建国，把比萨拉比亚划入自己的版图。当时国力尚不强大的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乌克兰，只保留了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1924年12月12日，在这里成立了属于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到1939年时仅有80万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至卫国战争开始前这段时间，苏联利用当时比较有利的形势沿西部国境线扩充领土，建立所谓的“东方战线”，强迫罗马尼亚归还了比萨拉比亚，割让了北布科维纳，略作调整之后，在原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和比萨拉比亚领土上于1940年8月2日成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在同一天加入苏联，成为它第11个加盟共和国。卫国战争爆发后，该共和国被德国和罗马尼亚占领，直到1944年8月才全部解放。战前的摩尔达维亚没有大的工业企业，整个共和国的工业水平不高，因此战后工业和恢复比较顺利，到1948年就已经达到战前水平了。倒是农业方面的问题比较多。由于共和国成立时间晚，没有赶上全苏那场急风暴雨式的集体化运动，因此，这里的农业生产关系，按照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普遍认识，是落后的，与全苏普遍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制度不相适应。而刚刚起步的对这里的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又被战争打断，于是在解放了该共和国领土之后，这种改造便立即再

按照1950年时苏联的行政区划，加盟共和国为16个。1956年7月16日，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被撤销，改为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州和边区一级的行政单位为132个。

次提上日程。正好在别的共和国被解放的地区恢复和重建集体农庄的工作也在全力进行，没有赶上集体化第一趟快车的摩尔达维亚，是绝对不允许再落下了。在战后第一个五年中，集体化运动或者说集体农庄建设工作，自然成了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中心工作。1948年9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涅斯特河右岸地区集体农庄建设》的决议，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集体化的步伐。到1949年年底，德涅斯特河右岸地区已建立起1747个集体农庄，联合起36.8万人，占农户的80.7%和耕地面积的近85%。1950年的第一季度，又有33300户被纳入集体农庄，使集体化的农户比例提高到89.5%。同年年底这一比例达到96%，集体化基本上完成了。

在摩尔达维亚的农业经济中，种植业占主导地位。这里的农民绝大多数以种植葡萄、瓜果和蔬菜为生，这种更多的是靠“手艺”而不是靠规模的生产特点，使这里的农民比30年代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事大田生产的农民更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农民的抵触情绪与完成集体化的行政命令相撞击的结果，是使这场“改造”运动难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在活动”，他们“进行诽谤，挑衅，继而钻进农庄的领导机构，派进自己的心腹，千方百计破坏农民对集体农庄的信心”。有些地方的反抗还演化成武装冲突，“他们还使用短统枪，虽然没有形成大规模行动，但在集体化过程中仍然有人被暗杀”。而在同反抗者进行斗争时，“党组织表现出真正的革命警惕性和布尔什维克毫不妥协的精神”。这种“真正的革命警惕性”和“毫不妥协的精神”在强行推进集体化运动上无疑会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违背农民意愿的情况下迫使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其结果只能引起混乱，直接影响到共和国的生产和政治稳定。大概，联共（布）中央正是看到了摩尔达维亚酝酿着的政治、经济危机日趋严重，才决定更换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

勃列日涅夫来到摩尔达维亚后，主要抓了三件事：巩固集体化成果，发展摩尔达维亚的工业，培养干部。到1952年他离开时止，这三件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正式当选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前，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代表，勃列日涅夫跑了几个区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也从实际解决问题中总结出了巩固集体农庄的一套办法。例如，有一次他来到德罗基辅区，这个区有一个村子同时成立了两个集体农庄。经过一段时间后，两个集体农庄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一个有了较大发展，几年中购买了20多台农业机器，农庄庄员的现金收入增加了5倍，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逐年提高。而另一个集体农庄却奄奄一息，不仅没什么发展，反而在农产品产量和庄员收入上都后退了。通过了解发现，前一个集体农庄党组织很强，党员在生产领域起着决定性作用，成为农庄主席的主要依靠力量。后一个集体农庄却相反，党员无声无息，甚至连会都不开，农庄主席孤立无援……经过整顿党组织，这个集体农庄慢慢走上了正轨。由此，勃列日涅夫认识到，“党对集体农庄的领导水平当时的确是一种决定性因素”。因此，他巩固集体农庄的措施之

西方出版的勃列日涅夫传记中有一种流行说法，即认为勃列日涅夫是摩尔达维亚集体化运动的主要推行者，从上述引用的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中不难看出两方流行的观点并不确切。勃列日涅夫只是借助前往已经形成的集体化运动的巨大惯性，使之走向完成而已。

一，就是加强和巩固集体农庄的党组织，包括发展党员，培训基层干部并奖励先进，等等。如果不脱离历史环境来看待问题的话，应该承认，勃列日涅夫得出的认识虽没什么新内容，但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对那些由不久前还是个体农民的人组成的集体农庄，除了已经具备的一个集体化外壳之外，能往其中注入统一与一致精神的，在当时也就只有党团组织了。只要在集体农庄中建立起党的组织，就可以借助党的组织纪律把党的意志贯彻、甚至强加给刚刚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

当然这不是惟一的措施。20 年代末在乌拉尔的比谢尔季土地局工作的经历，对勃列日涅夫处理摩尔达维亚集体化问题也许大有裨益。那几年，正是全苏掀起集体化高潮的时期，其最大特点就是追求全盘集体化，要求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在包容的人员和区域上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集体农庄办得越大、集体化程度越高，国家就越好用先进的技术装备扶植它、加强它，因此它就越能显示出集体化的优越性，吸引力和生命力也就越强。而把若干个分散的集体农庄联合成一个大集体农庄是上规模、出效应的捷径。曾身为比谢尔季土地局负责人的勃列日涅夫对此自然不会陌生。现在他把这条经验也搬到了摩尔达维亚。一次他视察尼斯波列内区，区委书记克雷扎诺夫斯基带他参观一个大果园，勃列日涅夫发现在果园中间有一道耕过的垄埂，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这里两个集体农庄和一个国营农场之间划出的地界。换言之，一个果园现在由三个独立核算单位瓜分了。当晚，在和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座谈时，勃列日涅夫从耕作和产品分散处理的不利方面提出了问题。结果，终于有一个聪明人站出来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合成一个大的，怎么样？一个村子，一整片土地，让我们试试吧！”就这样两个集体农庄联合在一起，国营农场也让出了原属于它的那片果园，专营水果加工。而勃列日涅夫也像 20 年代末的领导们一样，当场允诺将给联合起来的集体农庄提供技术装备，这对加起来才有 150 头牛作为全部牵引力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当第一书记期间，该共和国的集体农庄数目从 1950 年末的 1600 个，减到 1952 年末的 1100 个，再减到 1953 年末的 900 个。

摩尔达维亚的工业经济是随着共和国主体经济即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尽管战前这里就有了食品加工工业，但它的技术水平已不能适应战后经济发展的需要了。这一点往往是计划经济所无法预料的。

1951 年秋，眼看就是葡萄收获季节了，共和国食品工业部长基·伊·楚尔坎急匆匆来找勃列日涅夫。那年天公作美，葡萄长势喜人，是历史上少有的丰收年。也正是这即将丰收的葡萄，急坏了这位部长。

“列昂尼德·伊里奇，怎么办？总动员吧！整个摩尔达维亚的现有包装材料、容器，按这次收成的需要来说，还缺少一半，葡萄没地方放了。”

勃列日涅夫也一筹莫展，夜不成眠。如果让求之不得的好年景变成丰产不丰收，不仅可惜，而且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于是他马上派人到莫斯科。要求调拨槽车。莫斯科有关部门答应调给 200 节，但又不能马上开

苏联部长会议所属中央统计局编撰的《1956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中提供了这组数字，并特别注明：“集体农庄数目因合并小的农庄而有所减少”。该年鉴另一项统计显示，摩尔达维亚农业中拥有的拖拉机台数，折合成每台 15 马力计算，1940 年为 1300 台，1950 年为 9500 台，1953 年为 13000 台。这说明集体农庄数目的减少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是同向进行的。

到。远水解不了近渴。楚尔坎又提议利用市里的旧水塔装葡萄，可一看，水塔内的钢铁构件全都生锈了，根本无法使用。

只好群策群力了。楚尔坎把一些造酒专家、有经验的葡萄种植者找来，让他们开动脑筋，主要挖掘本地的潜力。经过一番分析讨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计划：在摩尔达维亚的干旱地区，每户农民家的院子里都有一口收集雨水的水泥井。如果把这些井按需要的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用来贮放葡萄。食品工业部派出特派员到各地区找井，同有井的集体农庄庄员签订存放国家酒料的合同。这样，总算渡过了这一难关。

这件事对摩尔达维亚的工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至少勃列日涅夫认识到了：“必须把摩尔达维亚工业的基点首先放在食品部门和工业加工部门。”同时，这也可以一举两得：“为加工越来越多的产品建立自己的基地，还可以解决人员就业问题。”1952年2月，一项加速发展摩尔达维亚食品工业和发展食品机器制造业的大规模综合纲领拟定出来了，勃列日涅夫拿着它亲自到莫斯科游说，结果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认可。不过，纲领的实施是勃列日涅夫离开摩尔达维亚以后的事了。

勃列日涅夫并非像西方的传记作家所说得那样，是在顾问和亲信的簇拥下来到基什尼奥夫的，但也和以前的工作调动不同，不是只身一人到这个偏远而又陌生的共和国就职的。他带了很少的几个得力助手一同来到这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尼·安·谢洛科夫。1951年1月，谢洛科夫出任摩尔达维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此后直到1966年，谢洛科夫始终呆在摩尔达维亚。在摩尔达维亚，勃列日涅夫又发现和培养了不少干部，其中不乏只属于他自己的干部，契尔年科便是一个。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生于1911年，比勃列日涅夫小5岁。他从18岁起就当上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新肖洛沃区团委宣传鼓动部长。之后在边防军部队中服役三年，退役后仍回原边疆区工作。卫国战争的头两年，他没像当时的绝大多数年轻干部那样上前线，而是留在边疆区党委任党委书记。战争的后两年，他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直属的党务工作者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被派到莫斯科东南的奔萨州任州委主管宣传鼓动的书记。1948年，即比勃列日涅夫早两年，契尔年科来到摩尔达维亚，任该共和国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并在这里，在基什尼奥夫师范学院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在同勃列日涅夫一同工作之前，契尔年科的仕途并不很顺利，从这个意义上讲，结识勃列日涅夫可以算是契尔年科政治生命中的一次巨大转机。新到任的第一书记发现，自己不仅一下子被纷杂的经济问题包围了，而且还被置于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上。落后的、根深蒂固的小私有制意识就够麻烦的了，而这种小私有制意识往往又与在摩尔达维亚特定历史环境下生成的民族主义意识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摩尔达维亚的民族主义虽然不像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那样具有悠久传统，但是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对莫斯科来说都是敏感的大问题。在乌克兰的多年工作经历，使勃列日涅夫从更近的距离上耳濡目染中央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敌视和打击，因此用不着别人指点他就完全明白如何对付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世界观的残余”。而展开意识形态斗争，开动宣传教育机器，是其中必不可少

摩尔达维亚的人口密度在1940年时为每平方公里73.4人，1950年为68.5人，1959年为85.9人。在所有加盟共和国中一直名列前茅。

的。身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长的契尔年科，正是能帮助勃列日涅夫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关键人物。而契尔年科看来并没让他失望。在晚年写成的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仍没忘记给他这名得力助手专门写一段褒奖之辞，说他具备了进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所需的“一切品质”，“他把全部力量献给了他的事业”。对契尔年科来说，也许最大的奖励就是从此他随着勃列日涅夫步步高升，直到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当上他隔任继承人。

另一个受到勃列日涅夫重用的党的工作人员是日后大红大紫的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特拉佩兹尼科夫。他生于1912年。1935年前在中伏尔加边疆区做基层共青团工作，从1935年至1944年在奔萨州党委任职。然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并在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接受培训。1948年，他又从联共（布）中央社会科学院毕业，不久来到摩尔达维亚，任摩尔达维亚党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人》杂志主编。这时，他的主管领导之一就是契尔年科，因此他们两人逐步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及私人关系。当勃列日涅夫需要契尔年科这样的帮手时，特拉佩兹尼科夫也就很快进入了第一书记的视野之中。由于他比契尔年科受过更多的教育，理论水平较高，所以勃列日涅夫不仅把他当做一名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干将，而且还视他为自己为在政治理论上的顾问。勃列日涅夫那时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行家，越是这样，他就越倚重身边像特拉佩兹尼科夫这样的专家。特拉佩兹尼科夫也没让勃列日涅夫失望，他的工作得到了第一书记的赏识，勃列日涅夫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便把特拉佩兹尼科夫安排到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前者当上总书记后，后者很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他在这一职位上发挥的影响之大，以至于西方称他为“苏联科学研究和教育领域里事实上的沙皇”。

值得一提的还有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这是一个比勃列日涅夫小10岁的乌克兰人。与契尔年科和特拉佩兹尼科夫相同的是他也毕业于师范学院——敖德萨师范学院，不同的是他不是搞党务的，而是一直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干部。战后，他先于勃列日涅夫来到摩尔达维亚，在共和国国家保安部任职。勃列日涅夫上任的第二年，他被任命为该共和国国家保安部副部长。说到私人关系，茨维贡比契尔年科和特拉佩兹尼科夫与勃列日涅夫更近些，因为他的妻子正是勃列日涅夫夫人的表妹。如果他的这次婚姻不是特别晚的话，那他应该早就与勃列日涅夫认识了。有他呆在共和国的国家保安部，第一书记无疑会心里踏实许多。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茨维贡很快也来到莫斯科，成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看来，勃列日涅夫的运气还算不错，除了在摩尔达维亚找到了比较得力的帮手外，天气也有意成全他。50年代初的几年，历来比较干旱的摩尔达维亚风调雨顺，由集体化运动引起的动荡基本平息，共和国迎来了战后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摩尔达维亚农业的支柱——葡萄和水果的栽种面积和产量都有扩大和提高。各种树龄的果树和浆果栽种面积由1950年的4万公顷，扩大到1953年的6万公顷，同一时期各种树龄的葡萄栽种面积由8万公顷扩大到11万公顷，而结果期的葡萄园面积也由7万公顷扩大到9万公顷。1953年与1950年相比，共和国水果的收获量提高了20%，葡萄的收获量提高了37.5%，而制糖用的甜菜产量提高了60%以上。此外，粮食作物的总收获量即入库产量提高了近11万吨，工业总产值在1950—1955年5年中提高了57.8

%。而且，勃列日涅夫非常擅长地大兴土木，进行基本建设，也让人们对共和国首府基什尼奥夫大有“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1952年1月，《真理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

在基什尼奥夫的全部历史之中，它的居民从未见到今天正在边行的如此宏大的工业建设和其他建设工程。崭新的巨大的居民楼正在把城市的中心街道列宁大街打扮起来。一幢120个单元的居民大楼、食品工业部办公楼、歌剧院和一个电影院正全速建设……市内较贫困的地区正迅速加以重建，主要是建起了居民楼……植树造林规模巨大，进展神速，仅在1951年就栽种了200万株花木。

尽管摩尔达维亚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但有了上面这些就能够说明第一书记的政绩了。1951年秋，勃列日涅夫像在扎波罗热一样，两次在《真理报》头版致信斯大林，向他报告摩尔达维亚果农和葡萄种植及制酒工作者取得的辉煌成就。第二年秋天，他终于有机会到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报告，而这次莫斯科之行的收获大得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作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不仅是当然的代表，而且还是该共和国代表团的团长。由于距上次代表大会相隔了13年，尽管勃列日涅夫此前已身居高位，但他无机以党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这次是他一生中众多个第一中的又一个第一。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不大，代表团人数很少，按说勃列日涅夫不会太引人注目。但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两次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并请他发言一次。主持这次会议的莫洛托夫受代表团代表委员会委托，建议选举大会秘书处，建议立即被大会通过。在选举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时，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被列在其中。当然，这都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并未引起代表们和外界注意。同样，当勃列日涅夫被安排在第二天下午倒数第二个发言时，也不会太引人注目。他的发言跟前面14个发言者的内容大同小异，在介绍共和国近几年取得的成绩时贯穿着对党、对斯大林的颂扬。而坐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中的119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也只是在勃列日涅夫以特别加重的语气颂扬斯大林时，才报以“长时间的鼓掌”。看来，斯大林对这个高大、结实、穿戴讲究的摩尔达维亚党的领导人留下了印象。当人们把勃列日涅夫指给斯大林看时，斯大林转向发言的勃列日涅夫说道：“多漂亮的摩尔达维亚人。”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更改党名的决议，此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更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按照党纲，代表大会选出由126人组成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名列其中。这很自然，所有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均被选入。接着，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大家对据说是斯大林亲自念的一份名单进行了表决，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取代了原来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根据新通过的党纲，前者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后者负责日常工作，“主要是组

以上数字均引自苏联官方出版的统计年鉴和按年鉴上数字进行换算得到的。可参见由李仁峰主编的《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及由陆南泉等人翻译的《苏联国民经济60周年纪念统计年鉴》，三联书店1979年版。

织对党的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和挑选干部”。可见，这两个机构才是真正大权在握的最高决策机关。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两个机构中都有勃列日涅夫！他是 11 名主席团候补委员之一，也是 10 名书记处成员之一。在书记处中，只有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别哥夫三人是主席团候补委员。从名义上讲，他们与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在这里是平等的。

勃列日涅夫能入选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确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人们在对主席团和书记处组成人员进行推测时，几乎没人把第一次参加代表大会、在此之前远离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勃列日涅夫考虑在内。只是两年前他被选为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时，他的名字才超出乌克兰的范围为党内更多的人所知道，但仍然谈不上有多大的知名度和影响。这当然不能怪勃列日涅夫，他“统治”的共和国太年轻也太弱小了，它不仅加入联盟的时间最晚，而且面积、人口、工农业生产整体水平都是排列最后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同样，他“领导”的党组织也太弱小了，不足 6 万名的党员在全党 688 万正式和候补党员中连 1% 都占不到，甚至还不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党员多。按苏联人那种习惯以数量作为衡量尺度的思维模式，勃列日涅夫能当上中央委员就够幸运的了，要知道在苏联家喻户晓的朱可夫元帅也还只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如果说进入中央委员会是沾了他是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光，那进入主席团就不是这样了。在主席团正式和候补的 36 名成员里，只有 3 个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列·格·麦利尼科夫是正式委员，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尼·谢·帕托利切夫和勃列日涅夫是候补委员。而在剩下的 13 名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中，无论是领导的党组织规模还是政治资历，超过勃列日涅夫的不乏其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书记处 10 名成员中，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是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党龄比勃列日涅夫长、并且在党内的资格比勃列日涅夫老的麦利尼科夫和帕托利切夫却没能入选。这次代表大会开后，麦帕两人还要返回基辅和明斯克去管理各自的共和国，而勃列日涅夫则要由偏远的基什尼奥夫搬到莫斯科来，在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工作”。勃列日涅夫不仅以难以想象的步幅在政治的阶梯上迈上了一大截，而且还一步跨到了苏联的政治中心，在这个令多少人向往、却又以“不相信眼泪”为格言的首都安家落户了。1952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 35 周年的庆典上，勃列日涅夫平生第一次登上了列宁墓，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身份检阅盛大的庆祝游行。他这时的心情和感觉恐怕和 7 年前胜利阅兵式那天不大一样，受阅者和检阅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极大的位置差别。这种位置的转换绝大多数人用一生的时间都无法实现，而勃列日涅夫仅用了 7 年的时间就做到了。

那么，他应该感谢谁呢？

感谢斯大林吗？这是人们通常会首先想到的人。不错，斯大林当时握有的权力无人能比，他的意志仍然是全党的意志，他提出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建议在党的最高决策层中只会得到一种反应：赞成，更何况像组成中央委员会

据此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供的数字，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代表团由 12 人组成，按每 5000 名选一名代表的规定，该州党员人数已达 6 万名。

麦利尼科夫和帕托利切夫均于 1928 年入党。前者自 1945 年起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二书记、1947 年起任第一书记。后者 1947 年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1950 年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1941 年起便成为联共（布）中央委员。

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选这样重大的人事安排了。他在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念的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如果不经他的最后认定都不可能写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斯大林认识、了解、或是在此之前接见过勃列日涅夫。除了勃列日涅夫后来自己说的在扎波罗热时那次与斯大林极为可疑的通话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勃列日涅夫仪表的那句评价之外，在这两个隔任继承者之间此前的个人关系中，就只有一片空白了。到底是斯大林把他不知道、不了解的勃列日涅夫写到名单上去的呢，还是他在别人提供的名单上正是由于不了解才没有把勃列日涅夫划掉呢，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斯大林同意把原来由 11 人组成的政治局扩大为由 36 人组成的主席团、把原来 6 人的书记处扩充到 10 人，无疑是给了勃列日涅夫一个跻身最高领导集团的绝好机会。

也许不能不感谢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没有他们两人中的哪一个，勃列日涅夫的升迁都是不可想象的。赫鲁晓夫作为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提携者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在勃列日涅夫坐上苏共最高领导位子之前的政治生涯中，赫鲁晓夫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越到后来他对勃列日涅夫政治命运的影响越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后者命运的主宰。如果说把勃列日涅夫推上高位有什么幕后力量在起作用的话，那么这种力量的最终化身就是赫鲁晓夫，即便现在还无法肯定斯大林念的那份名单就是赫鲁晓夫帮助拟定的，但出现在名单上的勃列日涅夫是百分之百地被作为“赫鲁晓夫的人”看待的。马林科夫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微妙。斯大林在晚年日益冷淡和疏远了与那些“老”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关系时，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新人”得以迅速密切与斯大林的关系，成为少数几人有幸进入斯大林身边“小圈子”的人。特别是在 1948 年日丹诺夫逝世之后，马林科夫在中央的影响力迅速增加。也许正如西方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们分析的那样，斯大林出于制衡马林科夫权力的考虑，1949 年便把赫鲁晓夫调来莫斯科，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要竭力保护已有的影响和权力，排斥一切新的竞争对手；一个在领会了斯大林的意图后，想方设法不让他失望。这样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可避免了。在政治斗争中，干部的安排和使用，尤其是关键职位上的人选，意义重大，因此双方都会千方百计地安插“自己的人”，限制、削弱对方的力量。这是一个政治常识，同时也是当时苏共内部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从马林科夫这个角度看，在赫鲁晓夫的人当中，只有勃列日涅夫资历最低、最没什么棱角，因而对自己的威胁也就相对最小，如果让他选择的话，当然首选勃列日涅夫。既然赫马之间的力量平衡是斯大林要求的效果，因此不管名单的拟定者是谁，他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凡属于赫鲁晓夫一派的人，马林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坚决否认自己与那份名单有任何关系。而且据他说，他曾问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后两个人也都发誓说事前对此一无所知。考虑到赫鲁晓夫口述回忆录时他已经下台，而且这件事又不是发生在他当政时期，因此似乎他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假话。据他推测，这份名单极有可能是卡冈诺维奇提供给斯大林的。卡冈诺维奇是赫鲁晓夫的政治提携人，并在 1947 年任过不到一年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这时勃列日涅夫虽是他手下的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但尚未干出成绩。等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罗热获得列宁勋章时，卡冈诺维奇已回莫斯科工作了。所以很难说他对比自己小 13 岁的勃列日涅夫有多少了解和器重。当然，所有这些都有待由可信的材料加以证实。

西方的传记作家，如原西德的莫罗佐夫执此看法。从政治道理上讲，这种解释并非一窍不通。但同样，他也缺乏有说服力的材料证明。

科夫一派要能接受，反之亦然。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大师们来说，摆弄这个魔方让它形成各方都满意的色彩搭配，并不特别困难。

如此说来，勃列日涅夫还应该感谢他自己了。他不是那种个性鲜明、恃才傲物、盛气凌人的人，也不属于阴险狡诈、令人生畏生厌的那种小人。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比较敦厚稳重，彬彬有礼，平易近人。这样的人即便不能讨得所有人喜欢，但是能被一致接受。尽管他被列入斯大林念的名单里让绝大多数人感到吃惊，但几乎没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幸，更不用说灾难了。很可能，勃列日涅夫的最大个性就是没有个性，所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遇到的上下左右无数的政治强人们，很少有谁认为自己不能控制他而在一开始就拒绝他，往往是在被他控制住了以后才体会到这个人的能力。这也许是一种政治上的韬光养晦，或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不管怎么说，它保证了勃列日涅夫在已有的近 20 年政治生涯中没栽大的跟头。

总之，勃列日涅夫的这次升迁是多种因素形成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斯大林、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以及勃列日涅夫本人等这些我们今天看得见的因素缺一不可。勃列日涅夫的这次“定位”既然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反过来说，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使勃列日涅夫的命运发生变化。不知道勃列日涅夫当时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即尽管他已贵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他仍然是斯大林党的一颗螺丝钉。就像越接近震中震级越高一样，越接近政治中心这颗螺丝钉所受到的作用力也越大，因此脱落、甚至断裂也就不足为奇。就在勃列日涅夫被“拧在”这个新位置上不到五个月，苏联内部的一场强震让他尝受了第一次重大的政治挫折。

第五章哈萨克的垦荒岁月

莫斯科一个普通的初春早晨，天空阴沉，寒风阵阵。早上6点，人们一觉醒来，习惯地随手打开收音机，立即被一段不同以往的悲伦、哀伤的音乐和随后播送的消息惊呆了。由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的《告全体党员和全体苏联劳动人民书》中说，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因患脑溢血于1953年3月5日晚9时50分逝世……

这无疑是苏联政治生活中一次强烈的大地震！那些离“震中”最近的人，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首先感受到了剧烈的震荡，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怎样使自己在震荡中保持平衡，使他们赖以立足安身的这个党、这个国家保持稳定。突发的变故容不得他们有片刻的犹豫，多年政治活动的经验、阅历使他们没有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相反，他们迅速达成一致并果断行动起来。3月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达成共识：“在我们党和国家这个困难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的整个生活得到不间断的正确的领导。因此就需要我们的领导保持最紧密的团结，防止任何不协调和混乱现象，以便彻底保证我们党和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能够顺利实现。”同时，也“为了防止对于各级国家机关和党组织的活动的领导发生中断起见”，会议认为“必须采取若干措施，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接着，会议作出了11项调整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决议，涉及的人事变动共有50人次。勃列日涅夫是这50人之一，他和波诺马连科、伊格纳托夫一起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职务，调任苏联海军部政治部主任。在同时公布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组成人员名单中，无论是正式还是候补委员都没有勃列日涅夫了。勃列日涅夫忽然发现，一夜之间他已经被“请”出了党的两个最高机构，要知道，他在这两个机构中任职充其量也只有140天呀！

就这样，勃列日涅夫搬出了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第三次穿上军装，到海军部上任了。不难想象，这段日子勃列日涅夫的心情大概不太好，他对斯大林逝世会对自己的政治命运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缺乏心理准备，对自己眨眼之间就成了这次强震之中第一批受到冲击的对象感到茫然。一切都说明，在这次政治大地震中，他是从最接近震中的党的最高机构中首先“脱落”的螺丝钉之一，这时刚刚被拧到这个位置上只有20周时间、还“崭新”的勃列日涅夫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在他那部还算连贯的《回忆录》中，从1953年3月至1954年2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几乎没被提到过。不过，在这段灰色的日子里，让勃列日涅夫心理上多少能找回一点平衡的是，首先他仍然留在政治中心莫斯科，这至少比同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阿·勃·阿里斯托夫好得多，这名党中央人事部领导人一夜之间被调到中苏边境上的哈巴罗夫斯克，任边疆区苏维埃主席。其次，他的军衔也晋升一级，从少将变为中将。这大概主要考虑是为与他担任的新职务相称，因为这时根本谈不上他在军事领域有什么贡献。勃列日涅夫在海军部还没完全安顿下来，新的机构调整又随之而来。3月15日，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

会议决定全文收入《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

议上，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提议，把苏联军事部和海军部合并组成苏联国防部，由布尔加宁元帅任部长。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勃列日涅夫改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的直接领导是阿·谢·热尔托夫大将。但他在总政治部几乎没有固定的工作，所以 1953 年的整个夏天他都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度过的。如果说这段时间他还干点什么工作的话，那也是受热尔托夫将军个人的委托临时处理点事情。这种安排只会加重他的失落感，尝到了被人不用任何理由就从权力的核心抛出来的苦涩。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的工作很难获得成绩，所以就连勃列日涅夫在世时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不惜笔墨介绍勃列日涅夫生平和贡献，对这一时期也只有简单且措辞谨慎的两句话，说他“领导政治机关努力提高军人的思想修养，保证陆海军全体人员尽快掌握新式技术装备和武器”。

但是如果认为勃列日涅夫从此便意志消沉、厌倦政治，那就把他看得过于简单了。勃列日涅夫虽然表面上不像一个政治强人，但也绝非是那种承受不住任何打击、没有一点自我保护能力的政治“雏鸟”。多年从事政治的经验，看到、听到的许多活生生的事例，教会他如何败而不馁，如何耐心等待，如何寻找并果断抓住一切可以重新崛起的时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而对一名政治家来说这却是一种基本素质。

勃列日涅夫等待着。11 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

即使到了 1953 年，若按人口和使用土地面积划分，苏联仍可算得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它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57%，集体农庄、农业企业及农场使用的土地占全部国土的 44%。然而，这个每年平均创造差不多 3000 亿卢布产值的国民经济第二大部门，发展似乎总不令人满意。在战后的恢复时期，虽然被战争破坏的集体农庄制度重新确立起来，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提供的农副产量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现象一直存在。与战前一样，农业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民经济部门，制约着其他部门的发展。斯大林执政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被作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战略确定下来，这就决定了在实践上轻工业和农业既要为重工业服务，同时也要为它让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服务和让路往往意味着牺牲。斯大林在世时，农、轻、重发展比例失调已经相当明显，人们，包括斯大林本人对此也不是没有察觉，但在把最高权力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没有下决心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之前，一切都只能是务虚，而且具有相当的危险。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领导层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具备斯大林当时已达到的威望，他们要想在领导位置上站住脚，得到党内的认可和为人民所接受，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继承斯大林的遗产，而是必须办些实事。于是，接任斯大林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马林科夫，在 1953 年 8 月上旬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刻意强调了必须大大增加对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以及水产业，对发展农业的投资，以大幅度增加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明确了这是要在两三年内完成的“刻不容缓的任务”。9 月 3~7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在这次全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措施的报告。全会根据他的报告作出决议：“必须立刻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把落后的农业部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地区提高到先进的水平，以保证整个社会主义农业大大发展。”目标是使巨大潜力尚未很好挖掘出来的农业，

《苏联国民经济 1958 年统计年鉴》上的数字，年鉴注明按 1956 年不变价格计算。

在“最近两三年内充分满足我国居民对各种食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充分保证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供应”。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中，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就发展畜牧业，增加马铃薯、蔬菜产量，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工作，扩大日用品及食品生产并改进其质量等问题作出一系列决议。

自认为在最高领导层中对农业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赫鲁晓夫，为解决上述问题开出许多“药方”，像降低农业税额，增加对农业的技术投入，改进对农业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提高农副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动员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和干部充实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以及最富有赫鲁晓夫个人特点的垦荒计划。他在1954年2月23日至3月2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开垦生熟荒地作了报告。依他之见，苏联目前的谷物生产水平尚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一切需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外，“增加谷物生产主要的、最容易做到的和最迅速的办法”，就是大规模开垦荒地，以扩大谷物播种面积。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作出一项涉及八方面内容的决议，其中第三方面在“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是增加谷物生产的巨大潜力”标题下，决定开垦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 and 北高加索一部分地区的生熟荒地。苏共中央全会向苏联农业部、苏联国营农场部以及上述地区党政机关、农业机关提出的任务是，在1954—1955年至少开垦1300万公顷的生熟荒地，并在1955年从这些土地上收获11—12亿普特的谷物。同时，决议中还指出，上述任务能否顺利完成，首先取决于正确地选派熟练的领导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到新垦区去。

尽管农业问题自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以来一直是中央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就这样一个大规模垦荒计划本身，提出的还是比较突然。对那些被列入要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共和国和边疆区领导人来说，如此迅速地上规模、出效益，只能打乱他们已经习惯的工作节奏和已作出的工作安排，增加巨大的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他们对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缺乏相应的雄心、信心，甚至连表面的热情也表现得很有分寸，更有甚者，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列在各开垦地区首位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沙扬赫梅托夫和第二书记阿方诺夫就是最后一类人的代表。在已经奠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下定决心推行垦荒计划的赫鲁晓夫面前，他们俩的反对只能导致被撤换下台的结果。为了“加强”哈萨克共产党的领导，马林科夫从“自己的人”中选出了潘捷列伊蒙·康德拉季耶维奇·波诺马连科，而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平衡，赫鲁晓夫也需要从“自己的人”中选一个去哈萨克，于是他选中了勃列日涅夫。

至于为什么偏偏选中当时已身在军队中的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没有进

认为农业潜力没有很好挖掘出来的理由看来是基于以下统计，以1953年的产量对1940年产量的百分比计算，谷物为86%，亚麻纤维为47%，马铃薯为95%，蔬菜为83%，肉类和脂肪为129%，牛奶为108%，而农业总产值仅为104%。

生荒地指未经开垦且长满天然草木植物的土地，也称处女地。熟荒地指曾开垦种植，但由于各种原因荒废达三年以上的土地，亦称撂荒地。

1 普特约为16.38公斤。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曾设法查明哈萨克党的领导人持反对态度的动机。他的结论是，这些领导人“染上了民族主义病菌”。由于哈萨克人口稀少，他们害怕大规模垦荒会引起大量非哈萨克族人的涌入。

行过多解释，只是说他曾当过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对勃列日涅夫来说，来自中央的召唤，是他期待已久的了，去一个加盟共和国担任党的领导职务要比在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位子上更有用武之地。用他的话说，这是他生活道路上的“又一个急转弯”。

1954年1月3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哈萨克的形势及有关垦荒的事宜。很可能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调整哈萨克党中央领导班子的决定。在此前几天，赫鲁晓夫已与勃列日涅夫进行过谈话，交代了任务，所以主席团会议结束没几天，2月初，勃列日涅夫便与波诺马连科飞到阿拉木图，准备参加决定许多人命运的哈萨克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在2月5日召开的全会上。哈萨克党的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尽管很尖锐，但为时已晚。进行选举时，随着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前来的苏共中央代表通知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建议选举波诺马连科为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为第二书记。这样，两个既不是哈萨克族人、在此之前从没到过哈萨克工作过的“莫斯科来客”，顺利地坐上了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和第二把交椅。

波诺马连科生于1902年，比勃列日涅夫大4岁，入党却比他早6年。早年从事过共青团工作，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然后在苏军中服役5年。从1937年起，他就在联共（布）中央任督导员，几个月后破任命为联共（布）中央领导机关主管部副部长，而该部部长就是马林科夫。1938年夏，波诺马连科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并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47年。卫国战争期间，先后任西方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军事委员，并在1942年11月至1944年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总司令员，于1943年获得中将军衔，这比勃列日涅夫得到同等军衔早了10年。1948年，波诺马连科就成了联共（布）中央书记。十九大后，他是主席团正式成员和书记处书记。尽管斯大林逝世后他没能进入新的主席团正式委员之列，但仍为候补委员，并在新组成的政府中任文化部部长。仅从这份简历中就不难看出，波诺马连科的政治资历比勃列日涅夫高许多，由他任第一书记是很自然的。

作为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要对共和国各方面工作负责，初来乍到的他，光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理顺各种关系就需要花巨大的精力，因此像垦荒这样紧迫而又复杂的任务，只好委托给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来集中精力完成了。

这种规模的垦荒，就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也可算得上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垦荒地点的选择和垦荒人员的调配，是该系统工程中的两大主项。围绕这两大主项又派生出许多子项，如土壤、水文材料的收集整理及科学分析，人员的衣食住行安排，垦荒所需物资的调集与分配以及技术保障等，可谓千头万绪、纷繁庞杂。别的不说，单是垦荒者的安排这一项，就远不是像

退休后，赫鲁晓夫回忆往事时提到波诺马连科，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和可靠的领导工作人员”，“对农业管理和政治工作也十分称职”。但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说，当年他常与父亲谈论对周围人的看法，每当谈到波诺马连科时，赫鲁晓夫便不愿多谈，给他的感觉是父亲与此人关系不大正常。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排除对波诺马连科的任命有赫鲁晓夫想把此人尽快调出莫斯科的因素在起作用。某些西方人也有类似看法。对此可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七章、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的前前后后》、原西德的米夏埃尔·莫罗佐夫《勃列日涅夫传》中《草原上的考验》一章等。

想象得那样简单。为了给垦区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党和政府向全国发出号召，特别是向共青团员们发出“向荒地进军”的号召。短时间内，成千上万名垦荒者来到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仅莫斯科及其郊区就有5.4万多人来到垦区，有的是整个农庄、班组和家庭一齐迁居过来的。第二年，又进行了有组织的迁徙，仅从勃列日涅夫工作过的摩尔达维亚来到北哈萨克定居的家庭就有近两万个。如果说对那些第一批自愿来垦荒的共青团员们还可以让他们暂时在军用帐篷里安身，那么对有组织迁居过来的居民来说，就需要为他们准备好像样的住房、修建配套的生活设施如学校、商店、幼儿园、医院、水电及供暖设备了。而对于任何一个初具规模的开垦点，除了要有上述设施外，公路、桥梁、粮仓、库房、加工厂、甚至机场，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新的开垦点是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的，问题也还好解决。但当时垦荒工作是一下子全面铺开的，因此新的农场和集体农庄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如雨后春笋，十几个、几十个同时出现，其问题之多、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而这只是垦荒这个大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项！

从1954年春到1955年夏这十五六个月，恐怕是勃列日涅夫一生中最忙的一段时间了。的确，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宽大、宁静的办公室里听赫鲁晓夫大谈垦荒的宏伟规划和巨大意义是一回事，而置身于哈萨克荒凉、落后、气候恶劣的大草原中，并对几十万人生产、生活乃至生命负责、对自己的政治恩师的全部希望负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论从哪方面说，这都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件相当危险的工作，干不好虽然不会马上危及生命，但至少会使自己的政治前途遭受重大挫折。因此，自从勃列日涅夫走出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接受了来哈萨克完成这件“目前党的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时起，他就没有退路了，只能全力以赴地去干。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人的政治命运，通过荒地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需要勃列日涅夫过问、处理的工作千头万绪，从整个垦区的土地规划——勃列日涅夫20年代未曾当过土地规划员，到新建农场的选址定位；从莫斯科苏联国营农场部特设为垦荒区挑选专家的办公室，到垦区某一个新农场的开犁典礼；从大型农用机械的调拨，到普通铁犁的改进；从应付上至赫鲁晓夫下至各政府主管部门要员的视察，到帮助新农场解决男女比例失调问题，等等。当然，即使勃列日涅夫精力再充沛，只靠他一人是无论如何完不成垦荒任务的。他承担起垦荒主要领导者责任后，马上在自己周围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后来被人称为共和国垦荒司令部的工作组没有正式编制，也无任何专职人员，所有成员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而他们的工作又都与农业、因而也就与垦荒联系在一起。只要看看这个小组成员们的头衔就不难体会它对垦荒的意义了。除勃列日涅夫外，小组成员还有：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农业书记法·卡·卡里勃扎诺夫，中央委员会主管农业和国营农场的部长安·康·莫罗佐夫和瓦·安·利文佐夫，共和国农业部长格·安·弗拉先科等。这些人身居要职，握有相应的权力，如果说单独地看他们每个人面对如此规模的大垦荒可能算不上什么，那么把他们汇合在一起，其能量就不能低估了。除了这几员“大将”外，勃列日涅夫还物色了许多顾问，像共和国科学院院长丁·阿·库纳耶夫，此人虽是矿业工程师、有色金属专家，但勃列日涅夫评价他说“不囿于狭隘的专业，能从国家全局出发思考问题，思路开阔，又有胆略，对哈萨克的丰富资源和发展远景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见

解”。共和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所长乌·乌·乌斯帕诺夫、共和国农业部土地规划局局长瓦·亚·舍列麦季耶夫等人也都是勃列日涅夫的顾问和助手。

来自中央、首先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支持与关注，也使勃列日涅夫有了可靠的后盾。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就垦荒做出的一系列决议和指示，成了勃列日涅夫手中最具威力的“上方宝剑”，有了它，他可以要来平时不敢想象的一切，化解遇到的阻力。大规模开垦荒地需要大量现代化农机设备，在这方面中央对哈萨克格外慷慨。以拖拉机为例，1953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拖拉机总台数折合成15马力的拖拉机计算为70100台，1954年增至120500台，1955年又达到17200台，而1956年再增加到218100台，成为仅次于传统农业大户俄罗斯、乌克兰的拖拉机第三大共和国，其各年增长率分别是71.9%、42.7%和26.8%。统计显示，无论是这几年拖拉机增长绝对数量累计还是增长百分比，没有一个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超过哈萨克。统计还显示，1955年全苏生产的拖拉机总数（折合15马力拖拉机计算）中有1/4提供给了哈萨克。有了拖拉机，人们迫不及待地向荒地开战了。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沉睡了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大草原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征服。蔓延其上的各种草本植物的根茎纠缠在一起，坚韧异常，好似铁丝和牛皮绳的混合物，而这种混合物连成一体覆盖在草原上，使表面绿茵如画的草原宛若披上一副铠甲。加上这里的5月份几乎不下雨，而且气温很高，土壤中表层的水分迅速蒸发，土地干结得像石板一样。要翻耕这样的土地，不仅需要大马力的拖拉机，而且还需要新型的铁犁。这时正是1954年6月上旬，垦荒工作全面铺开没多久，各地对此反应强烈。赫鲁晓夫恰在这时前来哈萨克视察，在库斯塔奈州的一个养马场召开了规模很大的工作会议。赫鲁晓夫及其随同前来的党政要员、波诺马连科、勃列日涅夫、州委第一书记和执委会主席、以及农业机械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上层翻耕问题，问题的要害是普通耕地用的铁犁无法把前小犁切开的草根土地翻到垄沟底部去，被翻耕的土地乱七八糟地堆积着，这样将无法进行播种。这个问题让与会者大伤脑筋，因为这将大大影响垦荒的进程和结果。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拖拉机手的意见，解决的办法找到了。其实很简单，只要生产一种带半螺旋形和全螺旋形犁壁的铁犁就行了。当赫鲁晓夫弄清楚问题原来如此简单时，对身边的农业机械专家和地方党政官员大发雷霆，责怪他们没事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个月后新型的铁犁便送到荒地上来了。

赫鲁晓夫的视察对哈萨克的垦荒是个推动，同时也说明他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在库斯塔奈州举行的一次州常委会上，他提出要在垦荒区修建窄轨铁路，理由是这样可以把粮食从偏远地区运到铁路线上来。结果当然是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库斯塔奈——乌里茨科耶、叶西尔—图尔盖两条窄轨铁路先后建成。尽管勃列日涅夫后来认为这是赫鲁晓夫一次“鲁莽冒失”的错误，两条铁路在运粮方面实际上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但在垦区尚未播种之时赫鲁晓夫就想到了大获丰收之日，这种憧憬是源于梦想还是信心呢？看来，当时的与会者更多的是接受了后者，否则他们不会“没有提出任何值得注意的

库纳耶夫结识勃列日涅夫后，其政治命运随之发生变化。1955年，勃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库纳耶夫升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后又接任勃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1971年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反对意见”，也不会短时期内就迅速建成上述两条铁路。如果是一种信心的话，那么这种来自党内最高领导的信心，只会让地方的党政领导们受到鼓舞与激励。

1954年，哈萨克开垦的生熟荒地共853.1万公顷，第二年又开垦了943.6万公顷，两年相加的垦荒面积相当于两个匈牙利，或是一个半捷克斯洛伐克。这上面新建的农场达337个。成千上万的第一批垦荒者极具献身精神。一个新的农场场长来到他的任址的时候，往往口袋里只装着任命书、银行存折号码和图章。到达指定地点后，把标有农场名称的界桩砸进地里，然后按照带来的新农场土地规划图向荒原开战。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垦荒者的生活艰苦又枯燥。最初的住所是军用帐篷、土窑和被称为“无檐海军帽”的小土房，靠汽灯或煤油灯照明。由于大规模垦荒使建筑材料和一些生活用品极度紧张，许多垦荒者不得不在这种简陋的栖身所里度过春天、夏天和秋天。而分布在北纬50°的垦荒区的冬天对“荒地人”就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偏偏1954年哈萨克的冬天又酷寒异常，刺骨的寒风卷着连当地人都少见的大雪在草原上咆哮，天昏地暗，滴水成冰，置身其中，就如同堕入黑暗的深渊。在这样的条件下，毋庸讳言，一些抱着美好幻想来到垦区的青年人退缩了，离开这里回家了。但是毕竟也有相当一部分垦荒者留了下来，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块土地，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没来得及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就与世长辞了。这中间，有经历了战争的枪林弹雨、没有牺牲在战场上的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垦区的垦荒者，也感动了当时的勃列日涅夫，他说他在读因给在暴风雪中迷路的拖拉机队探路而牺牲的瓦西里·拉古佐夫的遗书时，“感到喉咙哽住了”。而他又以政工干部特有的敏锐，通过报道让全国知道了拉古佐夫的遗书，于是“一支支新组成的志愿垦荒队伍纷纷向荒地开来”。

大力发展农业和垦荒在哈萨克初见成效。1954年秋收之后，《真理报》10月27日报道，哈萨克上缴国家2.31亿普特商品粮，共和国库存1400万普特，仅库存一项就比近5年的库存都多。要知道，这还是在并不是所有开垦出的荒地都播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上上下下对垦荒的信心大增，热情陡涨。根据中央进一步扩大开垦荒地的指示，哈萨克领导人决定在1954年开垦853万公顷荒地基础上，1955年再开垦出至少同等数目的荒地。1955年的春播进行得非常顺利，1000万公顷的谷物播种到垦区翻耕过的地里，这比计划多播种了近150万公顷。人们看着黄灿灿的种子落入泥土，几乎没人怀疑半年后他们将收获沉甸甸的麦穗和玉米……然而，五、六月份这个对垦区来说绝对宝贵的“雨季”没下一滴雨，火辣辣的太阳日复一日地烤炙着垦区大地上的一切。当然，炎热和干旱在这里并不罕见，但是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这些“外来”的垦荒者们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时的气候有一条自己的残酷无情的规律：每10年就要来一场特别严重的干旱，一旦它到来，那就是毁灭性的。现在，哈萨克的垦荒区，那上千万公顷已经播种下种子和人们希望的土地，就面临这种毁灭。

“草原上连呼吸都很困难。空气像火炉里喷出的热浪，烧炙着人的肺腑。就像在严寒的冬季一样，鸟儿也不飞了。植物的叶子干枯凋零，落在尘土里。

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说1954年哈萨克向国家缴纳了将近2.5亿普特粮食。两个数据之间有差异。但库存一项与《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相符。

大地龟裂，裂缝深得连铁条丢下去都会无影无踪。大片大片的小麦眼看变成灰白色。沙沙作响的麦穗都是干瘪的，没灌浆的。但是祸不单行，突然刮起了热风暴，扬起了满天尘埃，吹断了电线，掀走了屋顶。”勃列日涅夫的这段描写，说明了什么叫“灾难”。1955 年对垦荒者来说，的确是个“绝望之年”。如果说这场 10 年一遇的干旱让垦荒者痛心疾首的话，那么它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就来得更不是时候。1955 年 3 月，哈萨克党中央领导层发生重大人事变动，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被解除了职务，调任苏联驻华沙大使，了解苏联政治情况的人都懂得，这是表明此人政治上被贬黜的典型做法。波诺马连科的去职并非由于哈萨克的工作没有做好，而是与他在莫斯科的政治靠山马林科夫的倒台联系在一起的。马林科夫在同年 2 月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后，赫鲁晓夫在最高领导层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而勃列日涅夫作为他的人，并且为他提出的垦荒战略在哈萨克旗开得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填补波诺马连科的空缺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来自中央的任命却让勃列日涅夫疑惑不解，他被任命为代理第一书记而不是正式的第一书记。尽管这可能不是赫鲁晓夫的本意，但却足以令勃列日涅夫惴惴不安了，因为这时任何一个小的失误，都可能授人以柄，落得个前功尽弃的结果。同样，回避和退缩也不是办法，惟一的选择只有咬牙坚持住。

勃列日涅夫感到周围的压力明显加大了。绝望的人们连续好几个月把一封封求援信投寄到哈萨克党中央委员会，询问他们心目中的万能的党组织：怎么办？如何是好？当勃列日涅夫来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时候，与会者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向他打听情况，或者故意谈些不相干的事情来掩饰自己对勃列日涅夫的同情，这让勃列日涅夫感到“很不是滋味”。甚至赫鲁晓夫有时也有些灰心了。在一次全苏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会议上，当勃列日涅夫发言表示将在荒地上重整旗鼓时，赫鲁晓夫打断他的话说：“用您的诺言可烤不出馅饼来！”而当勃列日涅夫宣布明年哈萨克将向国家提供 6 亿普特粮食时，大厅里响起的不是常见的鼓励的掌声，而是“一片表示怀疑的嗡嗡声”。人们大概认为，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就肯定是勃列日涅夫同志让灾害气昏了头。

好在赫鲁晓夫并未对勃列日涅夫彻底丧失信心。1955 年 8 月，勃列日涅夫被哈萨克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为第一书记，这也正是赫鲁晓夫在党中央主席团中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地位的时候。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他只有拼命工作来报答中央对他的信任。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哈萨克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各垦荒区召开群众大会，向人们说明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丰歉是农业生产的常事。勃列日涅夫特别叮嘱到各地区去召集会议的干部，“不要显示出一副乐天派的样子，好像什么也不在乎”，因为灾难性的形势越粉饰后果就越严重。同时，在各个农场大兴土木，调运大批食品和工业品，以稳定垦区群众情绪。勃列日涅夫更是马不停蹄地忙碌着：或是穿梭于莫斯科与阿拉木图之间，寻求中央的支持和帮助；或是到共和国各地视察，为严重歉收做些别的补救工作。他有一架在基辅定做的“安—2 型”飞机，这在交通不便的大草原上是最理想的交通工具了。勃列日涅夫乘坐它有时一天跑好几个垦区或国营农场。机上安放了一座大功率电台，客舱里有六只沙发，机尾还放了

西方的传记作家认为这是由于莫斯科领导层中有些人不愿意让赫鲁晓夫的势力增长太快。莫罗佐夫便持此看法。

一张折叠床。这样，第一书记不仅可以保持与各地的联系，根据需要及时赶往目的地，还可以在机舱里召开小型会议，或是抓紧时间休息。在勃列日涅夫离开哈萨克时，机长莫伊谢耶夫告诉他，两年来，这架在苏联外号叫“蚊子”的飞机载着第一书记飞行了480个航次，几乎飞遍了草原的各个角落。紧张、艰难的工作和生活的无规律，使49岁的勃列日涅夫两次心脏病发作。人们把他送进了阿拉木图的医院，医生坚持让他卧床休息，但勃列日涅夫实在没有心思呆在病床上，因为对垦荒、因而也是对他政治前途至关重要的1956年来到了。

第六章经受政治风雨洗礼

1956年，苏联政治生活中第一件、也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就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当这四年一次的代表大会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开幕时，恐怕谁也没想到它会在苏联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引起一连串令世人惊愕的后果。在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后召开的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在大会一头一尾作的两个报告，即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成功地为“赫鲁晓夫时代”的开始树起了里程碑。

勃列日涅夫率领哈萨克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勃列日涅夫第二次以党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大礼堂，而且两次他都是不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过，上次他率领的摩尔达维亚党代表团小得可怜，而这次，他的代表团人数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排第三位，如果不算俄罗斯联邦内的各代表团的话，那么哈萨克仅次于乌克兰。作为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依惯例获得一次大会发言机会。假如没有1955年的干旱和歉收，勃列日涅夫本可以向代表大会汇报更多的成绩，现在他只能把调子定得尽量低些。主要的成绩集中在开垦荒地上，他向代表们透露了当时还属于内部的数字，“实际上，开垦了1800万公顷的荒地，比预定计划多270万公顷”。大会速记记录显示，代表们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莫罗佐夫就此评论道：“在一个依然还是第二流的干部发言中响起掌声，这是罕见的”。勃列日涅夫还谈到了哈萨克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工业中的开采部门和冶金部门，农业中的畜牧业，等等。作为一名政治家，特别是作为赫鲁晓夫的亲信，勃列日涅夫的这种表面上的自我批评，有其深刻的政治寓意。像哈萨克这样蕴藏着占全苏总量2/3的铅、近1/2的铜和镉、储量极大的铁矿石和煤与石油的共和国，完全“具备一切条件，成为苏联最强大的工业和动力中心之一”，然而“我们并没有充分利用那些条件”。显然，这是一种决策失误。同样明显的是，对此负责的不是刚刚当了半年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至于他的前任波诺马连科，尽管他比勃列日涅夫在这个职位上呆的时间长些、因而责任要大，但他也不应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他毕竟也只是个执行人而非决策者。他的背后是一年前身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位的马林科夫。人们尚记忆犹新，正是马林科夫在1953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刻意强调政府将大大增加对轻工业、食品工业、农业的投资，指出这是两三年内要完成的“刻不容缓的任务”，而对苏联一贯强调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没有像以往那样提到首要位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成了马林科夫政治上的致命伤。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赫鲁晓夫成功地抓住这一点并赢得对马林科夫的第一回合胜利，迫使后者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承认了在发展重工业问题上的“过失”。现在，勃列日涅夫举出哈萨克发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方面的不足，只不过是证明马林科夫的错误和赫鲁晓夫的正确加一个新的注脚。

和历届代表大会一样，本次大会也投票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勃列日

在1957年出版的《1956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垦荒数字。与勃列日涅夫说的略有不同，1954—1956年哈萨克共开垦荒地1987万公顷，居全苏首位。

[西德]米·莫罗佐夫：《勃列日涅夫传》中译本，三联书店1975年，第201页。

涅夫是新当选的 133 名中央委员之一。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一切似乎是 1952 年十月全会的重演：他又被选举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当然，勃列日涅夫达到的只不过是四年前就已得到的位置，但只要作个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勃列日涅夫是最“幸运”的。在 1952 年被选为主席团候补委员的 11 个人中，只有勃列日涅夫经过 4 年动荡不定的岁月后重新当选，其他 10 个人在党内的职位现在没有一个超过他，尽管这里面有自 1940 年起就任苏联人民委员会（1947 年改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柯西金，有已经担任 17 年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长）的兹维列夫，有享有党内哲学家声誉的尤金等人。

在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核心机构——书记处中，勃列日涅夫被安排分管国防工业、重工业、基本建设以及发展宇宙航天技术方面的工作。与前三项相比，发展苏联的宇航技术当时还是一个崭新的工作领域。像开垦荒地一样，热核武器及其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宇宙火箭技术，也是赫鲁晓夫特别关注的对象。越来越明显的是，在热核时代，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及苏联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但这又是一个包含当时自然科学中诸多前沿理论和尖端科技成果的庞大综合问题，远比开垦荒地复杂、艰难得多。即使赫鲁晓夫对此非常重视，经常过问并发布指示，但他不可能像熟悉小麦和玉米一样去熟悉火箭和卫星。再说，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也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那些天书一样的运算公式和符号。他必须物色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亲信，帮他管理此项工作并督促其尽快取得他所要的成果。于是，在哈萨克不辱使命的勃列日涅夫再次被选中了。此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决定了勃列日涅夫的工作安排：其一，在书记处的八名书记中，他是惟一既有冶金工程师职称又有将军军衔的人，也是惟一个在斯大林逝世后在军队最高领导机关里工作过的人，而分管国防工业及发展宇航的工作，无疑都要跟军方打交道；其二，苏联领导人曾有意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荒原上选一块地区，作为宇宙火箭发射场场址。据勃列日涅夫说，为火箭发射场选址，是他们赴哈萨克执行垦荒任务时中央交给他们的另一项秘密任务。这样勃列日涅夫又成了书记处中对哈萨克境内这个未来的基地最有发言权的人了。

就这样，苏联历史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苏共二十大，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命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56 年初春，他离开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哈萨克，重新回到了莫斯科，并且至死都没有再被从这块政治中心上排挤出去。哈萨克盘根错节、风雪交加的草原垦荒成为过去，现在，一块新的“处女地”正等着勃列日涅夫组织新的大军来开发。

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偏西南部，与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共同拥有一个内陆湖——咸海。从咸海东岸沿锡尔河东行约 200 公里有个叫列宁斯克的地方，现在属于人口上万的行政区，但在 50 年代中期，这个原名丘拉塔姆的地方，还是人烟稀少、荒漠连天的不知名的小村镇。早在 1955 年上半年，肩负开垦和为火箭发射场选址双重任务的勃列日涅夫来此地视察，结果，他没有

其中安·扬·维辛斯基已于 1954 年 11 月 22 日在纽约逝世。

见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宇宙的十月革命》，载《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专辑·续编），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为共和国找到一块有开垦价值的荒地，却为苏联选中了一块火箭发射场的候选场址。当时除了在哈萨克建发射场方案外，还有个北高加索方案。两个方案的支持者展开激烈辩论，作为主管书记勃列日涅夫无法回避要对这两个方案表态。经过研究和与有关专家交谈，勃列日涅夫决定支持哈萨克方案，理由有两条。其一，尽管选择北高加索方案可能建设速度会快一些、简便些、花钱少些，但这将毁掉成百上千公顷极好的可耕地和优良的牧场，相反，哈萨克方案就不会造成这方面的损失。这条理由想必对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非常关心的赫鲁晓夫留下深刻印象，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的倾向往往又是决定性的。其二，在原本是荒漠的地区兴建火箭发射场，势必改变这一地区落后面貌，因此，国家的投资可以一举两得，收到双份效益。这一条，无论是对总想方设法从中央多争取资金的地方干部，还是对总感到钱不够用的中央领导人，都还算是能让双方满意的选择。因此，中央赞成哈萨克方案。于是，日后举世闻名的拜科努尔宇宙发射场，就在哈萨克破土动工了。

尽管勃列日涅夫在书记处分管发展宇宙科技方面的工作，但他在这方面充当的实际角色，还是一个执行者和协调人。国家宇宙航天的最高决策者仍然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工作直接向他负责，除了例行的请示汇报外，凡是稍大一点的问题，勃列日涅夫都习惯于请示赫鲁晓夫拍板决定。同时，对于具体设计、制造宇宙航天器、火箭以及发射场建设工程的纯技术部门和专家们，他又是个“门外汉”，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他的优势和特长，就在于介于决策者和从事具体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之间，上令下传和下情上达，或是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以比较超脱的身份，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他也因此结识了当时苏联一些一流的宇航专家及与此有关的军方人士，像苏联航天学奠基人之一、火箭和航天系统总设计师谢·巴·科罗廖夫，宇航学理论家姆·弗·凯尔迪什，军用火箭专家米·库·扬格利，当时任苏联国防工业部部长、1976年后任国防部长的德·费·乌斯季诺夫，军事防御体系专家、拜科努尔发射场工程总负责人格·马·舒布尼科夫将军，第一任战略火箭军总司令米·伊·涅杰林……

在1957年5月1日拜科努尔发射场交付使用之前，勃列日涅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射场工程建设，二是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设计研制。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拜科努尔发射场工程进行得非常艰苦。由于工程是在荒原上进行，建设者们只能住在车厢和帐篷里。他们需要首先挖掘和运走100多万土方，因此，整个工地上空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为了抢时间，工程昼夜不停地进行，但就在离基坑设计深度还剩下几十米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钻孔中喷出地下水来。在干旱的草原上，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经过紧急勘察，原来基坑附近有条地下河，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工地随时都可能被淹没。工程负责人在把情况上报的同时，也提出了几种应对方案，如边抽水边施工，在远离地下河的地方重挖基坑，以及能否减少基坑的设计深度，等等。但前两个方案将大大延迟整个发射场竣工的时间，在工程期限已经被卡得很死、且这里的工程已经引起西方国家密切关注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对延迟工期造成的后果负责。而后一个方案在科学上就根本行不通，用发射场总设计师的话说，发射架的深度不能小于火箭启动时气流自由行程的长度，“这在今天是一条法律”。

工程只好暂停下来。也许，勃列日涅夫后来所说“这项建设工程曾引起

了极大的焦虑和关注”，这次就是其中之一。要不是一位工地主任突发奇想，工程可能还会拖延下去。这位主任建议用强力爆破法把水压出去，即便几周后水再流回来，还是来得及浇灌混凝土底基，建成抽水站，修好排水渠。工程总负责人舒布尼科夫将军认为这是最后的机会，值得一试，并向勃列日涅夫讲明了情况。勃列日涅夫当时让他们马上行动。但在舒布尼科夫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时，他又“对这个大胆的施工方案的后果感到焦急不安”。不过，勃列日涅夫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往拜科努尔打电话，他只是“等待着”。结果，“舒布尼科夫终于说话了”：强大的爆破不仅暂时顶住了地下水，而且完成了基坑剩下的几十米厚度的上方。尽管地下河后来又在渗水，但基坑按时完工了。

相对于发射场工程和地下河来说，运载火箭的研制付出的代价更大。当时苏联大功率火箭系统的研制由科罗廖夫领导的设计同页贡。早在1932年，年仅26岁的科罗廖夫就领导着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火箭技术研究所——苏联国家喷气推进研究所进行火箭武器的研制工作，并在第二年试射成功了苏联第一枚液燃火箭。他的研制工作得到当时苏联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兼工农红军装备部部长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大力支持。可惜没过几年，图哈切夫斯基被莫须有地指控犯有“叛国罪”遭到处决，一大批军工方面的科研人员受到牵连，被捕入狱，科罗廖夫是其中之一，所幸的是在以后的10多年中，科罗廖夫仍被特准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继续其研究工作。斯大林逝世后，科罗廖夫恢复了自由和名誉，焕发他极大的工作热情。由于当时苏联尚不能制造能飞到美国的远程轰炸机，而美国可以轻易地用它在欧洲基地上的轰炸机威胁苏联，使苏联在同美国的抗衡中处于下风，因此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人认识到，苏联需要拥有比轰炸机更可靠、能把炸弹投到敌人家里的手段，这就是洲际导弹。然而要把约2吨重的原子弹投到6400公里外的目标，需要有至少455吨推力的巨型火箭。而科罗廖夫正是苏联远程火箭系统首屈一指的专家。于是他被请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给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行火箭和导弹知识的“扫盲”，并带领他们参观发射场。赫鲁晓夫把这些高级领导人当时的惊奇神态描写得惟妙惟肖，说他们就像一群绵羊第一次看见一扇新门，还像市场里的农民，绕着巨大的火箭转来转去，摸摸拍拍，就差用舌头舔舔，尝尝它是什么滋味了。这群人中是否有勃列日涅夫，不得而知，但自1956年后，他与科罗廖夫的私人关系和与其设计局的工作关系都迅速密切起来。他亲自视察科罗廖夫设计局，关注着大功率运载火箭“谢苗尔卡”的研制进程，在乌斯季诺夫陪同下，勃列日涅夫亲临试验场观看运载火箭发动机的点火试验，分享成功的欢乐……

1957年8月3日，经过前几次发射失败后，“谢苗尔卡”火箭终于发射成功。火箭从拜科努尔起飞后，在地面导航系统引导下，飞行到堪察加半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这次发射成功使莫斯科深受鼓舞，对科罗廖夫的工作更加重视。但科罗廖夫并不满足于发射火箭，他的志向早就对准了更惊人的目标。第一次发射成功后，他找到勃列日涅夫，建议在下一个火箭上安装一颗最简单的卫星。他对感到有些吃惊的勃列日涅夫说：

“我们为什么要装上一个重物？那是宇宙飞船的模型，让它在地球上空飞行，可以得到有关地球电离层的第一手科学数据，又可以检验地面观察系

统。”

发射地球卫星的设想，科罗廖夫在 1956 年研制“谢苗尔卡”时就提出了，但为决策层否决。科罗廖夫在加快研制“谢苗尔卡”火箭的同时，也在研制卫星，到这时，卫星已经制造完成了。这些情况勃列日涅夫完全了解，他很钦佩这位科学家的勇气和政治头脑。在他看来，科罗廖夫预见到宇宙研究将对世界形势产生巨大影响，懂得“通过显示宇航学的成就就可以令人信服地表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进步的道路上已遥遥领先了”。对于如此重大问题，必须要由最高领导集团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除了政治意义外，很可能勃列日涅夫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他曾就发射卫星可使国民经济得到什么实际效益的问题，征求过当时任苏联科学院院长的亚·尼·涅斯梅亚诺夫院士的意见。院长告诉他，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各科科学家组成的专门小组，讨论开发宇宙的前景。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卫星一定要发射，因为“卫星的应用领域将会是多方面的”，对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其他专家的研究工作都十分重要，并且还可以改善同边远地区的联系。尽管当时也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有了上述两条理由，就足以影响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取向了。

1957 年 10 月 4 日，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苏联领土上飞向太空。这颗重 83.6 公斤的卫星在向世人显示苏联强大的宇宙科技潜力的同时，也激起了苏联领导人更高更大的发展宇航事业的热情。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它“很自然地促进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这种促进的一个证明，就是在卫星发射刚刚成功，勃列日涅夫便把科罗廖夫请来，热情祝贺他成功后便迫不及待地提出新的要求：

“最近能发射新卫星吗？”

“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大概过个把月到两个月就可以准备好下一次发射。”科罗廖夫挺有把握。

再过一个月零三天就是十月革命节，而且是 40 周年大庆，勃列日涅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次献礼的机会。“好吧，这对全国人民来说可是件好礼物。不过，你们要考虑：我们不要重复已经做过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要使新卫星在质量上超过第一颗。”

很可能这不仅仅是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要求，而是赫鲁晓夫、甚至是主席团成员们的共同愿望。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让他们体会到了在当时高精尖的科研领域独占鳌头的那种兴奋与自豪。在夺取了宇宙空间的领先地位后，他们需要保持住这种地位，以便把它变成一种资本，一柄让任何人都不敢对苏联有非分之想、更不敢轻举妄动的镇山宝剑。被勃列日涅夫称为“卓越的政治家”的科罗廖夫迅速从勃列日涅夫的话中领悟到问题的实质：“当然，我们打算进行动物实验。这将向前迈出一大步。”第二天晚上，科罗廖夫打电话告诉勃列日涅夫，他的工作人员都已提前结束了休假，“我们已经投入工作”。

科罗廖夫和他的同事们没有让人们失望，就在第一颗卫星上天整整 30 天后，苏联的第二颗卫星又被送上了太空。这颗卫星重达 508 公斤，是第一颗的 6 倍多。卫星上除了携带更多的科学仪器外，还载有一条名叫“莱卡”的小狗。这颗卫星在空间飞行一周、发回大量珍贵数据后，载着小狗安全返回地面。“莱卡”撞开了地球生命体进入宇宙空间的大门。此后，苏联又于

1960年8月19日和12月1日，分别发射了两艘载有小狗的“东方”型宇宙飞船，进一步了解了太空环境，为人类进入宇宙空间创造了条件。在一股汇入了国家荣誉和尊严的强大动力推动下，人类进入宇宙的这一天很快在1961年4月12日开始了。当尤里·加加林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用1小时48分钟绕地球一圈后返回地球、降落在伏尔加河中游的萨拉托夫州境内时，苏联又率先给了世界一个惊奇：在探索外层空间、开发宇宙方面，苏联又一次无可争议地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4月1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身份，为加加林佩带上了一枚列宁勋章和一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同时，还向七位贡献突出的科学家和设计师授予“镰刀与锤子”金质奖章，向众多设计师、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工作者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勃列日涅夫也是该称号获得者之一。这是对他这几年在协调领导发展苏联宇航事业工作的肯定。就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他主管宇航工作这几年，正是苏联宇航事业突飞猛进、接连取得重大成果并在多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几年。当然，这绝非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功劳，但他主管下的这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不能不对勃列日涅夫产生影响，他得以从更近的距离了解这项新兴科技领域发展的情况和前景，得以从工作关系到私人关系结交一大批这方面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也更能体会到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中蕴含的巨大政治和经济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他当政的18年中，他一直特别重视加强苏联在这一领域与美国的竞争，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如果说一个人的经历能决定或改变他对某种事物的看法，那就应该想到，勃列日涅夫后来对火箭、导弹、飞船、空间站等表现出的热情与偏爱，与他这段工作经历，不会没有联系。

苏共二十大后到1959年1月打破常规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几年中，无论是苏联国内还是国际，重大的事件接连爆发。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发生了反对官方推行反对个人崇拜运动的示威游行，并演成流血冲突；相反，在匈牙利，从苏联吹来的为个人崇拜受害者平反昭雪之风，配合着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最终酿成一场物损人亡的悲剧；波兰的工人和市民也以激烈的方式表露出他们对现行体制的某种不满。铁托的访问使赫鲁晓夫成功地打破了封冻两国关系的坚冰；而远在千里之外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使苏联有机会以一个能把导弹发射到7000公里之外和把卫星送上大空的强大国家的身份，向英、法和以色列提出公开的挑战。不过，赫鲁晓夫在对外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的同时，他自己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严重的挑战。1957年6月，主席团内部的一场发难，险些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而4个月后他对个人声望如日中天的朱可夫元帅的处理，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自己权力的一种忧虑……勃列日涅夫尽管这期间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防和宇航事务，但身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不可能彻底置身上述重大历史事件之外，特别是在最高领导层内那些与他政治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斗争中，他不能也无法仅做个旁观者，尽管他暂时还当不上呼风唤雨的主角。我们可以选择上述事件中的几个，观察一下勃列日涅夫在这些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及其所起的作用。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很快按照党团组织系统进行了传达。人们在震惊之余，免不了对与产生个人崇拜相

1960年5月勃列日涅夫接替伏罗希洛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关的方方面面提出疑问和批评，而群众批评的矛头除了针对斯大林外，又不可避免地指向斯大林在世时就身居高位、现在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人。形势发展有些出乎领导集团预料，为使局势不致完全失控，苏共中央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要求基层党组织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只把那些维护党的总路线和能为完成二十大决议而斗争的人留在党内。

1956年6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作出专门决议，确定了各级党组织讨论此问题时的讨论方向。7月，中央向各级党的机关和组织发出公开信，告诫有关领导人要采取严厉措施，追究对二十大决议进行“不正确”讨论的党员个人和组织的责任。有迹象表明，中央认为只在党组织内部采取行动还不够，还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政治工作，并对反苏的敌对分子进行反击。为此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准备有关文件，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勃列日涅夫。12月19日，委员会把《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和对反苏敌对分子实施反击》文件草案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也是以信的形式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的指示。信中说：“在国际反动派的影响下，国内可怜的反苏残余分子在已有的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情绪下，企图利用我们的困难和不足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进行恶毒的诽谤，散布各种挑拨性流言，企图动摇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对社会主义各国实力及它们兄弟般友谊的牢固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善于利用某些党员和党组织领导人政治上的疏忽大意和庸俗的怜悯，用虚伪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言辞、用‘为民主’而斗争的口号掩盖自己的敌对活动。”

信的结尾也是“程式化”的：“苏共中央特别强调，对敌对行动除了与之进行斗争外我们不可能有两种态度。无产阶级专政在对待反苏分子的态度上应该是无情的。在检察机关、法院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人应该警惕地维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对敌对分子的阴谋提高警惕并依据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及时惩处破坏活动。”

经过30年代末“大清洗”时期的人们，很容易地从这些用语中看到那个年代的影子。而且不仅是语言，还有行动。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逮捕并审判了一批“反苏分子”，如以列沃利特·比缅诺夫为首的一批年轻的列宁格勒人，以利沃夫·克拉斯诺别夫岑夫为首的莫斯科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等等。被逮捕和审判的人中，既有党员也有非党人士，因此这是斯大林逝世后又一次全国范围的“清洗”运动。勃列日涅夫是否卷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场“清洗”运动，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使人们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由他领导的委员会起草出来的那封给各级党组织的信，是启动这场运动的最后一道电闸。同时，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斯大林时代留给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们的印迹是如此深刻，以致在反斯大林的第一个高潮中，他们仍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斯大林式的语言和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当然，据此说勃列日涅夫是个斯大林主义者，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至少可以这么说，即便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都不是个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曾坦率承认，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年中，“我们没有能同过去决裂”，在他去世后还不能摆脱他

该委员会中有主席团委员格·马·马林科夫、书记处书记阿·鲍·阿里斯托夫、尼·伊·别里亚耶夫，中央委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阿·谢洛夫，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总检察长罗·安·鲁坚科。

的统治，“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在搜捕人民的敌人的那段时期中，支配着我们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心理后遗症”。尽管赫鲁晓夫说这是在1956年以前，但心理后遗症很难用一剂药就能治愈，更不大可能在短时间根除。赫鲁晓夫尚且如此，更何况勃列日涅夫呢？

进入到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也给勃列日涅夫提供了积累外交经验的机会。虽然年近半百的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名气日渐增大，但在外交方面他的实践机会少得可怜。如果不算战争后期随军打出国境线的话，那么直到1956年3月他才获得第一次出国机会：率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到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种两党之间礼节性访问中，很难展现什么外交风格，但毕竟勃列日涅夫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了。

以勃列日涅夫的身份，出访的机会不是很多。此后，他要更多地依靠接待来访的外宾和参加主席团讨论对外政策的会议，来慢慢丰富自己的外交经验了。到1956年秋天，他已会见过一些著名的来访人士，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及南斯拉夫的铁托。其中铁托的来访最为引人注目。不过，在铁托逗留苏联期间，除了到车站迎接、盛大的宴会和送行外，勃列日涅夫尚无机会参加小范围的会谈，而只有这种小范围会谈才往往是实质性的。然而三个月后机会就来了。9月下旬至10月初，铁托应邀来到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休息”，并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基里钦科、勃列日涅夫和苏共最高领导层里的唯一一名女性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等人，“就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会谈”。尽管会谈是非正式的，也没签署任何外交文件，但仍然涉及了当时两国都看重的问题，如是否需要阵营，流血冲突后的波兰局势，以及在匈牙利出现的某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赫鲁晓夫和铁托之间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不过，正是这种思想和观点上的交锋，让作为外交新手的勃列日涅夫学到不少东西。

赫鲁晓夫一行从雅尔塔回到莫斯科不久，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局势急剧恶化。由于匈牙利党政领导人处理失当，10月23至24日，群众性的示威游行迅速发展成起义。许多工厂企业成立革命委员会，驻扎在首都的人民军和国家保安部队已处于互解状态，警察局长公开支持起义者，获得大批武器的起义者给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

10月23日，匈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求援。第二天，新任总理纳吉又公开请求苏军出面干预。对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苏共中央高度重视，在10月20日、23日、26日、28日、30日、31日和11月初的几天内，多次举行主席团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及其苏联应采取的对策。现已公布的档案文件表明，勃列日涅夫作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参加了上述所有会议。尽管每次他都没有发言，然而广义他讲，他也是决策者之一。通过亲身参加对这样一个突发的、某些方面又非常棘手的重大外交问题处理的全过程，相信勃列日涅夫不会没有收获，至少借助这个难得碰上的机会，他知道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引用哪些理由就可以用苏联的军事力量去干涉兄弟国家的事务，也了解了在采取行动的前前后后需要照顾哪些关系，打通哪些关节，准备哪些补救措施，以及如何施展各种各样的政治外交手腕，等等。人们也确实能从12年后勃列日涅夫主持处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看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九章第二节。

出他从这次事件上学来的某些东西。

二十大后国内外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党内最高领导层内思想和路线的斗争再度激烈起来。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势力，利用赫鲁晓夫在处理上述事件中暴露出的弱点加强了自己的力量，积极准备寻找适当时机向这名第一书记摊牌。不会轻易服输的赫鲁晓夫也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进行自卫和反击，措施之一就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希望借此从反对派手中剥夺一部分权力，削弱他们的地位和影响。1957年2月中旬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会上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决议》，就是赫鲁晓夫采取的一项兼具政治和经济意义的改革。赫鲁晓夫提出改变过去那种按专业部主管机关管理国民经济的形式，采取新的分区管理形式，这就意味着将取消原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各联盟部、共和国部，而在工业发达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环节。无疑，这对打破传统的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人参加生产管理是有益的；同时这也是对在现有体制下掌握管理大权的经济技术官僚们的一个沉重打击。反对赫鲁晓夫的力量逐渐联合在一起，他们在主席团中的代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这年6月18日要求召开一次主席团特别会议。在连续三天的会议上，反对赫鲁晓夫的一派占多数，他们借此得以在主席团中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勃列日涅夫和另一名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福尔采娃虽然出席了主席团会议，但由于他们都是候补委员，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因此对改变主席团内的力量对比无能为力。好在赫鲁晓夫想到了召开中央全会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多亏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洛夫竭尽全力调动手中掌握的力量援助赫鲁晓夫，用最快速度把上百名中央委员和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候补中央委员及60余名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从全国各地送到莫斯科，使中央全会得以召开。全会从6月22日一直开到29日。到会的有130名中央委员中的121人，11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94人，62名监察委员中的51人，一共266人。从已发表的这次全会的速记中，可以感受到会议整个过程中那种面对面交锋的紧张气氛。勃列日涅夫虽不能算是赫鲁晓夫派的最积极最勇猛的斗士，但他在拥护赫鲁晓夫、与反对派的当面交锋中也没有犹豫和退缩，可以说“旗帜鲜明”。

会议的头两天主要是向中央委员和其他与会者介绍前几天主席团会议的经过。勃列日涅夫自始至终参加了主席团会议，因此他多次发言作证，澄清事实真相，当然这些作证都不利于反对派。

当马林科夫说他曾请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时，勃列日涅夫立即打断他说：“不对。需要一个半小时，朱可夫、福尔采娃、我、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米高扬就能把所有主席团委员、所有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叫来，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但他们拒绝了。卡冈诺维奇称‘我们这儿已经凑齐了政治局，我们今天就解决赫鲁晓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冲着马林科夫说：“因此您要强行通过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您说，应当在今天就停赫鲁晓夫的职并让主席团成员中的一人——是的，没说是谁——当书记。第二个问题：

应当解除谢洛夫 的部长职务（场内一片喧哗），然后，我们将稍许商量一下就可以进行我们可爱的全会了。这很像过去贝利亚领导内务部时进行的那种全会，众所周知，你们在那儿都干了什么事。这就是实际情况。”

马林科夫仍然争辩：“是我说的召开中央全会，是我提出的关于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是最先提出召开中央全会问题的。”

勃列日涅夫寸步不让：“我们声明，如果你们想通过决议，我们就退出主席团以示抗议。只是在这之后，您才赞成召开全会，但要先选举领导，然后再召开全会，这就是您赞成的那种全会。”

反对派的另一个成员谢皮洛夫在会上被人追问在中央全会之前在于什么，谢皮洛夫说他与速记员一起在准备发言稿。勃列日涅夫在一旁插话说：“我在 17 日往你办公楼的办公室打电话。你的助手说你早就去克里姆林宫了。我问：在谁那儿？在卡冈诺维奇同志那儿。你在那里呆了两个半小时。”这对谢皮洛夫来说非同小可，因为这暗示着他与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卡冈诺维奇之间有过密谋。在众人追问下，谢皮洛夫矢口否认，说是把时间弄颠倒了。但这种否认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已无法改变他的形象了。

随着会议的进行，反对派的失败看来是不可避免了。以后几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们纷纷进行长篇发言，对反对派展开声势浩大的围攻，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他在 6 月 26 日的会议上用很长时间对反对派的密谋活动进行了揭露。他一开始就竖起了攻击的标靶：

同志们！在我们面前展现出的触目惊心的反党阴谋的图景更加深入和完整了，这个阴谋是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组织的。遗憾的是，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也被他们吸收到分裂集团里去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是这一阴谋的主要组织者和头目。被称为‘思想家’的谢皮洛夫在这个卑鄙的事情中耍两面派。不用说，同志们，这都是有经验的，老资格的、深谙暗中幕后活动的政治家。

在回顾了二十大后这些人的某些活动后，勃列日涅夫描述了 6 月 18 日和 19 日主席团会议前和会中发生的事。

对我们来说，6 月 18 日是和往常一样的工作日。福尔采娃同志、我、部主任一起研究了祝贺列宁格勒建城 250 周年信的草稿。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将接受匈牙利记者的采访。但突然来电话说主席团全体将在主席团会议厅接受采访。我们去了。已经有了某种不安的感觉。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这之前在与福尔采娃的闲谈时，她叙述说，6 月 17 日晚上大使馆招待会结束后，卡冈诺维奇乘坐的汽车赶上她、谢皮洛夫和别尔乌辛乘坐的汽车。按喇叭让他们的汽车停下，卡冈诺维奇从车门下来，把谢皮洛夫拉下车并把他带到自己的汽车里，车就开走了。她后来问谢皮洛夫是怎么回事，他对她说，在到叉路口前的这段路他们想一起走，然后他就变得语无伦次并闪烁其辞。实际上，他并不是坐到叉路口，而是到卡冈诺维奇同志那儿开会去了。这就是由他们策划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前夕发生的事。

接待记者采访前，我们聚集在一间小办公室里，米高扬同志对福尔采娃同志说：‘他们把去列宁格勒的问题放在一边，想谈别的什么问题。显然，他们串通好了，因此要求马上进行主席团会议。’我们与福尔采娃同志商量怎么办，决定立即叫朱可夫和阿里斯托夫同志来开会。

.....在记者提出第一个问题后，我从会议厅出来去与朱可夫同志联系。然后，我又给阿里斯托夫同志打电话，并把与米高扬同志的谈话转告给他。

朱可夫同志来了，在进入会议厅前我对他说，一帮人要求召开主席团会议，有些棘手的问题他们要求讨论。朱可夫同志也对我说，这天早晨马林科夫把他叫去，跟他进行了一次奉承讨好和莫名其妙的谈话，说早晚让他当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说我应该与党的领导谈一谈，等等。我当时就对朱可夫同志说，这是马林科夫在安抚您，您要决定站在谁一边。

会议开始了。赫鲁晓夫告之，同志们请求讨论与到列宁格勒去有关的问题。我不知道，实际上是他发觉，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个问题。突然，马林科夫讲开了。几分钟里他阐

述了自己的‘信条’。他说，党的领导陷入危机，滋长了个人崇拜，我不能容忍这一切，我们应当结束这一切。

勃列日涅夫说到这儿，马林科夫再也坐不住了，他冲着勃列日涅夫说：“您干吗进行歪曲？”勃列日涅夫针锋相对：“在党和人民面前我为自己的每句话负责。”台下有人高喊：“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接着，勃列日涅夫逐个点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进行了谴责，其中对卡冈诺维奇尤为激烈。速记记录记下了这段对话。

勃列日涅夫：.....然后卡冈诺维奇发言。他打开一个有各种统计数字的纸夹，重复了马林科夫说过的话。

朱可夫：他是从这句话开始说的：马林科夫在这里发表了个人激动的演说。

勃列日涅夫：然后，他严厉批评了农业，说我们没取得任何成绩，一切都是虚构出来的。

卡冈诺维奇：我说的是伏罗希洛夫的令人激动的演说，而不是马林科夫。

勃列日涅夫：我应当问问您，卡冈诺维奇同志，您对农业知道什么？请您回想一下，您是怎样带着春小麦来到乌克兰的。您有一年的时间没把乌克兰的党组织放在眼里。

卡冈诺维奇：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勃列日涅夫：大家知道，乌克兰是秋播作物区域，而您却强迫我们减少冬小麦。您把我们害苦了，您从政治上为此寻找理由。

赫鲁晓夫：我对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了。

春小麦种得越多，收获的粮食就越少。

卡冈诺维奇：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波斯别洛夫：那是谁把它塞给下边的呢？

喊声：卡冈诺维奇。

勃列日涅夫：最后还有几句属于卡冈诺维奇的名言。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是个“性情古怪的人”，“应该把赫鲁晓夫从第一书记的位子上撤下去”，“给他另外的工作”。

卡冈诺维奇：我没用“撤销”这个词。

勃列日涅夫：请别打扰我讲话，我不是在斥责，而是在说是怎么回事。

基里钦科：他现在说他没说过这个词，而是说应该停职。

（笑声）

.....

不用再引用勃列日涅夫的发言也能看到，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

的立场和态度是何等坚定和鲜明了。在主席团中占多数的反对派，在这次全会上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谴责与批评，最终彻底失败，而且身败名裂。全会通过的决议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定为反党集团，说他们使用反党的派别活动方法，力图变动苏共中央全会选出的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全会对上述三人进行了组织处理，撤销了他们三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还撤销了参与这一集团活动的谢皮洛夫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全会选出了由 15 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勃列日涅夫名列其中。这样，经过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考验，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

第七章国家首脑和党的领袖

1957年发生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那次政治大地震，并没有在对“反党集团”成员进行了组织处理后立即结束。它的余波断断续续但却非常明显地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在粉碎“反党集团”仅四个月，曾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朱可夫因“破坏了党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列宁主义原则”，“在苏联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的个人迷信”，“成了在政治上站不稳的人”，被撤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共委员资格及国防部长职务。显然，他在粉碎“反党集团”中释放出的能量和其后的某些言行，让接受这次事件教训、深感防患于未然和加强控制之必要的赫鲁晓夫，产生疑虑和不安了。接着，在1958年3月底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交出了拥有的权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提议下，会议一致同意由赫鲁晓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样在斯大林逝世五年后，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职务又合并到一个人身上了。对布尔加宁的去职，在同年9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有了权威性解释：他参加了去年6月的“反党集团”，而且在他作的检讨中供认，“反党分子们”是在他的办公室里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有鉴于此，全会决定把他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至此，这次地震已让五个老资格的政治家或是军人翻船落马了。他们从政治舞台中央消失，只能进一步增强赫鲁晓夫的光彩，证明在斯大林重用和培养的现存的这批人中他是与众不同的。而这种不同正是一笔无价的政治资本。当然，在1957年6月的主席团内部“政变”中，除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外，伏罗希洛夫也没有像术高扬那样旗帜鲜明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尽管这名斯大林的战友和最老的元帅之一现在已很难从政治权力上对赫鲁晓夫构成什么威胁，但让他留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似乎就显示着与过去的联系。某些时候从他身上可以折射出过去那个时代的影子，甚至是斯大林本人的影子。尽管这纯粹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反应，但赫鲁晓夫也不喜欢，于是，伏罗希洛夫的“辞职”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1960年5月7日，苏联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的代表们听取了赫鲁晓夫的闭幕词。他告诉代表们两个重要消息：苏联政府决定成立火箭部队总司令部和伏罗希洛夫“因健康情况不佳”请求解除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相比之下，前一个消息并未让代表们吃惊，因为自这年1月份以来，这名党和政府领导人已经在多种场合谈到苏联的裁军打算和今后的建军方向，其中用火箭核武器装备部队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因素之一。至于伏罗希洛夫的“请求”，倒是出于绝大多数代表的意料之外，而赫鲁晓夫提议由勃列日涅夫接替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更是人们没有想到的。这并非因为勃列日涅夫缺乏知名度，恰恰相反，人们不解的是，怎么这样一个一直以从事党务工作闻名的干部，越过那么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的要员一下子当上了国家首脑呢？看来，人们的疑问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自设立这一职位时起，勃列日涅夫的三个前任——加里宁、什维尔尼克和伏罗希洛夫没有一个是带着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头衔荣任此职的。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个，尽管两个多月后，他的党中央书记职务就被免去了。同时，在这次（7月）全会上，根据伏罗希洛夫本人的请求，免去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这样，除了一个象征性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职务外，伏罗希洛夫离开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越来越远了。在第二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他被

与“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受到众人指名道姓的批评，至此，1957年6月的那次“政治地震”已经使二十大选出的11名主席团委员中的7名、6名候补委员中的两名栽了跟头，全部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获得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不久便失去了中央书记职务，而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党的领导处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一些西方的传记作家认为这对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挫折”，是他继斯大林逝世后头几个月遭到贬滴之后“第二次受挫”，其前程“似乎已到尽头”了。尽管他们从赫鲁晓夫执行的内外政策、领导集团内部斗争以及像U-2飞机入侵和被击落这样的突发事件等比较广泛的背景上，为自己的观点寻找依据，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即勃列日涅夫在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他一直是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也就是说，他虽然离开了掌握实权的书记处，但仍留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这与当时同样权势显赫的基里钦科和别利亚耶夫的遭遇相比，要强得多了。这两人不仅在同年5月份被解除了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而且一个多月后前者失去了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职务，后者被免去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职务。在苏联竞争激烈的政坛上，如果连最起码的州一级的第一把手都不是，那就意味着手中暂时还没有叩开仕途大门的敲门砖。如果再与同一天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的伊格纳托夫和福尔采娃比较，勃列日涅夫得到的新位子也是最高和最好的：前者仅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而且在他之前已经有了三名副主席了；后者又低一级，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看看上述这些曾在三年前为维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地位而与“反党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干将”们纷纷坠落，有的甚至坠落得无影无踪，勃列日涅夫难道不该为自己的现在庆幸吗？

当然，如果换了一个具有极强的工作能力和权力欲、不甘心充当二流角色并且准备为获得更高权力进行不惜一切的斗争的人，这种比较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前面说过，在苏联当时的政治体制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毕竟还只是形式上的国家首脑，而不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要受党的领导人的领导与制约。换言之，在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这个职位的实际位置充其量在第二层次上，如果不是更低的话。这对有极强权力欲的人来说，是不会满意的。然而，勃列日涅夫恰恰不是这种类型的人。确切他说，至少是在60年代初，在精力充沛、政治经验丰富、且大权在握的赫鲁晓夫之下，勃列日涅夫更习惯于当一名执行者而不是领导人。因此，他满足于现在的位置，对来自于上级赫鲁晓夫的指示不折不扣地遵守和执行。曾经长期充当苏联领导入政治谋士和笔杆子的著名政论家希尔茨基证实，勃列日涅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多次出国访问，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为他起草讲话稿的人传达他的主要愿望：“写得谦虚一点，写得谦虚一点。我不是首脑，我不是领袖……”

曾在60年代初任《消息报》记者的斯图鲁阿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他说有一次《消息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刚当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的一篇文章，并配发了一张作者的照片。不管配发照片一事勃

见[美]多恩伯格《勃列日涅夫》第11章；原[西德]莫罗佐夫《勃列日涅夫传》“竞争者与第二次受挫”。参见布尔茨基《领袖与谋士》第十一章。该书披露了不少有关勃列日涅夫的内幕。

见1962年12月30日《消息报》。文章内容为纪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40周年。

勃列日涅夫事先是否知情，反正赫鲁晓夫对此举大不以为然，少不了用他特有的方式把作者训斥一顿，说他“不谦虚”。勃列日涅夫牢牢记住了赫鲁晓夫的批评，对报上刊登他的照片十分敏感和谨慎。1963年9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作为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主持了批准条约的仪式。斯图鲁阿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出席了仪式并准备进行报道。没想到仪式刚结束，勃列日涅夫就把斯图鲁阿叫了过来。下面是斯图鲁阿记录下的一段对话：

“你们要发表照片吗？”勃列日涅夫问。

“当然，列昂尼德·伊里奇。”

“绝对不行。发报道时不能登照片。”

“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了，不登任何照片！”

“这到底是为什么，列昂尼德·伊里奇？”

“怎么，你是不记得了，还是故意装做不记得了？”

“您是指附在您文章上的那张照片的事吗？”

“还能有别的吗？”

“但是，这完全是两回事。现在，您不是文章的作者，而是签署批准证书的官员。”

“谁会去注意这些微妙的细节！”

“不过，这里没有任何细节。”

“够了，不许登任何照片，就这样。”

记者赶紧找总编商量，结果是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报上登出一张反映主席团召开会议场面的照片，而不是更有历史意义的由勃列日涅夫签署批准书的照片，并且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处在照片远景最不显眼的位置，他的图像看起来比大头针的头大不了多少。相反，主席团其他成员由于处在前景位置，图像要大得多。

斯图鲁阿用这个例子除了说明“在国家的第一把手面前，勃列日涅夫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感”，之外，他还试图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即勃列日涅夫这样做，是出于“政治上得以生存的一种本能”，是一种在最高层权力斗争中“生存的艺术”。依他之见，勃列日涅夫“把这套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

不管是真心还是本能，也不管是本质的流露还是精心加工的艺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他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4年2个月零8天时间里，他没有表露出对自己目前地位的不满意，也没有给最高领导层中那些异常敏感的同事们留下丝毫他正觊觎更高地位、谋求更大权力的印象。否则，他不会在1963年6月又重新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并同时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近1年；更不会在1964年10月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内部斗争中，被作为一个对大家最无害的人选，推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宝座。如果硬要说这一切都是勃列日涅夫韬略的成功，或者干脆说他极善于伪装，以致让所有人都没察觉到他的野心，那就太低估勃列日涅夫身边那些政治强人们的智力和水平了。

斯图鲁阿的文章收录在由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一书中，标题为《两幅照片，一副面孔》。

成为国家首脑之后，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不仅经常出现在苏联的报刊上和广播里，而且也频繁地出现在国外的各种传播媒体中。他接二连三地出访，4年中先后到过15个国家，有的是以国家首脑身份的正式国事访问，像访问几内亚、加纳、印度、苏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朗，有的是随苏联党政代表团出访，像访问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也正是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才开始成为国际人物，为国际社会所注意。

勃列日涅夫以国家首脑身份首次正式访问，是去西非的几内亚和加纳。这时的勃列日涅夫还无法和已成为国际风云人物的赫鲁晓夫争夺在国际舞台活动的区域，那些对苏联对外政策来说更为重要的重点国家和地区，是由赫鲁晓夫亲自负责的。再说勃列日涅夫也需要在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场合锻炼自己的外交能力和积累经验。当然，几内亚和加纳也不是随便选择的地方。几内亚和加纳一个原是法国、一个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前者在1958年10月宣布独立，后者于1957年3月建国，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之后又于1960年废除自治领地位，成为共和国。在热带非洲它们属于独立和建国较早的两个国家。1960年，非洲大陆一系列国家宣布独立，形成所谓的“非洲年”。苏联认定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非洲的崩溃，对此给予大力声援。在同年7月发生的刚果事件中，苏联应刚果政府求援运去了粮食和药品。12月，经苏联和34个亚非国家的积极活动，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苏联一向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60年代初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非洲大陆，自然要被提上苏联外交活动的日程。而非洲独立运动的两只“带头羊”，也就成了苏联外交部门安排国家首脑出访的首选对象。

在勃列日涅夫之前，没有任何一名苏联党政领导人踏上这块古老而又神秘的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勃列日涅夫的到来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尽管几内亚和加纳两国准备以它们能做到的最热情和周到的方式接待这名苏联国家首脑，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勃列日涅夫还是两次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险情。1961年2月9日，勃列日涅夫乘坐的伊尔-18型专机，在距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以北130公里的地方，两次受到法国喷气式战斗机莫名其妙的阻截和射击，要不是当时的驾驶员鲍·帕·布加耶夫机智、镇定，结果很有可能是一场悲剧。勃列日涅夫对此印象颇深，他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此事。

飞行是按计划进行的，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突然，我们的飞机遭到殖民主义者的战斗机的袭击。显然，苏联代表团对非洲年轻国家的访问不合他们的心意。

我看得很清楚，几架战斗机是怎样对准目标盘旋，怎样俯冲而下，准备攻击，开始射击……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奇怪地感觉到自己好像置身于战斗之中，但又完全不同。因为一切都不取决于自己，你唯一能做的是，镇定地坐在座位上，看着舷窗，不要干扰驾驶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时，一切都是在几秒钟内解决的。就在这几秒钟之内，由驾驶员鲍里斯·希加耶夫领导的、有经验的机组人员使这架民航机脱离了射击区。苏联政府就此事向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称之为：“国际土匪行径”。法国政府推说客机偏离了航线，截击机实在“设法查明它的来历”。

总的说，在各种国际场合勃列日涅夫所扮演的规定角色还是成功的，他给外界留下的印象与赫鲁晓夫不大相同。容易冲动、因而有时不太顾及外交场合应有礼仪的赫鲁晓夫，常常别出心裁，言行令人尴尬；而勃列日涅夫则

更显得举止稳重，彬彬有礼。登上国际舞台，无疑扩大了他的视野，对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他渐渐地学会和习惯了用另外一种标准，正如多恩伯格所说，以“与第聂伯河沿岸、基什尼奥夫、阿拉木图或中央委员会简朴的办公室里的一个‘机关人员’所熏陶过他的大不相同的准绳”，观察、理解这个世界。对任何一个在国际社会成为风云人物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必经的起点，同时也是一个把自己与国际社会连接起来的最初一环。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 60 年代最初、4 年中的国事活动，在勃列日涅夫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苏联头号领导人后，给他频繁的国际活动提供了多大程度的自信与帮助，但是可以肯定，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领导人必备的国际活动经验，对他来说，不再是空白了。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 10 年中，他主持召开过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三次代表大会每次间隔的时间都不足党纲规定的四年，这本身就反映出那段激烈变革时期的总的特性。如果说 5 年中（1956 年 10 月至 1961 年 10 月）连续召开的这三次代表大会在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坐标上有什么象征意义的话，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二十大标志着赫鲁晓夫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二十一大表明他已达到政治权力的顶峰，二十二大则是他滑向失败的起点。基于赫鲁晓夫在党和政府中的影响力，他的这条运行轨迹势必对与他的政治命运有各种各样联系的个人和集团产生复杂而又微妙的影响，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勃列日涅夫正是这种反应的受益者。

在 1961 年 10 月 17 日至 31 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三次作大会发言，作了两个报告——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的报告——和总结发言，这在列宁逝世后是唯一的一次。在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从国际形势谈到苏联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再谈到党。他不仅公开地批判了斯大林错误，而且彻底清算了 1957 年“反党集团”的旧账，同时，通过点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了利用党的代表大会声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先例。此举不仅激怒了阿尔巴尼亚，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应邀出席代表大会的周恩来率团退出大会，提前回国。这样，中苏两党之间存在已久的分歧再也没必要掩饰了，两党、两国关系此后迅速恶化直至决裂。

更让坐在大会主席台上和代表席中许多人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这些，毕竟，阿尔巴尼亚太小而中国离他们又很远，它们的恼怒暂时威胁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但赫鲁晓夫在大会第二天就苏共党纲草案所作的报告中传达出的一些思想和信息则不同了，听起来并非那么顺耳。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概念。两个概念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即国家也好党也好，它都不再附属于某一个阶级了，而变成全体人民的工具和组织。正因为如此，对国家的内部职能和在党的建设上，实行民主化改造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迫切的。赫鲁晓夫想出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党的领导机关中的成员经常得到更换，并且要成为一种制度。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和社会团体机关也是如此。他认为，这将是发展民主制的一大步骤。对那些现在已经在党、政府和社会团体的领导机关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因此而获得不少既得利益的人来说，第一书记的这个听上去蛮有道理的想法，无异于在他们的位子下面架起了一堆干柴。

勃列日涅夫在第三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他在对“反党集团”进行抨击

之后，对赫鲁晓夫大加赞扬，说他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具有执行党的路线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性，大胆精神和坚决性，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有权受到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爱戴和深深的尊敬”。当然，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话只是代表大会上歌颂赫鲁晓夫大合唱中的几行音节而已。假如赫鲁晓夫是个冷静、稳重的领导人，听到这些颂扬就会更加谨慎和小心。恰好相反，本来就容易头脑发热的他，在几乎是众口一词的颂歌声中，把“大胆精神和坚决性”发扬到了极至，结果物极必反。

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增加了一条以前从未有过的规定：为体现党的领导机关经常更换成员的原则，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 1/4，主席团委员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成员在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 1/3；专区党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机关成员至少更换 1/2。上述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任，但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书记不得超过两届。这条规定意味着赫鲁晓夫不仅在许多人位子下面架起了干柴，而且开始投入了火种。不过，这之中并不包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因为党章中对此没作任何规定。

13 个月后，赫鲁晓夫又把手术刀对准了党的组织结构。在 196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以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为由，提出按生产原则自上而下建立党的机关。具体做法是，在原区、边疆区和州一级党委基础上，分别组成两个平行的党委，分管工农业生产；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苏共中央内，也分别设立主管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领导局，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仍予保留，其职能主要是协调下设的两个生产专业局工作。与此相适应，各级苏维埃及其执委会也应进行相应改组。这个提议被全会通过的《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决议》所确认，在赫鲁晓夫的督促下立刻付诸实施。这种改组在实践中引起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它首先造成地方上党政及群众组织的急剧膨胀。比如，苏联最重要的 173 个边疆区和州党委改组后，一下子出现了 146 个同级的党的领导机关，之后又有同样数量的苏维埃机关、工会机关、共青团及妇联机关出现。其次，这种人为的划分破坏了工农业之间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有机联系，反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对于一些交叉领域，如意识形态、教育、科学研究等，要么形成权力重叠，引起无谓的争执，要么出现控制盲区，造成权力部门间的扯皮。不乏幽默的苏联老百姓常常编出一些政治笑话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笑话流传甚广：有个党员向农业州委书记告状，说另一名党员用锤子砸了他。农业书记听后耸耸肩、摊开双手无奈他说：“我很想管这事，但这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您知道，如果他是用镰刀砍您的话，那就好办了。”

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就是在二十二大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赫鲁晓夫的这些改革是不是真的得到中央委员们的真心拥护。尽管 175 名中央委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通过相应的决议时都肯定投了赞成票，但这仅仅是个组织观念或是遵守党的纪律问题，而不是个人感情问题。作为一个在现实中而不是在真空中生活的人，他们现在拥有的地位、权力让他们享受着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生活条件，甚至特权。当然，谁也不希望失去这些。在他们举手赞成根据赫鲁晓夫的意见拟定的决议时，他们肯定不会马上失去地位、权力和既得利益的。但是以后呢？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的时候呢？他们还能拥有今天令人羡慕的一切吗？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这恐怕又是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们都会想到的问题。道理很简单，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名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和其他书记，回去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面对自己身边出现的另一个权力相同、地位相等的第一书记以及他的一群副手，无形中这就是一种竞争，或者直截了当他说就是一种威胁。因为在中央委员会的规模不可能扩大一倍的情况下，下次成为中央委员的就完全有可能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了。与这种资格联在一起的种种权力和利益也将随之转移，对失去者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灾难。在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中，像这样的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有 50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18 名，在他们现在的位子下，赫鲁晓夫不仅架起了干柴，投下了火种，而且现在又泼进了一勺油。试想，在他们为维护党的统一而举手拥护这些决议的时候，他们心里真的那么轻松和愉快吗？但在当时，这种忧虑被小心掩盖起来，因为常识告诉他们，为个人得失而去投票反对党，是只有傻瓜才会干的事。而一旦决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引起矛盾和混乱，潜藏的忧虑便会转化成不满。实际上，正是今天这些为了拥护赫鲁晓夫改组党的结构而高高举起的手，在 1964 年 10 月，在宣判赫鲁晓夫政治上“死亡”的判决书上按下了核准的印章。

不仅是党的机关，政府机关、军队以及国家安全部门里的上层，也有许多人越来越对赫鲁晓夫失望和不满了。政府各部门的频繁增撤，使已习惯在首都有个安稳的生活环境的机关工作人员失去了往日的安逸，也打乱了各部门之间原有的联系。仅在赫鲁晓夫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第一届（4 年）任内，38 名部长和各种委员会主席中，被撤换的达 19 人，正好占一半。在他领导政府的 6 年中，农业部长就换了 4 人。由于对火箭和核武器的热衷，赫鲁晓夫下决心要大力裁减常规部队，压缩在更新常规武器上的开支，全力扶植他的“新宠”——战略火箭部队和空军。这就使那些靠常规武器打赢了卫国战争并因此而在苏联武装力量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将军、元帅们心里不是滋味。继朱可夫之后，他与像科涅夫、莫斯卡连科、扎哈罗夫、崔可夫这样的将帅们关系渐渐疏远。在他执政后期，他在军界最坚定的支持者就剩下总参谋长比留佐夫元帅了。至于以前曾拥有巨大权力和影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赫鲁晓夫也“忽略”了：是他第一次把这个机关降到政府的一个部的水平，而没有像以往那样赋予它更大权力；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既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不是中央书记，与他所有前任相比，地位也是最低的。布尔拉茨基对此形象地说：“由于这个曾经具有无限权力的组织多次遭到赫鲁晓夫的指责和贬低，谢米恰斯内早已经把牙齿咬得轧轧响。”而这一切，都为反赫鲁晓夫的“密谋串通准备了土壤”。

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是一点点积蓄和扩大的，而且正像实际情况那样，是在不露声色中进行的。表面上，你看不出什么，那些最有理由对赫鲁晓夫不满的人，在发言中仍然大段大段引用他的话；他的建议不管多么稀奇古怪，中央委员会似乎都能接受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他每一次出访，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都去隆重地迎送，并在公开场合用最热烈的语言赞美他……但是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在向赫鲁晓夫点头、微笑、鼓掌，甚至拥抱、亲吻他时，心里在默默祈盼和盘算着让他快些下台。这就需要有一个接班人。在 1963 年 6 月之前，可以或者说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候选人不下五个，但其中没有勃列日涅夫。因为按照惯例，作为第一书记的接班人除了要是中央委员会主

席团（之前称政治局）委员外，还必须是书记处书记。而当时勃列日涅夫缺的正是第二个条件。然而，1963年4月的一个偶然事件，不仅使勃列日涅夫在两个月后重返书记处，而且俨然成了党的第二把手，这恐怕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没想到。

1963年4月中旬，苏共中央书记、主席团委员弗·罗·科兹洛夫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科兹洛夫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仅次于赫鲁晓夫，后者也似乎有意把这个54岁的原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从让他在二十二大上作引人注目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上不难看出。科兹洛夫比勃列日涅夫小两岁，入党比勃列日涅夫早五年。由于科兹洛夫与以列宁格勒为主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联系密切，而赫鲁晓夫的几乎各项改革措施——为垦荒而加大对农业的技术设备投入、工业和建筑业的改组、裁军和发展火箭核工业——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科兹洛夫的地位上升很快。但科兹洛夫也有他的弱点：脾气暴躁，在与同样容易冲动的赫鲁晓夫共事中自然少不了摩擦和冲突。据说，他这次突发脑溢血之前，曾与赫鲁晓夫发生激烈争执。在科兹洛夫住院后，赫鲁晓夫并没有马上找人接替他，相反他在儿子陪同下几次到医院探望科兹洛夫。只是在看到后者病情逐渐恶化、丧失说话能力、并且听医生说科兹洛夫将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工作之后，赫鲁晓夫才不得不开始物色接替科兹洛夫的入选。经过比较，赫鲁晓夫选中了自己的老部下勃列日涅夫。早在勃列日涅夫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人们就给他起了个与他的姓有点谐音的外号“巴列里纳”，即女芭蕾舞演员，意思是说他能做出你想要的各种旋转。赫鲁晓夫在想到勃列日涅夫时是不是也记起了这个外号呢？

就这样，一个人脑血管中的一次意外，改变了另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在1963年6月18~21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重新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并没有随即解除，直到13个月后他才把它交给了米高扬。同时，与勃列日涅夫同一天被选为中央书记的还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维·波德戈尔内。再过10个月就年满70岁的赫鲁晓夫曾在不同场合流露出准备退休的想法，假如科兹洛夫身体健康，很有可能赫鲁晓夫会把第一书记的担子卸给他。现在科兹洛夫指望不上了，赫鲁晓夫召回了勃列日涅夫，又提拔了波德戈尔内，这就让人难以断定多变的赫鲁晓夫到底属意于两个人中的哪一个。当时赫鲁晓夫也许自己也没拿定主意。在1963年10月31日赫鲁晓夫接见法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摩勒时，后者问他新一代苏联领导人中谁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据说赫鲁晓夫依次提到三个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并都给他们以相当高的评价。当1964年7月中旬勃列日涅夫把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职务交给米高扬以便全力投入党务工作后，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勃列日涅夫已经被确定为党的第二把手了。

另一方面，进入1964年春夏季，推翻赫鲁晓夫的密谋也在加紧策划中。在苏共中央的工作日程上，定于11月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原拟议题是讨论有关农业改组问题，但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不会让讨论仅局限于此，他还要谈党的领导，这就意味着又将在最高领导核心中出现无法预料的人事变动。也许是心虚，密谋策划者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的主要策划人是老谋深算的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和中央书记谢列平，以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伊格纳托夫，再加上谢列平一手提拔起来

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那个对赫鲁晓夫咬牙切齿的谢米恰斯内。密谋者们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同时，不可能不考虑接替其职位的人选。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柯西金比较合适。当年正好 60 岁的柯西金早在 1940 年就当上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后改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直到斯大林逝世。其间还兼任过苏联财政部长、轻工业部长。1953 年 3 月后改任一段时间食品和轻工业部长，但到同年年底又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后又主管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到 1960 年 5 月他成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仅从这份并不翔实的履历表中便可看出，柯西金的确是个管理政府工作的老手和全才。另外，他作为“苏联的经济专家”而在国际上享有的知名度，也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看来，选择柯西金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既顺理成章，又量才适用。

相对困难些的是由谁出任地位最高、权力更大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职。在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下，人们真正看重的是这个职位，密谋者们首先要剥夺的也正是赫鲁晓夫的这个权力。那么由谁来当第一书记呢？当然，密谋者们具有优先权。如果这是一场军事政变，是一次准备对任何反对者实行流血处理的激烈行动，那么这个优先权是绝对的，密谋者愿意把它加在谁的身上就是谁了。问题恰恰在于密谋者不想采取流血的激烈方式，他们希望一切进行得越平静越缓和越好。因此他们就需要征求、平衡尽可能多的人的意见，当然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样他们的优先权就只能是相对的了：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能否从赫鲁晓夫手中接过第一书记的权力，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多数人的意见。在多数人看来，连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都不是的伊格纳托夫和谢米恰斯内不够资格；而资格最老的苏斯洛夫本人又不愿意干，剩下的谢列平虽是中央书记，但不是主席团委员，更主要的是，人们对他有时掩饰不住的野心和过分的精明不大放心。当人们把选择的目光转向稍大一点的范围后发现，一个现成的人选就在身边。他就是勃列日涅夫。

看上去，勃列日涅夫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他是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有长时间在州委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任领导的工作经验，是新一代领导人中资格比较老的。无论是在中央、在地方、还是在军界高层领导中，他都有不少故交老友占据着重要职位。单是数一数他在军界的老朋友就足以让别的书记们自叹弗如了：现任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 1941 年底接任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后，成了当时任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勃列日涅夫的首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华沙条约国联合部队总司令格列奇科元帅和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更是与勃列日涅夫在“小地”上就建立起深厚情谊的战友；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总监察长莫斯卡连科元帅，曾与勃列日涅夫并肩打进布拉格；他的大学同学和同事格鲁谢沃伊现在是莫斯科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能在掌握着枪杆子的人中间有这么多关系不一般的朋友。的确是一笔无价的财富。特别是在党和国家重大转折关头，这笔财富尤其显得珍贵。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在领导集团中的“人缘”也不错。他给人的印象是沉稳、敦厚、随和，不像老谋深算的政客那样阴险狡诈，也不像政治强人那样咄咄逼人。弱者感到他很可靠和安全，强者认为他好摆弄，不会形成威胁。何况以他现在在党内的实际地位，由他接任第一书记更自然，也更顺理成章。当然。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领袖，勃列日涅夫似乎缺少那种叱咤风云的魄力和坚决果断的强者风度。也许正因为如此，尝够了赫鲁晓夫的魄力和大胆行事之苦的人们，才“容忍”了勃列日涅夫的这点不足。

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少有谁相信勃列日涅夫能在第一书记的职位上长期呆下去，因为以往的历史证明，这毕竟是只为强人准备的位子。自知不是强者的人希望他坐上去，最好一直坐下去；自认为是强者的人不怕让他先坐上去，反正需要他下去的时候轻而易举就可把他轰下去。而在更多的人看来，由第二书记接替第一书记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历来如此，现在也无须破坏“规矩”。很难说这是历史的误会，传统的惯性，命运的安排，还是事物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正勃列日涅夫被选中来接赫鲁晓夫在党内的班了。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跟赫鲁晓夫“摊牌”了。

最理想的时间是在 11 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因为这次全会的时间早就确定了，到时候中央委员们会自动聚集到莫斯科。这时讨论重要的人事任免问题，比把他们紧急召来，要自然、放松一些，不会给人一种“政变”的印象，起码能多少冲淡这种印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对密谋者们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赫鲁晓夫知道了幕后策划的阴谋！

事情发生在 9 月份，莫斯科的初秋。一天早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格·叶戈雷切夫刚要去上班，电话铃忽然响起。来电话的是勃列日涅夫，他让叶戈雷切夫上班前到他那里去一下。

当叶戈雷切夫走进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他发现平常总是和蔼安详、举止稳重的勃列日涅夫，像完全换了个人，脸色苍白，双手发抖，惊慌不安。见到叶戈雷切夫，勃列日涅夫马上把他带进里面的房间，压低声音说：

“一切都完了。赫鲁晓夫知道了筹备全会的细节。”

叶戈雷切夫作为密谋的参与者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勃列日涅夫的表现还是让他有些吃惊。他反问道：

“难道这有什么不合法的？召开中央全会并不违反党章……”

“你对他不了解，”勃列日涅夫急忙说，“他会把我们大家都枪毙掉的。”说着，他张开五指做了一个不明确的动作，看得出来，他完全泄气了。叶戈雷切夫一面给勃列日涅夫打气，一面也安慰自己：

“我们的行为中没有什么不符合党性的，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了，应当捍卫二十二大路线。”

赫鲁晓夫的确知道了反对他的密谋，而且消息来源很有可能不止一个。他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也在 9 月下旬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那里得到有关消息。然而，当他向父亲讲了得到的消息后，赫鲁晓夫竟然不信！

“不，这令人难以置信。”赫鲁晓夫苦有所思般地自言自语，

“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是完全不同的人。这不可能。伊格纳托夫嘛，有可能，而且总的来说，他这个人不好。可他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一直被赫鲁晓夫一家视为忠实朋友的米高扬，也知道这个密谋，但是，要么他的消息来源跟谢尔盖·赫鲁晓夫是同一个，要么他另有考虑，反正他也没有使赫鲁晓夫对此事保持高度警惕。很可能，“他只是宠统地向赫鲁晓夫转告此事，而且是以安抚的口气转告的”。这样，赫鲁晓夫自己的判断加上米高扬的安抚，最终使赫鲁晓夫没有把密谋的消息真的当回事。9 月 30

叶戈雷切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对话可参见《苏共党史问题》杂志 1991 年第 5 期发表的叶戈雷切夫谈话录《苏共二十二大后》。谢尔盖·赫鲁晓夫撰写的《全苏意义的退休者》（中译本名为《尼·谢·赫鲁晓夫下台前后》）和阿朱别伊《赫鲁晓夫的悲剧》提供了这段时间的较详细材料。布尔拉茨基在《领袖与谋士》一

日，他离开莫斯科，到黑海边的皮聪大度假去了。临走之前，他向送行的波德戈尔内甩下一句话：

“把伊格纳托夫叫回来，问他在那里胡说些什么？这是什么阴谋？等我回来要把一切弄清楚。”

这也许就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足以让密谋者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到 11 月份“正常”地解决赫鲁晓夫问题了。

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的第五天，勃列日涅夫也率代表团飞往东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祝活动。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他只提到赫鲁晓夫一次。10 月 11 日，他率团返回莫斯科时，细心的人会发现，前来迎接的党政要员比送行时要多，多出的人中引人注目的是苏斯洛夫。作为密谋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在计划实施已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内定的第一书记通报准备情况和最新的事态发展。而这恐怕也是勃列日涅夫最想知道的。

第二天，10 月 12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大多数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会议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名义作出决议：定于 10 月 13 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撤回赫鲁晓夫 7 月份向各级党组织散发的一封有关农业改革的信件，因为它在地方上已“引起了混乱”；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召到莫斯科听取主席团的有关报告。在赫鲁晓夫不在、并且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这样一系列重大决定，说明在主席团大多数人眼中，赫鲁晓夫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已经无足轻重了。

就在上述决议通过的当天，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皮聪大通过无线电与“上升”号飞船上的三名宇航员通话时，赫鲁晓夫仍然兴致勃勃地答应要亲自在莫斯科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但他的这个许诺永远无法实现了。10 月 13 日，赫鲁晓夫被叫回莫斯科，与米高扬一起被从机场直接送到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室，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一场长时间的责难与批评。赫鲁晓夫进行了抗争，但他无论如何聚集不起 1957 年 6 月时的那种力量。70 岁的赫鲁晓夫终于不得不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退休声明上签了字。14 日凌晨，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通过决议，在指出赫鲁晓夫主要错误后，决定：

1. 满足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2. 承认今后由一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是不适宜的。
 3. 认为必须于 1964 年 10 月 14 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 责成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召开全会。
- 责成卡·亚·苏斯洛夫同志以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作报告。

早有准备的中央全会在 10 月 14 日下午举行。勃列日涅夫首先介绍了主席团会议的情况，并给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

“中央主席团中的局面是不正常的，其责任主要在赫鲁晓夫同志，他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中央主席团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仓促的指示及其领导国民经济的考虑不周的唯意志论的行为，产生了严重混乱，出现了被没完没了的改革和改组

所掩盖的严重失误。”这就是说，赫鲁晓夫个人要对党的核心权力机构和国民经济中的不正常局面及混乱状态负主要责任。接着，苏斯洛夫用了一个半小时时间历数了赫鲁晓夫大大小小的错误。尽管这个报告显得零乱琐碎，然而精神实质与勃列日涅夫定下的调子是合拍的。这很自然，因为责任必须要由退出政治舞台的人一个人来负，否则从他那里夺过来的权力就不好名正言顺地转交给内定的人选了。

剥夺赫鲁晓夫的权力进行得并不艰难，而把它交给后继者的过程就更简单了。苏斯洛夫讲完活唇，苏共中央主席团 14 日凌晨作出的决议被全会顺利通过。接着，开始选举党中央第一书记。会议厅里有人说：“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第一书记。”由于没有人提出别的人选，于是马上进行表决。表决是以最简单的举手方式进行的。大约十来分钟后，主持会议的波德戈尔内宣布：“勃列日涅夫全票当选。”很快，又以同样方式选举柯西全为部长会议主席。

就这样，过完 70 岁生日不足半年的赫鲁晓夫在十月全会上一言不发地让位了；就这样，还差两个月就满 58 岁的勃列日涅夫登上了党内职务阶梯上最顶端的一层，成了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之后这个赫赫有名的党的新领袖。

闻一在《世界历史》杂志 1996 年第 4 期《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一文中，根据最新发表的档案材料，详细叙述了十月全会的准备和进行过程.可为参考。

第八章新的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十月全会结束后第5天的10月19日。他在莫斯科主持了欢迎“上升”号3名宇航员的盛大仪式。3名字航员科马罗夫上校、医学博士叶戈罗夫和该飞船设计师弗奥克季斯托夫一定还记得，当他们在太空中飞行时，赫鲁晓夫曾许诺在他们返回地面后要为他们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现在，仪式如期举行，可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迎接他们的人群中，唯独没有了赫鲁晓夫。

在从机场到欢迎仪式的主会场红场的30多公里道路两旁，热情的群众有组织地挥舞旗帜、演奏乐曲，欢声雷动。当然，他们是向站在“吉尔”牌敞篷车上的宇航员们欢呼，几乎没有人看见坐在长长的车队中一辆黑色防弹轿车中的新任第一书记。但是第一书记透过车窗上的幔纱看到张张笑脸和兴奋的人群，也感到满意了：至少从这里看不出五天前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什么阴影。当勃列日涅夫登上列宁墓发表完他就职后第一次公开讲话、当他站在全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中间迎着欢呼的声浪挥手致意时，他的那种感觉再次得到印证：人民平静地接受了一切，接受了那个领导苏联近10年的领导人的消失，也接受了这个即将领导他们的新领导人的出现。

平静和稳定对于一个刚刚上台的领导人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而要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最保险，也是最简单的办法之一，就是宣布执行前任领导人制定的路线政策。勃列日涅夫利用他和新的领导集团第一次“亮相”的机会，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惟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党和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发展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除此之外，在这种特殊场合，对前任的某些错误进行批评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能证明实行这种权力交接的必要性。不过，当时人们能知道的赫鲁晓夫去职原因，并不是由于什么错误，而是“鉴于年迈和健康恶化”，因此，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措辞非常含蓄，点到为止。他在谈到苏联在空间探索方面取得的成绩后，话锋一转：“但是我们苏联人民并不把我们的空间探索看做目的本身，看做某种‘竞赛’。在探索和征服空间这一伟大而严肃的事情上进行轻率赌博的精神，是与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绝大多数人都把这段话按习惯理解为是对美国的批评；只有少数知道为让赫鲁晓夫下台而列举理由的那些人，从类似于“轻率”这样的用词中，品出一点别的味道。而只有真正了解“上升”号发射内幕的人，才对“竞赛”和“赌博”有更深切的体会，因而能更确切地知道这是在批评谁。

然而，这种哑谜式的含蓄批评没有、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毕竟赫鲁晓夫主要不是因为年迈和健康原因“光荣退休”的。他的错误，特别是那些让掌握实权的人们感到不适的规定，必须首先否定。11月16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在听取了波德戈尔内《关于把州、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工业苏维埃机关和农业苏维埃机关合并》的报告后，全会作出决议，在原被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州和边疆区，恢复统一的州、边疆区的党组织，把州和边疆区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联合在一起。这是赫鲁晓夫

改革措施中第一个被否定的。《真理报》在 11 月 18 日一篇题为《忠于列宁的组织原则》的社论中，进一步阐述了通过上述决议的理由，指出两年前根据所谓生产原则对党组织进行的改组，是“在缺乏应有的准备、不考虑它的全部后果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地匆匆忙忙进行的”，“引起了许多困难和麻烦”，“同生活发生了矛盾。”虽然社论及中央全会决议中仍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其矛头所向比一个月前要具体和清楚得多了。同时，全会还通过了人事任免决定。积极支持和组织推翻赫鲁晓夫密谋的谢列平、谢列斯特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现在的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相反，曾很有希望成为赫鲁晓夫接班人的科兹洛夫“因重病需要长期治疗”被解除了苏共中央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而中央书记兼党中央农业办公厅主任波利雅科夫因支持赫鲁晓夫被解除了上述职务。受牵连最大的可能要算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了。他先是在其岳父下台的 10 天后被从《消息报》主编职位上撤下来，而后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由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被开除出苏共中央。

在党外，对赫鲁晓夫改革的“纠正”也在进行。11 月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取消自 1956 年 8 月起实行的对城市中拥有牲畜的公民征收现金税的规定。之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爱沙尼亚等加盟共和国相继通过决议，取消对农庄庄员宅旁园地和私养牲畜的限制。12 月下旬，又取消了农民只能在本县出售“高级产品”的限制。12 月 11 日，第六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结束当天，赫鲁晓夫最后一个职务终于也被解除。1962 年 4 月，赫鲁晓夫曾被选为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当时党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都是该委员会委员。现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一致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该委员会主席。

1965 年，对赫鲁晓夫大的“清算”向纵深发展。先是在 3 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以第一书记身份作了主题报告《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直截了当地承认“近几年来农业的发展减慢了，提高农业生产的计划没有完成”。他第一次披露了七年计划执行期间农业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比如，按照七年计划控制数字，农业总产量应增加 70%，而实际上，6 年来只增加了 10% 左右，换言之，每年平均增加不到 2%。畜牧业也是如此，牛、猪、羊的数目比前五年都大大减少了。他得出结论：“如果说在 1959 年以前农业有显著提高的话，那么在后来这个时期它实质上是在原地踏步不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描述出农业停滞不前的事实，而在于对造成这种状况原因的分析。在勃列日涅夫列出的四个原因中，第一个就是农业领导方面的问题，即没有充分考虑，甚至常常忽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在近几年农业领导的实践中单凭意志行动越来越占上风”，而“大量的、有时是臆想出来的改组造成了神经过敏和无谓的瞎忙”。人们尚对前几年从最高领导者脑子里产生出的那一个个奇特的想法，在农业的实践上引出的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记忆犹新，勃列日涅夫的这段话，听来就是在进行点名批评。在全会讨论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时，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新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戈里亚乔夫就不那么“客气”了，他们都指名批评了赫鲁晓夫。有意思的是，这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在 8 月初公开出版发行了。上述几人的发言也被收录其中。勃列日涅夫等人就是用这种方式第一次公开地和自己的前任划清了界线。

9 月底，苏共中央再次举行全会。接任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柯西金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报告，提出对 1957 年以来实行的工业管理方面一系列改组，包括取消各工业部，改由按地区原则组成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工业，以及为补救这种改组带来的问题而在 60 年代初相继成立的各共和国和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等，进行纠正。因为“不久以前在计划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对于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采取了轻率的唯意志论的态度”。他建议取消经济行政区、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和部门性国家委员会，成立全联盟部和加盟共和国部。全会根据柯西金的报告通过相应决议。几天之后，第六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业管理机构体制改革和其他某些管理机构改革》的法令。接着，重建了 28 个部，在任命的 28 名部长中，至少有 5 人在赫鲁晓夫成为部长会议主席前就已经是相应部的部长。至此，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被清除殆尽。

对赫鲁晓夫在党政以及经济改革方面的“唯意志论”和“草率从事”错误的纠正，进行得比较平和，有条不紊。在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公开讲话中，甚至找不到对前任的点名批评。这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对“反党集团”成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风格，一种求稳、冷静的领导风格。

假若可以这样认为的话，那么这是出于接受前任的教训呢，还是意味着新领导人的成熟呢？

与撤销赫鲁晓夫时期颁布的一些法令、解散或恢复某些机构比较起来，还有一个更敏感、更棘手的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新领导人的面前，这就是斯大林问题。不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柯西金，他们都是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干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斯大林体制的受惠者。但他们更是赫鲁晓夫非斯大林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不可否认，作为首先站出来揭露斯大林错误及其危害的第一人，非斯大林运动已经与赫鲁晓夫的名字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了。非斯大林运动作为赫鲁晓夫在其执政时期一项具有广泛社会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主要政治活动，不仅已经深入人心，而且作为一份政治遗产留给了后继的领导人。对于新领导人来说，接受这份遗产，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有利于稳定，但同时等于肯定了赫鲁晓夫，至少是肯定了他的政治活动的重要方面；抛弃这份遗产，意味着在政治路线上来一个大转弯，由此产生的颠簸和倾斜将无法避免，甚至不排除现在由他们驾辕的这架马车有人仰马翻的可能。不过，如果敢冒这个风险，那就可以使他们彻底地与赫鲁晓夫划清界线，在国人和世人面前，他们将不会再被误认为是“赫鲁晓夫第二”或是赫鲁晓夫的管家，而是新的主人。政治就是这样，永远没有绝对安全和保险的港湾。

新领导人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似乎一切照旧：报纸、广播中仍然在说斯大林个人迷信，给受迫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仍未停止，但内部的斗争却在激

从精简机构的角度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在他去职之前就已经破产了。在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时，苏联部长会议设有 23 个全联盟部，29 个联盟兼共和国部，7 个中央直属机关，共 59 个部级单位。1957 年改行地区管理原则后，撤销了工业和建筑业部门的 10 个全联盟部和 15 个联盟兼共和国部，合并了 4 个部。从 1960 年起，陆续组建了一些国家委员会和国家生产委员会。到 1964 年 10 月，苏联部长会议设有 11 个部、45 个国家委员会和 3 个中央直属机构，总计还是 59 个部级单位。

烈地进行。而随着一个重要的纪念日——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20 周年纪念日的到来，这种斗争必须产生一个结果。按照习惯，在纪念日那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要作报告。为起草这份报告，从苏共中央有关各部抽调的几个人组成写作班子，布尔拉茨基为临时负责人。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把谢列平手下人起草的一份材料交给布尔拉茨基，并告诉他，第一书记希望对这份材料的观点进行分析评价。布尔拉茨基等人看过后认为问题严重。

“这篇‘大作’，”布尔拉茨基在自己的书中说，“应当说是一篇郑重的宣言——一篇用公开的新斯大林主义来全面修正赫鲁晓夫时期党的全部政策的宣言。我们发现 17 处政治方向盘急速转向斯大林时期……”

相反，当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兼苏共中央联络部长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则向第一书记提交了一份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内容广泛的纲领，其中中心点就是要求更彻底地贯彻二十大制定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并不急于确定自己的立场，在布尔拉茨基看来，“他在注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力量对比情况”，然后根据力量对比情况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指示写作班子既不是按谢列平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按安德罗波夫的纲领起草报告初稿，然后把它印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各个书记，请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从汇总上来的意见看，绝大多数领导人赞成增加对斯大林的积极评价。其中，像谢列平和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还坚持要从报告草案中删去诸如“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时期”的提法；而米高扬和苏共中央书记兼苏共中央国际部长鲍·尼·波诺马廖夫则建议照抄 1956 年 6 月中央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决议的提法。看到领导人之间意见分歧较大，而且任何一方都没有占压倒优势，安德罗波夫提出一个折衷性建议：在报告中完全不提斯大林的名字，回避斯大林问题。他的理由很简单，这时没有比斯大林问题更能分裂领导集团乃至全党和全国人民了。

不管安德罗波夫的理由在当时是否真的成立，但这种在两种意见之间寻求平衡、掩饰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的思路，与勃列日涅夫力求稳定、不希望发生激烈变革的领导风格更为吻合。在 5 月 8 日这天，勃列日涅夫在长达 4 小时的报告中，只是在下面一句话中提到一次斯大林的名字：“在非常情况下……组成了以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来领导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但就是这句平平淡淡的话，引来克里姆林宫大礼堂里一阵热烈的掌声。

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不仅没有给围绕斯大林问题进行的斗争和争论画上句号，相反倒是开了一个头。禁区里既然放进了第一个人，对那些已在外面等待许久的人来说，就不再是，至少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禁区了。一些卫国战争著名将领借胜利 20 周年之机，纷纷发表回忆文章，尽管没有用漂亮的词藻赞美斯大林，但也多是正面地述及这位最高统帅的活动。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在该共和国党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中，直接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党的论述，这是二十大以后的近九年中，一名党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言论中正面引用斯大林的话。进入 1966 年后，这种势头丝毫不减。1 月 30 日，《真理报》刊登历史学家茹科夫、特鲁哈诺夫斯基的文章，认为“个人迷信时期”是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术语”，它夸大了一个人的作用，贬低了党和人民的英勇努力。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斯图鲁阿在 3 月上旬格鲁吉亚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话更有代表性。他说：“批评

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所付出的代价表现在，这种批评给反共宣传的某种积极性提供了材料。……某些过分积极的批评家，企图打着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的旗号，恢复托洛茨基、右派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我们党内其他反列宁主义的思想倾向。”敏感而且消息灵通的西方记者发现，斯大林的著作 10 年来第一次被列入党史必修课推荐书单中；2 月 7 日，莫斯科电视荧屏上两次出现了斯大林的形象。3 月 25 日，一家英国报纸报道说，据从东欧传来的消息，一批苏军领导人，包括几位元帅，写信给苏共领导，要求在定于 3 月底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大上“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

与此相反，另一些现象却在加深人们对斯大林统治时期种种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回忆。就在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20 周年大会的听众为勃列日涅夫说出斯大林的名字而热烈鼓掌的那个月，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伊·格·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 6 卷，也摆上了莫斯科各大书店的货架。翻开这本书，用诸如“专制暴君”、“像人一样聪明，像野兽一样阴险”的词句来形容斯大林的地方俯拾皆是。同时，为斯大林时期受迫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为两位在战后受到批判的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恢复名誉。与那些上书中央要求部分恢复斯大林名誉的军人针锋相对，有 27 名知识分子联名致信苏共中央，反对在二十三大大上为斯大林恢复名誉。

在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出现如此不协调的局面，一方面说明新领导人对如何处理这类重大问题尚未作好准备和制定出稳妥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最高领导集团中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不相同，意见还不一致。换句话说，表现出来的不协调与上层的幕后斗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央委员会里的不同意见自不必说，就是主席团和书记处对此看法也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对最高领导人的威望和能力是一种考验。按照比较一致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当上中央第一书记，不是由于他享有崇高威望和具有超群的能力。而是特殊环境下复杂的政治力量相互平衡的结果。因此，他成为第一书记最切的一段时期里，他还做不到以个人的意志代替党的意志，无法让最高领导集团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说，他必须正视眼前达成的力量平衡，尊重同事们的意见。但是又没有人不承认，能在苏联政坛上“闯荡”几十年并且从基层干部一步步登上最高权力位子的人，绝不会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束手无策的“幼稚”。勃列日涅夫也许不会像权力鼎盛时期的斯大林或是赫鲁晓夫那样去贯彻自己的意图，但他仍有能力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实行自我保护，在复杂的政治结构中为自己寻找一个有利的位置。不错，在他从一个冶金工程师到当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过程中，确实有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然而如果他根本就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不善于在政治活动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培养自己的能力，那他恐怕早就被政治生活本身淘汰了。勃列日涅夫的能力表现在哪里呢？布尔拉茨基说，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亲口对他说过：“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组织能力当然是个内容广泛的概念，但它至少应该包括协调的能力，把本是无序的东西变为相对有序的能力，把各种独立的因素纳入统一的目标之下的能力，等等。而心理素质要求自信、锲而不舍、能以稳定的心态等待有利的时机。如果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评定是切实的，那么他就必须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应付挑战和考验。

为了不使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分歧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公之于众，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决定，只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 可以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这是少得不能再少的发言人数了，他们分别代表苏联的三大系统：党、政府和苏维埃。另外，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谢尔比茨基虽然也是主席团委员，但他们只能代表乌克兰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发言。除此之外的所有主席团委员，包括党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老资格的米高扬、年轻气盛的谢列平等，在代表大会上都要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罕见的决定，因为自从 1903 年 7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了第一个党章时起，向上级组织、中央机关和党的代表大会表达意见，就成了每一个党员的权利。尽管任何一次代表大会实际上都不可能为每一个代表留出表达意见的时间，但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发言要求总是能够满足的。因此这次的“缄口令”，严格说来是违背党章的。然而，它不仅为主席团委员们接受而且从后来的情况看还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这肯定是有了一条更强有力的理由迫使他们牺牲自己的党员权利。这条理由是什么，现在尚无法确定，但最有可能的就是安德罗波夫去年引用过的那条：维护和保持党的统一。这一条，从 1934 年在党章第 58 条中被确定为“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到 1961 年党章里被视为“苏共生活的不可破坏的法规”之一，可以说一直占有神圣的地位。也正是从这一条上，体现出党——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组织的力量。它可以以联合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组织的名义，要求任何一个成员无条件地放弃理论上应该享有的权利。勃列日涅夫现在就是这个强有力的组织的合法领导人，他当然不希望党分裂，因为任何分裂只能意味着他的统治的削弱。他也不愿意对尚不明确的重大问题急急忙忙公开表态，这不符合他的作风，而且具有一定的风险。另外，他也不擅长争论和雄辩。所有这些都使避免在由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出现分歧——不仅仅在斯大林问题上，就显得非常重要。不管提出“缄口令”建议的是谁，它被通过就对勃列日涅夫有利。勃列日涅夫的长处是组织能力，这次看来得到了验证。他能把听起来有点离奇的建议“组织”得让主席团里那些水平都不低的政治家们接受、遵守，进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在当时恐怕是最理想的环境。这一点在 1966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8 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初步表现出来了。

二十三大是勃列日涅夫作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惯例，第一书记要向大会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同时依党章规定，由代表大会听取和批准总结报告，决定党对内对外政策，修改并批准党纲和党章，还有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总之，勃列日涅夫能否进一步巩固他的党的领袖地位，这次代表大会是个关键。

波德戈尔内在 1965 年 12 月上旬召开的第六届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取代米高扬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耐人寻味的是，在 1934 年以前的三个党章（1919 年、1922 年和 1925 年）中一直规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

对主席团成员同意保持沉默的另一种解释是，一旦勃列日涅夫被迫下台时，他们可以以此说明自己没有支持过他的政策方针。莫罗佐夫在自己的书中就这样认为。但这种解释至少忽略了两点，其一，苏联政治史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搞政治的人，今天为某人大唱赞歌，丝毫不妨碍明天对同一个人口诛笔伐、只要“党的利益”需要。其二，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3 月 26 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审查并“一致批准了”向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可挽回地赞成并支持勃列日涅夫了。

在勃列日涅夫工作班子——有关这个班子的情况后面将会提到——的全力组织下，代表大会开得应该令勃列日涅夫满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充当主角的滋味。在历时 11 天的会议中，勃列日涅夫是唯一一个三次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他在会议开幕当天作了总结报告，4 月 4 日作了总结发言，4 月 8 日又致闭幕词。柯西金获得两次发言机会：作《关于 1966—197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指示》的报告和总结发言。而波德戈尔内只在大会讲台上出现了一次。勃列日涅夫的总结报告基本上还是传统格式，从苏联的国际地位、苏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讲起，然后是苏联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及苏共的国内政策，最后是党的工作。报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和思想，对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多是“冷处理”，像斯大体问题及其进行的争论根本没有提及；对他的前任也没有进行特别的指责和批评。但是凡是出席过赫鲁晓夫主持过的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马上比较出来，在报告的风格上，现任第一书记确实不如前任第一书记灵活和风趣，因此，虽然他的报告比赫鲁晓夫的短些，但还是有些乏味。也许。这正是勃列日涅夫刻意追求的东西：四平八稳，一本正经，言辞慎重。而这也就很容易让人把他与赫鲁晓夫区别开，说明他不是那个冲动、鲁莽的前任衣钵的继承人。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还建议修改党章。修改的地方有 10 处，最关键的是取消了原党章中的第 25 条，即规定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成员原则及各级领导机关每次更换成员的比例的那条。随后，代表大会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建议通过相应决议。参加代表大会和没参加的各级党的机关的干部们，轻轻松了一口气，他们向报告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尽管，在修改过的党章中仍写有“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组织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时，应遵守党的机关成员要经常更新、党的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字样，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少了硬性规定内容的所谓“原则”，实际上形同虚设。这样，赫鲁晓夫留在党章中最有特色的这一条，如果不是在掌声中被冲刷得一干二净，至少也是面目全非了。深谙“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话奥妙的勃列日涅夫，也一定在掌声中感到脚下站立的地方坚实了许多。

勃列日涅夫在代表大会上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从此以后他将用“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不是现在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称谓来表示党的领袖身份了。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按他的说法，正是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倡议使用这个称谓的。想必叶戈雷切夫不敢在引用列宁的话上无中生有，然而自从“总书记”称谓使用的第一天起，它就与斯大林的名子联系在一起了。在勃列日涅夫之前，除了斯大林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效过这顶帽子。因此，在人们的意识中，它是斯大林的“私人用品”。勃列日涅夫最终接受了这个称谓，不排除有吸引舆论、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此证明自己是传统体制的继承者，是列宁思想的捍卫者。同时也以此与那位离经叛道的前任不仅在风格上而且在纯属形式的称谓上，划清了界限。在此之前，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建议把苏共中央主席团改称为苏共中央政治局，以突出党的这个领导机构的政治性质，同时也与国家的领导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有所区别。政治局最初是在十月革命前夕，为了对武装起义进行政治领导而建立的，当时列宁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在 1919 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政治局作为中央委员会下设的负责政治工作的机构，被正式确定下来。从它成立时起到列宁逝世，列宁都是其名

列第一位的成员。尽管成立政治局的建议最初是由季诺维也夫提出的，但列宁在世时成立并有列宁参加的这个机构，仍可作为列宁思想传统的体现。由此看来，无论是把“第一书记”改为“总书记”，还是把“主席团”变为“政治局”，其真实用意是为了证明现任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既不是赫鲁晓夫、也不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而是列宁主义的继承人。仅此一点，就可以让勃列日涅夫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本。

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苏共中央书记处名单。勃列日涅夫被一致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其他 10 名委员按勃列日涅夫宣读的顺序是：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谢列平、马祖罗夫、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佩尔谢。8 名候补委员按勃列日涅夫宣读的顺序是：杰米契夫、格里申、姆扎瓦纳泽、拉希多夫，乌斯季诺夫、谢尔比茨基、库纳耶夫、马谢罗夫。11 人组成的书记处顺序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谢列平、基里连科、杰米契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鲁达科夫。

敏锐的观察家们立刻从勃列日涅夫宣读的这份名单中捕捉到一个信息：勃列日涅夫没有按惯例以字母排列顺序宣读名单。以前除了第一书记或总书记可以例外之外，其他人都是按字母排列的。勃列日涅夫这次的破例，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它比较忠实地反映出名单上的人在他所在的机构中实际占有的地位，换言之，这是一份高级领导人的排位表，位置的前后由其在政治上影响力的大小决定。当然，这也仅就一般意义而言，因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拥有相当权力的领导人的影响力是很难量化的。不过，仅从这个相对的排列顺序上，似乎已能说明，勃列日涅夫当时的权力和影响还没有强大到除了自己之外对所有其他领导一概“一视同仁”的地步，他必须要正视领导集团中权力影响不平衡的事实，承认在他之下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不是彼此没有任何区别的一个“复数”，而是一个个的“单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会想，在这些有权有势的“单数”包围中，勃列日涅夫这个总书记（当然也是个“单数”）的地位是加强、提高了呢，还是相反？

获得总书记头衔的勃列日涅夫没有理由不争取尽可能长久地保护住这个头衔。领导集团中权力影响不平衡的现实既增添他的紧迫感，也为他指明了需要防范和警惕的对象。如果说勃列日涅夫为争取和巩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在 1964 年 10 月就已经开始，那么在二十三大大后他仍需把斗争进行下去。

第九章巩固权力

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领袖后，他的权力扩大了。不过，随之而来的是，需要他操心费神、解决处理的事情也增多了，他肩负的责任、承受的压力以及遇到的挑战，无疑也比以前加大许多。尽管有人说，“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头上的”，但对这种多少有些意外的好运，勃列日涅夫有理由为自己庆幸，却没理由不加以珍惜。这种好运，对于一个苏联政治家来说，一生中能遇上的几率可能仅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分之一，更严酷的是，活着从这个位置掉下来的人，都马上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对勃列日涅夫来说，权力虽然并非来之不易，但仍须为捍卫它而斗争。而往一些关键位置上派去信得过的干部，是捍卫权力的有效措施之一。勃列日涅夫懂得这一点。

早在1956年勃列日涅夫被从哈萨克重新调回莫斯科工作时起，他就悄悄地把几个得力的干部调到身边做助手，最先来到的是康·乌·契尔年科和谢·帕·特拉佩兹尼科夫。这两人都是勃列日涅夫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时结识和赏识的干部，前者被称为党务和行政管理专家，后者则是勃列日涅夫的首席理论

顾问。关于契尔年科前面已简单作过介绍，他从事过团的工作，上过专门的党务工作者高级党校，当过州委书记，即便是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也一直在后方的机关中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机关工作者”。正因为如此，他对党政机关各个方面非常熟悉和了解，甚至可以说深有研究。这对先是需要借助党政机关系统扩大权力和影响、而后再靠控制这一系统巩固地位和加强权力的勃列日涅夫来说，确实是个必不可少的帮手。而契尔年科自结识了比自己大五岁的勃列日涅夫后，一直视其为政治靠山，对其忠顺致至。初来莫斯科时，契尔年科被安排到苏共中央宣传部中的一个部门，同时负责编辑《宣传员》杂志。勃列日涅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马上把他调来，任主席团办公室主任。勃列日涅夫重新成为党中央书记并把国家首脑的职位交给米高扬没多久，契尔年科也离开最高苏维埃，再次追随勃列日涅夫进入党中央机关协助后者工作。勃列日涅夫当上第一书记9个月后，1965年7月，契尔年科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从此直至勃列日涅夫逝世，契尔年科都是他忠实的“管家”。

特拉佩兹尼科夫生于1912年，出身贫寒。早年也从事过共青团和党的工作。1946年，34岁的特拉佩兹尼科夫毕业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同时也从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拿到了结业证书，这样就为他进入联共（布）中央社会科学院深造创造了条件。两年后，他从社会科学院毕业，来到摩尔达维亚党中央高级党校任校长，兼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如果不是结识了稍后来摩尔达维亚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这个年轻时曾被人打破一条腿的党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永远也离不开基什尼奥夫了。被勃列日涅夫调到莫斯科后，特拉佩兹尼科夫一面在党的机关中工作，一面攻读博士学位。1957年，他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三年后成为教授并任他的母校之一——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副校长。1965年5月，特拉佩兹尼科夫终于从幕

1977年契尔年科所著《创造性发展党和国家工作作风的一些问题》一书出版。之后苏联又于1984年为他出版了《契尔年科讲话和文章选集》（第2版）。其中有不少论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如《关于完善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问题》，《完善党的机关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

后走到前台：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成为第一书记，后来是总书记在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中的代言人和管理者。由于特拉佩兹尼科夫对非斯大林运动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因此他除了为勃列日涅夫出谋划策、起草和加工重要的报告和讲话外，还充当了后者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寻找平衡的“拐杖”。二十三大时，特拉佩兹尼科夫的地位上升神速，成为中央委员，而契尔年科仅是中央候补委员。

在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称得上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和政治盟友的大有人在。首屈一指的是安·巴·基里连科。基里连科是勃列日涅夫在第18集团军时的战友：勃列日涅夫任该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时，基里连科任集团军军事委员。两人的工作关系应该说是非常密切的。不过，基里连科很快就离开了前线部队，任国防委员会驻莫斯科飞机厂的全权代表，监督飞机生产。乌克兰解放后，他立即被派回战前他工作的州——扎波罗热，任州党委第二书记。1946年8月至次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罗热当州委第一书记时，基里连科正是他的副手。这次两人配合工作的时间仍然不长，但工作很有成效，因而双双受到奖励：勃列日涅夫调任更大更重要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任第一书记，基里连科升任尼古拉耶夫州党委第一书记。然而当勃列日涅夫1950年初到中央工作时，又是基里连科来接替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留下的职位。1957年，基里连科因在反对“反党集团”斗争中表现突出，升为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但以后的几年中他得经受地位下降的考验，因为赫鲁晓夫制定的那个干部轮换制的规定，曾一度使他离开了党中央主席团。直到1962年4月，他才被选为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在二十三大上，基里连科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不仅成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且在勃列日涅夫打破字母排列顺序的排名中，他列第六位，仅次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和沃罗诺夫。

丁·阿·库纳耶夫则是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工作时的老相识。勃列日涅夫到哈萨克任党的第二书记时，采矿专家库纳耶夫就已经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当上哈萨克科学院院长了。这个当年40多岁、土生土长的哈萨克科学家，给勃列日涅夫留下良好印象，并利用他在哈萨克科学界的关系和影响，给急于要在赫鲁晓夫发起的垦荒运动中做出成绩的勃列日涅夫不小的帮助。勃列日涅夫升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库纳耶夫也得到提拔，当上了哈萨克部长会议主席。1960年1月，在身为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支持下，库纳耶夫又当上了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哈萨克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但此后勃列日涅夫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解除了其中央书记职务，与此同时，科兹洛夫在党内的地位上升到第二位，影响超过勃列日涅夫。库纳耶夫在哈萨克也受到指责，说他是靠私人关系提拔和使用的干部，结果他被解除了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重新回到该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上。1964年12月，库纳耶夫再次出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原因不用说谁都清楚：他的政治靠山现在已经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了。的确，库纳耶夫自50年代后期以来的每次升降，都证明了一点，即他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命运是联在一起的，从政治谱系上说，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人。现在他又以候补委员身份进入了政治

此人与前文提到的阿·伊·基里钦科是两个人。后者在50年代未曾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在1960年被撤销其上述职务。两人的姓氏中一字之差，容易被混淆。

局，不管勃列日涅夫是以什么理由办到这一点的，其结果无疑会加强总书记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的力量。

另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弗·瓦·谢尔比茨基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更近些。谢尔比茨基的出生地也是在卡缅斯克，即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因此他与总书记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同乡，只是比后者晚出生 12 年就是了。虽然他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化工学院，但学院所在的地点很有意义，因为它与总书记的“第二故乡”和政治发祥地又重合了。这使谢尔比茨基早在 1941 年就有机会结识了当时在“第二故乡”任州委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战后，谢尔比茨基由技术和党政工作兼职转为专职搞党的工作，1948 年起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党委第二书记，1952 年升任该市党委第一书记。在斯大林逝世后勃列日涅夫被赶出党中央主席团那段灰暗的日子里，勃列日涅夫回了趟故乡，很有可能谢尔比茨基以家乡父母官的身份迎接或是拜访了这位从莫斯科“滑落”下来的政治兄长，并一如既往地给勃列日涅夫一家人以相应的关照。1954 年，谢尔比茨基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任州委第二书记，成了基里连科的副手，第二年，他便接了基里连科的班。1957 年，勃列日涅夫和基里连科都在莫斯科站住了脚，谢尔比茨基升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1961 年又出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尽管 1963 年至 1965 年因乌克兰粮食减产，他被降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但最终又官复原职。坐稳了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的位子，成了勃列日涅夫安插在乌克兰的最可信赖的人物，对那个不怎么驯服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形成牵制，并最终于 1972 年取代了前者。

除此之外，在党和国家及政府部门还能看到其他勃列日涅夫的同乡、同学和老部下身居领导岗位。格·谢·帕夫洛夫，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30 年代中期，他与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是同学，40 年代又担任过勃列日涅夫家乡城市的党的领导人，是谢尔比茨基的前任和提携者之一。伊·特·诺维科夫，自 1962 年 11 月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他也是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的毕业生，不过比勃列日涅夫早两年毕业，但他们在一起从事过学院共青团和党的工作。尤其是当勃列日涅夫在扎波罗热为恢复第聂伯水电站的工程到处求援的时候，当时身为苏联电站设备总局局长的诺维科夫给他不小的帮助。尽管两人也发生过争执，但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尼·亚·吉洪诺夫，自 1965 年 9 月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并毕业于这里的冶金学院，虽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和同学，但也算得上是近邻和同行，大家也许还记得，在勃列日涅夫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他辖区内的尼科波尔南方钢管厂厂长正是这个吉洪诺夫。别的不说，至少在勃列日涅夫力倡的整治市容厂貌的运动中，吉洪诺夫走在了前面，他的工作

最可能的理由是，哈萨克与中国接壤，而这时中苏关系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从战略上考虑，哈萨克是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地区。对与中国毗邻地区的重视，还可从二十三大后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视察、授勋上得证实。

据说，对州里过多干预水电站技术工作深感不满的诺维科夫在一次与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争执之后，直接打电话给斯大林，请他裁决对水电站工作进行第一须导的是电站部还是州委。斯大林肯定了电站部。但提供这条材料的罗·麦德维杰夫搞错了，他把弗·尼·诺维科夫与伊·特·诺维科夫混淆了。在各种官方记载中，前音是一名军工专家，没有在水电部门工作的经历。

给州委第一书记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从 1963 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技术委员会主席的列·瓦·斯米尔诺夫，他曾在 40 年代末担任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军事科学研究所所长及其他领导职务而与当时的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建立了良好关系。

在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也可以找到总书记的同乡和校友。委员会副主席帕·瓦·阿尔菲罗夫在未成年之前就和勃列日涅夫在同一家工厂中工作，之后又在同一所学院学习。战后初期，已经在党中央组织部当上部长的阿尔菲罗夫对刚刚从部队转到地方“发展”的勃列日涅夫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关系。在任命他为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这件事上如果说有什么“额外”因素的话，那么阿尔菲罗夫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而扎波罗热正是勃列日涅夫“政治起飞，’的最初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基地。当上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自然不会忘了老朋友，在 1971 年 3 月中旬阿尔菲罗夫逝世时，勃列日涅夫是讣告的签署人之一。楚卡诺夫比勃列日涅夫年轻 13 岁、晚 8 年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夜校部毕业。现在尚不清楚勃列日涅夫是怎样发现这个人才的，反正从 1958 年起，楚卡诺夫就以苏共中央书记助理的身份出现在勃列日涅夫身边。此后无论是勃列日涅夫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是再回到书记处，楚卡诺夫始终是形影不离的助理，直至勃列日涅夫逝世。这样，也就很难说清他们两人谁更离不开谁了。

以上这些人，加上下面还将提到的几个，构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嫡系”，是他统治的“班底”。西方根据这些人的经历中多少都与第聂伯河畔两座城市有某种关系这一点，称其为“第聂伯帮”，尽管形象，但并不很确切。实际上，他们是以勃列日涅夫个人政治经历轨迹为主线纠结在一起的既得利益集团。地域因素在这个集团的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任何人的政治活动都是、而且只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的。能在特定的、相对狭小的时空中，使自己的政治活动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活动相交叉或者重合，确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但必须清楚，这种地域因素的意义并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发生交叉和重合的双方当时是否都认识到他们从中将会获得的利益。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政治活动的前期，在他还无法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的情况下，这种认识就更显得重要和珍贵。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个集团的成员之间完全不存在私人感情和友谊，相反这恰恰是维系集团的一条有力的纽带，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个人友谊与政治活动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在更注重政治价值而不是人的价值的环境中，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就更容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掺杂政治利益方面的因素。应当承认，政治利益而不是私人感情，是这个集团成员间关系的实质和基础。

还需说明一点，这份名单并不是“第聂伯帮”或叫“勃列日涅夫帮”的全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有一批新人补充进来。也不要把它误认为就是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的全部。不是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党、国家和政府的关键领导岗位上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严格上讲不属于这个“帮”，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毕竟，统治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且地域辽阔的大国，需要一部庞大繁杂的管理机器，操纵这部机器正常运转，绝不是仅靠总书记的少数同乡和同学就能办到的。而如果完全抛开这些“久经考验”的同乡、同学们，勃列日涅夫就会感到自己像一叶浮萍，失去了根基。全靠它不行，不靠它也不行，总书记与这一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就这样微妙。

对于亟需巩固领导权力的勃列日涅夫来说，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是必须牢牢抓住的两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远的不说，仅在他的前任执政期间发生的几次重大政治变故中，军方领导人和安全机关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让任何一名智力正常的政治家认识到抓住这两个环节的意义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命运是生死攸关的。

在和平时期苏联的军事领导岗位中，国防部长一职地位最为显赫。像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等著名将领先后担任此职，更使它的人选备受苏联国内外关注。朱可夫元帅在 1957 年 10 月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后，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罗·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任。而接任马利诺夫斯基职位的是安·安心格列奇科。无论是马利诺夫斯基还是格列奇科，勃列日涅夫都不陌生，相反，在战争年代里，前者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当过他的军事首长，后者则是后来被大加渲染的“小地”上的战友。根据 1957 年六月事件中国防部长朱可夫在支持赫鲁晓夫当政上所起的关键作用判断，1964 年十月事件中，如果没有马利诺夫斯基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勃列日涅夫恐怕不会顺利地取代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位置。马利诺夫斯基在二十大上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他在党内的位置也就到此为止了。自朱可夫之后将近 20 年里，没有一名职业军人出现在政治局（之前是主席团）的名单上。这倒不是说党的领导人对军方的轻视，相反，正是由于对他们非常重视而总感到有些不放心。直到 1976 年苏共二十大上，这个“传统”才被打破，职业军人、勃列日涅夫久经考验的信得过的战友、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终于成为政治局委员。

1967 年 3 月 31 日，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因患癌症医治无效逝世，谁将接任这一重要职位引起苏联国内外人士的极大兴趣。按照惯例，当时 64 岁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列奇科是最正常的人选。他从 1919 年参军，先后毕业于骑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军事学院，参加过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可以说是个文武双全的军事统帅。尽管他的元帅军衔和苏联英雄称号都是在 50 年代后半期获得的，但他在苏军中的知名度却很高。1957 年，他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陆军总司令，1960 年又被任命为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因此由他出任国防部长一职应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格列奇科的任命并没有马上公布，10 多天里克里姆林宫对新任国防部长一事保持沉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4 月 6 日，《红星报》引人注目地刊登了巴宾上校的一篇题为《党是苏联武装力量的领导者》的文章，强调“党的领导是军事建设基础的基础，是苏联陆海军强盛和取得不可磨灭胜利的决定性源泉之一”。文章的主题虽然不新鲜，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老话重提，总让人感到不是无的放矢。敏感的西方观察家据此作出判断，说这可能意味着将任命一名文职人员当国防部长，这样就与西方国家的做法相同了。同时，这种判断的另一个根据是，有传闻说政治局准备任命德·费·乌斯季诺夫为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比格列奇科小 5 岁，年轻时曾是钳工，193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之后历任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兵工厂工程师、试验室主任、副总工程师、厂长。1941 年至 1946 年，他是苏联武器装备人民委员，在组织军工生产、供应苏军武器装备上做了大量工作，被誉为“军火工业专家”。战后历任苏联武器装备部长、苏联国防工业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尽管乌斯季诺夫在 1944 年已是工程技术上将，但从上述经历中仍可看出他的确属于文职之

列。他与其他高级文职人员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有长期与军方打交道的经验，虽不像以前的几任国防部长那样是标准的军人，可也绝非在苏联军界不为人所知的无名之辈。更重要的是，他还是苏联军事工业集团中最强大、最有实力的列宁格勒集团的代表。在苏联日益重视和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抗衡的背景下，这一集团的作用日趋重要，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此不会不考虑。这样看来，由乌斯季诺夫继任国防部长，在所有文职人员中是最理想的人选了。因此这时传出上述传闻，从道理上讲、亦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除此之外，也有人分析，争论还可能来自军方内部。部分高级将领、特别是自赫鲁晓夫时期起越来越受重视的战略火箭部队的指挥官们，打算拥立国防部副部长兼战略火箭军总司令尼·伊·克雷洛夫为国防部长。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在现时代，核战争将取代常规战争占第一重要的位置，因此战略火箭部队将是苏军的发展方向 and 主体。可见，在格列奇科和克雷洛夫背后，实际上是军方内部长期争论的问题，即对未来战争作战样式性质的认识问题。这些分析和推测最终都被事实粉碎了：1967年4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了对格列奇科的任命，他成了20年代中期实行军事改革以来第九任国防部长。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尽管还不是很清楚，但由他的一个久经考验的可以信赖的老战友坐镇国防部，无疑对他巩固权力是有巨大意义的。在军界其他一些重要职位上，也还能看到总书记另外的故友和熟人。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阿·阿·叶皮谢夫，战前曾任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战争后期，叶皮谢夫任军事委员的第38集团军和勃列日涅夫任政治部主任的第18集团军曾并肩战斗，解放了西乌克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因此他们两人也算得上是战友。1946年至1949年，叶皮谢夫一直是乌克兰党中央书记，在赫鲁晓夫手下主管干部工作，而这几年又正是勃列日涅夫奠定政治仕途基础最关键的时期，他的战友想必不会没有给他帮助的。现在由这样一个老战友和熟人主管苏联武装力量中党的领导机关，体现和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勃列日涅夫该是比较满意了。叶皮谢夫也非常坚定地政治上紧跟总书记，积极支持勃列日涅夫的内外政策，因此他在这个位子一直坐到逝世。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伊·格·帕夫洛夫斯基大将，虽然跟勃列日涅夫暂时还没有什么更深的“故交”，但他却是格列奇科的老部下，而且在进入国防部之前是远东军区的司令员。在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这个多事之秋，帕夫洛夫斯基的提升，是能说明不少问题的。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谢·格·戈尔什科夫，是勃列日涅夫在新罗西斯克时的老战友。当1942年勃列日涅夫所在的第18集团军后撤到这里时，戈尔什科夫也率领着亚速海区舰队抵达黑海，并被任命为新罗西斯克防御地域副司令。第二年，第18集团军和亚速海区舰队又在解放克里木半岛战役中再度合作。又过了一年，勃列日涅夫所在的第18集团军和戈尔什科夫指挥的多瑙河区舰队同被编入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海军掌握在他手中，勃列日涅夫还是放心的。1967年10月，戈尔什科夫被晋升为惟一的苏联海军元帅，他也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逝世。还有，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格鲁谢沃伊，现在是上将和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老战友莫斯卡连科是国防部资格最老的副部长，老部下尼·格·利亚先科先后在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土耳其斯坦军区和中亚军区任司令员。

长期以来，苏联的治安与国家安全机关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让任何一名执政者都不会对其掉以轻心。从历史上看，苏联的治安与国家安全机关包括两大系统：一个是1917年11月成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一个

是晚一个月成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总工特别委员会”系统。在斯大林逝世之前，这两大系统上的机构时分时合。1953年3月6日，两大系统的中心机关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在贝利亚被处决后，1954年3月13日，在内务部之外又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两大系统再次并存。1960年1月14日，苏联政府宣布撤销内务部，但保留了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此后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克格勃是管理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的惟一中央机关。在克格勃系统下，除了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边疆区和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及市、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处之外，还有一支不受国防部控制的独立部队。这支部队的主体是装备精良的边防军，而在苏联各地控制着类似核武器发射和贮存设施这样极其敏感和要害地点、负责保卫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通讯和安全的武装人员，也是克格勃部队的一部分。不难想象，对一个最高领导人来说，控制这一系统意味着什么，相反，它的失控又将意味着什么。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中执掌大权的是弗·叶·谢米恰斯内。他1924年出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能有幸降生在这块土地上，如果能再选准了政治靠山和从政路径的话，本来是很有前途的，因为他具备了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具备的条件。然而谢米恰斯内却“不幸”，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在克麦罗沃化工学院学习期间，他开始从事共青团工作，而且以后一直在共青团系统发展，历任团的州委书记、第一书记，乌克兰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直至50年代末任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尽管谢米恰斯内和绝大多数是共青团这条从政路径的人一样，在超龄后转到党的部门工作，在苏共中央机关和阿塞拜疆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但他毕竟不同于一直在党的部门工作，而且是从基层党组织干起的那种党的干部。共青团有共青团的系统，长期在其中工作就会对这个系统产生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留下某种政治群属的印记，工作时间越长、职位越高，印记就越明显、越深刻。谢米恰斯内选择的从政路径虽然很难说错了一一因为他毕竟沿着它走上了令无数人羡慕的高位，但他的政治身份上带有的共青团系统的印记，冲淡甚至磨掉了与生俱来的地域上的痕迹，在他在团的系统中获得政治利益的时候，他也无形中失去了许多别的、也许会给他带来更大利益的机会。

明白了谢米恰斯内选择的政治路径，也就很容易明白了他的政治靠山或曰政治提携人，为什么不是出生在同一个州的勃列日涅夫，而是团的系统中的老上级亚·尼·谢列平。谢米恰斯内与谢列平之间的关系，只说一点就足以让人清楚了：1958年11月，谢列平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时，他让谢米恰斯内继任自己的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1959年4月，谢米恰斯内又当上了谢列平曾经当过的党中央机关工作部部长，而1961年11月，当谢列平被选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不得不离开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广场附近的克格勃总部大楼时，谢米恰斯内接踵而至，再次成为老上级的新的继任者。这样一来，克格勃这个能量巨大、令人生畏的机关，实际上是由谢列平的人控制着。而对已经当上党的领袖的勃列日涅夫来说，谢列平正是他潜在的、最危险的政治对手，他的权力地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谢列平比勃列日涅夫小12岁，天资聪颖，不到20岁就考进了在苏联公认是最难考的高等学院——莫斯科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他参加过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当游击队员，战前就从事共青团工作，并且由于讨得了赫

鲁晓夫的欢心，在政界步步高升。1961年，43岁的谢列平成为最年轻的党中央书记，一年后，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苏并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录监祭委员会主席。这样，他就成了除赫鲁晓夫之外，惟一个脚踏党中央书记处和部长会议这两个党政最高职能机关的人。尽管如此，谢列平并不是真正的“赫鲁晓夫分子”，如前所述，在推翻赫鲁晓夫的密谋中，曾受赫鲁晓夫大力栽培的谢列平，是主要策划者之一，并进行了积极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自认为同时也被许多人一致认为是强者的谢列平没能接替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位，而让勃列日涅夫得了去，他和他的支持者自然不会甘心。既然有了这种情绪就难免不流露，1966年6月，谢列平率代表团到达乌兰巴托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蒙期间，他的一个密友在泽登巴尔面前说，真正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应该是谢列平，并且暗示谢列平当第一书记是早晚的事，兴致所至，这个谢列平的拥护者兴高采烈地唱起了《奔向伟大的目标》这支歌。泽登巴尔迅速将此事通报给了莫斯科，可想而知，这个消息对正在小心翼翼巩固自己地位的勃列日涅夫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聪明过人的谢列平回国途中特意在伊尔库茨克停留，借在州党委会议上发表讲话之机，有意强调了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但为时已晚，他终于“露馅”了，让那些原来对他存有戒心的领导人们，对他更加小心提防，而勃列日涅夫也获得了应削弱谢列平地位及影响的有力的“证据”。在与谢列平进行的较量中，勃列日涅夫深知，像克格勃这样的机构掌握在谢列平的人手中，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要想削弱谢列平的地位、影响，必须打断谢米恰斯内这根支柱。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勃列日涅夫一点都不糊涂，而且一旦机会到来，他也干得雷厉风行。

在正面进攻机会尚不成熟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也善于使用迂回前进的办法。1966年7月26日，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发表公告，宣布成立社会治安部，以“保障对社会治安机关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中的活动进行统一有力的领导”。虽然名称不同，但人们还是把它看成是1960年初被撤销的内务部的恢复。社会治安部的建立无疑要接管一部分克格勃的职权，如果不说是对后者的一個削弱，至少也是一种牵制，因此，它的部长人选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很可能是一场激烈的斗争，9月17日，原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尼·安·谢洛科夫被任命为该部部长。这是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胜利，因为这个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卫国战争前夕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跟随勃列日涅夫到摩尔达维亚工作的新任部长，是总书记的又一个心腹。

同年年底，谢列平的权力受到第一次冲击：由他担任主席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被撤销，同时又撤销他兼任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谢列平不仅被赶出了政府机构——部长会议，而且又丧失了对党和国家高级官员进行监督的合法权力。谢列平地位的动摇，使勃列日涅夫等人有机会对谢米恰斯内的克格勃实施“外科手术”了。1967年3月，一个偶然事件，为进行“手术”提供了依据。当时，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那娃由谢米恰斯内批准后，前往印度安葬她去年年底在苏联去世的丈夫骨灰。然而由于苏联驻德里使馆及安全机构工作人员的疏忽，斯维特兰娜成功地叛逃到了西方，一时间轰动了国际社会，使苏联政府非常被动。另外，几个月来，克格勃驻外机构频繁出事，有九名苏联人被指控为克格勃分子，被逐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希腊，这不能不影响到克格勃的声誉。而克格勃最高级领导人之一鲁

申科

少将的神秘死亡，更让人感到克格勃内部出了乱子。这几件事，谢米恰斯内都难辞其咎。1967年5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尤里·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解除谢米恰斯内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无论从哪方面说，当年52岁的安德罗波夫都不能算是与勃列日涅夫紧密相连的那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安德罗波夫出生在苏联东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毕业于当地的水运学校。

1936年至1944年间做团的工作，最高职务是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团中央第一书记。然后转入党的系统工作，当过市委书记、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1951年，他被调入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两年后又派往匈牙利任大使，其间因处理匈牙利事件得力而受到赫鲁晓夫重视，1957年调任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并从1962年起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政治关系上，他与老资格的政治家、芬兰共产党创始人奥·威·库西宁更密切些，后者从1952年起就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7年又任苏共中央书记，直至1964年逝世；而从修养和气质上，可能更接近苏斯洛夫，并且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之间有过默契的合作。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他成为党的领袖后，安德罗波夫从联络部长职位与他配合得不错。最典型的，就是在准备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报告时，他出的主意让勃列日涅夫顺利地避开了敏感的斯大林问题，从而使力求稳妥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绕开了一片可怕的政治“雷区”。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不像谢米恰斯内和谢洛科夫那样，具有明显的政治集团属性，因此他也就容易为力求保持力量平衡的最高领导层所普遍接受。在

成功地把自己的心腹安排在社会治安部长的职位上后，勃列日涅夫恐怕也感到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再让别的心腹去接谢米恰斯内的班。他这时还必须照顾其他政治力量。既然不能安排心腹，他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信得过的人。安德罗波夫符合这个条件。

当然，政治家都懂得，政治上的信得过，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为保险起见，勃列日涅夫还是利用克格勃大换班的时机，在安德罗波夫身边安插进自己的人。于是，和勃列日涅夫家人沾亲的谢·库·茨维贡，被从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委员会调来，出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1950年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历任该市市委书记、第一书记、之后又当上该州州委书记的维·米·切勃里科夫，也从勃列日涅夫的家乡来到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先任干部局局长，一年后升任克格勃副主席。而总书记的另一个同乡、也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也当过该市市委书记、与前者并肩解放罗马尼亚、匈牙利的格·卡·齐涅夫将军，自1953年就来到克格勃总部，1970年7月，也终于成了它的副主席之

鲁申科在克格勃中负责军队安全。1967年5月19日《红星报》刊登讣告，说其“在执行公务时不幸身亡”。按常规，将军去世一般都要配发死者照片，但此次未登照片，而且讣告落款是“一群同志”、这也与众不同。

西方许多人都把安德罗波夫视为苏斯洛夫的门徒。然而据非常接近前音的布尔拉茨基说，苏斯洛夫早就不喜欢安德罗波夫了，怀疑此人觊觎他的位子。而当时另一个实权人物柯西金，由于想尽快恢复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因此也希望把曾积极参与攻击中共的安德罗波夫从主管与外国党关系的联络部部长位置上调走。

一。

就这样，勃列日涅夫利用掌握的权力，借助已形成的政治力量平衡，耐心等待并充分利用每次机会，慢慢地把自己的同乡、同学、故交、战友中那些在政治利益上与他密切相连的人，提拔、安排到党、政、军、警系统中的各个重要职位上，从而编织起了自己的关系网，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势力，即人们常说的“第聂伯帮”。不要小看这个帮的影响和作用，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央部门的领导，他们掌握着巨大权力，可以集中使用自己权限内的所有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现在获得的职位不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是上级任命的，因此他们的各种既得利益就都只与上级有关系，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让他们获得现在职位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道理足以让他们为维护自己的政治靠山不遗余力、不借代价。

还要说明，结成政治帮派，并非勃列日涅夫的首创。从苏联政治史上看，派别问题一直是个客观存在，只不过各个时期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除了“第聂伯帮”外，也还有其他的政治集团存在，它们在与“第聂伯帮”并存过程中也免不了发生磨擦和冲突，甚至威胁和排挤了后者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无疑会增加“第聂伯帮”的危机感，提高他们维护集团利益意识和“自觉性”。上述两方面不管从哪方面讲，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固了勃列日涅夫的统治基础。

第十章 1968 年：不流血的入侵

60 年代的后 5 年，国际社会动荡不宁，危机迭起。美国的侵越战争逐步升级，不仅恶化了东南亚地区局势，也使美、苏、中等国的关系复杂化了。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执，终于导致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而中印两国关系上持续不断的磨擦，都使印度次大陆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阿拉伯各国与以色列的旧怨新仇，终于酿成了战后第三次中东战争。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中苏两党、两国间由意见分歧到关系破裂、再到兵戎相见，已不复存在；东欧各国的改革尝试，引起对这些国家发展方向高度警觉的苏联的激烈反应：苏军坦克和华沙条约国部队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要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在爆发危机的情况下，接受对他们处理国际问题能力的考验。

执政之初，勃列日涅夫并不是苏联外交舞台上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不仅远不及时常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赫鲁晓夫，而且他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甚至不如从事国务活动比他早得多的柯西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许勃列日涅夫还有别的考虑，譬如说要首先巩固自己党的领袖的地位，集中精力解决能够决定一切的干部问题等，他必须接受在对外事务上，与柯西金以及后来当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波德戈尔内平分秋色的现实。这与 70 年代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外交舞台上绝对第一主角时，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上述三个人之间有所分工的话，最可能的是：作为苏联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主要负责与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在该党在该国为执政党时，党际间关系与国家间关系很大程度上合二为一了。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初几年中，他出访的国家几乎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其原因大概就在于这种分工。相反，柯西金主要负责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波德戈尔内则更多地去“光顾”第三世界。不过，这种分工并不绝对，作为苏联党、政府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既需要协调行动，也需要相互“补位”。在重大的外交活动中，常常是“集体亮相”，以示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致与团结。

在苏联新领导人中，柯西金的国际声望最高。他所担任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也使他可以更“名正言顺”地代表苏联政府参与国际活动、处理国际事务。这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国际知名度。其中，出面调解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使柯西金一度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克什米尔是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简称，该地区面积 22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500 万，其中穆斯林占 77%，印度教徒占 20% 左右。由于 1947 年按“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巴分治时，对该地区的归属未作出明确规定，巴基斯坦以“蒙巴顿方案”倡导按宗教原则划分为据，认为该地区穆斯林占多数，故应划归巴基斯坦；而印度以该地区的土邦王和议会赞同加入印度为由，坚持此地区应属印度。于是双方从此争执不下，并屡次演成武装冲突。1965 年八九月间，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再次发生冲突，并逐渐升级，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切。为了增加自己的力量，印巴两国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寻求支持。9 月份的前 20 天中，安理会先后通过三个决议，要求双方停火。9 月 17 日，柯西金代表苏联政府，自愿为解决印巴冲突进行斡旋。1966 年 1 月 4～10 日，应柯西金的邀请，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到苏联乌兹别克的塔什干，在柯西金主持下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署了声明结束印巴冲突的《塔什干宣言》。尽管这一纸宣言并不能最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但

能让两个敌对国家的首脑坐在一起并在共同宣言上签字，从而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应该说还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成功。虽然，印度总理因心脏病发作在宣言签署的第二天逝世于塔什干多少给这次成功的外交活动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柯西金所起的作用在全世界有目共睹。同时，这又给了柯西金另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与美国人对话。在新德里参加夏斯特里葬礼时，他与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国务卿腊斯克举行秘密会谈。据汉弗莱几天后发表电视谈话时透露，双方认为美苏关系能够改善而且应该改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柯西金是苏联对外政策第一发言人的印象。

第二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柯西金的作用得到再次证实。当苏联支持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即埃及）、叙利亚、约旦在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突然袭击之下，形势岌岌可危之时，柯西金首次启用美苏之间的热线，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苏联政府愿意为中东停火而努力，希望美国也能对以色列施加同样的影响。在整个中东危机期间，苏联和美国通过热线交换意见，互通情况，苏联这边唱主角的都是柯西金。6月16日，即双方同意停火后的第六天，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到美参加联合国讨论中东问题的特别紧急会议。在美期间，他与约翰逊总统在葛拉斯堡罗市两次会晤。这是自1961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总统维也纳会晤后，美苏两国首脑的第一次会谈，也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因而柯西金的美国之行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苏美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中东局势、越南问题、防止核扩散问题及苏美关系问题。从会晤后约翰逊和柯西金向新闻媒介发布的消息看，成果极其有限，用柯西金声明中的话说，“双方就中东局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对越南问题的立场双方“有深刻的分歧”，取得的共识是“更快地就缔结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达成协议是重要的”。

中东危机期间，勃列日涅夫也按照新领导班子的内部分工，对这一突发事件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在二十三大上已经初步确立了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勃列日涅夫，不甘心仅作为一个旁观者了。以色列发动战争后的第五天，苏联、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八国党和政府领导人齐聚莫斯科，由勃列日涅夫主持进行紧急磋商，并就中东局势发表了一项七国领导人签署的声明，坚决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并表示将给予后者必要的援助。此外，苏联提出的与以色列集体断绝外交关系的建议，也为七个签字国领导人接受。由勃列日涅夫组织的这次集体行动，尽管不能说圆满成功，至少让勃列日涅夫有机会验证了一下苏联的号召力以及在关键时刻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除了罗马尼亚领导人外，包括一向以奉行独立政策、敢于“顶撞”莫斯科闻名的铁托在内的其他东欧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中表现一致，无疑会增加勃列日涅夫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经验与信心。14个月后，当他为制止“布拉格之春”的进程而不得不再次寻求东欧各国共同行动时，这种经验与信心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柯西金抵达美国后、与约翰逊首次会晤之前，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在为期2天（6月20—21日）的全会上，主要议程就是两个内容：一是关于苏联对以色列在近东的侵略的政策；二是审议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提纲。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就第一个问题向全会作了报

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和毛雷尔出席了会议，但未在声明上签字。

告。全会通过决议。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制止以色列侵略，支持遭到进攻的阿联、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防止侵略的危险后果，保卫普遍和平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进行的实际活动”。指出以色列的侵略，“是最反动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首先是美国玩弄阴谋的结果”。重申苏联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援助阿拉伯各国人民坚决回击侵略者”，“扑灭近东的战争火源”。同时还特别说明，苏联党和政府的立场及其针对近东事态采取的措施“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完全拥护”，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行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斗争的强大因素”。

熟悉苏联历史的人对一种现象恐怕都不陌生，即在官方正式发表的文件中特意说明或是强调的问题，恰恰表明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内部斗争，细心的读者发现，在发表的六月全会《关于苏联对以色列在近东的侵略的政策决议》中，特别提到全体苏联人民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态度，绝非偶然。这不仅说明苏联党和政府对分布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立陶宛等地的 50 余万犹太教徒并非完全放心，而且更意味着在党中央内部就这一问题存在分歧。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切了解这种分歧的程度和各方面的具体主张，但六月全会后的重大人事变动却为印证上述分歧提供了很好的证据。第一个重大人事变动发生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戈·叶戈雷切夫身上，6 月 27 日，他被解除职务，由当时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维·瓦·格里申接任。1989 年，《星火》杂志发表了叶戈雷切夫的谈话录，如果这名 69 岁的老人所谈可信的话，那么他的去职主要是由于他在六月全会上激烈批评了政治局在处理近东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近东的这场战争使苏联国内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都有所增长，而党却没有对整个民族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在国内民族关系复杂化并在有些地方发展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却视而不见，假装一切正常。同时，他还对某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包括早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就被树为样板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出激烈批评，说他们在对外政策和利用苏联的帮助上不坚定，而且不负责任。这就等于指责苏联的整个近东政策犯了根本性错误。不管叶戈雷切夫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批评，其矛头所指自然包括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以及身在美国没能参加全会的政府首脑柯西金。由于同时得罪了两个最有权势的人，叶戈雷切夫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觉得，既然事已至此，与其消极等待别人“处理”，不如主动提出辞职。于是，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便来找勃列日涅夫，开门见山地说：

“我清楚，只有在得到政治局和党的领导支持时，才能领导莫斯科党组织。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了这种支持。因此我请求同意我辞职。”

勃列日涅夫说：“你用不着自己瞎紧张。再考虑一天吧。”

第二天，叶戈雷切夫又来找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见到他后问道：“噢，怎么样？睡着了吗？”

“睡着了。”叶戈雷切夫回答。

“那怎么决定的？”

“我像昨天说过那样决定的。”

“噢，好吧。你有什么要求？”

“只有一个要求：我要工作……”

“别着急，你会有工作的……”

四个月后，叶戈雷切夫被任命为苏联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副部长。

又过了八个月，他成了苏联驻丹麦大使。他的最后一个公职是苏联驻阿富汗大使。

另一项人事变动涉及那个精力充沛、总给人一种野心勃勃感觉的谢列平。他是政治局中主张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的代表。他的立场也许得到军方的支持，或是代表了党内国内一种郁积已久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由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直至越南战争已经越来越强烈了。他们觉得，虽然苏联目前还不宜与美国直接冲突，但教训一下它的走狗以色列还是完全应该而且不难办到的，何况，对以色列恨之入骨的阿拉伯各国根本不需要苏联士兵去冲锋陷阵。大概是“吃透”了上边的精神，谢列平——之后是谢米恰斯内——培养出来的克格勃工作人员，通过驻中近东各国外交机构，向莫斯科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阿拉伯国家如何团结一致，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它们的军事实力如何强大，战争准备如何充分等方面的情报。事后看，这些情报并非准确真实。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夕，苏联情报部门为以色列故意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致使阿联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也丧失了生死攸关的时机。这对久经考验的苏联情报部门来说是个莫大的耻辱，也把苏联置于一种被动尴尬地位。对此，谢列平难卸其责。从逻辑上看，是很清楚的：如果不是以他为代表的强硬派力促，纳赛尔可能不会“冲昏头脑”，苏联也不至于卷入得这么深；如果不是他和其亲信培养的克格勃这样无能，即便是苏联卷入了也不会落得如此难堪和被动。尽管谢米恰斯内在这场战争爆发前就失去了克格勃主席的职位，但若把这笔账算在上任刚刚六个星期的安德罗波夫身上是不公平的。如果说对谢米恰斯内可以不再追加处罚，那么作为他的前任和政治提携人，谢列平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当然，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谢列平的“处理”，不能跟叶戈雷切夫一样，前者毕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的代表。1967年7月11日，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举行全体会议，鉴于格里申已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选举谢列平为中央理事会主席。虽然苏斯洛夫到会并强调苏共一贯认为“联合了8000万人以上的最富有群众性的劳动人民组织——苏联工会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但人们马上猜到谢列平将很快丢掉书记处书记一职，因为格里申当工会主席时就没有担任此职。果然，两个月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谢列平被免去了书记处书记职务。这意味着他开始从政治顶峰上走下坡了，从政治舞台的中央，退到了一个灯光较暗的角落，尽管还没有被赶下台——为了保持某种政治平衡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可是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光彩照人了。

这次中东危机，如果说给苏联新领导人上了一课的话，那么他们从中学到的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如何正视现实，如何在冒险不成的情况下及时寻求避免激化矛盾的方法。但是，假如谁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新领导人容易驯服，甚至比他们的前任更加软弱可欺，那就错了。他们可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妥协退让，但却不会就此屈服。他们会耐心而谨慎地积聚力量，寻找时机，准备在原地或是别的地方为自己挽回面子，补偿损失的利益。

中近东爆发的这场危机，对苏联领导人固然是一个严重事件，但它比起一年以后，即1968年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苏联的震动以及引起后者的反应，就逊色许多了。毕竟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发生在距苏联几千公里之外，而捷克斯洛伐克就在苏联的家门口。阿以之间的胜负如何不能说与苏联的利益毫无关系，但就当时而言，它对苏联的影响还没有达到危险的程度，也就是说它未让苏联领导集团普遍感到已经威胁到了苏联的根本利益，

因此必须不惜代价做出强烈反应。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不同了。在这里，苏联领导集团，而且还包括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正是感到上述威胁，因而做出了与阿以冲突时完全不同的反应。

捷克斯洛伐克地处东欧中心地区，东与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接壤，南与匈牙利、奥地利为邻，西边与当时的两个德国交界，北面是波兰。这样的地理位置首先决定了它内部的任何重大变故都不会被它的邻国仅仅当成孤立的事件看待。作为一个由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的发展中受到苏联的强大影响，并最终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从此，它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就不仅是地理上的了，而是加进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在“冷战”时期，这些因素被以各种方法和形式不断强化，使之成了最敏感的内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所以引起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应，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触及了那些最敏感的内容。

事件的起因在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一部分人倡议对现有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早在6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就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状况，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率下降到4.5%，1963年继续下降到0.54%，而到1965年结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统计结果显示，这是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五年计划。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以捷共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为首的领导集团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扭转形势，尽管成立了以经济学家奥塔·希克为主席的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并且制订出向市场机制过渡的改革方案，但由于缺少像诺沃提尼这样实权人物的支持而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经济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各种矛盾激化，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反映到党内，使党内斗争日趋激烈。1967年10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会上以斯洛伐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一批人，指责诺沃提尼保守、经济改革不力、政治上不民主等。会后国内党内要求诺沃提尼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诺沃提尼看到形势于己不利，便与苏共中央联系，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出面为自己保驾。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特别是党际间关系是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于是，12月8日，勃列日涅夫赶在原定于1968年1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之前，飞抵布拉格。

勃列日涅夫的到来至少没有帮上诺沃提尼的忙，如果不是相反的话。在同捷共领导层中多方面人士接触后，勃列日涅夫发现诺沃提尼不可救药，或者说不值得为维持他的地位花费精力了。据说，勃列日涅夫来之前曾问过主管捷克斯洛伐克事务的助手，谁是捷共的第二把手，显然，总书记已经准备了实在不行就“换马”的方案。当他实地感受到诺沃提尼确实不行之后，丢下一句“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便回了莫斯科。反对派从这句话中读出了希望和支持，诺沃提尼则从中尝到了遭到冷落，甚至比这更苦更坏的滋味。

1968年1月初，捷共中央全会解除了诺沃提尼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杜布切克接任此职。但诺沃提尼仍是共和国总统。二三月间，两起突发事件震惊了捷克斯洛伐克：一是捷军队中的捷共党委书记谢伊纳少将叛逃意大利，一是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这两人都与诺沃提尼关系密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诺沃提尼于3月21日向国民议会提请辞去总统职务。结果，国民议会接受他的辞职同时，捷共中央也接受了他辞去主席团委员职务的请求。

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事变，引起苏共中央的关切。3月15日，苏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捷国内形势。会上，有的与会者对捷国内形势表示忧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曾在 1956 年在布达佩斯经历了匈牙利事件的全过程，所以比别人都更为敏感和紧张。他忧心忡忡地说。

“情况确实很严重。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干的，从形式到方法很像匈牙利。……匈牙利也是这么开始的，然后第一、第二梯队就跟上来了，最后是社会民主分子。”

政治局觉得应该给捷共中央主席团发去一封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自己的担忧的信件。苏共中央书记、党中央国际部部长鲍·尼·波诺马廖夫建议，在信里要“说明他们那儿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开始嚣张了，说明所有这些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这点要说得更明确更详细。……要在信中说明，他们与联邦德国坐在一起了。”

勃列日涅夫是政治局中少数几个在杜布切克上台前接触过他的人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勃列日涅夫那句名言“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杜布切克可能还当不上第一书记。因此一定程度上说，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负有责任。但勃列日涅夫毕竟对这名新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缺少更深的了解，与其说他同意捷共领导人“换马”是因为他对杜布切克的信任，不如说是由于对诺沃提尼的失望，然而杜布切克几个月的表现，的确难以让苏联领导人满意。

“对杜布切克的希望被证明是不对的，他可能会栽下来，因为他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束手无策。”勃列日涅夫说道。但他又极力开脱自己的责任：“他们让诺沃提尼下台，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撤换了检察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着是罗姆斯基，然后就是杜布切克的问题了。”

会议当中，勃列日涅夫给布拉格的杜布切克打了电话，杜布切克丝毫没有灰心丧气，他反倒安慰勃列日涅夫：

“不论是布拉格还是国内，都没发生任何事件……我们将能控制我们这儿发生的事件。”

此后几天中，勃列日涅夫通过电话与杜布切克多次交谈，后者仍然试图使前者相信：一切都很平静，事件不会闹到大街上。但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的话不大相信，而且他从种种迹象中发现了更不妙、更危险的信号，在 3 月 21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道出了自己的发现：

“各种集会、会议和活跃分子中有许多具有反苏的苗头。越来越明显了，不是捷共中央，而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希克和其他受冤屈的人左右着这些事件。显而易见，他们顽强地决定，或者说基和某些苏联忠诚的好朋友们。”

不过，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把杜布切克赶下台，他知道在捷国内形势已经不稳定、危机一触即发的时候，一次不慎重的行动，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当杜布切克请求他不要把苏共中央拟就的信发往捷共中央以避免使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利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答应了。

政治局其他委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不过，总的基调都不怎么乐观。柯西金觉得杜布切克这个人思想有点混乱，不稳健，看问题很幼稚。例如，当有人问杜布切克他对军队怎么办时，杜布切克回答说，军队里一切正常，因为绝大多数师的指挥员都是我的熟人。问他现在在主席团里依靠谁，他说：讲实话，我也不知道依靠谁。柯西金说了自己的感觉：“我看，捷克斯洛伐

克正准备着匈牙利式的选择，但他们现在还害怕实现这种选择。”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变尤其警觉，因为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惟一的边境线就在乌克兰，换言之，捷克斯洛伐克的风吹草动，乌克兰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首当其冲。而且据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变已经对乌克兰的局势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这个脾气很大的第一书记言辞格外激烈：“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必须更主动地利用和寻找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力量。同时，应该保持我们机关的稳定，应当更主动地进行这项工作。在军事方面也应采取措施。”谢列斯特的主张，尤其是最后一点，得到安德罗波夫的赞同。谢列平则提醒与会者注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给苏联，特别是对大学生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的后果。书记处书记索洛缅采夫亦有同感。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也让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感到不安。他们纷纷向苏共中央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示了对目前形势的忧虑。鉴于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东欧各国内部都面临着类似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及政治问题，这些领导人和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串在一条丝线上的珠子，不论丝线从什么地方绷断，他们都会相继滑落。他们要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因此希望苏联采取措施扭转捷克斯洛伐克形势。但他们又都提不出扭转形势的具体建议。于是大家同意进行一次会晤，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

3月23—24日，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日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六国党政领导人及其随行人员，在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进行了会晤。会晤的中心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各国领导人纷纷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对它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遇到的危险表示担心，但杜布切克千方百计使与会者相信，捷国内形势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糟，从共产主义事业的角度看，现在的形势并非不利。尽管在短短的一天会晤中，与会者对杜布切克等人的解释仍然将信将疑，不过塔斯社发表的公报上说：“与会者表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将……保证该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德累斯顿会议后，在捷共中央4月5日结束的全会上通过了充满改革精神的《行动纲领》。在这份长达63页的纲领性文件中，在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发扬党内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国家体制、工会作用、干部政策、经济体制以及对外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设想和措施，构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社会主义在纲领制定者看来，将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民族问题上公正的社会主义”、“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拥有现代化文化基础的社会主义”。总之，从纲领中不难看出，捷共中央领导人决心已定：“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非常明显，这种试验的过程，就是突破苏联模式的过程；而新的形式一旦确立，那又将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强大冲击和挑战。

5月4日，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共和国总理切尔尼克等党政领导人来到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九个多小时。看来，这次会谈给勃列日涅夫留下的印象并

不好，特别是杜布切克让他越来越不放心了。在5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向与会者通报会谈情况时，道出了他的担心：

“每当回顾与杜布切克同志最初的几次谈话，包括我在布拉格与他的交谈和以后几次交谈后我们关系的各个发展阶段，就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他故意说一套而做相反的另一套，尽管他说得含糊其辞。”应当说，勃列日涅夫的感觉还算准确，杜布切克后来曾谈到他对付苏联人的策略：“当勃列日涅夫对我大声喊叫时，我只是竭力对他微笑，说‘是的，是的’，而回来之后，我什么也不执行。”在参加会谈的其他人谈了他们各自的感受并进行讨论后，勃列日涅夫得出结论，有必要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以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施加压力。有人担心在目前形势下，派去军队会在资产阶级和捷克斯洛伐克舆论界引起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屑一顾地说：“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第一位的。然而我们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此后谁也别想和我们开玩笑了。”同时，他还告诉他的同事，在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军事委员会上讨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具体措施，这些步骤的第一步，是向捷克斯洛伐克建议，派以科涅夫和莫斯卡连科元帅为首的20—25名元帅和将军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胜利纪念日活动。

政治局里没人对勃列日涅夫的结论提出异议。不过，德·斯·波利扬斯基补充建议，其他华沙条约国家也应同时出兵。谢列斯特马上附议，提出应该把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叫到莫斯科来，而军事演习一事应尽快开始。

5月8日深夜，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领导人聚集到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一起进行了会晤。杜布切克没有接到邀请，这就间接证明这次紧急会晤讨论的问题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会晤中，苏联提出了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施加影响的想法，包括实行军事干涉。第二天，是捷克斯洛伐克由苏军解放23周年的胜利纪念日。首都布拉格照例到处挂满红旗和巨幅红色标语，其中不少写上了感谢苏联红军的词句。与往年不同的是，聚集在比尔森美军战士纪念碑遗址前的捷克人似乎更多，政府也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美国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也许只是承认了一个事实，但选在这样一个时刻，配合着国内那样一种气氛，足以让苏联不高兴了，据当时驻布拉格的《纽约时报》记者塔德·舒尔茨观察，无论是在官方组织的庆祝活动上，还是观看露天剧场的演出时，科涅夫元帅及随行的将军们都紧闭嘴唇，面无表情。紧接着传来的消息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大为紧张，经过核实的信息确认，在接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附近的波兰领土上，苏军正在调动。这一消息与华沙条约各国背着捷克斯洛伐克人召开最高首脑会议的消息合在一起，更让人有理由相信，已经准备要对捷克斯洛伐克下手了。而5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担心。

格列奇科率领的代表团在布拉格机场降落不到6小时，柯西金的座机也在这里降落了。对柯西金的来访事先苏方没有透露一点消息，只是在他的座机已经起飞之后才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弄得措手不及，电视台第一次报道说苏联总理是来“短期休假和治病”的。一小时后，捷通社发表公告，他是应捷共中央的邀请来访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不知

道在前一天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就柯西金此次出访的问题

进行了讨论，当然也就不清楚苏联总理的真正目的。实际上，在 5 月 16 日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焦点在柯西金是否要与杜布切克会见上，因为这个问题与要不要继续给予杜布切克政治信任联系在一起。同时，还讨论了在捷共中央中谁属于“健康力量”，要不要与这股力量全面接触等问题。勃列日涅夫在综合讨论意见时说，最好不与杜布切克会见。应当在出兵进行演习上取得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同意，但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需要另外作出关于出兵的决定”。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报纸上借用格林童话画的漫画中，把柯西金画成暂藏凶相的大灰狼、杜布切克是童稚未退的小红帽，并且注上“小红帽，你的童话结束了”，柯西金在 5 月 27 日向政治局报告他捷克斯洛伐克之行结果时，还是得出了比较客观、中肯的结论，与他不久前离开莫斯科时完全不同，因而让政治局里的同事们惊诧不已。其中最重要的是，“目前除了现在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外，没有其他力量能控制局势”。而“在目前形势下，在党内和国内，没有比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沃博达 更有威信的人了”。这实际上否定和推翻了以前政治局关于寻找捷克斯洛伐克“健康力量”取代杜布切克的设想。柯西金还对他接触过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逐个进行了评价，其中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评价最高，说他具有非常坚定的原则立场。这个评价引起勃列日涅夫的注意，也使他对撤换杜布切克有了新的想法。

6 月 4 ~ 15 日，斯姆尔科夫斯基率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这是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捷的回访，因此是早就安排好的。斯姆尔科夫斯基率团前来，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在代表团访问结束、即将回国时，勃列日涅夫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大家在友好气氛中交谈了大约一小时，然后勃列日涅夫请斯姆尔科夫斯基单独留下来谈一谈。后者在回忆录中对这次谈话作了如下记述：

我留下来了。我们的大使考茨基不在场，苏联方面也没有第二个人在场，只有我与勃列日涅夫两人。他根据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几次谈话的精神，再次对我国局势的发展表示担心和不满。在那里，他还谈到领袖问题。在谈到杜布切克同志的个人经历和党的工作经历时，他对选举表示不满。他的意思大概是，杜布切克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与此相反，他以完全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谈论我。他请求原谅，说苏联领导人在这几个月里对我很不了解，他大概是指德累斯顿会议和哈格对我的攻击。这样，我就被他的花言巧语感动了，我原谅了他们。我说，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这是由于不了解情况造成的。他说我是个老人了，献身党的事业已经快 40 年了。他这样提出问题，好像是让我出来负责，使我国的局势按照他们的劝告和后来在 8 月份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的精神来发展。

勃列日涅夫的话大大出乎斯姆尔科夫斯基的预料，让他吃惊不小。他知道，苏联领导人是想在背后搞掉杜布切克。对于一个杜布切克体现的那种改革精神的积极支持者，在如此关键的时期，斯姆尔科夫斯基没有别的选择。他明确但又尽量用缓和的语气对勃列日涅夫说：

“形势发展很快，一下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杜布切克能控制局势，他

卢德维克·斯沃博达于 1968 年 4 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名 1895 年出生的职业军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率领由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组成的部队与苏军并肩作战。1944 年 10 月后，他率领部队参加了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并与当时也在这一方向上作战的第 18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相识。

能够成为一个党的真正的领袖。”

勃列日涅夫见他这么说，也就没有再坚持。

6月下旬，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估计更坏了。先是受到苏联点名批评的捷共中央书记齐萨日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回击性的文章，重申捷克不能把苏共经验当做马克思主义政策惟一可能的方针，不想重复过去几乎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政治灾难的错误和过失。这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捷共要走自己的路，不想盲目地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意图和决心。由于齐萨日在捷共领导集团中的地位，苏联领导人深信，这不是齐萨日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包括杜布切克在内的捷共中央的观点。更让苏联不能容忍的是，6月27日，捷《文学报》等4家报纸，发表了作家卢·瓦楚利克执笔的一份致“工人、农民、职员、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及所有人”的声明。这份后来被简称为“两千字声明”的文件，坦率地提出了对捷共、对改革事业、以及对国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看法，其中不乏尖锐犀利的批评和溢于言表的忧虑。虽然声明中的一些语言富于煽动性，但它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智。但是，正像许多类似的文件一样，它的词句含义站在不同角度、怀着不同心情，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比如，声明中说共产党曾在战后赢得了人们的很大信任，但党以后却官僚化了，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对那些目的不纯、品行不端的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涌入党内的结果，是使党的性质和作风受到影响，渐渐地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些话可以理解为是对党的一种批评，目的在于使党通过整肃，变得如同以前一样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它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实际上号召抛弃党的领导。再比如，作者对国外势力干预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务的可能性表示不安，表示不应首先去冒犯别人，但在需要的时候，要支持政府，“甚至于拿武器来支持它”。这些话反映了作者一种忧患意识和一种献身激情。然而在那些本来就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深感不安的人看来，这样的言辞，不啻吹响了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冲锋号了。

据《真理报》提供的消息说，苏共中央对这一声明深感不安。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的正式宣言，提醒他注意，这个声明会促使反革命活动进一步活跃。杜布切克回答说，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苏方的提醒将会受到极大重视，将为此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杜布切克这次没有食言，在召开主席团会议后，6月27日当天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了一份特别声明，谴责了“两千字声明”，说它是反革命的号召，是对整个民主化过程的明显威胁。

“两千字声明”使苏共领导层内主张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干涉的人，再次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在7月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等人主张趁华沙条约国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军事演习刚刚结束、苏军尚未撤离的时候，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进行干预。葛罗米柯甚至提出：“不进行武装干涉我们就无法对付了。”他的意见得到柯西金的赞同。勃列日涅夫倒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他并没有顺从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而是主张继续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他对政治局的同事们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准确地搞清楚，我们在评价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是否会出差错，我们的所有措施都取决于此。”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勃列日涅夫同意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捷共中央主席团发去一封信，讲清对捷国内形势的关切和不安。同时，他

还与华沙条约国的其他领导人联系，建议他们采取同样步骤。另外，哥穆尔卡同意在华沙召开由苏、波、保、匈、民主德国和捷六国党的领导人的共同会议，可以当面对杜布切克等人施加影响。

很快，苏、波、保、匈和民主德国五国党中央向捷共中央主席团分别发去信函，表示他们对捷国内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关切与忧虑，建议捷共中央能派代表参加拟于7月7日在华沙举行的共同会议。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五国来信后认为，目前不宜举行共同会议，最好由捷共领导人在近期先与兄弟党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而且鉴于捷国内局势，捷共中央领导人不可能离开本国参加会晤。在五国党中央再次敦促后，捷共中央主席团一方面再次请求“谅解”，一方面向苏共中央表示：愿意立即先同苏联领导人进行双边会晤。

尽管缺少了捷克斯洛伐克，五国党政领导人还是在7月14—15日来到华沙，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与会者拟就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捷共中央主席团：

我们深信，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对你们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进攻，有使你们的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从而危害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

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已经不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

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深信，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基础的威胁正在危害着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切身利益，这样的局面已经出现了。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这样的词句，就不单单是对捷共中央领导人的提醒了。它是一种散发着火药味的警告，是板起面孔摔在你面前的最后通牒。然而，捷共中央并未屈服和就范。主席团17日向上述5国发去了复信，逐点驳斥了对捷共的指责，认为“没有任何现实的理由把我国当前的局势叫做反革命局势，没有任何理由说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直接危险……或者说存在着我国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具体危险”。同时对五国在捷共代表缺席情况下开会讨论捷国内形势及其捷共政策和活动的做法，表示了不满，说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起不了促进作用”。两天后，捷共中央召开全会，在讨论主席团上述复信时，出席会议的88名中央委员一致无条件地赞同复信。此事让美国记者舒尔茨感慨不已：“杜布切克及其同事们在一个月以前无法做到的捷共内部的团结一致，竟在苏联的压力之下出现了。”

捷共中央的反应，多少出乎出席华沙会议五国党政领导人的意料，迫使他们对新形势做出判断。在苏共中央政治局7月19日会议上，有人认为到了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了。安德罗波夫甚至提出与捷共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也没必要进行了，因为很可能收效甚微。勃列日涅夫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捷国内的健康力量尚未向苏联寻求帮助，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要不要再继续施加政治影响？“我们是否把政治影响的所有方法都试验过了？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我们是否没什么可干了？我们在全体会议上声明，要采取一切我们能采取的措施施加政治影响。假如这一切都得不到相应的效果，只有到那时

我们就将采取极端措施了。”可见，总书记的态度仍然同月初一样：不主张马上采取极端行动，而是要继续对捷共领导施加政治压力。

总书记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但他们觉得，苏捷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应是施加政治压力的最后措施。因此，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继续对捷共领导施加政治影响的同时，也要开始秘密制定“极端措施”的具体计划，包括华沙条约国部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更换其政治领导人。同时，还拟定好了各种文件，如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革命政府名义发布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声明，告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书，等等。这样，苏联已经开始做了两手准备。

苏捷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双边会谈于7月29日至8月1日在靠近苏联的捷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一列从苏联境内开来的专车载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委员，换言之，除了波利扬斯基、马祖罗夫和基里连科三人缺席外，政治局所有成员都到会了。而另一列来自布拉格的专列则把捷共中央主席团所有11名委员送到这里。切尔纳，这座蒂萨河畔的默默无闻的小镇，突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并因此而被载入史册。来切尔纳之前，苏联一方为会谈进行了精心准备，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与会谈有关的问题，为与会者准备了会谈备忘录，其中明确提出了苏联的要求。当然捷共中央主席团也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原定会谈只进行一天，但是由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分歧太大，争论激烈，结果会议开了四天。种种迹象表明，到会议结束时，双方并未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对立情绪仍然存在，但苏联事先准备的几点要求，捷方还是答应了，其中包括某些人事安排、不允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和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等。同时还商定，两天以后，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举行苏、捷、波、保、匈和民主德国六党领导人会议。不过，8月3日举行的会期只有一天的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的问题。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也让人们看不出究竟是谁的主张占了上风。它一方面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尊重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基础上，声明各国党要考虑本国的特点和条件，要关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改进党和国家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共同规律、党的领导作用，不允许任何人离间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还特别提到，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政治局大部分委员，包括勃列日涅夫都到南方休假去了，莫斯科由基里连科主持工作。杜布切克就没有这样轻松了，他要准备定于9月9日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要应付随着改革而来的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问题，同时，他还要准备迎接两名至关重要的客人——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从一开始就没有参加莫斯科指挥下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围攻，相反，它们对捷克斯洛伐克所进行的改革，表示了难能可贵的理解和支持。铁托8月9日至11日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四天后，齐奥塞斯库也来到了布拉格。前者留下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的积极评价和对要干涉他国内政企图的警告；后者除了作出类似的表示外，还签订了捷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杜布切克身边一下子站出来两个支持他的朋友。这情形，让休假中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又平添了一层忧虑和不安。但这又很难算是杜布切克的错。惟一能够测试杜布切克是否“可靠”的办法，就是看他是否履行在切尔纳应允的那几点了。于是，勃列日涅夫从休养

地多次与杜布切克通电，询问他答应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8月13日，勃列日涅夫再次接通了杜布切克的电话。由于布拉格迟迟没有履行苏捷切尔纳会谈达成的协议，使苏联领导人大为不满，政治局里那些勉强同意勃列日涅夫靠施加政治压力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人，有理由对这样做是否正确、对杜布切克控制局势的能力表示怀疑了。尽管这种怀疑目前还不是针对勃列日涅夫的，但它明显地对总书记不利。因此，想必勃列日涅夫也心中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一开始便对杜布切克表示了不满：

“我们在政治局就你们的事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得出结论，有一切理由认定所出现的情况是对在切尔纳达成协议的破坏。我所说的协议是与你单独谈起的，是我们四个人会谈时产生的，它在我们党政治局和你们党中央主席团之间产生的。”接着，勃列日涅夫举出了捷方未按协议办的例子：“近两三天……报纸仍由恶毒诬蔑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撰稿人把持着。”为了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他把政治局搬了出来：“我的政治局同事们坚持要给你们就此问题提个醒，提出相应的照会，而我不能阻止我的同志们发这个照会。”

杜布切克还是尽量安慰勃列日涅夫：“我相当清楚，从来没有任何针对苏联、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我们开过了报刊工作者会议。会议对这些报刊记者不正确的活动进行了谴责。”

“萨沙，问题不在这儿，”勃列日涅夫虽然叫着杜布切克的爱称，但听得出已经相当不满了，“我们达成的协议不是说开个会……这应该有具体措施。要知道我们就别利卡纳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曾达成具体协议，别利卡纳必须撤掉。这是让大众传播机构恢复秩序的第一步。”

两人还谈到其他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不断指责杜布切克违背了切尔纳协议，后者则用诸如“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现在的情况与切尔纳会谈时不同了”等理由进行解释。但越解释越让前者觉得捷共领导人是在狡辩。最后，勃列日涅夫气急了：

“你清楚，对履行在切尔纳通过的义务的这种态度造成了全新的形势，显然，它迫使我们重新评价形势并采取新的独立的措施。”

杜布切克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但他没有退缩：“勃列日涅夫同志，请采取你们中央政治局认为是正确的一切措施吧。”

这句带有挑战味道的话，一定是极大地刺激了勃列日涅夫，他生硬地回答了一句：

“如果你这么回答我，那我应该告诉你，萨沙，这个声明是不严肃的。”

杜布切克掂出了勃列日涅夫这句话的分量，甚至能想象得出，电话线那一头苏共中央总书记紧蹙的两道浓眉和阴沉的脸，但他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收回自己的话，甚至不能示弱。但他还是对刚刚说过的话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

“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骗子，那就请采取你们政治局认为需要采取的措施吧。”

“当然，不得不采取——显然你也同意——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措施。”勃列日涅夫冷冷地说。

8月13日的这次通话，对以后事件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勃列日涅夫在三天后起草了一封给杜布切克的信，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整体上我形

成这样一种印象，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执行我们之间的协议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主动性和坚定性，所有这些协议对回击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右翼分子，对保卫捷共和在捷克斯洛伐克取胜的社会主义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莫斯科还指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契尔沃年科，让他把此信的内容告诉捷共中央内的“健康力量”即亲苏分子，并有意识地把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写信的消息散布出去，让他们向后者要求在主席团内通报信的内容。

又过了一天，即8月17日，苏共中央休假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悄悄返回了莫斯科，由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决议：

经过对最近几天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和事件的全面分析，以及对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向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在反对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中给予他们军事帮助的请求的研究，苏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最近几天的发展具有极端危险的性质。右翼分子依靠帝国主义反动派公开的和秘密的支持，准备实行反革命政变……考虑到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已经用尽了所有对捷共领导进行影响的政治手段，以迫使其回击右翼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已经到了采取积极措施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的时候了，因此一致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以帮助和支持。认为向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建议于1968年8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议并讨论上述问题是适宜的。

这份决议的通过，标志着苏联最高领导层最终下定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心。

8月18日，星期日，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显得比平常更加繁忙。短时间内，载着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党政领导人的专机，纷纷在此降落；然后，一队队由骑警拥送的车队风驰电掣地驶往克里姆林宫。华沙条约国党政首脑，确切地说，是准备参加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各国党政首脑会议将在这里举行。勃列日涅夫向与会者报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新情况，通报了前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议。之后，乌布利希、日夫科夫、哥穆尔卡和卡达尔分别就此讲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完全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结论。换言之，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得到了四国最高领导人的一致支持。第二天，在莫斯科老广场苏共中央所在地，召开了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及边疆区委、州委书记会议，向他们通报了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同一天，苏联有关部门向驻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驻联合国代表发出了相应指示，并审定了塔斯社声明文稿，说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是“应捷党和国务活动家提出的请求”，是“由于同敌视社会主义的外部势力相勾结的反革命势力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威胁引起的”。出兵行动就这样经过长时间酝酿、筹划和准备之后，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安排就绪了。

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8月21日午夜至次日凌晨，苏、波、保、匈、民主德国约25万军队，从北面、东北面、东面、南面以及空中，侵入捷克斯洛伐克。

入侵的军事行动组织得非常成功，五国军队在没遇到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力量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但成功的军事行动仅仅是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一个开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占领者不

得不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利局面，他们那些设想好的方案，在事实面前被粉碎了。打着前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旗号的军人们，发现他们远不像想象得那样受到热烈欢迎，相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消极的反抗，常常把他们置于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地。亲苏的“健康力量”也不如事先估计的那样有力量，靠他们组成革命政府的计划遭到失败。而最让苏联担心的原定于9月初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竟然在占领军的鼻尖底下提前在8月22日召开，更让入侵者感到失望，因为入侵之所以选在这时候进行，目的之一就是要赶在上述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一连串的失败，迫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适当调整计划，在极端措施之外，开辟一条政治解决问题的渠道，这就有了8月下旬苏捷双方的莫斯科会谈。

尽管这次会谈被人形象地称之为“刺刀下的谈判”，苏方在各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从会谈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上，可以看到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在谈判桌前的表现。这些表现也许暂时还称不上风格，不过熟悉一下它，对了解总书记这个既是个体、又不是个体的人的全貌，不会毫无帮助。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是在入侵后第一批以公开的正式身份抵达莫斯科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当8月23日当地时间下午1点他的座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时，这名老将军看到了弦梯旁站着的欢迎人群中，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全在其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从军乐队演奏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歌到通往市区的道路上悬挂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旗，以及威风凛凛的迎宾车队，让人很难把这种场面与刚刚发生不到72小时的入侵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你知道了宽大的海鸥轿车中的这名总统的国家已由他现在所在的国家的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占领着，又该作何感想呢？会不会觉得眼前隆重的欢迎场面变得那么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苏联党政领导人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之间的会谈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这时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共和国总理切尔尼克、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及克里格尔等人均被苏军扣押，所以斯沃博达在会谈一开始就郑重地告诉坐在桌子对面、昔日曾为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并肩作战的战友、现在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说在上述四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获得自由之前，不谈别的任何问题。勃列日涅夫等人先是指责这四人给捷国内出现的反苏、反社会主义事件负有责任，继而又主动表示愿意把他们交给总统进行公审。斯沃博达闻听此言勃然大怒，高血压症使他立即涨得满面通红，他瞪着眼睛喊道，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是依法当选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是他的同事，他不能容忍别人指责和污辱他们，污辱他们就等于污辱他本人。据一个参加这次谈判的人说，苏联领导人仍然千方百计地回避和拒绝斯沃博达的要求，最后终于把老将军惹急了，他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比画着，说如果不立即释放上述四人他就在克里姆林宫自杀。美国记者塔德·舒尔茨确信斯沃博达会这么干，他说：“斯沃博达虽然面容慈祥，却是一位倔强而易动感情的人——人们有时忘记了，捷克人虽然很讲实际，但归根结蒂还是感情冲动的斯拉夫人——而且他有很高的荣誉感。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已经关系到他的荣誉问题了。”

斯沃博达总统的坚定和牺牲精神终于产生了效果。谈判中断几小时后在午夜重新开始。勃列日涅夫等人一开始仍然拒绝释放杜布切克等四人。双方又是一番争执。突然，勃列日涅夫不再参加争执了，静了一会儿之后他宣布，

为了苏捷友谊，苏联政府决定释放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并让他们以自由人的身份参加会谈。斯沃博达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后又问：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四人回到布拉格之后能够继续行使其职权？勃列日涅夫对这名老战友的咄咄逼人显得有点不大高兴，他沉着脸答道：“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斯沃博达脸上又浮现出那种慈祥的微笑，他知道，现在是1：0，他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8月24日凌晨，杜布切克等四人被带到克里姆林宫，以正式身份参加苏捷会谈。几天的关押和监禁使这四个人看上去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心脏本来就不好的杜布切克终于支撑不住躺倒了。其他人与斯沃博达和被陆续从捷国内接来的各方领导人一起，继续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进行抗争。

根据苏方意见，双方要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一个协议。苏联方面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为首起草了一份协议书，把华沙条约五国出兵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局势说成是反革命的，因此认为进行军事干涉是必要的和适宜的，至于什么时候撤军根本未提；同时，否认捷共十四大的合法性，坚持要把某些右翼分子从党和国家领导层中清除出去，等等。捷方也提出自己的协议草案，不承认整个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的，认为干涉犯下了悲剧性错误，因此五国必须首先撤军，同时还强调捷共的《行动纲领》仍然是以后制定路线的基础。由于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因此在讨论双方草案时并没有进行面对面的集体谈判。一般是由双方派代表把自己的草案交给对方的代表，然后再把对对方草案的意见转告过去。除代表之外的其他人则进行频繁的私人接触。捷方的草案被苏方认为是最后通牒，拒绝接受；苏方的草案对捷克斯洛伐克利益损害太大，捷方主要领导人认为难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经过多次磋商、交涉，苏方作出一定让步，即不再提捷克斯洛伐克曾出现过反革命活动，并接受在对外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写明，华约五国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正常化前，暂驻捷克斯洛伐克”。在其余各点上，如按照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来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发展方向，宣布捷共十四大无效，通过书报检查制度，承认捷同联邦德国接壤的边界线上防御力量不足、必须由盟国保证其安全，以及作出相应的人事变动等，苏方无论如何不肯让步。当捷方代表团中仍有人不愿在包含上述内容的议定书上签字时，波诺马廖夫一字一顿地说：“你们现在不签，过一个星期再签。一个星期后不签，过14天再签，如果过14天还不签，那就过一个月再签。”这话的弦外之音捷方每一个人都听出来了：不接受苏方提出的条款，他们就别想回国。

苏方的强硬立场，是由决策层内部对出兵后下一步如何处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方法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知道了，就在双方进行紧张磋商、交涉的过程中，8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会上就如何进一步处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提出了三种选择方案：一是成立以总统为首的革命政府；二是成立以切尔尼克为首的政府，或是由切尔尼克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由胡萨克任部长会议主席，让杜布切克退出政治舞台；三是保持原有的政治领导人，但要让他们重新执行在切尔纳达成的协议。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杰米契夫、包括刚刚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谢列平都倾向于第三种选择。其中，杰米契夫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我认为，惟一可行的选择就是最后一种、第三种选择。如果不是这种选择，那就意味着战争，那时候就要打仗，没有

胡萨克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和斯洛伐克党中央第一书记。

别的任何出路。是否应该这样？应该想一想。”尽管政治局里也有人赞成前两种选择，但结果支持第三种选择的意见占了上风。非常明显，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大的变化，苏联将中止所谓的极端措施。既然苏联领导人已经内定了要把原捷党政领导人送回国继续执政，就必须要有个明确的保证，保证回去后按能让苏联满意的方式管理党和国家。在切尔纳，杜布切克等人虽然也曾向勃列日涅夫等人保证过，但没有在成文的东西上签字画押，而这次无论如何要履行这一手续。同时，为防万一，进入捷境内的五国部队还不能马上撤出来，所以必须“暂驻”。可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主要成员接不接受苏方的条款，签不签字，直接影响到苏联既定方针的贯彻，而这种方针的受挫，又有可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化，甚至导致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不符合苏联的利益。

在苏联的强硬态度面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除了克里格爾一人外，最终都同意在苏方拟定的议定书上签字。8月26日下午至晚上，双方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苏捷双方的最高党政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成员姆林纳日对这次谈判作了可能是最详细的记述，作为苏方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会谈中起了重要作用。

会谈由勃列日涅夫主持。他先发言，说了许多关于同志关系和共同利益的话，并说苏联是如何带着惋惜和痛苦的心情决定搞军事干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回想一下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讨论军事干涉时的态度，应当说，这些话，至少从他本人来讲，并非口是心非的假慈悲。捷方切尔尼克第一个发言，他小心地捍卫了捷共《行动纲领》的路线，否定了军事干涉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提法。这个发言引起一阵争论。接着，杜布切克发言，他是在打了针以后来到谈判桌旁的，因此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但他的即席发言讲得不错，既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行了辩护，又对军事干涉进行了控诉。听后，勃列日涅夫马上也即席进行了反驳。他的话，可以说是苏联领导人普遍心态的一次暴露。他明确和具体地指责杜布切克处理内政问题时未事先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和批准，甚至不顾他的指示和劝告。

“我一开头就愿意帮助你反对诺沃提尼。”他对着桌子对面的杜布切克说，“在1月份我就问过你：他的人对你有威胁吗？你想换掉他们吗？你想换内务部长吗？想换国防部长吗？你还想换谁？”

可是你却说，不用换，这都是些好同志。然而以后，我们突然听说你把内务部长、国防部长以及其他部长都换掉了，你还撤换了党中央书记。”杜布切克面无表情地听着。“2月份我就对你的报告提了意见，”勃列日涅夫顿了一下继续说，“我提醒你说，有些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你竟不作修改！怎么能这样工作呢？在我们这里，甚至连我自己在准备报告的时候，我还要请全体政治局委员提意见呢。是这样吗，同志们？”说着，他转动脖子用眼睛望着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人。那些人冲着总书记点着头，嘴里咕嘟着表示同意的词句。勃列日涅夫再转向杜布切克的时候，有点动感情了，他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我信任你，并在别人面前维护你，我说过，我们的萨沙是个好同志。可是，你却使我们大家太失望了。”

听着勃列日涅夫简直要哭出来的声音，姆林纳日忽然产生一种感觉，也许别人也有同感：

眼前的勃列日涅夫，“好像是一个深受伤害的家长。他确实认为十分自

然和惟一正确的是，由于他是一家之长，家庭的其他成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听命，因为他的意见和意志自然是最大的权威，他是为大家好。如果认为这一切应该是另一个样子，那他是决不容忍的，他很自然地把这看做是敌对和叛逆的表现。”

勃列日涅夫接着谈到了问题实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已经涉及一个另外的、最根本的问题了，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问题。他讲的中心意思是，苏捷以巨大的牺牲和损失为代价赢得了自己的安全，其保证就是战后欧洲的分治和社会主义阵营，苏捷结成联盟就是这些具体保证之一。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界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边界，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边界。苏共政治局没有权力使这次战争的成果遭到威胁。对苏联来说，这个成果是不可侵犯的，为了维护它苏联不怕冒发生新战争的危险。“就是有这样的危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仍然会进行”。勃列日涅夫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定，不过紧接着他语气一缓，“可是现在不存在发生这种冲突的危险。我问过约翰逊总统，美国政府今天是否仍完全确认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8月18日，我得到回答说，如果是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美国政府毫不保留地确认决议，至于南斯拉夫，则需要谈判。你们看，会发生对你们有利的事吗？不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

看到桌子对面的人们对这些消息感到有些吃惊，勃列日涅夫知道他打出的这张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于是他抓住机会进行安抚：“军事干涉后，你们国内的局势是困难的。这一切在今天对你们来说好像都是不能接受的，可是你们看看哥穆尔卡，他在1956年的时候也像你们一样，反对我们的军队帮助波兰。如果我今天说，我要从波兰撤走苏军，哥穆尔卡就会马上坐着飞机到这里来求我不要那样做。”

经过如此明确易懂的阐述，勃列日涅夫觉得捷克斯洛伐克人应该明白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马上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画押。因此，当杜布切克忍不住对勃列日涅夫刚才说的反驳了几句时，真把总书记惹火了。他打断了杜布切克的话，叫喊了起来，脸色血红，怒气冲冲地说，杜布切克的顽固立场，使谈判变得毫无意义，再谈下去也是多余，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宣布中断谈判。勃列日涅夫和苏方全体谈判代表都站起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斯沃博达说话了，他说不要互相指责，这样会毫无结果的。说着，他扬了扬手中的议定书：“我们来逐条看看这份文件吧。”斯沃博达讲话时，勃列日涅夫愣了一下，听他讲完，然后转身走了，整个苏方代表团跟在他身后鱼贯出了会议厅。

当时在场的姆林纳日也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至今也搞不准，当时的事是否偶然发生的。我当时的印象是，那是事先排演好的戏。因为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和他下令离开，是与当时的形势不相符的。我确实记不得是什么话引起了这场风波。但我认为，杜布切克没有说什么太厉害的话，至少没有说过任何在此前不曾说过的话。会谈以后的进程表明，这是苏共政治局有意安排的场面，其目的是要为通过文本造成一种气氛，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们注意把自己不合时宜的意见压到最低限度。

经过一个多小时混乱和紧张的磋商，又恢复了谈判。双方按斯沃博达建议的那样，逐条讨论了议定书文本。一直到午夜，总算一切准备就绪，可以

签署这个文件了。姆林纳日对这个时刻做了生动的描述：

……签字的时刻来到了。突然，通向大厅的门敞开了，大约有 10 名摄影师简直是奔了进来。好像听到口令一样，整个苏联政治局成员一下子都站了起来，每个人都向长桌对面的捷克斯洛伐克对手张开了双臂，准备拥抱。这是一个由摄影师的闪光灯照耀着的荒谬绝伦的场面：苏联政治局委员们的十几双手臂依次张开越过长桌。我突然感到，这好像是一种奇异的植物想用自己带粘液的爪子把我们抓住似的……

尽管姆林纳日没有上前加入拥抱的行列，但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一瞬间，还是被一只巨大的手臂抓住了。

1968 年的前 8 个月，一场挣脱与束缚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摩擦出一串耀眼的火星后暂时平静下来了。前者终于没能完成突破，后者依然固守着原有的藩篱。这不是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之间的较量，而是两种力量之间的较量。应当说，新兴的挣脱力量和传统的束缚力量在国际上都并不孤立，但又绝对没有达到哪怕是相近的力量平衡。因此，前者的失利和后者的胜利都不是偶然的。

勃列日涅夫由于他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被推上了传统力量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时主动地对较量的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有时则迫不得已地被他所代表的那股力量裹挟、推动着往前走。不管怎么说，他所代表的力量赢了，他经受住了自执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考验，随之而来的是赞誉、荣耀，当然也有来自失败者和为失败者痛心的人的谴责。但这反而提高了他的知名度。难道不是吗，恰恰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平息后不久，一种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很快就传遍全世界了。勃列日涅夫作为一颗国际政治“明星”，开始“照耀”世界这个更大的舞台了。

第十一章 1969 年：流血的冲突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苏捷双方联合发表的会谈公报为标志，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内部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舆论反应，却不是仅靠一纸公报就能解决和平息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苏联党和政府将如何对待那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这些国家就国际法意义上说，都是确定无误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处理内政问题的权利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在 1968 年 8 月 21 日，华沙条约 5 国军队在没有收到任何政府的任何请求下，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又是一种什么行为呢？虽然早在 1956 年苏军就曾进入过匈牙利，但那次先是应以纳吉为首的匈牙利政府，后是应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而采取的措施。而这次并不具备同样的条件。

尽管苏联已经用实际行动演示了解决上述问题、处理与兄弟国家关系的方法，但事后看来很有必要为这种方法的使用找到理论解释，也可算作“挽回影响”吧。于是，苏联理论界开始在阐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上做起了文章。其核心所在，就是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保留的，在有些情况下，它必须服从于更大更高的利益。这种提法，还在华沙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就已经在文件中出现了。在 1968 年 8 月初发表的布拉迪斯拉发声明中，就曾提到“不允许任何人离间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指出“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这些话的内涵又被声明中关于东欧和苏联各党建立在“平等、尊重主权、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兄弟团结基础上”的合作等诸如此类的言词掩饰起来了。因此，尽管两天后《真理报》就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和声明发表的社论中强调，“每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孤立地解决它的内部问题是不可能的”，但仅靠这样一份声明是不能对出兵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更无法成为以后采取类似行动的理论依据。9 月 26 日，《真理报》刊登了一名叫谢尔盖·科瓦列夫的理论家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对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有限性和国际主义义务的无限性进行反复阐释。

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和共产党无条件地享有并且必须享有决定他们国家的发展道路的自由。然而，他们的任何决定必须既无损于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也无损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全世界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在具有固定国界的单独国家中以自己的具体形式而存在，那么它的发展要考虑本国的特点。任何人都不会干涉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措施。但当出现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身的威胁时，问题就发生根本性变化了。世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体系是各国劳动人民的共同成果，它是不可分割的，保卫它是所有共产主义者、全世界进步人士、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共同事情。兄弟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自然不允许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绝对意义上的主权，而眼看一个国家受到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威胁无动于衷。

这一“理论”很快为勃列日涅夫本人所接受了。11 月中旬，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华沙召开，勃列日涅夫率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他在 12 日的讲话中，专门论及了这一问题：

斗争的经验和对世界现状的现实考虑还十分明显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极其需要高举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旗帜，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相互声援。这是我们每个国家顺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帝国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主要条件之一。

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防御的利益及其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利益，都要求兄弟国家间实行最广泛的合作，要求全力发展它们之间各方面的联系，要求实行真正的国际主义。

接着，他举出越南的例子，说如果没有苏联、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有效的援助，“越南要同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进行多年的英勇斗争是不可能的”；越南取得的胜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巨大胜利”。他往下话锋一转，谈到了主权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主张严格尊重一切国家主权。……在这方面，确立和保卫已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国家的主权，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力图……要取消这种主权。

大家很清楚，苏联为实际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做了不少工作。苏共一直主张每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考虑到本国民族条件的特点来确定自己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具体形式。但是，同志们，大家也知道，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背离了这些普遍规律就可能离开社会主义本身。而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正义事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是这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了，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

当然，他要利用这一机会为华沙条约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几句，外加对其他兄弟国家进行安抚：

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

从科瓦列夫的文章到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贯穿着一个中心，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在某种情况下是有限的，为了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保卫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不应视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任何方式行动的障碍。尽管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中特意划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界限，但终究是对关于国家主权传统的、公认的解释的一种新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诠释。这种诠释经苏联报刊和其他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很快为全世界知晓了。善于创造抽象概念的西方记者，干脆把这种诠释命名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有的人则更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有限主权论”。无论用哪个名称，它已经打上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印记，与勃列日涅夫连在一起了。

仅仅作出理论说明——姑且不论这种说明是否强有力，是否能令人信服——并不足以平息出兵事件引发的震荡及其余波，这一点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得尤为明显。但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过去五个月后，他们的生命安全在莫斯科竟然受到了威胁。那就是

发生在 1969 年 1 月 22 日对经过红场的党和国家首脑的车队进行枪击的事件。虽然开枪射击的是地地道道的苏联军官，但是西方观察家们还是马上把它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联系起来，推测这是苏联国内、特别是军队内部对政府政策不满的反映。然而至今尚没有确凿材料证明这种推测是正确的。不过，对勃列日涅夫个人来讲，这是他在国内经历的少有的几次险情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1969 年 1 月 22 日，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上正在举行欢迎宇宙飞船“联盟—4”号和“联盟—5”号宇航员的仪式。勃列日涅夫出席并主持了仪式。仪式完毕后，政府官员和宇航员们乘坐黑色吉尔牌和海鸥牌汽车，经过沿途夹道欢迎的群众队伍，向克里姆林宫驶去，因为在那里还有一个正式的招待会。车队驶抵莫斯科河时停下来。宇航员沙塔洛夫、沃卢诺夫、赫鲁诺夫和叶里谢耶夫四人走出轿车，换乘一辆敞篷车，准备穿过红场——那里聚集着更多的热情的莫斯科居民——进入克里姆林宫。本来一路上勃列日涅夫乘坐的轿车一直跟在载着四位宇航员的轿车之后，在宇航员们换车时，领导人的车队先行驶入了克里姆林宫，以便能在宴会厅里迎接宇航员们。跟在领导人车队后的原来是以前宇航员们的车队。这些宇航员中有一个别列戈沃伊少将，也有一头漂亮的波浪形黑发和两道浓密的粗眉毛，这使他在长相上与总书记颇为相似。事有凑巧，别列戈沃伊的轿车是跟在领导人车队后的第一辆，这样当领导人车队驶进克里姆林宫后，他的轿车就自然变成跟在敞篷轿车后的第一辆轿车了，而这个位置原来是勃列日涅夫轿车的位置。当敞篷轿车在警察摩托车卫护下驶抵克里姆林宫时，慢慢降低了速度。前面是个急转弯，然后是鲍罗维茨基大门，要通过大门还要驶过一个铺着鹅卵石的斜坡，这都使车队的速度不能很快。敞篷车经过了大门拱道，第二辆跟了上来，透过挂着薄薄霜气的车窗，宇航员别列戈沃伊波浪形黑发和粗重的眉毛依稀可见。就在这时，一个站在拱道内、身穿警察制服的年轻上尉，突然抽出两把手枪，冲着别列戈沃伊的轿车连发六枪。随轿车而行的一名摩托车手中弹，连人带车歪向一边。轿车司机猝不及防也被子弹击中，飞溅的玻璃碎片如水银泄地撒在汽车周围。不等刺客再进行第二次射击，几个身穿便衣的克格勃人员猛扑过去把他击倒压在身下……

第二天，《消息报》在第五版发表了塔斯社就此事一条非常简短的报道，甚至没有提到刺客的姓名。14 个月后，苏联最高法院通告说，刺客名叫伊林，1947 年生，列宁格勒人，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在行刺时神经错乱，决定送“特种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治疗”。此后，伊林便消失了，行刺事件就这样下了结论，并且不再提及了。

60 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终于导致了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公开武装冲突。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成了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遇到的又一个难题。

前面已经说过，中苏关系的恶化始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双方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及其发展方向和应遵循的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导致了内部的争论。并因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提前撤走援华专家而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党和政府准备利用这次机会修补乃至最终改善两党两国关系，采取了主动行动。宣布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接替赫鲁晓夫党政职务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就致电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能继续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

为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中国党和政府派出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中国代表团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等，讨论了两党两国关系问题，“坦率地、同志般地”交换了意见。勃列日涅夫代表新的领导班子表明了立场，说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在 11 月 6 日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再次重申：“我们党最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们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这样，不管苏联新的领导集团是出于什么考虑，他们实际上把中国试图重新打开的“友好大门”又推上了。中国由此得出结论，苏联新领导人推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苏联新闻界则坚定地维护既定方针。1965 年 2 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两次在北京停留，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两次谈话，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也会见了。中国领导人表示，尽管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要继续下去，但两国关系应该改善。然而双方没有发表任何有关会谈的公报，柯西金回国后在广播中说，会谈“帮助澄清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一直来弥合，两国关系的改善始终难以有大的进展。相反，随着两党之间恢复论战、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受国际环境和事件——如越南战争、印巴战争及中印边界危机等——的影响，两党关系不仅继续恶化，而且两国关系也日趋紧张，其中，最容易产生磨擦的问题之一，就是边界和领土问题。

中苏两国的共同边界在西北段约为 3100 公里，东北段约为 4300 公里，是世界上拥有共同边界最长的两个国家。这 7000 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既反映出两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也凝结了历史上诸多的的是是非非。1840 年以后，沙俄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起，参加了对中国领土的侵占与瓜分。随着沙俄政府把《中俄璦琿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它从中国手中掠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十月革命后，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于 1920 年 9 月 27 日发表声明，“宣布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地归还中国”，并于 1924 年 5 月 31 日与中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规定，废除中国政府与前沙俄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公约、条约、协定等。至于边界，将重新划定，但在未划定之前，仍先维持现在疆界。但直至中国革命胜利，中苏之间一直未能完成上述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边界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起来。但随着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边界问题上的的是是非非，也成了双方争论的问题之一，而且由于它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变得愈发复杂而难于处理了。1963 年 9 月伊犁事件发生后，中苏于第二年 2 月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未取得任何进展。此后，苏联领导人指责中国引起边界争端，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对此提出反驳，说 1960 年 7 月至 1965 年底之间，苏联在中苏边界挑起 5000 多起事件，并且陈兵中苏边界，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这都使中苏边界上的局势日益严重。终于，1969 年 3 月，两国边防军在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

据新华社报道，3 月 2 日上午 9 时许，苏联边防当局派出大批武装部队，

携带全副武装，出动装甲车、卡车和指挥车多辆，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对中国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边防军人进行挑衅。中国边防军多次发出警告，令其退出中国领土，但苏军不仅不予理睬，反而于9月17日，公然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军人多名。中国边防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差不多同时，塔斯社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说法截然相反，认为是中国“蓄谋和精心准备的”对苏联边防军人的“突然袭击”，侵犯了苏联国界，造成苏联军人31人牺牲，14人受伤。3月15日，双方在珍宝岛地区再次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苏方出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中国则以大炮和迫击炮予以还击。6月6日，中国外交部又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照会，谴责苏联把武装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北段扩大到西北段。在西北段，双方于6月10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8月13日在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发生两次较大的武装冲突。这样，在长达7000公里的中苏边界线上，双方不仅形成紧张的对峙，而且在多处地段爆发了流血冲突，使这里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

不管怎么说，边界地区频频发生流血冲突，对两国都是不利的。双方都在寻找机会避免发生更大的武装冲突。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柯西金，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他们一致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同时，双方还就贸易等问题达成谅解。据塔斯社称，这次会见是苏联方面建议举行的，但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否认在边界地区存在有争议地区，从而否认两国政府首脑就此问题达成的谅解。不过，两国边界问题谈判于10月20日在北京首次举行，至1978年6月，谈判共举行了15轮。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在中苏冲突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并没有置身其外，他是两国之间进行的论战及宣传战的积极参加者。他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指责，以苏联的立场、观点分析和解释冲突产生的原因。作为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涉及中苏关系的讲话，自然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他个人的观点，它能够反映苏联领导集团中对此问题的主流意见和态度。

1969年6月5—17日，由苏联组织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有75个党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阿尔巴尼亚等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作了长篇发言，其中用了相当篇幅谈论中国。

他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时，认为这些分歧多半是由于“左”倾和有倾修正主义影响的渗入引起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向民族主义让步，甚至直接转到民族主义立场上。在他看来，中国党的情况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他抓住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作文章：

我们认为，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有助于了解中国领导实际上在同谁进行斗争，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必须首先同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无情斗争”的方针。可是大家知道，被北京列入现代修正主义范畴的绝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

按照他的逻辑，中国党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这种指责其实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发明”，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把这顶帽子扣在中国头上了。勃列日涅夫的发展在于，他把中国党所谓的争夺领导权同“它的大国野心和它对别国领土的要求”联系在一起进行解释。这种大国野心和领土要求，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表现为：

正在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灌输所谓中国起救世主作用的思想。正在用沙文主义和恶毒的反苏精神进行群众性的思想改造。正在根据把别国领土划入中国版图的课本和地图向儿童讲授地理。“挨饿和备战”，这就是目前向中国人民指出的方向。

当然，勃列日涅夫在这里没有谈把百万苏军部署在中苏边界会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压力，也没有提苏联曾在三个月前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让蒙古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建议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是说，中国的报刊上公开发出“既要准备同苏联修正主义进行常规战争，也要准备同他们打核大战”的号召。不过，勃列日涅夫下面的话又表明，他们并不认为中苏之间马上会发生战争：

当然，从大吹大擂的声明到现实可能性，这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苏联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自己，苏联人的神经是坚强的，叫喊是吓不倒他们的。

勃列日涅夫还谈到了引人注目的中苏边界和领土争端。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苏联政府3月29日就苏中边界问题发表的声明和5月24日中国政府的答复声明。苏联政府3月29日的声明中，回顾了50年代两国之间友好关系，对边界谈判中断表示惋惜，建议尽快恢复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边界协商，表示“苏联政府坚信，苏中两国人民的重要利益最终将有可能消除和克服苏中关系中的困难”。中国政府的答复声明通过对历史的回顾，重申了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吞，指出苏方应对60年代以来的边界争端负责。声明还重申了中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同时又明确表示：“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的，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就完全打错了算盘。”对中国政府的声明。勃列日涅夫一方面承认，“如果可以从字面来判断的话，中国方面并没有拒绝谈判的主张，还表示同意避免边界冲突，不开火”，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声明“充满对历史的伪造和对当前事实的歪曲”，“重复着对苏联没有根据的领土要求”，因此“决不能称为建设性的”。实际上，这已经表明，苏联政府虽然提议进行谈判，但它不准备作出任何领土方面的让步；尽管他说苏联政府愿意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但在事先就已经得出对方是在伪造历史、歪曲事实的结论之后，难道还能有心平气和的气氛和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基础吗？

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于3月17日在布达佩斯举行。苏、保、匈、波、罗、捷和民主德国七国党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在3月16日的预备会议上，苏联要求会议就珍宝岛事件发表一项反华公报，但遭到一个成员国反对后作罢。合众国际社4月16日援引东欧外交界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苏联在会议上提出了让蒙古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建议。对此有三个成员国表示反对，此建议未被接受。东欧外交人士说，此建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苏联在中苏争端中的地位。

在这篇讲话里，勃列日涅夫有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从事后的事实看，他当时这样说，并不是泛泛而谈，相反是有所指的。他说：

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冒险主义同他们不断加剧的战争歇斯底里气氛相结合，这就给国际局势带来新的因素，我们没有权利不考虑这些因素。

对这些因素，勃列日涅夫仅提到一点，即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党和国家的团结，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更加坚定地执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这里他顺便讥笑了“帝国主义宣传家们编造和使用了臭名远扬的‘有限主权论’”。但稍有政治分析能力的人都清楚，这并不是苏联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全部因素。那么，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从什么背景下观察和思考中国的问题呢？勃列日涅夫的传记作家米·莫罗佐夫作了如下分析：

自 1969 年以来，中国显然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号问题，一切对外政策的设想和行动都服从于这个问题，再也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占优先地位的了。确定下来的最高原则是，不管什么时候，要是决心在“满洲”对中国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的话，那么在这之前必须使欧洲的形势稳定下来，以便能期望欧洲各国至少保持一种善意的、为条约所保证的中立。

看来，不仅仅是莫罗佐夫自己有这种感觉，另一个勃列日涅夫的传记作家约翰·多恩伯格也说，“中国当然是勃列日涅夫制定他的‘西方政策’时的主要着眼点之一”，“是他的头号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两名西方传记作家的观点也许不足以全信，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70 年代，尤其是前半期，苏联打出了“缓和”的大旗。大旗招展之处，也确实令世人眼花缭乱了一番。撑起这面大旗的旗手，正是勃列日涅夫。别的不说，也就是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才真正成为国际风云人物了。

第十二章撑起“缓和”大旗

在勃列日涅夫成为国际风云人物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能不提，他就是自1957年起任苏联外交部长之职的葛罗米柯。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1909年出生在白俄罗斯距戈梅利不远的一个小村里。他开始的志向是农业和经济。1934年从明斯克农学院毕业后，又进入莫斯科全苏农业经济科学院研究所研究班深造了两年，之后便留在该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转入外交部门工作有些偶然：1939年初的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召到位于库兹涅茨桥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里，去与党中央的一个专门负责选拔外交干部的委员会成员见面。当葛罗米柯被叫进委员会办公室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坐在对面的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谈话进行得简单明了，结果也出乎葛罗米柯的预料，他不仅被很快调到外交部工作，而且被任命为美国司司长。葛罗米柯后来回忆说，他是“怀着一种困惑的心情走马上任的”。这时他刚刚30岁。在大战期间苏联与同盟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是苏联驻美国大使，这对他形成自己的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基本观点不无影响，对东西方结成同盟的那段蜜月般美好时光的深刻印象，以及对苏美联合起来产生的巨大力量的切身感受，使他虽然身不由己地投入“冷战”，但却永远也无法彻底冷却内心深处的余温。所以只要形势适宜，场合许可，他就会表示同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愿望。只有真正了解他内心世界的人才知道，这种愿望并非完全是姿态和宣传。他参加了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是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的首任代表，尽管因在两年中投了20多次否决票而在安理会得了个“否决先生”的雅号，但却从这时起直接介入了东西方关系，特别是苏美关系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在苏联外交界，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与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罗纳德·里根的历届美国总统都打过交道。除了乌斯季诺夫外，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曾在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历任苏联领导人手下担任过要职。

1957年，他从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升任部长后，一方面积极帮助赫鲁晓夫推行其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也渐渐地和当地位忽上忽下的勃列日涅夫拉上了关系。没人能说得清葛罗米柯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在别人看来，当时的勃列日涅夫远不是赫鲁晓夫明确的接班人，即便是勃列日涅夫当上苏联国家首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后又顶替因病无法理事的科兹洛夫成为党的第二把手时，也很少有人相信赫鲁晓夫之后，第一书记的交椅非勃列日涅夫莫属。而葛罗米柯恰恰就是除了所谓的“第聂伯帮”之外极少数几个把宝押对的人之一。当他发现，作为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缺少应有的外交经验、需要人在这方面提供足够的帮助时，葛罗米柯及时地提供了这种帮助。他帮助勃列日涅夫履行自己国家首脑职责的态度是认真和积极的，不仅调动他手下的力量及时满足勃列日涅夫的需要，而且偶尔还亲自为其介绍有关政策。当他发觉勃列日涅夫需要有人为他撰写外事活动的讲话稿时，便把自己的撰稿人安·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派到勃列日涅夫身边承担这项工作。此后，勃列日涅夫就再也离不开阿根托夫了，这个精通德语并懂英、法、意大利语的身材瘦长、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的人，成了日后总书记在外交政策方面最亲密和最具影响力的顾问，勃列日涅夫在前台的每一个重要动作，都能看到阿根托夫隐在幕后的影子，无怪乎他被西方称为支撑着总书记的“头脑”。而不论是需要“头脑”的勃列日涅夫，还是成为“头脑”的阿根托夫，都要

感谢葛罗米柯。葛罗米柯在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领袖后进一步加深了和最高领导人的私文。为此，他学会了打猎，以便能与党的领袖一起参加他最喜欢的运动。葛罗米柯的“政治投入”得到了回报：他不仅一直稳稳地坐在外交部长的位子上，并在1973年4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被从中央委员直接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鉴于葛罗米柯此前在党内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而且一下子越过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级一步跨进了政治局，这样的提升在苏联是罕见的。反过来看，葛罗米柯之所以如此“幸运”，肯定是与他的工作成绩和党的特殊需要分不开的。也正是从70年代初开始，勃列日涅夫渐渐取代了柯西金，成为苏联外交舞台一个“全方位”的主角，而作为具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的职业外交家，葛罗米柯自然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为总书记铺路架桥的重任。

70年代，葛罗米柯等人架设的第一座桥，便令世人为之一振地选在了莫斯科与波恩之间。勃列日涅夫正是通过为它“剪彩”并登上它，走向西方那个神秘而又充满挑战的世界的。

自德国分裂成两个德国以来，德国问题就成了让东西方都感到头痛和棘手的难题了。某种程度上，它成了东西方集团“冷战”的焦点、对峙的前沿，以及反映相互间关系变化的温度表。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扶植帮助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迅速恢复和崛起，而且被重新武装起来，成为苏联和东欧集团面前的一个现实威胁。这让苏联感到非常不舒服。斯大林在世时曾想以解决柏林问题警告西方不要在德国问题上“玩火”，结果引发了战后第一次严重的危机，反而加快了联邦德国的成立和更坚定地倒向西方集团。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虽然于1955年9月恢复了两国外交关系，但在联邦德国的国际地位、东部边界以及与民主德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两国并未取得一致，加之联邦德国依靠西方三国的既定方针坚定不移，并奉行不承认民主德国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所谓“哈尔斯坦主义”，使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实际上仍处于一种“冻结”状态。为了解决与德国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悬而未决问题，赫鲁晓夫在1957年、1959年和1961年，屡次向西方打出“德国牌”，一度造成东西方关系紧张，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

柏林危机及第二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给全世界以强烈的震撼。美苏两国的对抗至少在表面上已经不止一次地把世界推到核战争的边缘，这让处在东西方对抗前沿的联邦德国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过去推行的政策，估价它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同时，美苏两国的对抗尽管声势吓人，但最后终于还是由对抗走向对话。这也表明，事过境迁，对抗由于终究不能解决问题而正让位于对话。1963年6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说，承认美苏有着共同利益。两个月后，美、苏、英三国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这个条约签署前，联邦德国竟没有从自己的盟国那里得到一点消息，使联邦德国朝野感到一阵心寒。长期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的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越来越认识到，向西方的一边倒和拒东方各国于门外的政策，并非是最明智的选择。于是，从60年代前期开始，联邦德国内部就酝酿着调整其对外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东方的政策。到了60年代后期，新的东方政策已基本成型了。

按照新东方政策设计者们的意图，联邦德国在和西方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要同东方实现某种谅解，保证同苏联及东欧各国和平共处。达到这一目标，可采取四个步骤。一是改善同民主德国的关系，承认其为一个国家；二

是同其他东欧国家缔结互不使用武力的协定，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苏联签订放弃使用武力的协定；三是裁减苏美两国在东西德的现有兵力；四是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1969年10月，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内阁，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出任政府总理，加快推进新东方政策的步伐。11月15日，勃兰特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就签订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定进行谈判。苏联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从12月份开始，葛罗米柯先是与联邦总理办公厅秘书埃贡·巴尔、后又与联邦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各进行了15轮谈判，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在克服了一系列障碍之后，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亲自来到莫斯科出席条约的签字仪式。

由于获悉有炸弹威胁，勃兰特从德国瓦恩机场起飞的时间不得不推迟，因而到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的时间比原定的要晚。勃兰特走下飞机时，对前来迎接的柯西金一语双关地说：

“我们来晚了，但我们还是来了。”

8月12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在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叶卡特琳娜大厅举行了举世瞩目的签字仪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外交部长谢尔分别代表本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上签字。出乎勃兰特以及绝大多数到场的外国记者预料，勃列日涅夫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了仪式。这个后来被人们称为《莫斯科条约》的文件，就其内容而言，完全有理由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它规定双方“只用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并承担责任，在关系到欧洲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问题上，以及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放弃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特别是它明确规定了苏联在战后锲而不舍追求的目标，即“完全尊重欧洲所有国家在其今天疆界内的领土完整”，“它们今天和将来都视欧洲所有国家在本条约签署之日存在的边界为不可侵犯”。柯西金在条约签字后举行的宴会上称这一天是两国关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勃兰特则把条约看成是“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它使两国“摆脱过去的阴影和重荷”，给了两国一个“新的开始的机会”。葛罗米柯在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有些激动，他说他感到“欧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虽然勃兰特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的主要陪同者是身份对等的柯西金，但勃列日涅夫出席签字仪式和宴会让人同样不能忽视他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在签字仪式后和宴会之前，勃兰特和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后者的办公室里，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会谈。会谈是单独进行的，柯西金、葛罗米柯和谢尔等人均未参加。在勃兰特1976年发表的回忆录《会见与思考》中，比较详细记叙了他与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内容。两人从刚刚签定的条约，谈到欧洲局势正常化的前景，又从西柏林问题谈到大国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探讨了开展更大范围经济技术合作的可能性，等等。可见，这里面已经涉及苏联对外政策中、特别是对西方政策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勃兰特对勃列日涅夫的印象，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从西方领导人眼中了解勃列日涅夫的“窗口”。

我的印象是勃列日涅夫在等待什么。他十分拘泥于文字材料，整段整段地照本宣科。

在这一时刻，勃列日涅夫显然决心对西方政策的重要问题亲自负起责任来，在这方面他肯定是有权威的。当时，我觉得他和柯西金仿佛是最高领导的“第一号甲”和“第一号

乙”的人物。一年以后，勃列日涅夫的突出的并且是无可竞争的地位便不容忽视了。

我觉得勃列日涅夫是在党的干部范围内通过他的地位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他并不体现亲密的党书记那种类型。他的仪表说明为求得良好外表而作了努力。他的形象并不完全符合照片所报道的那种样子。他不是个“高大的形象”，他虽然身材魁梧，但给人一种小巧的感觉；他谈话较为放松时，举止表情活泼，富有朝气；他说话时手势生动而且动作大，几乎像一个南方人。与柯西金不同，柯西金毋宁说是冷冰冰的，而勃列日涅夫会冲动，甚至暴怒。有时可以看到他感情起伏的迹象，像通常“俄国心灵”那样，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很快流泪而不觉羞耻。他在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思绪久久不能平息，感情自发地、强烈地表现出来。……这并不削弱给我的突出印象：我们不得不同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人打交道。看来，这种感觉……随着一次又一次会晤而增长。他的深入细致地阐述自己立场的本事，与他的无可竞争的、明显出众的威望一起在增长。

勃兰特从1970年到1981年的十多年间，先后4次访问苏联，每次都与勃列日涅夫见面；勃列日涅夫出访联邦德国时，也与勃兰特多次交谈。因此，勃兰特对勃列日涅夫的上述印象和感觉，还不完全是仅凭一两次接触就得出的结论。他对勃列日涅夫的描述，有些看似矛盾的地方，但很可能正是勃列日涅夫多重性格或是对待不同问题的不同作风的真实写照。

《莫斯科条约》的签定极大地推动了联邦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该条约的精神实质——承认战后形成的欧洲各国边界不可改变和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为最终确定联邦德国一直未承认的波兰西部边界创造了条件。这年的12月6日，勃兰特又赴华沙，第二天两国政府首脑签订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两国相互关系正常化基础的约定》，即《华沙条约》，确认了1945年8月由《波茨坦协定》划定的波兰西部边界。在签约之前，勃兰特在外交部长谢尔的陪同下，冒着严寒来到华沙胜利广场，向这里的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然后又来到波兰犹太人居住区，勃兰特在跟随的大批记者和驻足围观的华沙市民的注视下，缓缓走到犹太人纪念碑前，俯首默立。他的花白头发在两支燃烧的长明灯发出的嘶嘶声中微微抖动，周围一片寂静。突然，他双膝跪在纪念碑的石阶上，记者和围观的市民被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谢尔和身旁的德国人热泪盈眶……一名记者写道：“于是，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下跪了。”

1971年3月30日，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无论是对苏联还是对勃列日涅夫本人，这次代表大会都是又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坐稳了党的领袖的头把交椅；同时，在代表大会之后，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苏联的外交活动中，在国际社会树立起苏联第一号决策者的形象。他不再满足于只在东欧和社会主义国家抛头露面，他开始向以前不大熟悉的“新大陆”进军了。

进军的号角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由勃列日涅夫亲自吹响的。

像以往绝大多数时候一样，苏共中央总书记作了中央的总结报告。

按照传统格式，报告的第一部分首先谈及苏联的国际地位和苏共的对外活动。他说，党中央委员会注意的中心始终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他谈到了苏共在发展同兄弟党的合作、与它们协调对外活动、完善华沙条约组织、加强同兄弟国家经济合作及双边关系等方面的工作。在此他比较多地谈了苏中关系和捷克斯洛

伐克事件。他仍然坚持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思想政治纲领”，说中国领导要求苏共放弃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和苏共纲领，指责中国“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把事态弄到 1969 年春夏在边境发生武装事件的地步”。不过，他也认为，近一年半以来，两国之间关系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如两国政府首脑会晤、开始边界问题谈判、互派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等。

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认为可以得出几点“最实质性的结论”。他把这次事件看成是“在已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的内部反社会主义势力在一定条件下活跃起来，甚至可能指望外来的帝国主义的支持而直接采取反革命行动”。他说，这种情况令人信服地表明，加强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领导作用的重要性。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问题不仅在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企图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还在于，企图通过这种办法打击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阵地，为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势力随后向社会主义世界进攻创造有利条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结，是设置在那些企图进攻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破坏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并使之化为乌有的势力的道路上最牢靠的障碍”。

在谈到资本主义世界和与西方国家关系时，他认定，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他有选择地集中谈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认为是具有“尖锐性”、“对未来的意义”的重要国际问题，其中有东南亚的事态和越南战争、中东问题和阿以关系、欧洲形势的变化、裁军问题以及苏联同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关系。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苏联“保卫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的六项具体任务。这六条日后被广泛地称之为“和平纲领”，并在以后几年中成为苏联对外政策及其活动的中心内容。勃列日涅夫也正是高举这面大旗走向西方世界的。

这个纲领规定：

第一，消除在东南亚和近东的战争策源地；立即给予任何侵略行为和国际上的专横行为以坚决的回击；使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争端成为国际生活准则。

第二，以最终承认二战后欧洲形成的领土变更为出发点，实现欧洲走向缓和和紧张局势的根本转折；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同时废除《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召开全欧会议。

第三，缔结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条约；停止核试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实行核裁军。

第四，停止一切种类的军备竞赛，撤除所有外国的军事基地。

第五，贯彻联合国关于消除殖民政权的决议，谴责和抵制种族主义。

第六，发展和加深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

这确实是个内容广泛的纲领。它既包括了当时的热点问题，如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战争和危机，也包括了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些难题，像禁止核武器、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等。如果这些纲领能够实现，甚至实现一半，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巨大改观。因此，此纲领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纷纷议论。

《北大西洋公约》的一些缔约国对苏联提出的裁军倡议尤为敏感，不断通过

各种途径询问这项倡议背后的真实意图：裁减哪一家的武装力量？是外国驻在缔结国的武装力量还是缔约国本身的？是哪些军备？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另一些国家还对这六点纲领是不是一项一揽子纲领感兴趣。而对外界的议论，勃列日涅夫在5月14日庆祝苏维埃格鲁吉亚成立5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作了回答。他把这些心存疑虑、犹豫观望的国家比作不想用嘴尝、只想凭外表来品洋酒味的人，他建议他们要下定决心对所感兴趣的建议来“尝尝味道”，开始谈判。三天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与美国驻苏大使比姆就苏美裁减欧洲驻军问题进行会谈。西方观察家注意到，苏联此次在两个问题上态度有所不同。其一，葛罗米柯正式表示苏联不再把欧洲裁军限制在外国军队方面；其二，苏联外长还表示共同的均衡裁军同欧洲安全会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又过了三天，苏美就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的程序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本年度将集中力量起草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6月中旬，苏联政府分别向美、英、法、中四国政府递交声明，建议最近召开五个核大国会议，讨论核裁军问题。8月23日，苏联与西方大国在处理柏林问题上的谈判取得突破，自1970年3月开始的苏、美、英、法4国大使级谈判达成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苏联在对待西柏林的实际地位问题上作出了让步，终使协定得以达成。柯西金在致勃兰特的电函中称，该协定是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道路上的重大步骤。勃列日涅夫也致函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昂纳克，说协定是“和平共处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平、安全与合作路线毫无疑义的成就”，将对解决欧洲和世界政治中业已成熟的其他问题“产生良好的影响”。9月30日，葛罗米柯又代表苏联政府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两个重要协定：一个是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定，另一个是通过使用人造地球卫星来完善苏美直接通讯联系的协定。

由此可见，“和平纲领”提出不到半年，苏联就已经大幅度动作起来。而这一切的设计师，人们肯定会首先想到勃列日涅夫。

二十四大对巩固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权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看看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几乎可以在这个由396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中找到“第聂伯帮”所有成员的名字。精于此道的西方传记作家为我们提供这份很有意思的名单：伊·萨·格鲁谢茨基（乌克兰党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尼·亚·吉洪诺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列·瓦·斯米尔诺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谢洛科夫（苏联内务部长）、尼·费·瓦西里耶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费·瓦特钦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伊·伊·鲍久尔（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帕·特拉佩兹尼科夫（党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安·帕·基里连科（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弗·瓦·谢尔比茨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J·阿·库纳耶夫（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伊·哈·尤纳克（图拉州委第一书记）、格·埃·楚卡诺夫（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格·谢·帕夫洛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康·乌·契尔年科（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谢·库·茨维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维·米·切勃里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康·斯·格鲁谢沃伊（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和伊·特·诺维科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此外，虽然算不上“第聂伯帮”核心成员，但也是勃列日涅夫的战友、同事的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少，像安·安·格列奇科（国防部长）、谢·格·戈尔什科夫（海军总司令）、基·谢·莫斯卡连科（国防部副部长）、阿·阿·叶

皮谢夫(苏军总政治部主任) 尼·格·利亚申科(中亚军区司令员)和伊·格·帕夫洛夫斯基(陆军总司令)。

在另一个党中央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里，也有勃列日涅夫的人：党中央总书记助理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格·卡·齐涅夫、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委第一书记伊·列·弗尔斯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4月9日代表大会闭幕的当天，举行了第一次中央全会。全会除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外，还选举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比上次代表大会后选出的11名扩大到15名，其中上次当选的11名委员这次全部当选连任。这说明勃列日涅夫虽然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但他还必须在最高决策层中正视已形成的政治力量平衡。能够进入政治局的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根基，代表着苏共党内一定的政治力量，或者本身就是一个平衡力量。在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理由触动已形成的力量平衡时，暂时保持它总比冒风险要好。不过，如果以为勃列日涅夫愿意永远消极等待政治局力量对比自然发生变化的话，那就错了。扩大政治局，就是他采取的积极行动。这种方法是他在政治导师斯大林、赫鲁晓夫那里学来的，前者在1952年、后者在1957年都曾以此办法来迂回地推动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四名新进入政治局的人中有三人是原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是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瓦·格里申。前两人在我们前面列出的第一份名单中可以看到，其政治倾向自不待言。格里申是接替因在1967年中东事件中反对勃列日涅夫而被贬的叶戈雷切夫出任首都党的首脑的，而且任职后紧跟勃列日涅夫。尽管他还不能与前两人一样称得上是总书记的人，但他至少现在不是总书记的反对派。另一个进入政治局委员行列的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党中央农业部部长费·达·库拉科夫。虽然西方观察家把他看成是波德戈尔内的人，认为他进入政治局是妥协的产物，但他是苏联党的高级领导人中称勃列日涅夫为“领袖”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不管怎么说，现在的这个政治局肯定比原来的政治局更让总书记满意，他虽然没能立即把他感到不舒服的人——如谢列平、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以及常常和他意见相左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排挤出去，但是新补充进来的人员无疑改善了他在这里的地位。

二十四大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诚然，他这时还没有达到他政治生命的巅峰，但毫无疑问，从此以后他已经离它不远了。在未来的五年中，他还不能完全不受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牵制，然而他应该感到他的地位的加强让他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而不是相反。如果说这种地位加强带来的更大行动自由在苏联国内还看得不是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就显得清楚多了。

第十三章走向欧洲的那一边

70年代前半期，确立了在党内国内无可争议的第一领导人地位的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外交舞台上也日益占据了中心位置。从这时起，在他外事活动的安排表上出现了两点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一，他越来越多地单独会见来访的重要贵宾，而不像以前那样与其他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共同会见；其二，在他出访的日程中开始有了西方国家。而在那些国家，由于他党的总书记的身份在传统的礼宾规章中没有相应的条文确定其规格，他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又使接待国不敢忽视，所以他每到一地都是受到最高规格——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勃列日涅夫通过几次重大外交活动，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了他，了解了他，并造成一种印象：只有他，才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真正制定者，因而他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人类的命运。

勃列日涅夫显示自己在外交领域独立发挥作用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单独会晤特意邀请来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

苏、美、英、法四方关于柏林问题的协定签订之后，德国问题的解决前景似乎一下子变得豁然明朗了。欧洲缓和的窗口一经打开。身受其益的国家都想继续推进这一进程。勃列日涅夫在二十四大上打出“和平纲领”的旗帜之后，更希望能有更强烈的缓和之光照耀在这面旗帜上，让它更加光彩夺目。而勃兰特执政以来面向东方表现出来的积极合作态度，使苏联领导人即使不是出于私人感情，就是从策略上考虑，也要对他另眼相看。非常明显，欧洲的缓和缺少联邦德国是不可想象的，而联邦德国如果没有勃兰特，至少又会变得让人捉摸不定。拉住勃兰特，靠他的合作不断在缓和的牌局里打出德国牌，进而在外交上争取主动甚至得分，这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恐怕是顺理成章的事，或者说不至于是一种愚蠢的选择。所以，在签署柏林协定的同时，苏联就向勃兰特发出询问：他是否愿意在1971年9月中旬到克里木半岛作几天非正式的、不率代表团的、不拘外交礼节的访问。同样需要获得更大外交成功来加强政绩的勃兰特，自然不会放弃这种并不算多的机会。很快，苏联方面通过驻联邦德国大使按正常的外交程序——不是像传说的那样是秘密的程序——向勃兰特转递了勃列日涅夫的请柬。

9月16日傍晚，勃兰特的座机在克里木的辛菲罗波尔着陆。

勃列日涅夫在机场迎接，身边没有通常前呼后拥的人群，这更加突出了私人会晤的性质。由于事先知道勃兰特是乘坐联邦德国国防军的飞机、由穿联邦国防军制服的军人驾驶，所以勃列日涅夫在与到场的记者随便聊天时提醒他们，不要放过国防军飞机降落的一刻，因为这是自1944年德国军人被赶出苏联国土后第一次再度踏上这块土地，这应该是历史性的一瞬。“我们两国关系不好已够长久的了，现在谁也不应再破坏我们的关系。”勃列日涅夫说。

勃列日涅夫先给客人营造了一个轻松随便的气氛，勃兰特下飞机后，勃列日涅夫并没有与他马上乘车前往黑海边的奥列安达，而是建议客人先稍事休息，吃些点心。宾主在机场的贵宾室里围坐在一起，随便聊些轻松风趣的话题，甚至双方还讲起了笑话。乘车前往奥列安达途中，勃列日涅夫告诉勃兰特，他本人把这次会见看得极其重要，并且认真地说，他预计这次会见将会被载入欧洲史册。他希望双方能为欧洲发展的“总方针”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点。因为，依他之见，欧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以苏联为一方

和以联邦德国和法国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不知勃兰特听了总书记的这番话之后，是否感到了在这次于休养胜地进行的非正式会晤中，所谈的话题和要负起的责任绝不都是像吃点心与讲笑话那样轻松。

在奥列安达，勃列日涅夫和勃兰特住在两幢相邻的别墅里。别墅的顶部可以打开，好让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海风直接进入室内。两幢别墅之间由一个豪华的游泳池相连，别墅旁的山坡上有一个人造岩洞，洞内有个会议室，透过洞口，碧波万顷的黑海和岸边金色的沙滩、滴翠的阔叶林、以及点缀其间的白墙红瓦的别墅，尽收眼底。在将近两天的时间里，两人除了举行正式会谈外，还利用共同进餐、一起游泳、乘船游览等机会交换意见。按勃兰特的计算，他在克里木的不到 48 小时里，有 16 小时是与勃列日涅夫交谈中度过的。

交谈的内容虽然也包括像两人的经历、趣闻轶事等轻松的话题，但主要还是政治，两人就两国关系、欧洲安全、苏美、苏中关系等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勃列日涅夫特别关心联邦德国什么时候能批准 1970 年 8 月签订的《苏联与联邦德国条约》。习惯于苏联政治体制的勃列日涅夫感到联邦德国对条约的法律批准程序太慢了，而且居然还有反对派。他告诉勃兰特，苏联国内在对待这个条约上没有反对派。不过他也承认，老百姓中对条约迟迟不能生效还是有议论的。他对勃兰特说，他想“完全限于私下地”了解一下，条约究竟能否批准。勃兰特告诉他，确信能够批准，并且补充说，他这届联邦政府的命运已与条约连结在一起了。据勃兰特讲，他这番话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像任何会谈一样，双方免不了发生争论。这次的争论是由柏林问题引出的，勃兰特称赞了两周前签署的《四国柏林协定》，认为这对欧洲政治气候具有重大意义。“苏联的贡献和总书记的贡献，我是知道的。”勃兰特特意强调了一句。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方面为了不给签署条约增加困难，作了重大让步。“现在苏联方面已经让到了最后界限，在舆论看来以及对党说来也是到了不能再让步的地步了。”勃兰特说，他的政府认为，只有与《柏林协定》有关的问题解决了，才能批准《苏联和联邦德国条约》。这句话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不满，他立即表示：他不知道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而且，苏联的态度是，只有在《苏联和联邦德国条约》批准后，《柏林协定》才能生效。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勃兰特：“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勃兰特马上意识到这是苏联使用的一个“连环套”，他指出做这种联系是不对的，并以送给联邦德国的协定德文文本中有几处译文不准产生理解上的分歧为由，坚持联邦政府必须再花些时间才能批准此协定。勃兰特的态度和举出的理由有些出乎勃列日涅夫的意料，他不理解，四国协定的条文已经用签约国的三种文字正式定稿，怎么还会出现不同解释呢？而且怎么可能个别词句经翻译就能作出不同于正式文本的解释呢？他得出结论，这里面肯定有故意的人为因素在起作用。他当面向勃兰特表示：“你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力图利用德译本来歪曲解释一些条款，以便给波恩拖延进一步谈判的可能。”勃兰特反驳说，他的工作人员绝不会歪曲协定的条文，并且即使他们想这么做也没有可能，因为两个德国每方各派五人——两名官员和三名翻译——参加协定的翻译工作，并且还有美苏两国精通德语的大使馆参赞在场。勃列日涅夫听后表示，苏联方面是不会干预翻译问题的。第二天，也许是勃列日涅夫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勃兰特搞僵，他向后者指出，《柏林协定》的最后议定书可以与

被批准的《苏联和联邦德国条约》同时生效，并且和缓地说：“事实上《柏林协定》自签署以来，已经显示出积极的结果了。”说着，他还冲对方微笑着眨了眨眼，意思是说，他们俩人现在坐在一起，就是例证之一。

奥列安达会谈的另一个引起双方重视的话题，就是欧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当时，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中欧共同均衡裁军会议的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而这两个会议能否召开并取得成果，对欧洲的安全与合作进程将是一个考验。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议是由苏联首先提出的。早在 50 年代中期，为了把美国的势力排挤出欧洲，分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就提出了召开只有欧洲国家才能参加的全欧安全会议，以后又不断以此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开始对此建议不屑一顾，但在与苏联争夺欧洲军事优势的竞争中，北约各国普遍感到越来越吃力，它们亟待解决如何在不增加防务开支的前提下解决防务的问题。60 年代后期，随着北约组织调整其战略方针，把首要任务目标定为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提出了北约与华约组织“共同均衡裁军”的主张，并建议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最初，苏联对此也不予理睬。但随着中苏关系紧张，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西方在欧洲缓和过程中实行所谓的“联系原则”，使苏联要想实现自己的建议就必须接受西方的建议，要想使像《苏联和联邦德国条约》、《联邦德国和波兰条约》得到批准就必须同时批准《四国柏林协定》，苏联终于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由勃列日涅夫发出了同意召开中欧均衡裁军会议的信号。

勃兰特来克里木之前曾到美国去了一趟，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这次来，给勃列日涅夫带来了西方对召开两个会议的反应。他告诉总书记，北约组织会为欧安会的召开打开绿灯，这样，该会议的筹备工作将会顺利进行，有望在 1972 年举行预备会议，勃列日涅夫听到这话表示很感兴趣。当勃兰特说美国和加拿大也将参加欧安会时，勃列日涅夫毫不迟疑表示理解。对均衡裁军，勃兰特传达了尼克松的意见，美国总统认为这种裁军不能只限于美苏之间的谈判，有关的欧洲国家都要参加。勃兰特也谈了他对“均衡”一词的理解，他说其中的关键是双方“不危及全球平衡地裁减中欧的部队和军备”。这时，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他曾在三个月前在格鲁吉亚发表讲话时说到的西方国家四处打听的那些问题：“开始的裁军是不是只应限于国外的驻军呢？是按百分比还是按单位比率进行裁军呢？在中欧裁军，范围是不是仅仅限于两个德国？”看着勃列日涅夫提出这些问题时的神情，勃兰特感到，对方是向他、同时也是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的。换言之，苏联领导人这时候对这些问题心里也没有确定的答案。如果勃兰特的感觉没有错，那么勃列日涅夫三个月前在格鲁吉亚的那次讲话就是“虚张声势”了。他在讲话中把提出类似问题的西方政治家比作滴酒不尝只凭外表就想品评酒味的人，但是实际上苏联人手中晃动的原来是一只空瓶子！这可能也是一种策略吧。

与勃列日涅夫单独会谈 16 小时，使勃兰特有机会更好地了解这名苏联领导人。与一年前在莫斯科初次见面相比，勃兰特发现了总书记身上的变化：

我认为可以肯定，我的对手在两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他作为苏联领导中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他自己也没有打算掩饰这一点。另一方面，他在讨论国际问题时显得更加自信。他很少依靠材料，这一次别人也给他作了准备，其他国家也是这种情况。

勃兰特的观察和感觉也许不大准确全面，但至少说明勃列日涅夫的外交

能力正在经历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这种能力的提高当然有赖于参与外交实践机会的增多，以及本人在这方面的进取心。然而同样不应忽视的是，自信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勃列日涅夫来说，自信心的增强与他地位的巩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勃兰特上面那段话中暗寓的，也许正是这一点。

不言而喻，在自己的国家里接待来访者是一回事，出访别国，特别是到那些自己还不熟悉、但又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国家去，就是另一回事了。在 1971 年 10 月之前，勃列日涅夫虽然频繁出访，但从没到过西方大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出访的局限性，无疑对扩大自己国家的国际影响多少有些不利，更何况苏联要想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还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合作呢，于是，勃列日涅夫终于举着缓和的旗帜走向西方了。

勃列日涅夫出访的第一个西方国家是法国。

戴高乐总统领导法国期间出于战略考虑与苏联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同时，对东方即苏联东欧各国实行缓和、谅解、合作政策的发源地也是法国。1960 年三四月赫鲁晓夫访法和 1966 年 6 月戴高乐访苏，都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1969 年 6 月接替戴高乐任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基本承袭了前任的外交大政方针，外交风格更为现实和富有弹性。他把法国首要的外交任务，不是定位在如何发挥全球作用，而是如何依据本身的实力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中、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夹缝中，求得法国的生存与发展，求得法国发挥东西方桥梁的特殊作用。因此，蓬皮杜继续推行缓和政策，并且紧紧抓住这一政策的中心：保持法苏特殊关系。而在 60 年代末那种环境下，苏联也不愿意看到戴高乐下台后法国对苏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希望继任者是个护“桥”的而不是拆“桥”的。在 1969 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苏联从多种渠道发出信息，希望长期作为戴高乐总统幕僚的蓬皮杜当选，蓬皮杜当选总统后的第 16 个月就来到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苏联给予隆重接待。勃列日涅夫出乎绝大多数西方记者意外地亲自到机场迎接，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市民站在宽阔的列宁大街两旁，挥舞着法苏两国小国旗，用精心学会的法文欢呼“蓬皮杜总统万岁”。这个欢迎场面，比七个月前蓬皮杜访美时受到的欢迎更为盛大、热烈，连随同蓬皮杜前来的法国官员也承认，如此盛大的欢迎场面让他们感到惊讶。访问期间，苏方还特意安排蓬皮杜参观了当年由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时规划兴建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礼遇了，因为除戴高乐之外，蓬皮杜是当时能参观这个享誉世界但又是对外绝密的基地的惟一西方领导人。访问结束时，双方签订了两个文件：《苏法宣言》和《苏法议定书》。双方表示同意召开全欧安全合作会议；两国政府不仅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要立即互相接触，而且确定政治协商成为定期性活动。勃列日涅夫率领政治局中的至少七人出席了签字仪式。而且苏联党、政、国家三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一致同意明年访法。合众社评论说：“这是这三人第一次同意一道到共产党国家以外的地方进行访问。”不过，一年以后，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个人去了。

1971 年 10 月 25 日，勃列日涅夫率领的代表团的专机降落在巴黎机场。勃列日涅夫偕夫人走下飞机，身后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弗·阿·基里林、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尼·谢·帕托利切夫。法国按最高礼宾规格鸣礼炮 21 响。欢迎场面与一年前的莫斯科相比不免逊色许多，偌大的机场上只有 300 余人到场欢迎，车队经过悬挂着苏法国旗的爱丽舍田园大街时，稀稀拉拉的人群只是表示了应有的礼貌，最富于浪漫色彩的

巴黎人这次没有向勃列日涅夫展示这一点。也许是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勃列日涅夫在追求时尚的巴黎还不大出名，也许是“冷战”下的欧洲乍暖还寒，勃列日涅夫必须承认，他对此访问造成轰动效应的期望不能太高。原定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由于怕出现不测而改在爱丽舍宫门前。蓬皮杜总统在欢迎词中说，即将举行的会谈“将不仅使我们能够探讨今天世界上一切重大问题，而且特别是将使我们能够在为和平继续作出努力方面达成一项协议创造基础”，因为，法苏之间的谅解是“欧洲安全的一个必要的和很可能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勃列日涅夫在事先拟好的答词中说：“对苏联人来说，法国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对苏联友好的国家。”他此行的真诚愿望是“尽可能进一步发展苏法关系，把它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以有利于“发展欧洲的睦邻关系和相互谅解”。之后，两人随即进行了只有两名译员在场的单独会谈。90分钟会谈结束后，蓬皮杜告诉等候的记者们：“会谈极为坦率和融洽。”晚上，蓬皮杜总统和夫人在凡尔赛特里亚农宫为勃列日涅夫及其夫人和苏联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有140道菜的盛大国宴。勃列日涅夫在祝酒辞中列出了此次法国之行准备讨论和关注的问题，如扩大苏法两国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召开全欧安全与合作会议、裁减中欧武装力量和军备、核裁军、消除军事集团对垒，等等。他还动情地回忆起战争年代他和他的战友如何渴望来巴黎，如果不是要参加红场的胜利阅兵，说不定在26年前他就踏上这块为世界贡献出伟大启蒙者、革命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土地了。

宴会上，宾主举杯言欢。一涉及具体问题，分歧还是掩盖不住。10月26日，蓬皮杜与勃列日涅夫的会谈比原计划超过两个多小时。在向新闻界发表的公报中，双方概述了已经取得一致的几个方面，但对中欧裁军等重要问题却只字未提。一位接近法国总统的官员称，公报表明，双方达成某几点协议容易，在此外的其他方面“要达成协议就下那么简单了”。双方显然都愿意促成欧安会召开，但在会议的最终目的上意见并不一致。法国想通过会议改变中欧的现状，苏联则要使东西德国的分裂状态保持下去。访问结束时发表了《苏法宣言》和《苏法合作原则声明》。前一个文件说双方希望不久的将来召开全欧会议、五大国核裁军会议，主张中东、印度支那和印巴问题政治解决。后一个文件包括13条内容，规定了双方及欧洲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同时，还签订了两国为期10年的发展经济、技术和工业合作的协定。在离开法国的前一天，勃列日涅夫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谈到此行所取得的成果时，用词审慎：

苏联和法国决定使彼此之风的政治合作变得更加深刻和巩固。我们扩大了对重大的边界问题，首先是对欧洲问题的态度上协商一致的范围。苏联和法国将更充分协调我们的努力，目的是在和平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和平，在保持和平的地方巩固和平。我们还一致表示决心，要使苏法两国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建立在巩固的、长期的基础上。

新闻界普遍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法国之行不能算失败，但他也没能拿到想要的全部东西。法国的《世界报》评论说，勃列日涅夫访法获得的是相对成功，“因为谈不上从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获得永恒和牢不可破的友谊”。对勃列日涅夫个人来说，这次访问无疑提高了他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上面的那

家报纸写道：访问可算是勃列日涅夫个人的成功，“他决意让人们了解，三架马车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是真正的克里姆林宫头号人物了”。

《纽约时报》也有同感：“今年秋天成了苏联外交中主要人物的勃列日涅夫，访问巴黎的意图是既要使他在西方的个人形象变得美好和得到抬高，又要向欧洲显示同莫斯科直接打交道的好处。”一位西欧国家的大使谈到他对勃列日涅夫巴黎之行的感觉说：“勃列日涅夫想要使人们觉得，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他不是一个搞强硬路线的人。”接触过柯西金、这次又目睹勃列日涅夫在外交场合表现的一位法国外交官，把两人作了比较：“同他交谈比柯西金容易。柯西金的举止与勃列日涅夫不一样。柯西金讲起话来可以像机关枪那样讲得很快。他要求摆出事实和数字，并且立即给予回答，勃列日涅夫则总是毫不犹豫地开一两个玩笑。”

此后，蓬皮杜在 1973 年 1 月 11—12 日再次来到苏联，这次是非正式访问，由勃列日涅夫在明斯克附近的扎斯拉夫尔接待并进行了会晤，在随后发表的公报中说，双方就欧洲局势交换了意见，达成了进一步扩大贸易及发展工业和经济合作的协议，同时说明，勃列日涅夫接受了再次访问法国的邀请。同年 6 月 25—27 日，刚刚结束美国之行的勃列日涅夫第二次访问法国，与蓬皮杜总统举行了会谈。据塔斯社报道，在这次访问中，苏法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就两国关系的前景和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进行的工作会谈。在美国期间，苏美签订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苏美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 12 份文件，满载而来的勃列日涅夫在欢迎午宴上踌躇满志地说：“如果说不久前国际局势的整个背景还是‘冷战’的思想和政策，那么现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世界处于忐忑不安的局面已经消除”，“我们仿佛跨越了危险紧张的地带”。但法国并没有感到同样的欢欣鼓舞，蓬皮杜只是强调，那些协定“是苏美的双边协定”，表示出法国特有的独立立场。对苏联竭力要把法国拉入其内的中欧共同均衡裁军谈判，蓬皮杜仍然坚持所谓的“空椅子”政策——拒绝参加，1974 年 3 月中旬，当时已身患重病的蓬皮杜最后一次访苏，来到黑海之滨的皮聪大会晤勃列日涅夫。尽管这次会晤的结果仅限于交换意见，但拖着病弱之躯还强作欢颜的蓬皮杜给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法国总统蜡黄的面容和每次上下汽车时无法掩饰的痛苦表情感到吃惊。当人们看到步履艰难的蓬皮杜和在一旁小心翼翼搀扶着他的勃列日涅夫，不知作何感想。这是苏法“特殊关系”的写照呢，还是两国关系即将发生变化的前兆呢？

三个星期后，这个在自己的国家为勃列日涅夫搭建了第一次向西方“亮相”舞台的法国政治家，在巴黎逝世。1974 年 12 月上旬，勃列日涅夫率代表团第三次访法时，在巴黎迎接他的已是新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了。尽管德斯坦竞选时并不是苏联最满意的人选，但他当上总统后对法苏特殊关系的态度并没有让苏联失望。有了这一条，欧洲的缓和进程至少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了。特别是德斯坦在去拜会美国总统福特之前，先接待勃列日涅夫来访，显示了他对法苏特殊关系的理解。在与勃列日涅夫会谈中，他改变了其前任对欧安会的保留态度，表示只要能达成合理协议，他愿意前往赫尔辛基参加欧洲安全首脑会议。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个不错的“见面礼”。所以这次会谈，用公报中的话说，“渗透着苏法关系特有的友好和相互了解”。另外，这位法国总统的潇洒举止也给苏联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亲自驾驶直升机前来参加会谈，令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惊奇不已。第二年 10 月，德斯坦

总统首次访苏，他又做了一件以前任何西方国家元首都没做的事情：向列宁墓献花圈，他所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墓碑前的下跪。尽管这次访问期间，他和勃列日涅夫在对缓和的内涵理解上出现分歧，勃列日涅夫此后以身体不适为由改变了会谈安排，但法苏特殊关系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正是在德斯坦任总统期间，法苏经济技术合作有了长足发展。

1973年5月，勃列日涅夫又在全世界的广泛注意之下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这是自德国分裂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来到联邦德国，也是勃列日涅夫继19个月前首次访问法国后出访的第二个西方大国。东西德国的分立如同一道屏障，使欧洲处于分裂、隔绝状态将近30年。如果说1970年勃兰特首次访问莫斯科是从西向东穿越这道屏障的第一人，那么勃列日涅夫的这次波恩之行就是从相反方向继续踏破屏障的领航员。

苏联、联邦德国《莫斯科条约》和波兰、联邦德国《华沙条约》的签订，特别是四大国《柏林协定》的签署及在1972年6月3日正式生效，推动了欧洲的缓和进程，也使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发生松动。两个德国经过一系列的接触和谈判，于1972年12月21日在波恩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条约》。在勃兰特等人的努力下，联邦议院正好赶在勃列日涅夫访问之前对该条约进行了表决，结果以281票同意、226票反对通过了基础条约。这样，勃兰特有了一件可以送给老朋友的不错的见面礼了。

临行前几天，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了西德《明星》画刊主编南宁的采访，谈到他此次访问的目的，是要继续签订《莫斯科条约》时所开始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两国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此外，他说，他还将与勃兰特极有兴趣讨论两国都能发表意见的重大国际问题，“不用说，这首先是指欧洲事务”，其中“就有关全欧会议及其结果的问题交换意见有重大意义”。知道勃列日涅夫亲身经历了苏德战争全过程的南宁，想了解这个当年的红军政委“将怀着怎样的感情”前往联邦德国，勃列日涅夫巧妙地回答：“我将以极大的兴趣和诚意并不抱任何成见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5月18日，勃列日涅夫在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民用航空部长、空军元帅鲍·帕·布加耶夫，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塔斯社社长列·萨姆杰京，以及总书记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等人陪同下，抵达波恩，开始了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勃兰特亲自到机场迎接。尽管勃列日涅夫说他不会抱任何成见，但在检阅身着制服、持枪佩刀的国防军仪仗队时，勃兰特发现当年的红军政委还是有点不自然。随后的几天中，勃列日涅夫与勃兰特或单独、或在小范围进行了多次会谈，两国代表团之间也举行了正式谈判。勃兰特感到，与前两次相比，勃列日涅夫似乎更加自信了。他告诉勃兰特，他在上个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作的关于开展国际活动的报告被一致通过。他在报告中给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以应有的注意。在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对党在二十四大上制定的对外政策以及他自己在推行这种政策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这都是过去的成就了，现在的问题是以新的内容去继续充实它。勃列日涅

此次例行全会于4月26—27日举行。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题目为《关于苏共中央为实现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而开展的国际活动》。在全会就此通过的决议中特别指出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在中央全会决议中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作用作出如此评价，这还是第一次。

夫表示，苏联当然不会谋求联邦德国成为自己的军事盟国，但苏联愿意把它看做反对复旧的盟国，看做超出双边关系的好伙伴。他希望勃兰特能与他一起完成一个“英雄业绩”，用能让两国人民充满信心、恢复相互信任的新关系，抹去30年前那场战争留下来的痛苦记忆，至少应该冲淡它。同时，他还给勃兰特带来了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的口信，为了早日摆脱曾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造成巨大创伤的“该死的《慕尼黑协定》”，胡萨克准备从他那方面配合联邦德国的行动。勃列日涅夫对此事看得很重，他觉得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树立起一个明确的标志，以清楚地表明我们是愿意继续1970年所开始的事业的”。勃列日涅夫还谈了扩大两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他一再表示苏联赞成大规模经济合作，可以跟联邦德国经济界签订30年、40年、甚至50年的协定。在这方面，他的冶金工程师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也许是受特定环境的影响，也许是想强化对苏联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意义的认识，访问期间勃列日涅夫在不同场合几次提起战争年代。在一次勃兰特在自己位于维纳斯山的官邸举行的私人晚宴上，勃列日涅夫又情不自禁地讲到了战争时期。他讲到苏德战争爆发的那天他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经历，讲到了战争爆发前苏联和德国的关系，当然更多的还是讲到了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苦难。他越说越激动，描绘了许多德国人犯下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以及战争恐怖的细节。情绪激动之中，他也顾不上措辞的严谨了，不断用“法西斯大兵”或“法西斯入侵者”之类说惯的词，泛指进入苏联的所有德国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勃兰特邀请来做陪的高级官员，正好有一个就是当年的德国士兵，而且恰恰被随部队派到了苏联前线。此人就是当时任联邦财政部长、后接任勃兰特出任政府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战争爆发的最初两年，他所在的第一装甲师就在苏联作战。作为当时一名接近德军士兵的下级军官，他对战争的残酷性和被当成炮灰的士兵们的真实情绪有他的理解和感受，他对勃列日涅夫一概把德军士兵称之为法西斯表示不敢苟同。他向勃列日涅夫谈了作为苏联人不了解、也不容易理解的德国士兵，包括军官在内的一种普遍的矛盾心情。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人是纳粹分子并且绝对忠于“元首”，但他们又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作为军人有义务执行军事上司的命令。他请勃列日涅夫注意德国国防军中这样一些军官，他们一方面为了国家同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又反对甚至憎恶希特勒。因此，他们愿意搞政变，却不愿意叛国。白天他们尽军人的义务，晚上则诅咒希特勒和战争。他们也必须承受战争的残酷和人情上的种种煎熬，尽管施密特说的这种“爱国”听起来很幼稚，但这倒正好符合当时那年轻士兵和军官的心理特点，因此，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印象。至少，他看得出这个昔日战场上的敌人，现在讲得都是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对这位财政部长有了初步的信任和尊敬。在施密特出任联邦总理后，两人曾多次会面，其中有两三次提到了这次晚宴上的谈话。对施密特留下的最初印象深深刻在勃列日涅夫的头脑中。1980年夏，双方在一次会谈中气氛有点紧张，当时施密特对勃列日涅夫说：

联邦德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虽然自1971年3月就开始了对话，但由于双方对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看法不同，关系发展不快。前音认为该协定应从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失效，后者坚持认为应从其签订之日起就无效。勃列日涅夫访德当月，联邦德国和捷政府开始进行正式谈判，并于同年12月11日签订了《布拉格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

“总书记先生，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勃列日涅夫马上回答：“这是真的。”

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的结果，是双方签署了为期 10 年的《发展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等文件，以及一份《联合公报》。离开联邦德国的前一天，勃列日涅夫在电视讲话中对访问取得的成果作了积极的评价，同时重申了苏联要争取的目标，即“要在欧洲大陆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转向缓和及和平”。他对着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呼吁：

曾不止一次地爆发侵略战争而造成极大破坏和千百万人死亡的那个欧洲，应当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希望由一个新的欧洲，各国之间和睦、相互信任和互利合作的欧洲，来代替它。

密切注意这次访问的国际社会，纷纷作出评论。法新社说，勃列日涅夫此次访问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中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双边关系中，“它是通向建设共处道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国际关系上，这次访问“一定会有助于西德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谈判”。《华盛顿邮报》则从苏美关系的角度体会勃列日涅夫西德之行的意义：“赫鲁晓夫 1959 年对美国的访问并没有产生什么持久的结果，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德国问题’没有解决。正是德国问题的解决使得去年能够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议。”英国《观察家报》驻莫斯科记者德夫·特拉尔从几年中勃列日涅夫在外交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感到现在的他与以前不同了：“看来，勃列日涅夫似乎已经达到他所攀登的权力的顶峰。就头衔来看，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一个集体领导中的高级人物，而实际上，他却使自己成了既是德国总理又是美国总统那样的人物。自 1971 年 4 月苏共二十四大以来，集体领导的形象就让位分斗领导人对重大政策——最近表现为对外政策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形象。”

如果勃列日涅夫当时看到了这些评论，他应该更加踌躇满志了。从联邦德国回来后，他马上准备一个月后的另一次出访。这又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因为他即将去的地方是西方世界的大本营——美国。

第十四章 超级大国的“蜜月”

当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9 年 1 月 20 日那个阴沉、寒冷并刮着大风的日子宣誓就任第 37 届美国总统时，几乎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曾以反共著称的政治家，会在他的任期内成为打破封冻美国与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关系坚冰的首航员。不过，他的就职演说还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说：“历史所能赐予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的称号。如果我们取得成功，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我们这些今天活着的人时会说，我们掌握了时机……”眼尖的记者发现，在尼克松发表演说时，站在他身后的他的夫人帕特手中捧着一本打开的《圣经》，那一页上写着：“他们将铸剑为犁，把长矛锻制成修树剪。各族不再向他族举起刀剑，它们都不再学习征战。”

在随后雪片般飞来的贺电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发来的电报，电文除了礼节性的外交辞令外，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27 天后，尼克松的日程表上才安排了接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来白宫的首次正式拜访一项。他在苏联大使面前并未掩饰苏美之间存在着的“很大的根本性分歧”，不过他希望能解决这些分歧，“至少应该确保我们之间不致因为缺少联系而产生不和”。多勃雷宁交给美国总统一份正式照会，表示苏联准备就中东、中欧、越南和武器控制等一系列问题求得进展。尼克松则提出，一方面的进展应同其他方面的进展联系起来。他针对多勃雷宁提出的苏联政府希望苏美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问题，认为在开始上述谈判时，努力缓和其他地区的剑拔弩张的紧急形势，也是苏美“义不容辞”的责任。

苏联如何对待这种“把各方面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政策”，尼克松还要拭目以待。但从美国这方面说，即将进入 70 年代的美国，背负的重担和脚下的羁绊使它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原来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内部的分化组合，使世界的政治格局趋向多极结构，美国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与以前相比不是加强而是面临着削弱；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卧薪尝胆”奋起直追，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基本扭转了军事战略力量上美国占优势的局面，达成两国之间的大体均势：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地位的下降动摇了其霸主地位，不仅法国继续奉行独立政策，就连昔日对其惟命是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也在悄悄地在经济上与美国展开竞争的同时，时常让世界注意到它们在某些问题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还有，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越来越让美国感到，也让全世界相信，它对美国来说已经不是荣誉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了，甚至让美国在亚洲这片不大的泥潭中看到了灭顶之灾的阴影：此外，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也迫使新总统要面临一个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尼克松虽然不能预设未来，但他能够面对现实。他认识到，该是着手调整美国全球战略并修正对外政策的时候了。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欧洲的中心位置和防苏反共的主题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尼克松的政策调整，也不会偏离、更不会放弃这两个基本点。但是，面对 70 年代初欧洲逐渐高涨起来的缓和思潮，在法国、联邦德国已经率先行动起来的情况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明白，如果不想使美国的政策遭到孤立和失败，就必须去适应当前的现实，在不放弃基本点的同时，调整策略和方式，以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作为把外交看得比内政更重要的总统，尼克松不仅紧紧控制着外交政策的制定权，而且相信，总统本人的外交活动

往往在推行政策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在蓬皮杜、勃兰特等先后访问莫斯科后，美苏之间的最高级会谈被提上了议程。

苏联领导人当然明白，缓和的进程可以在欧洲启动，但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苏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和。没有苏美之间的缓和，缓和就很难说是“健全的”。困难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性对抗，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大大复杂化了。它们的矛盾已经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范围”。如果说这些矛盾的形成是由它们的利益对抗决定的，那么同样肯定的是，缓和不能单方面损害两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家的利益。这就需要一个复杂的协调利益的过程。但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苏联所面临的形势，特别是中、苏关系紧张的局面，使苏联领导人迫切需要用缓和的成果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正因如此，苏联愿意向西方国家开列出准备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但却不愿意把所有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因为后一种办法既费时又不容易取得成果。在尼克松上台后，苏联首先表示希望举行两国之间的最高级会谈，但题目是单一的。

主张实行“联系原则”的尼克松政府开始对苏联的主动反应冷淡。但很快发现，它可以用欧洲的柏林问题和亚洲的中国两张“王牌”迫使苏联在美国最关心的越南战争上施加对美国有利的影响，于是它反过来催促苏联方面尽早确定双方最高级会谈的日期。当“球”踢回来后，苏联反而并不着急了。在没有确定对方的“要价”和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时，苏联宁愿把最高级会谈先挂起来。然而，尼克松迅速抓住了能让苏联不得不行动起来“要害”——中国：1971 年 4 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紧接着，尼克松宣布放松对中国的禁运和货币管制；7 月 15 日，在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北京后的第四天，中美两国在同一时间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仅过了四天，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会见基辛格时表示，完全赞同举行苏美两国间的最高级会晤，并且询问能否在尼克松访华前进行。8 月 10 日，苏联向尼克松发出正式访苏邀请。10 月 12 日，苏美发表公告，宣布苏美首脑会晤将于 1972 年 5 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

为了给首脑会谈做准备，基辛格再次执行“秘密使命”，于 1972 年 4 月 20 日抵达莫斯科，进行为期 4 天的秘密访问。第二天，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等人进行了会谈。与基辛格听到的情况不同，勃列日涅夫是按提纲进行会谈，而不是像传闻的那样宣读书面讲稿。他向基辛格表示了苏联对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取得成功的信心，他做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不在最高级会谈上吵架。要吵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吵。”对基辛格，勃列日涅夫履行了这一诺言，四天中没有让前者感到特别不愉快。但等到尼克松来了之后，这个诺言似乎又被忘记了。

在见到勃列日涅夫之前，让基辛格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越南问题。从基辛格抵达莫斯科的那个月的第一天起，美国政府以越南北方武装力量越过非军事区向南越发动大规模进攻为借口，授权美国空军对非军事区以北地区进行袭击，打击范围超过 18 度线扩至 20 度线以北的海防与河内等城市，并且第一次使用了 B—52 轰炸机。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计划是，利用苏联领导人急于举行苏美最高级会晤的心情，迫使苏联向其支持的越南北方武装力量施加压力，后撤其越过非军事区的部队，并在美国限定的时间里重新回到巴黎的谈判桌上进行谈判。对苏联会不会屈服于这种压力，基辛格没有把握。在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会谈中，主人并没有对轰炸河内和海防表示强烈

的不满,勃列日涅夫措辞微妙他说,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使得气氛有点阴沉”,并马上补充说:“我不是说这将会减少会议成功的前景。”对于基辛格提出的条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连基辛格自己都觉得“露骨”和“挑衅性”的言辞,勃列日涅夫的反应,用基辛格的话说,“极其温和”、“异常地和解”。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基辛格的一种印象,即苏联领导人“优先注意的显然是最高级会谈和美苏关系,而不是越南”。经验丰富的基辛格马上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而不致引起苏联威胁取消最高级会谈。”同时,勃列日涅夫对中国表露出的担忧和敌意,也让基辛格对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基辛格正是像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不愧为“自冷战初期以来最出色、最值得称道的美国外交家”,他仅仅经过一二个回合,就猜中了对手扣在桌上的那张底牌。

看看这个工于心计的美国外交家对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印象挺有意思,它为丰富勃列日涅夫的画像也许会有帮助。在他看来,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典型的俄国人。他又粗鲁又热情,又蛮横又可亲,又狡猾又善于使人不生芥蒂”。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他给后者的印象是,“显然是苏联的最高领袖”,但“还没有掌握全部权力”,因此他特别注意使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也参加会晤,以使对方明白,“他是在阐述一个集体商定的立场”。他有权对这个立场“做一点细微的补充”,但不能“擅自断然改变立场”。不过,“如果他深信有必要改变立场,他是可以说服政治局跟他走的”。在以后又多次接触过勃列日涅夫后,基辛格回过头来再看勃列日涅夫,感到“越往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威显然越增加了”。

对勃列日涅夫在会谈时的表现,基辛格也作了生动描写:

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勃列日涅夫似乎有点紧张;这大概是因为他对于初次同美国的高级官员打交道感到没有把握,部分地也是因为他吸烟、喝酒太多,曾经犯过心脏病,工作压力太重。他的双手总是在动,把表转来转去,香烟灰弹掉,或者用烟嘴敲击烟灰缸。他是闲不住的。当译员在翻译他的讲话时,他会烦躁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同他的同事们大声谈话,甚至不加解释就离开房间,过一阵儿再回来。因此,同勃列日涅夫谈判还包括这样一种异常的特点,即他随时都可能失踪,或者当你正讲得最雄辩的时候,他不是专心听你讲话,而是硬逼着你吃东西。

要知道,基辛格此次访苏主要是为一个月后尼克松访苏做准备,他对苏联领导人的各方面情况的观察、了解,或多或少会影响到美国总统。因此,尼克松在踏上苏联国土之前,应该是对自己的谈判对手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相反,勃列日涅夫对即将到来的尼克松的了解就要少一些了。尽管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都会见过美国总统,但他们都没机会像基辛格那样有这么长时间、从这么近的距离去感受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说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会见,从两人的地位上可以说是平等的话,那么在心理准备上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假如这可以算作一个因素的话,那么它将使得天平在这场“超重量级”的碰撞中倾斜向哪一方呢?

1972年5月22日,星期一,当地时间下午4时,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细雨蒙蒙的机场上,没有组织盛大的欢迎场面,据说用公共汽车专门接来的200多名工人,站在远处的栏杆外,手中挥动着小旗。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及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首的各界要人，列队站在停机坪一侧。按照外交礼仪，身为党的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到场迎接。看来，苏联是有意要把欢迎的场面压到最低规格，因为无论是蓬皮杜两年前首次访苏，还是勃兰特一年前到克里木会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都没有囿于什么“外交礼仪”，而亲自到机场迎接。美国人对这种场面并不感到吃惊，与三个月前没有任何欢迎人群的北京机场相比，这里毕竟多了一点象征性的群众欢迎场面。更何况由于尼克松在5月8日宣布对北越港口布雷及增加空袭的强度，舆论界一度对尼克松能否如期飞往莫斯科持很大怀疑，所以当尼克松迈下舷梯的最后一阶站在苏联首都的土地上时，人们在轻轻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马上意识到，莫斯科接待美国总统的第一幕既要搞得比北京热烈些，又不致引起河内的不快。

尼克松和夫人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中下榻。没等尼克松夫妇看完下榻处华丽的宫殿和内藏的珍宝，基辛格来告诉总统，勃列日涅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会见总统。

尼克松早在13年前就以副总统身份访问过莫斯科，会见过赫鲁晓夫，并与赫鲁晓夫在当时举办的美国工业技术展览会上有过一次著名的“厨房辩论”。在那次辩论中，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就站在赫鲁晓夫身后，两个人可能谁也没想到，13年后的今天他们会作为各自国家的首脑站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首先告诉尼克松，在美国最近对越南采取新的行动后，苏联方面能如期举行这次首脑会议很不容易。只是由于认为改善苏美关系和两国间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十分重要，才使这次会谈成为可能。勃列日涅夫并非是在虚张声势。5月上旬和中旬，政治局曾多次开会讨论越南出现的新局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美国正在轰炸苏联的一个事实上的盟国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在莫斯科接待美国总统。政治局内对此意见并不统一。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军方高级领导人反对举行最高级会谈，波德戈尔内支持这种意见。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赞成会谈如期进行，苏斯洛夫和一部分委员在要缓和还是要意识形态斗争上一时拿不定主意，勃列日涅夫尽管非常愿意再次充当缓和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但在军方的反对下也犹豫不决了。不过，河内领导人的做法让莫斯科很失望，并最终促使政治局内意见的天平倾向举行最高级会谈。越南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拒绝向给予他们巨大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苏联人透露他们的军事计划和对美政策，甚至对同美国人进行谈判的情况也对莫斯科保密。结果，莫斯科觉得自己常常被河内弄得措手不及。所以苏联领导人最终取得一致：不能把决定苏美关系的权利交给河内。

政治局取得一致后，为稳妥起见，又决定把此问题提交5月份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讨论。这次全会在尼克松到达前三天召开。勃列日涅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稳住河内，更需要克服来自党内的阻力。中央全会通过了决议，其中最后一段话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说全会责成中央政治局继续实施二十四大的和平纲领，“并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各种形式和方式实施这一纲领”，把解决当前的直接任务同长远的前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全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并作出这样的决议，表明在尼克松把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苏联党的领导层内感到有必要统一全党的认识，让意识形态的分歧服从缓和的大局，而不是相反。勃列日涅夫也有所得，从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看，他获得了可以自由行动的应允。就在尼克松抵达的前一天，

《真理报》仍然在做说服解释工作，在题为《党的列宁主义政策》社论中，一方面表示赞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要求武装干涉者离开印度支那”的建议，一方面再次强调，“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为使双边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苏美会谈，完全符合世界社会主义和加强普遍和平的利益”，而且特别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以求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来看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进行的对苏联的访问”。熟悉苏联党内斗争的人都知道，“求实的现实主义态度”一句不会是没有所指的。

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表示，他觉得建立和发展与尼克松的个人关系很有必要和好处。尼克松告诉总书记，他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位盟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历史，发现那时下级之间的分歧往往由于在最高一级达成协议而得到解决。“我希望和总书记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尼克松说。

勃列日涅夫爽朗地回答：“我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方面是完全准备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那些官僚去决定，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什么进展了。”尼克松抓住机会不放松。

“他们只会把我们埋在纸堆里！”勃列日涅夫说完开心地大笑，把掌心往桌面上拍了一下。尼克松也笑了，他心里想：这个开端看来还不错。

两人首次会谈后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多棱宫，出席苏联政府为美国代表团举行的国宴，波德戈尔内致祝酒辞。美国的资深记者威廉·瑞安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讲话中悄悄改变了以前苏联传统的提法。以往，苏联的一贯提法是“增进同美国的关系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现在波德戈尔内说，“增进同美国的不仅是良好的、而且是友好的关系，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瑞安在给美联社的新闻分析中写道：“一位美国总统刚下令对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港口布雷以阻止苏联军用物资运往北越，而苏联领导人却谈论同这位美国总统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刻。”勃列日涅夫显得兴致很高，感情洋溢。他抽着烟，时时侧过身与尼克松交谈。每当他转动身体的时候，领带上别的金刚钻领针在天花板上悬吊着的四个巨大铜烛台上洒下的烛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指着对面墙上比真人大几倍的《耶稣和使徒最后的晚餐》壁画，打趣地对尼克松说：

“噢，那是当年的政治局。”

尼克松听了作出仿佛悟出什么的样子：“那就是说总书记与教皇有许多共同点喽。”

勃列日涅夫放声大笑，伸过手和尼克松握了一下。接下来的一周内，双方代表团或分或合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会谈所讨论的问题范围很广，像欧洲的安全与合作、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中东地区局势、国际行为准则、中国、核军备控制、越南战争等都包括在其中了。双方代表团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虽然也有争论，但基本上是泛泛而谈，真正涉及实质性问题或是取得突破的还是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以及他们最亲密的顾问参加的小型会谈。在这种短兵相接式的交锋中，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个性和他的外交风格。

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这次首脑会晤预定要达成协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从1969年11月初开始，美苏双方就此问题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到尼克松来莫斯科之前，两国代表团历时30个月，经过123次会谈，总算拟定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草案和《限制进攻性战略

武器临时协定》草案，提交莫斯科首脑会谈审定，在讨论上述两个草案时，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仍需统一，其中第一个草案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两国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应部署在距首都多远的地方。尼克松要求苏联把反导弹系统放在距莫斯科 1500 公里的地方，在 5 月 23 日下午的会谈时，勃列日涅夫同意了。但到晚上再次会谈时，勃列日涅夫似乎漫不经心地就把几小时前谈妥的数字减少了：

“关于反弹道导弹问题，看来已经解决了。1200 公里，我们同意。”勃列日涅夫说。

翻译刚刚翻完这句话，尼克松马上纠正道：“是 1500 公里。”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中国去吗？”勃列日涅夫显得有些生气。

“可是，总书记应该了解，我是从来不为小事斤斤计较的。”尼克松没有让步。

勃列日涅夫沉默了片刻，然后耸耸肩，有点无可奈何他说：“1500 公里，也可以。你要我们东移，我们可以这么办，马上就能办。”他左右看了一下其他人，像是自言自语：“1200 公里我们接受起来轻易些，不过 1500 公里也行。”

尼克松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基辛格，他对后者告诉他的关于苏联谈判代表惯用的手法之一总算有了亲身体会。这种手法就是苏联人善于在一个已经商妥的问题上，而且往往是细节上，突然提出回到原来立场的修改意见，一方面考验对手的机警程度，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哪怕是微小的好处。因此，有过亲身体验的基辛格总结出一条“经验”：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看来，尼克松是有这方面心理准备的。

不过，尽管作了相当周密的准备，美国客人仍然遇上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事：总书记在双方代表团成员和总统保安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竟成功地“绑架”了美国总统。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令所有目击者终生难忘。

5 月 24 日下午举行了《苏美联合探索太空协定》的签字仪式。按原计划，当日晚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到他的莫斯科郊外别墅共进晚餐，同时讨论越南问题。原订签字仪式结束一小时后出发去别墅，但当勃列日涅夫陪着尼克松从大厅里出来时，勃列日涅夫忽然对美国总统说：

“我们干吗不现在就到郊外去，趁天还没黑看看那里的景色呢？”并且不由分说，拉着尼克松的臂膀，把他推进电梯，下到一楼，门外停着勃列日涅夫坐的那辆高级吉尔牌轿车。勃列日涅夫把尼克松让进汽车，也不招呼司机，自己坐在驾驶席上，启动汽车急驶而去。跟在后面的美方人员乱了手脚，基辛格情急之下，跳上一辆苏方的后卫车，总算没被抛下。而他手下两名讨论越南问题必不可缺的专家温斯顿·洛德和约翰·内格罗庞特拼命想找一辆车跟上去，但只是在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已经到达别墅后，快急疯的他们最后找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外国领导人安全的局长安东诺夫将军，才如愿以偿。

勃列日涅夫驾车高速行驶了约 40 分钟，到达别墅。别墅坐落在地势略高、树荫掩映的莫斯科河边。别墅是两座小楼，外表很普通，甚至算不上雅致，但内部陈设不失舒适。别墅前是一块草坪，一直伸展到莫斯科河岸，岸边停着一艘小型水翼艇。下车以后，勃列日涅夫又兴冲冲地建议尼克松坐船游览一下莫斯科河两岸风光。不过，这次勃列日涅夫没有充当驾驶员，技术

熟练的驾驶员驾着水翼艇以差不多每小时 90 公里的速度平稳地载着两个大国的第一号人物飞驰了近一个小时。

两人回到别墅时，心情都不错。这时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以及基辛格和洛德、内格罗庞特都已赶到别墅，会谈马上开始。然而，话题一转到越南问题上来，轻松愉快的气氛顿时消失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像事先商量好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向美国人发出谴责，勃列日涅夫指责美国最近对越南北方的空袭是“残暴”的轰炸，说尼克松并不是真心想结束战争，而是想利用中国来压苏联干预北越，把苏联置于一种非常难堪的境地，并且据基辛格的理解，有几次勃列日涅夫甚至影射美国的政策和希特勒的政策相似。勃列日涅夫在发言时情绪激昂，时时为了强调自己的语气而拍下桌子。柯西金则冷静得多，但是他的话却是最厉害的。他说，他访问美国时会见过林登·约翰逊总统，后者预言美国在越南会获得胜利，但结果还是失败了。显然，他是告诉眼前这位美国总统如果不悬崖勒马，也将落得同样下场。他冷冷地对尼克松说：

“总统先生，我认为你过高估计了在目前情况下，以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北越人可能重新考虑其他国家的军队开进去和他们一道作战的。”

尼克松被这句话刺痛了，他开口说道：“这种威胁一点也吓不倒我们，不过，你不妨把话说得再具体些。”

柯西金仍然不动声色：“不要搞错了，我们的话是威胁，你们的话就不是威胁。我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作一番分析，这比威胁要严肃得多。”

波德戈尔内最后发言，他措辞也很尖锐，但口气相对缓和。他谴责对越南的战争是“非法的”，“是纯粹的侵略”。在他发言时，勃列日涅夫在他背后来回踱步，口中喃喃有词。波德戈尔内讲完后，勃列日涅夫又讲了几句，然后室内出现了一阵寂静。过了一会儿，尼克松发言，他提到苏联在促进美越重新会谈上所起的作用，把破坏会谈和引起越南战争升级的责任全都推到了河内方面，说美国在越南采取的行动是由于“没有别的选择”，是“完全冷静而客观地作出的决定”。尼克松的发言声调并不高，但有些措辞——特别是指责北越的时候——也很严厉，但苏联领导者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没人对此表示反感，也没人进行反驳。尼克松说完后，勃列日涅夫只是淡淡他说，双方“对一件世界大事进行了极认真的讨论”，从尼克松的话中他得出结论，美国愿意寻求一项“合理的解决办法”。柯西金虽然还是板着面孔，但话中意思跟刚才不同了，他说，现在苏联开往越南的船只“运去的只是面粉和粮食，没有任何武器弹药”。

苏联领导人的突然爆发和随即的沉默，使美国人先是感到不解，然后又“恍然大悟”，他们“其实是在演戏给人看”。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就说他是突然悟到这一点的：

他们的口气充满敌意，态度极为蛮横，然而所有的讲话都没有包含要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思。……苏联领导人只是说一通空话，并没有逼迫我们做什么事。他们发言只是为了记录在案。所说的话够编成一份记录应付一下河内就算了。

基辛格的感悟得到了多勃雷宁的印证。他在 1995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把尼克松请到乡间别墅秘密讨论越南问题是政治局的决定，为的是“不破坏友好认真的谈判气氛”。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试图使尼克松改变或调整对越

政策，但由于提不出新的具体建议而未能成功。然而，对苏联领导人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向河内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报说他们已经做出了努力，这样他们在越南人面前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这场突然上演的“激情戏”持续了大约三小时后结束，时间已是半夜11点了。主人建议用餐，双方来到餐厅，面对丰盛的酒菜，气氛又迅速变得热烈友好了。每个人都像换了个人似的，相互敬酒、谈笑，仿佛刚才那场咄咄逼人的唇枪舌剑根本没有发生过。在五个小时中，双方从轻松欢快到厉言相责再到谈笑风生，情绪气氛大起大落，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对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紧急应变能力的特别考验。

在苏美莫斯科会谈期间，为了烘托会谈气氛，向世人显示会谈的成果，双方几乎每天都签署一到两个协定或条约。在所签订的九个文件中，对双方来说重要性并不相同，因此代表各自国家签字的人也不一样。就苏联方面说，勃列日涅夫代表本国在四份文件上签字，这四份文件即《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条约》、《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关于建立美苏贸易委员会的协定》和《美苏相互关系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此次会谈的核心，也是最被看重的成果。代表苏联签字的既不是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也不是政府首脑柯西金，而是党的总书记，这本身就说明苏联方面的重视。相反，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这种印象，即勃列日涅夫才是苏联的第一号领袖。

这次会谈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都引起各国新闻界、政治家及专家学者的极大注意。《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次最高级会谈“如果不是双方把早先的意识形态情绪冷却下来，以及把国家的自身利益放在新的首要地位的话”本来是不可能开成的，即使开成也很难取得成果。英国《每月邮报》也认为，在苏联制造的武器正在打南越、美国的B—52轰炸机正在轰炸北越的时候，“对于两个在世界上拥有能使千百万人死亡的最大毁灭性武器的国家来说，这次会谈意味着战后的现实政治达到了顶峰”。法国外长舒曼对记者说，“没有哪个人能够否认这次尼克松访问是一个重大事件”，莫斯科“会谈将会大大有助于全世界局势的缓和”。一名美国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把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和莫斯科之行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尼克松“去北京是一场历险，来莫斯科是商人聚会。在北京，尼克松总统是马可·波罗，在探险的旅途中对新奇事物惊叹不已。在这里，他是个旅行推销商，怀着想在一个熟地方找几千个新主顾的希望，不过手段是精明的”。《真理报》在题为《关心人类》的社论中指出：“莫斯科会晤的气氛是坦率的和求实的。会晤的积极成果给人类带来好处。”针对双方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塔斯社评论员尤·科尔尼洛夫写道，它“将作为向限制军备竞赛迈出的一大步”而载入史册，现在“对于裁军是一项切实可行的、并且今后仍需满怀信心为之奋斗的任务这一真理，有谁还能否认呢”？多勃雷宁也说，他当时认为此次会谈获得了重大成功，确立了缓和政策，并且“把许多美好的希望和这项政策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又承认，在冷战的惯性下，他对此并不是没有任何疑虑。

第一次见面的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自然也对对方有了直接的认识和印象。在尼克松眼中，勃列日涅夫更像美国的一位大工会领袖，这并不是贬低他，相反尼克松认为能上升到苏联执政党的最高地位，勃列日涅夫必须具备高明的政治才能和坚强毅力才行。他的口才可能不如别人雄辩，风度也不是

最潇洒的，但“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说话的声音深沉有力——不论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你都能感到他身上洋溢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和魄力。”

“他有时说话过多，并且不尽确切，但常常能够很有力地表达他的意思，同时也十分精明，善于在辩不过人家时转移话题。”在和勃列日涅夫相处一个星期后，尼克松回来后写下一句也许是最有见地的话：“我们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他看成一个傻瓜或头脑简单的粗人。”

5月30日，尼克松离开莫斯科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对这次最高级会谈进行了总结。与会者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除了对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结果表示满意外，他们对尼克松的看法也有了变化。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尼克松一直是一个冷战的急先锋，反苏反共的老手，同他达成协议肯定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经过这次面对面对接触，他们发现这个美国总统“是一个办事有条不紊而又讲求实效的人”。

“你能够和尼克松打交道。”勃列日涅夫以此概括他对美国总统的新印象，同时他也坚定了把这个“交道”打下去的信心：“现在是准备回访美国的时候了。”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率领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由于尼克松在去年举行的大选中获胜，连任美国总统，所以这是两人在一年后的第二次会见。

6月18日下午4时许，勃列日涅夫及其主要随行人员乘坐的白色伊尔—62型喷气飞机，在细雨中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根据苏方要求，机场没有组织欢迎活动，国务卿罗杰斯到机场迎接。勃列日涅夫一行下飞机后，立即转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飞往位于华盛顿北部约96公里的戴维营休息，正式访问将以次日开始。勃列日涅夫很喜欢这个带有乡村气息的地方，情绪非常好。当尼克松从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的家里打来电话表示欢迎时，他听到勃列日涅夫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友好和毫无拘束。当临时充任译员的多勃雷宁还未来得及把总统的话翻成俄语时，勃列日涅夫就用英语连声说“谢谢你”了。已经开始受到“水门事件”困扰的尼克松，听到来自另一个超级大国领导人如此友好的声音，其欣慰之感自不待言。

第二天，尼克松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主持仪式，欢迎勃列日涅夫。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在修剪得如碧毯般平整的草坪上，两位领导人并肩站在一个特别的讲台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名记者，听乐队高奏两国国歌。全世界或在同时、或在稍后都看到了这一庄严的场面。对勃列日涅夫来说，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刻。目睹了这一时刻的多勃雷宁，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流露出一种自豪感：“在苏联的核力量、导弹以及核弹头与美国——所有的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比和美国总统平等地站在一起更了不起呢？”“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一切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承认了它的力量 and 影响。”当日晚，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的蓝厅为勃列日涅夫举行了国宴，来宾包括政治、商业、劳工各界领袖。在白宫举行这样的盛大的国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宴请的客人又是在很长时间以来美国最主要的敌对国家的领导人，这都使得这次宴会愈加显得不同寻常。当主持人宣布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到场时，大厅内全体来宾起立，向走进来的勃列日涅夫鼓掌，这在白宫又是第一次。

按照两国共同商定的安排，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将在华盛顿、戴维营和位于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总统住所与尼克松举行一系列的会谈，会谈内

容与莫斯科会谈时一样非常广泛，主要议题有核武器控制及如何防止爆发核战争，欧洲安全与裁军，苏美贸易问题，以及诸如亚洲、中东等当时世界政治的热点问题等。其中，最被苏联领导层看重的是与美国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正是在讨论这一协议的过程中，首先反映出双方对问题实质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早在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之前，苏联就提出签署上述协议的建议，但美国方面一下子就把苏方草案中关于美苏彼此不使用核武器，并应防止出现因第三国的行动而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局势等条款，理解为苏联是在谋求美苏“核共管”，迫使美国放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核反击来保证免遭华约集团常规力量打击的基本军事战略，同时孤立中国，以便在可能发动的中苏战争中使苏联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种理解表面上并非全无道理，实际上却与苏联的真正意图相差甚远。莫斯科的原定目标是达成苏美两国相互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把它当成在缓和道路上取得进展的又一个标志，仅此而已。至于正在全力谋求缓和的苏联领导人想借此协议剥夺北约的核保护和对中国的核支持，以便发动常规战争，用对苏联领导层意图有着深刻的了解的多勃雷宁的话说，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然而基辛格想到了，尼克松和其他许多美国人对此也深信不疑，这就使这个协议的讨论变成了一件既敏感又复杂的工作。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意见交换，其中包括基辛格 1972 年 9 月和次年 5 月两次苏联之行与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当面对论，最终双方才同意签署一个折衷性协议。它去掉了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共同保证，代之以双方之间、以及任何一方和第三国之间都不应使用武力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规定，并同意在出现使用核武器危险时，彼此进行磋商。6 月 22 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这一协定。基辛格认为，他成功地避免了一项看来美国无法推托的义务——不使用核武器，把它变成了一项双方和其他国家都应追求的目标。相反，协定的某些条款限制了苏联，“使他们不能攻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是中东”，而且对苏联攻击中国也起到了“某种法律约束”。苏联新闻媒介按照官方的指示对上述协定大加褒扬，说它是在缓和道路上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勃列日涅夫此次访美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

不管怎么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差异终归没有影响后来协定的签订。但在另一个问题上就不这样幸运了。这个问题就是中东问题。1973 年上半年，中东地区局势日渐紧张，接替纳赛尔出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对“六五”战争后出现的“不战不和”局面极为不安，对积极插手中东事务却又不愿意结束这种局面的美苏两国愤懑和疑虑日重。尤其是对口头上说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而实际上迟迟不见具体行动的苏联，更是不满。美苏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中，提到双方要竭力实现中东的军事缓和。这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看来，意味着苏联并不想改变“不战不和”的状况，因为它不想以此影响与美国的新关系，也会使阿拉伯人更加依赖苏联。倔强的萨达特用宣布驱逐在埃及的苏联军事人员给送走尼克松后余兴未消的莫斯科浇了一盆凉水。1973 年初，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展开积极活动，前者为了收复失地加紧战争准备，后者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四处寻求支持。在埃及的一再要求下，苏联为了不致使自己彻底失去在中东的地位，答应提供“从未向苏联之外的任何国家供应的军事装备”，并于 4 月间向埃及运去了第一批可携带核弹头的斯库特式地对地导弹。尽管如此，随着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发展，苏联领导人已经感到它无法控制阿拉伯人的行动了。所以勃列日涅

夫赴美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政治局对他的委托，就是争取与尼克松就中东问题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即美苏联合采取外交手段，按照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条件实现和平，这就意味着以色列撤出它在上一次阿以战争中所占领的土地。作为支持此项建议的一个重要理由，勃列日涅夫需向美国总统透露一个关键信息，即苏联越来越难以控制阿拉伯国家了，因此中东地区爆发新的战争危险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选择谈这个重要问题的时间和方式都不得当，所以又没能使双方的思路汇合到一起。

这次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谈是在勃列日涅夫访问的最后一天即6月23日晚上将近11时，于圣克利门蒂总统别墅内的书房进行的。这天白天，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除了进行会谈外，还举行了一次有好莱坞明星和当地名流参加的露天鸡尾酒会和小范围的晚宴。晚宴结束之后，看来宾主双方都感到有些累了，于是各自回房间休息。但两个多小时后，当尼克松已经睡下后，苏方突然提出，勃列日涅夫想跟总统进行会谈。尽管尼克松肯定是怀着警觉的心情来参加这次“突然袭击”式的深夜会谈的，但他仍然难以抵御多年调节好的生物钟对他的作用。多勃雷宁发现，在持续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尼克松一直把头倚在沙发背上，显得迟钝又疲倦，对会谈内容并不感兴趣。而在白天刚刚与葛罗米柯就中东问题争论了一天的基辛格，也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类话题兴致索然。勃列日涅夫此时精神很好，不断地、甚至有些固执地要求苏美双方就中东问题的一系列原则达成协议，即使是秘密协议也好。他提出的建议直率而且生硬，说如果不就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以色列撤军、阿以相互承认新的国界、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等达成协议，就等于让他空着手离开美国。甚至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则，苏联很难使军事形势不骤然恶化，虽然苏联坚决反对中东重新开战。

勃列日涅夫大概认为他要传达的重要信息一定能引起美国总统的高度重视，自然也会对他想避免一场新的中东战争的想法给予支持和配合，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苏美达成原则协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然而，他过于直率的表露和急于求成的心情，反倒引起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警惕，使他们很自然地去分析在勃列日涅夫这些意图明确的建议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更深的目的。尼克松分析的结论是勃列日涅夫抛出一个“代价少得可怜的钩，来换取我们在实际上放弃以色列”。基辛格的分析也许更典型，他说勃列日涅夫威胁美国，“他企图利用威胁迫使我们帮他摆脱困境，却又不想付出任何代价。至少他是在想办法把造成僵局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并且在防止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受到进一步削弱方面有所建树”。不管这种分析是由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惯性，还是外交上正常的思维逻辑，反正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对勃列日涅夫提供的重要信息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个本来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就能理解的问题，结果反而把那些高智商的人们引入了歧途。多勃雷宁把部分原因归纳为勃列日涅夫的谈判技巧有问题：阐述的方式“极为冒失和笨拙”，然而事实也证明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是在自作聪明，因为三个多月后一场新的阿以战争真的爆发了。

总的说，勃列日涅夫的美国之行还是取得了相当收获的。双方签订了11项条约与协定，其中9项涉及技术与经济合作的不同领域，2项包括了限制核战争与军备竞赛内容。经济技术领域合作的扩大，无疑将促进两国交流、联系的加强，使缓和进程转化为具体的形式后巩固下来。而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和防止核战争上达成的协议，则标志着双方在莫斯科开始的进程在继续

前进。在勃列日涅夫的坚持下，在 6 月 25 日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正式写上了促进苏美友谊是世界和平的一个永久性因素。双方于公报中表示支持在适当时候举行世界裁军会议。欧安会和欧洲裁军会议之后的两个月，北约和华约组织终于同意 10 月 30 日在维也纳就相互削减各自在欧洲的武装力量开始谈判。而由 35 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参加的欧安会第二阶段会议也在日内瓦召开。这样，苏联长期孜孜以求的召开欧安会的目标更接近实现了；而美国力主的中欧裁军会议也总算落实了。基辛格 6 月 23 日在圣克利门蒂对紧随的记者们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这次首脑会谈已产生了“一种完全改善战后外交格局的联系网”，是“国际行动新时代的开始”。《真理报》在勃列日涅夫抵达美国之前就预言，这次访问中“即将发生的事件将成为苏美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而且还将成为国际局势总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有鉴于此，《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应该给予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以“巨大的个人荣誉”。

从私人关系上说，通过一起度过的 35 个小时，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加深了。在圣克利门蒂那个最后的晚宴上，尼克松的为子孙后代能有幸福、和平的未来的祝酒辞，让勃列日涅夫听得热泪盈眶，走上前去给他一个“真正熊式的拥抱”，这时勃列日涅夫大概感觉到统治着资本主义大本营的这个人，原来也有一颗常人一样的心和情感。而尼克松对勃列日涅夫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这名对手“更加令人感兴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能摆脱克里姆林宫的一些框框，发挥出他性格中更富有人情味和懂得政治策略的一些方面”。尽管他对这名总书记在公开场合的某些举止不敢恭维，但他觉得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胸襟开朗，比较有礼貌”，他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容易暴躁和冲动，尤其是在讨论问题时，“总是从容不迫”，“说话毫不留情，斩钉截铁”。

两次富有成果的会谈和相互了解的加深，使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都愿意把他们之间的这种互访式接触继续下去。在圣克利门蒂《苏美联合公报》签字仪式上，勃列日涅夫宣布，他已同尼克松商定，明年尼克松总统将再赴莫斯科。

在苏美第二次和第三次最高级会晤之间，一系列重大事件对缓和进程、对苏美关系的改善提出了新的考验。1973 年 10 月，被勃列日涅夫不幸而言中的阿以战争爆发，战争虽然是在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进行的，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站在它们身后的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这场战争一方面表明缓和进程远不及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它还没有真正发展为全球性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苏美关系的改善使两国在处理这一重大事件上的合作大于了对抗，这正是双方关系改善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两个方面都说明，作为缓和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苏美两国对这一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在两个国家中，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对它承担这个责任并不十分有利，自 1973 年 3 月“水门事件”调查取得突破后，形势向着不利于现任总统尼克松的方向迅速发展。尼克松的政治地位在司法调查的无情冲击下受到极大削弱，众叛亲离，日益孤立。他推行的对苏政策，遭到政府和国会中越来越强大的反对派的指责和攻击。尽管在他被迫辞职前一个月的民意测验表明，对他执行的对外政策的支持率仍有 54%，但就缓和进程中出现的苏美关系“蜜月”而言，余下的日子几乎肯定要在阴云密布中度过了。

对“水门事件”可能产生的结果，苏联领导人直到最后时刻都估计不足。

他们很难相信堂堂的美国总统会因这样一件小事陷入困境，更没有想到它会把尼克松从政治巅峰上拉下来。与其说莫斯科为尼克松的政治前途担忧，倒不如说是为刚刚有所改善的苏美关系、为缓和进程是否能持续发展担心。逻辑是很自然的：美国国内缓和的反对派正利用“水门事件”企图达到中断缓和进程的目的。因此，这时出现了一种罕见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尼克松在国内受到攻击，日益孤立的时候，来自意识形态对立大国的领导人反而暗中为他打气，并为帮助他渡过难关创造条件。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当然是在政治局同意下——起了主要作用。他通过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尼克松保持秘密通信，说他“从内心深处希望您能战胜各种困难”；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有人期望尼克松屈服和崩溃的时候，“正像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的那样，您在这方面不会让他们高兴”。不难想象，深陷窘境的尼克松读到这些话时所受到的感动肯定比听到一个美国人说同样的话要大得多。说这是一种精神支持也许有些夸大，但这的确是一种鼓励，昭示他在身边阴霾四布的时候，至少在东方还有一线光明。而尼克松通过多勃雷宁转达的感受和信息，起码让后者产生了这样奇特的印象，“尼克松在同他的共产主义老对手谈话时就像同他的朋友谈话一样——如果不是更加的话——坦率和直截了当，甚至有点玩世不恭。……这名因水门事件而日益孤立的冷战斗士，最终变得对苏联更为友好了”。多勃雷宁对此的解释简练而深刻：“毕竟我们都是人。”

苏美第三次最高级会谈从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总统抵达莫斯科时开始。尼克松一出飞机舱门，就敏锐地发现了与1972年5月的不同之处。他看到勃列日涅夫大步走过跑道迎上前来，而两年前站在这里的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两年前聚集在栅栏后的人群既少又缺乏热情，只是机械地挥舞小旗；现在不仅人群明显扩大，而且显出见到熟人般的热情。在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路上，尼克松还发现了第三点不同：街道两旁也都是欢迎的人群。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双方除了在莫斯科会谈外，还有两天移师克里木，在黑海海滨的奥列安达，一边欣赏着旖旎风光，一边继续着争论和讨价还价。

列入会谈议程的有核武器控制、地区性问题、经济与技术合作、后续最高级会谈问题等。在最主要的核武器控制问题上，摆在双方面前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三个：限制双方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补充双边核禁试协议，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发展。但由于双方在全面核禁试还是部分核禁试、如何进行核查、是在一定数目上冻结制造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还是相反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无法统一，这些问题仍未解决。相对重要的成果是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议定书》，它对1972年5月26日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作了补充，把原条约规定每方保留两处反弹道导弹基地改为保留一处。在新签署的《关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中，规定这种试验不得超过15万吨级。会谈期间，双方签署的其他六个文件涉及建筑、能源、医学合作、经济、工业、技术合作等方面，以及与更换、拆除、销毁战略武器程序有关的议定书。为了能在限制核武器问题上有所进展，尼克松建议在年底前再举行一次“微型最高级会议”，勃列日涅夫表示赞同。

7月3日，尼克松结束了他的这次苏联之行，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到机场为他送行。勃列日涅夫一直把尼克松送到“空军一号”专机的舷梯下。尼克松想留给他的苏联朋友一个最后的幽默，对勃列日涅夫说：

“惟一遗憾的事是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美国。”

勃列日涅夫这回没有笑，轻轻他说：

“事实上，在来机场的路上，我产生过同样的想法。”

尼克松忽然觉得勃列日涅夫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而他自己也“有些失望”。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与总书记告别，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毕竟没有利用这最后的机会为他们的后代多留下些东西。

35 天后，尼克松在华盛顿宣布辞职，从而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任内被迫辞职的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勃列日涅夫怀着复杂的心情给已经离开白宫的尼克松发去一封私人电报：

我谨以个人及我的同事的名义，向您表达我们的友好感情，为改善苏美关系和使国际形势正常化，我们共同努力进行了富于成果的合作，达成了相互理解的精神。在过去的一年中，您为苏美关系所做的一切，在我们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及全世界都受到高度评价。这些伟大成就不能不受到所有真正关心和平和人类未来的人的尊重。……

在电报的结尾，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夫妇及全家“表示良好的祝愿”，落款是“诚挚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尼克松在两天后给勃列日涅夫回电，也强调了他们两人合作的重大意义，说他是带着由两国关系改善、“因而在世界和平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离职的。同样，他的落款也是“诚挚的理查德·尼克松”。

接任美国总统职位的杰拉尔德·福特上任后的第四个月就飞到苏联，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这次会晤是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谈时商定的，地点不是两国的首都，而是一个中间站。结果，苏联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了美苏两国领导人见面的地点。11 月 23 和 24 日，勃列日涅夫与福特在这个银装素裹的城市郊外一所小别墅内，举行一次简朴而务实的工作会晤。

会谈的中心问题仍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前几次最高级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现在双方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在苏联投掷重量和数量占优势的陆基导弹与美国占优势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之间，寻找一种都能接受的平衡。在两个国家的战略武器沿着不同发展方向——美国是陆基、海基和战略轰炸机三位一体式发展，苏联则以发展陆基和海基导弹为主——已经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寻找这种平衡无疑是一件相当复杂和微妙的工作。经过预备性协商以及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双方达成了一项“向上平衡”的为期 10 年的“框架协议”，即给 10 年后两国的战略武器总额规定一个谁都不能超过的上限：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总额为 2400 件，其中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限额为 1320 枚。这个协议不会降低已存在的战略武器的水平，它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它规定了一个上限，从而使以前长期没有解决的双方导弹运载工具总数不平衡这一问题获得突破。勃列日涅夫和福特对这项协议都给予积极乐观的评价。前者认为“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后者觉得“这是向防止核灾难迈出了一大步”。

两国领导人还就欧洲安全、中东问题等交换了意见。会谈进行得紧凑、务实，气氛也比较友好。在 11 月 24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重申决心“继续不失时机地扩大并加强在各个领域合作的努力”。与会者在告别晚宴上用当地产的人参伏特加酒互致美好的祝愿，而连结中苏两国的黑龙江产的鱼籽

酱，是除了这里童话般银色世界之外，留给美国总统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勃列日涅夫与福特虽然是第一次作为最高级领导人见面，但他们私人关系发展很快。勃列日涅夫送给福特总统一幅木刻雕像，尽管由于雕刻者既没见过总统也没找到好的照片，所以雕像并不像福特总统，但福特总统对这件特别的礼物仍很欣赏。在登机回国之前，福特把他穿来的一件狼皮大衣回赠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高兴地立即穿上他，像老朋友那样与福特拥抱而别。回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上谈到这次会晤时说，他认为同福特总统的个人接触是有益的，这位总统是“一个将来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这跟他在莫斯科第一次接待尼克松后，对美国总统的评语几乎一模一样。

无论是对苏美关系，还是对勃列日涅夫个人来说，这次会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正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发作了中风。幸好随来的叶·恰佐夫教授及其他医生及时控制住了病情。在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他再次中风失去知觉，虽然这次医生们又使他很快恢复了知觉，但从此以后这种无法根除的疾病，渐渐成了勃列日涅夫生活和政治活动上难以逾越的障碍。经历了缓和全过程的多勃雷宁对此更有一番感受：

历史很少有界线明确的转折点，但这次中风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缓和在某一时刻曾达到过顶峰、而后便开始衰落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的中风可能就是那一时刻，因为从那一时刻起，最高级会谈的进程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

当然，勃列日涅夫不会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还必须在他的职位上再呆上8年的时间。在他这个地位上，他的一切早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

第十五章在狂风暴雨面前

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至少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它来的不是时候。在全世界已经没人怀疑中东是超级大国的竞技场的情况下，苏美两国分别支持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前线的殊死拼杀，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渐入缓和“佳境”的苏美关系。在它们刚刚满脸堆笑地拥抱之后，现在，又必须瞪起眼球逼视对方了。不知道尼克松感觉如何，反正勃列日涅夫有理由对这种情况感到别扭。在苏美缓和的推动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有望取得新突破，欧安会实质性的第二阶段会议刚刚开始没几天，美国国会正就给不给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展开激烈争论，在这种关键时刻，中东的这场战争，很有可能使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竭力构造的“和平大厦”毁于一旦。至于由外交失败引出的政治后果，更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如果苏联领导人制定的处理这场危机的原则是避免过深地卷入，尤其要避免与美国的公开直接对抗，那是不足为奇而且很容易理解的。

当然，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置“阿拉伯兄弟”于不顾。不错，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做法刺伤过苏联人的心——当然是在苏联让埃及人失望和感到被愚弄之后，他不仅在1972年7月下令2.1万名苏联军事人员限期离开埃及，而且没有告诉莫斯科他要进攻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的确切时间，苏联领导人除了接受阿以战争的既成事实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但是，不管是桀骜不驯的埃及，还是跟埃及站在一起的叙利亚，都是苏联在中东存在的体现，就像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主要体现在以色列身上一样。假如苏联出于对萨达特的埋怨而听任阿拉伯国家在这次战争败北，那么苏联被美国最终排挤出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的那天，也许真的不远了。这场战争，对阿拉伯人来说，认为是从邪恶的犹太人肮脏的爪子下收复真主的土地。对既非伊斯兰教、亦非犹太教统治的苏联来说，宗教的仇视远不及意识形态的对立意义重大。苏联领导人认为，既然这种对立的格局由于受帝国主义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已经暂时无法改变了，苏联除了利用阿拉伯国家反以情绪来保证对立的格局在这一地区不致失衡以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这就决定了苏联不会撤出这一地区，决定了为了保持对立格局的平衡，它还要给予阿拉伯国家应有的帮助和支援。

但是，苏联领导人明白，意识形态的对立绝不是要求苏联一概用军事方法解决问题。相反，与政治方法相比，军事方法往往不是苏联领导人首选的方法。这就是说，面对突然爆发的危机，苏联领导人会首先谋求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在勃列日涅夫及其缓和政策支持者眼中，当时对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是缓和，缓和的关键是苏美关系，因此，处理中东危机的方法必须要服从缓和的大局，苏联与阿拉伯兄弟的关系也自然要服从于苏美关系。尽管危机爆发后，苏联也瞪起了眼睛，但流露出的目光，更多的是渴望，而不是仇视。

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埃及军队顺利渡过苏伊士运河东岸，突破以军的巴列夫防线；叙利亚军队则全线突破以军在戈兰高地上的阵地，最远处向前推进了35公里。巴勒斯坦游击队、阿尔及利亚、苏丹、摩洛哥、科威特、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约旦、利比亚和突尼斯等九个国家都先后出兵站在埃叙一边参加战斗。形势对阿拉伯国家有利，苏联没有理由不利用这一形势巩固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因此，当基辛格提出，美苏两国应共同提议召开联大安理会并一致呼吁交战双方立

即回到冲突开始时的防线上时，遭到苏联的反对。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领导层的一致观点——很明确，不管西奈半岛还是戈兰高地，这些本来就是阿拉伯人的土地，自上一次中东战争后，它被以色列这个侵略者强行霸占了。现在阿拉伯人进入的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因此没有理由让他们撤回去。勃列日涅夫在致尼克松的信中说：“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以色列表示愿意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毫无保留地撤出去，那么以色列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将得到保障。以色列为什么不可以接受这一建议呢？”多勃雷宁也对基辛格说：“阿拉伯人想要收复他们被以色列强占的领土。他们一直在对我们讲这个道理，要让我们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解放你们自己的土地，那实在是荒谬可笑的。”

与此同时，莫斯科通过驻开罗和大马士革大使与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得到两个强烈印象：第一，掌握军事优势的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现在实现停火，萨达特直言：“在最后一批以色列士兵撤离西奈之前，和平是无法想象的。”第二，他们需要苏联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装备，以进一步扩大战果。而后者无疑又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苏联认为，由于自己掌握着供应武器的主动权，就等于拉住了控制牵线木偶的线绳，是收是放，是紧是松，完全由苏联支配。在美国还没有强烈反应时，不必要收紧它。因此，在战争最初的几天，莫斯科并不急于敦促安理会作出不符合阿拉伯人要求的决议。同时，苏联向阿拉伯国家送去大批武器。从10日起，苏联向埃及、叙利亚实施紧急空运计划，当天至少有80架安-12型运输机装载着地对空导弹、反坦克火箭等，飞抵叙利亚。苏联领导人还向其他拥有苏制武器的阿拉伯国家建议，让它们贡献出这些武器。就这样，苏联以它特有的方式迅速卷进了这场战争。

美国也以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方式卷了进来。它先是允许以色列用本国飞机空运武器。这与美国，确切地说是与基辛格本人对形势的估计有关。他根据上次中东战争的经验，乐观地认为，在战争进行两三天内，以色列将夺回战场主动权并打败阿拉伯人。但是，美国不想一开始就公开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从而得罪所有阿拉伯国家，使它在战后中东地区的调整中，因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而使美国的作用降低。也是基于同一个原因，美国虽然提议召开安理会，但在战争结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也不希望尽快通过有可能束缚自己手脚的决议：如果要求交战双方退到战前的防线，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不会接受；如果在形势有利于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实现就地停火，将损害盟友以色列的利益；如果照苏联要求的让以色列撤出所侵占的领土，美国和以色列就将陷入绝境。基辛格的计划是，乘苏联不急于在安理会通过决议之机，等待以色列扭转战争局势，然后在胜利的以色列和失败的阿拉伯人之间充当调停人，从双方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好处。但是，战争进行到第五天，以色列仍然没有摆脱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加上苏联开始大规模空运武器，以色列人几乎绝望了，以色列总理果达尔·梅厄夫人直接给尼克松发来一封电报，恳求美国立即、直接、大规模空运武器和装备。10月13日，30架C-130型运输机装载着军火飞抵以色列。据尼克松自己说，在10月13日前，从美国运到以色列的军用物资为每天1000吨；之后数周，美国飞机飞行达550架次以上，其规模比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空运还要大。

这样，在中东的战场上，除了参加战斗的人员不是苏美两国公民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了。

在美苏卷入中东战争的同时，两国领导人之间通过当时还不为世人所知

的渠道，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跟上一次中东战争时的情形大不一样。这使他们在作出有可能让对方不快的公开举动时，还可以及时向对方私下进行解释，或是传达另外一种信息。战争爆发之初，尼克松就通过多勃雷宁转告勃列日涅夫，他本人希望中东战争不要破坏苏美关系缓和取得的成果。尼克松在批准向以色列实施大规模空运的当天，特意把出席新任副总统杰·福特就职宣誓仪式的多勃雷宁拉到一旁，让后者转告勃列日涅夫，现在有许多人正在千方百计地在他和总书记之间进行煽动，以破坏缓和进程。“我们不当上他们的当，”尼克松说，“告诉总书记，我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将遵守我和苏联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勃列日涅夫也向尼克松转达大致相同的意思。这就像两个在衣服遮挡下用手指作交易的贩马人，人们看到的可能仅是他们的摇头、瞪眼和不满，实际上，重要的信息交换已在暗中完成了。

当然，超级大国之间要转达的信息有时要复杂得多，对方在判读时难免不发生错误。双方在长期的冷战中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理解上的思维定式并没有完全消除，也对危机时期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造成障碍。

由于获得了美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以色列逐渐扭转了军事上的被动局势。它在顶住西奈半岛上埃及军队攻势的同时，集中力量打击戈兰高地上的叙利亚等国军队，叙军开始败退。同时，埃及军队为缓解叙军压力于10月14日发动的仓促进攻，无功而返。以军抓住机会，利用埃及的第二、第三军之间出现的一个没有布防的约40公里缺口，迅速穿插到埃军身后，在运河西岸取得了一个立足点，通过它，整批整批的以军渡过运河，对埃及构成严重威胁。萨达特总统认识到对以色列的彻底的军事胜利很困难了，于是开始要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10月16日，柯西金飞抵开罗，就政治解决方案与萨达特进行会谈。柯西金希望埃及接受就地停火的解决办法，认为阿拉伯国家在这次战争中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收复了运河东岸部分地区，这些都为寻求一项比较有利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解决办法，提供了崭新的因素。萨达特总统知道美苏两国一直在政治解决这场战争的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接触，而且也猜得出柯西金建议的解决办法肯定也是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建议的办法，更明白苏联人之所以这样急切地要求停火，是担心事态进一步恶化后，会使苏联和美国一起更深地陷进来。现在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卷进来了，只不过这种卷入还小心地保持在一定的程度上，即没有使双方的“热线”联系中断，没有发生直接的公开对抗。用萨达特的话说，正处在和解状态的苏联和美国“不希望我们破坏这种和解，不希望我们迫使他们进行一场军事对峙”。但是萨达特不愿意别人“通过武器的力量或既成事实的力量”，把和平强加给埃及。因此他坚持要以色列提出从所侵占的阿拉伯人领土上撤退的明确的时间表。

柯西金在开罗呆了四天，这期间，战场上的形势对阿拉伯国家更加不利了。一名随同柯西金前来的善于辨认空中摄影照片的苏联军官，指着航空照片告诉萨达特，照片上反映出至少有270辆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通过缺口侵入到运河西岸。形势非常紧急，柯西金随时都保持着与勃列日涅夫的联系。到了19日，莫斯科已下定决心，立即实现就地停火。勃列日涅夫致函尼克松，说中东局势越来越危险，双方应立即尽最大努力使中东事态不致继续恶化。他建议基辛格来莫斯科进行直接谈判。这个建议被立即接受。

在莫斯科，基辛格提出的准备提交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草案被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迅速接受了，这多少有些出乎基辛格的意料，因为在这个方案中，

除了就地停火是苏联原来就主张的外，其他条款都曾遭到苏联的反对。勃列日涅夫要求把这个方案立即提交安理会，待安理会通过后，停火便立即生效。经验丰富的基辛格从苏联领导人急切的心情上估计到战场上的形势一定对阿拉伯国家更加不利了。因此，他想利用从起草提案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安理会通过提案、再到把安理会决议通知交战各方这中间必不可少的一系列技术性处理所需时间——据他估计最少能有 12 小时，让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他马上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尼克松，一封给梅厄夫人。当心满意足的基辛格一觉醒来才知道，两封电报由于“技术故障”都还没有发出去。基辛格顿时火冒三丈，但他也只能面对白白浪费四小时时间的事实了。基辛格心里清楚，八小时时间对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的梅厄夫人来讲“看来就像是最后通牒”。这回轮到以色列总理对美国国务卿火冒三丈了。

10 月 22 日，纽约时间 12 时 52 分，美苏就中东问题的提案在安理会获得通过，这个被称为第 338 号决议的文件呼吁所有参战国和地区，在决议通过后不晚于 12 小时，“在它们现在所占据的位置上，一律立即就地停火，并终止一切军事行动”；停火之后，有关各方应履行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并立即开始谈判。该决议一公布，人们马上发现它有一个重大“遗漏”，即没有指定由谁来监督它的履行，再具体点说，交战各方是不是在“所占据的位置上”就地停火将没有人进行核查。再有从决议公布到实现停火有 12 小时的时间差，这就给了准备乘乱获取额外军事利益的国家以可乘之机。而在战争初期蒙受耻辱、现在已经占据军事优势的以色列，正是这样干的。停火生效前后，以军抓紧时间继续在运河两岸及戈兰高地展开进攻。其中在运河一线，渡到西岸的以军装甲部队向南迅速运动，试图从身后包围占领着东岸的埃及第三军。萨达特总统几乎每小时都向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发出急电，指出以色列正故意破坏停火决议。参加 23 日政治局会议的多勃雷宁，听到萨达特用特殊电话向勃列日涅夫恳求：“救救我和埃及首都，它已经被以色列坦克包围了。”

苏联领导人很自然地认为，以色列如此不把美苏联合促成的决议放在眼里，肯定是得到美国的赞同，至少是默许，何况这一切正好是在基辛格抵达特拉维夫后发生的。勃列日涅夫当即给尼克松发出一封热线电报：

尊敬的总统先生：

以色列已经全面违反了有关在中东实现停火的安理会决议。刚刚于两天前才达成的协议被以色列领导人的这一行动给蓄意破坏了，我们为此感到震惊。您所处的地位可以使您更清楚地知道以色列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我们看出只有一种办法能挽救局势和实施这项决议。惟一的办法是强迫以色列立即贯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情况万分危急，这不仅是针对中东局势，而且也是针对我们两国的关系而言。

在萨达特向勃列日涅夫呼救的同时，梅厄夫人也给尼克松发去一封电报，称埃及军队破坏停火决议，以色列将要采取行动予以反击。因此，尼克松看到勃列日涅夫的电报中没有提到埃及人的行动，并且暗指美国是与以色列

这种分析得到原以色列《国土报》首席外事记者麦迪·戈兰提供的材料的证实。他在被以色列禁止出版的《基辛格的秘密谈话》一书中说，基辛格离开莫斯科来到特拉维夫后，才完全明白以军的形势有多好。他曾经向以高级军事指挥员暗示：“在越南，停火并未在议定时间准时生效。”

列串通共谋破坏停火，感到非常不快。他回复勃列日涅夫，说根据他掌握的情报，首先破坏停火的是埃及，表示美国将承担让以色列中止军事行动的全部责任。几小时后，勃列日涅夫告诉尼克松，埃及方面愿意立即停火，但以色列也必须同时这样做。同时他又指示多勃雷宁，让他告诉基辛格，苏联愿意与美国再联合向安理会提出新的决议案，填补第 338 号决议的“遗漏”。10 月 23 日，安理会通过第 339 号决议，明确规定对停火实行监督，要求所有各方部队退回到他们 10 月 22 日下午 6 时的阵地。

但是，眼看就要把埃及第三军装进“口袋”的以色列是非常不愿意失去这次绝好机会的。他们仍在进攻。而处境险恶的埃及军队也不会完全束手待毙。交战没有即刻停止。心急如焚的萨达特在 24 日同时向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发出急电，说“你们必须自己到现场去亲自看看以色列人违反停火的行为”。同时，苏联驻埃及的首席军事代表也向莫斯科报告，以色列人仍在进攻，埃及第三军已被包围，如果停火再不生效，它将被歼灭。苏联驻开罗大使馆报告的情况更严重：萨达特的统治即将崩溃。这一切给苏联领导人留下强烈印象。在这天晚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主张，已经到了“显示我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的最后关头，否则局面将无法收拾。波德戈尔内赞同这种意见。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表示反对，勃列日涅夫对让苏联军队直接卷入冲突也持谨慎态度。但是这三个人在被问到“除了出兵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手段控制那里的事态恶化”时，他们又都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了。的确，从一开始就以特殊的方式介入了战争，并且自认为能通过武器和军火这根“线绳”牢牢控制战争进程及结局的莫斯科，现在忽然发现在由他们促成的安理会决议面前，手中的线头成了废线一团了，不但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这可真够让人恼火的。会议最后决定以勃列日涅夫的名义给尼克松发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电报在简单说明中东形势已非常严峻后，提出：

让我们，苏联和美国，一起把苏联和美国的军队紧急派往埃及，以确保 10 月 22 日和 10 月 23 日安理会关于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决定的实施。……必须毫不延迟地遵守协议。我愿坦率地说，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不可能同我们一起行动，我们就不得不紧急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步骤的问题。我们不能容忍以色列方面的专横行为，它在公然向苏联和美国挑战，因为安理会决议是根据两国的一致意见达成的。让我们在这一特殊的问题上和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共同履行这项协议吧。这将成为我们两国为了和平利益而采取一致行动的典范。

基辛格后来把这封电报称为“这是一位苏联领导人对一位美国总统最严重的挑战之一”，认为“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使苏联慑于威势而放弃他们威胁要采取的单独行动。”尼克松也有同感，他马上命令召开政府高级官员和助手会议。基辛格打电话告诉多勃雷宁，美国方面就要开会讨论此事，希望在美国会议结束前，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否则“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他反复强调“不要对我们施加压力”。多勃雷宁对此只是冷冷地回答说“好”，没有做任何暗示和解释。这让精神已极度紧张的基辛格感到，危机真的就要到来了。在此之前，苏联为了增加声势，命令空军部队在外高加索地区举行具有一定规模的军事演习，一批安—22 型运输机飞抵开罗；游弋在地中海的苏联舰队舰只激增。不管这些行动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反正在

华盛顿看来都是凶兆。

在 10 月 24 日晚至次日凌晨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由美国总统立即命令美国全部常规部队和核部队处于三级战备状态。同时，美军第 82 空降师已接到待命行动的命令。“罗斯福”号和“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及其特遣舰队正在驶往地中海途中。25 日早晨 5 时许，尼克松发出了给勃列日涅夫的复信。美国总统表示，他同意美苏共同采取协调一致的维持和平行动是极为重要的，但认为现在“派苏美部队到埃及去”是不合时宜的。“在此情况下，我必须将你关于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提议看作是最令人关切的问题，它会引发难以估量的后果。”而这种后果“对我们哪一国都不利，而且将使我们花了这样大的努力才获得的一切成果化为乌有”。

冷战的某种思维定式在这里又重现了：勃列日涅夫一封在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时写成的电报，以及某些制造声势的“象征性”举动，在昔日冷战的对敌眼里，马上被理解为“摊牌”。在对抗的思维方式中，必须用威胁来对付威胁，用行动来回击行动。于是，美国也毫不犹豫地“摊牌”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一种表面上剑拔弩张、千钧一发的紧张局面，全世界也为之不寒而栗。但是，在冷战的思维中，超级大国的“热战”只能是一种“境界”，而终究不是所要追求的现实。双方可以隔着桌子“摊牌”，但谁也不想或者说没有勇气掀翻桌子。所以，在这种思维定式中，“摊牌”之后要考虑的是如何摆脱危机，而不是激化矛盾。

听到美国武装力量进入三级战备状态消息后，多勃雷宁当即用专用电话与基辛格通话，要求其做出解释。基辛格力图让苏联大使相信，莫斯科不应把此举看成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个敌视行动，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国内考虑”。他保证第二天就会取消这道命令，并建议多勃雷宁紧急地向勃列日涅夫通报这一信息。

多勃雷宁很可能立即把这一重要信息告诉了莫斯科。10 月 25 日这天下午，世界和平大会将在这里开幕，勃列日涅夫要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原定大会于下午 4 时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厅开始，但在事先没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开幕式被推迟了 1 小时。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终于打听出，会议推迟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正在修改讲话稿。这种解释不久便被证实了，在勃列日涅夫的报道中，原先一段严厉批评以色列，暗示要派军队去监督阿以停火的一段文字，有了较大改动。改动后的表述听起来温和了许多：

很难理解，以色列统治者奉行这种冒险主义方针，蔑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向世界舆论挑战，指望的是什么。显然，这里有外来的庇护在起作用。但是，以色列政府的这种政策使以色列人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想用武力掠夺和占领别国领土的办法来保障一个国家和平安的打算，是注定要失败的妄想。这样的方针既不会给以色列带来和平，也不会带来安全。它只能使以色列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使邻国人民对它更加仇视……

说到监督停火时，他并没有采用给尼克松的那封电报中使用的语气，词汇也变了：

据多勃雷宁说，原来的电文中没有那段说苏联准备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文字。但在发到华盛顿时它被加进去了。这是如何、何时加进去的，由于当事人均已不在世，已无法弄清楚了。

埃及总统萨达特请求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各派代表到作战地区去监督安理会停火决议的执行。我们表示愿意满足埃及的要求，并已派出了这样的代表。我们希望美国政府也这样做。同时我们也在考虑根据局势可能需要采取其他一些可以采取的措施。

同时，勃列日涅夫还郑重“辟谣”，说有人在“散布关于苏联在近东的企图的种种荒诞臆测”，这“当然无助于合作”。“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还是以采取比较负责的、正直的和建设性的态度为宜”。西方新闻界马上对此作出反应。法新社记者维·维奇涅夫斯基说，这一行动表明“他把他的缓和政策置于一切之上”；这种在最后一分钟取消可能会使危机加剧的讲话，“从而后退一步而让外交取得进展”。合众社的雷·莫斯利写道：“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语调是温和的”，“没有什么暗示表明，勃列日涅夫改变了苏联默默退却的态度”。《华盛顿邮报》记者凯泽也同意说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是乐观的、温和的”，他说西方外交官普遍认为，苏联对中东问题的主张，“是令人放心的，是消除危机的受人欢迎的解危剂”。

这天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一项决议，即第 340 号决议，决定立即组织一支联合国特殊部队派往中东作战地区。在这支部队中，将不包括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军事人员。苏美两国迅速公开支持这一决议。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也在第二天，华盛顿时间 10 月 26 日，解除了战备命令。

一场看来一触即发的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被国外新闻界普遍认为是做出退让的勃列日涅夫，几天后在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发泄了心中的不满，他说他和同事们都认为，苏美之间出现了一场“信任危机”。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公开支持以色列是由于尼克松总统得到了错误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情报，而提供这种情报的人的目的在于“损害苏美关系以及……削弱我们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尼克松一方面给勃列日涅夫回信说，他当时的确相信苏联要采取单方面行动的警告是很认真的，他不得不也认真对待。另一方面，他告诉多勃雷宁，刚刚过去的那些事，只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不愉快的插曲”。“请告诉总书记，只要我活着并担任总统职务，我就决不允许同苏联进行实际对抗。”基辛格在 11 日初也向多勃雷宁承认，美国宣布进入三级战备状态，“是一个损害美苏关系的轻率的举动”，他说事后他才感到，当时“总书记事实上比总统还紧张”。多勃雷宁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上述表示称为向苏联的“道歉”，但从这两名美国人的回忆录中看不出这层意思。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危机，双方认识到了苏美缓和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性。

第十六章缓和：从赤道到北极

1975年7月30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花团锦簇的芬兰大厦外，33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的国旗，在空中飘扬。格林尼治时间上午10点10分，芬兰总统吉科宁走上大厦大厅讲台，用英语宣布：欧洲安全和合作首脑会议开幕。以后的3天中，35个国家的首脑将在这里完成一项历史性的工作，从而把欧洲的缓和推向又一个高潮。

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倡议，是苏联首先提出的。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一系列预备性会议，1973年7月3日，欧安会正式启动，然后来自35个国家的375名代表，先后参加了3个委员会——西方新闻界称之为“3个篮子”——的工作。第一委员会讨论欧洲安全与国家间关系问题，第二委员会研究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合作问题，第三委员会协商人道主义及文化等方面交流问题。苏联领导人最关心的是第一只“篮子”，因为这里装着苏联战后一直追求的目标，即承认现有的欧洲各国边界的不可动摇性。承认了这一点，就承认了战后东西欧划分的既成事实，也就等于肯定了1945年以来，苏联为此目的所作所为的合法性。而欧美等国对第三只“篮子”更感兴趣。他们深感让苏联在边界和领土方面让步之难，只好转而寄希望于借助人员、文化及思想上的更自由的交往与交流，打开那道“铁幕”。双方都想在自己看重的问题上迫使对方让步，结果是以相互妥协达成最后协议。

尽管没人不理解达成一项重大的国际问题协议，作出让步是自然的、甚至是必须的，但当葛罗米柯把准备签署的欧安会最后文件提交政治局审批时，还是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等人，对第三只“篮子”里装的东西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接受这些条件无疑会给外国干涉苏联内政提供方便，极有可能要付出牺牲国内稳定的代价。连一向对西方持温和态度的柯西金也对此感到忧虑。葛罗米柯不得不在会上反复进行解释。他让人们掂量一下第一只“篮子”与第三只“篮子”，看看哪只更重要些；至于对第三只“篮子”的承诺，在他看来，不必十分认真对待，苏联政府完全可以判定什么是干涉内政，因而有权拒绝有损于国家主权的“无理要求”。“我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葛罗米柯的这句话，在说服持反对意见的政治局委员们上大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看来也没有料到放在第三只“篮子”里的全部货色，甚至也很难说他是否意识到了接受这只“篮子”对苏联来讲意味着什么。当多勃雷宁提醒他西方可能会在人权问题上找苏联的麻烦时，他对此不屑一顾：“你说人权是什么意思？”结果，70年代中后期西方抓住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大做文章，搞得苏联领导人非常被动。但是，勃列日涅夫深知就此文件与西方达成协议的重大意义。让西方承认战后欧洲边界的现状不可变动，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反复努力但终未实现的目标，也是身受战争之苦的苏联人民梦寐以求的，如果这一历史性的任务能经他的手完成，他在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及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也是他带给定于第二年2月召开的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份厚礼，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将从代表大会上获得相应的回报。再现实一点说，苏联的经济，尤其是农业，近来情况不妙。距离当年的收获季节到来只剩下几个月，但情况表明，严重的歉收已不可避免。旱涝灾害有可能使当年的收成成为自他执政以来最坏的一年。这就意味着作为农业大国的苏联要从美国进口大批粮

食。如果不接受第三只“篮子”，不仅第一只“篮子”拿不到，第二只“篮子”也没指望了，而这里面的经济贸易关系，说不定马上就将成为对苏联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没有忘记，他相信他的同事们也清楚地记得，几年以前因农业歉收而不得不提高食品价格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是怎样被由此引发的一场国内危机轰下台的。勃列日涅夫可不愿意成为第二个哥穆尔卡。

有了勃列日涅夫强有力的支持，葛罗米柯信心更足了。其他领导人虽然疑虑并未完全打消，但最后大家在这一点上统一了认识：把这只令人不安的“篮子”接过来是一回事，摆放在家里的什么位置又是另外一回事。

政治明星云集的赫尔辛基真正成了豪华的外交舞台。勃列日涅夫抵达后，即投入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中。他与芬兰总统吉科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昂纳克、南斯拉夫共和国总统铁托、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和美国总统福特进行会晤，出席一般性会议并代表苏联发言，还要应酬各种社交性宴会。其中与福特的会谈是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的“重头戏”。三天中，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两度会晤。在赫尔辛基会议召开十几天，苏联“联盟”号飞船和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在宇宙对接成功并进行了联合飞行。苏美的这次“空间握手”被新闻界普遍认为是一种表示苏美友好的姿态。在赫尔辛基，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进行得很顺利，2小时15分钟的会谈结束后，勃列日涅夫向记者说：“我很高兴能与总统再次会晤。”福特则称这次会谈“很富有建设性，很友好并很认真”。参加会谈的新闻官员告诉新闻界，两位领导人谈到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东问题和双边关系，其中包括贸易关系。8月2日，双方在苏联大使馆再次会谈了3小时10分钟，当表情比上一次略显严肃的福特总统被问及是否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取得进展时，他说：“是的，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勃列日涅夫急忙问身边的翻译福特总统说些什么，知道后他马上大声对记者们说：“是的，是的！是这样！”然后又补充一句：“难道你们看不出我们现在的情绪么？惟一的困难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一切问题。”说这话时，勃列日涅夫的表情显得轻松、欢快。两人分别时，勃列日涅夫希望福特能在明年的大选中获胜，也许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只要福特能连任美国总统，苏美之间关系的继续改善、欧洲的缓和进程、或者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赫尔辛基精神——就有了某种必不可缺的保证。这可能就是前一天当勃列日涅夫在厚达120多页的最后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与福特交谈时眼中闪动着泪花的原因所在。勃列日涅夫大概深切地感觉到了，有这样一个承认现状的文件和有一个愿意正视现实的美国总统对他自己、对他的国家来说，太重要了。

勃列日涅夫说得对，对于要解决的问题和适应骤变的形势来说，留给两个领导人的时间确实少了。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旧的问题诸如核查、多弹头分导式导弹的种类等不仅没有解决，来赫尔辛基后，他们发现他们还必须处理至少两个新问题：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双方都倾向于把自己的新式武器视为可爱鸽子而把对方的说成是有害的猛禽。就这一点要统一认识仍需旷日持久的谈判。另外，中东也有麻烦。美国借助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获得比较有利的地位，把苏联撇在一边单独在阿以之间施展“穿梭外交”，进行调停。9月24日，埃以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双方军队在西奈半岛脱离接触的第二阶段协议。感到被排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的苏联领导人，对此极

为不满。这也使苏美双方需要更多的时间弥合已出现的裂痕。

在欧美各国，对刚刚签署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这跟达成它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不成比例。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是苏联所追求的东西，它更多的是满足了苏联人的要求。甚至在赫尔辛基会议召开之前，西方的报刊就已经在公开讨论如何防止西方各国出现过分乐观情绪问题了，提醒说最后文件中还有许多东西会被作出相互矛盾的解释，特别是在西方更看重的第三只“篮子”，“还是不够满的”。等到会议开过之后，对它的评论反而更加审慎了。法国的《时代价值》周刊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说，赫尔辛基会议对西方只能起麻醉剂的作用，“它保持了‘缓和’的神话，这个‘缓和’使苏联毫不承担义务，但却使德斯坦把研究欧洲的防务看作是不适宜的，以便不冒犯苏联”；并且呼吁“现在是忘记赫尔辛基的时候了”。西德的《巴伐利亚信使报》也在同一天发表文章说，由于最后文件中的模棱两可的说法，“现在它就已经为新的紧张和斗争打下了基础”，说这是莫斯科搞的一个“最大的政治欺骗”。

最强的指责之声还要属福特总统的同胞们。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原来就对赫尔辛基最后文件颇有微辞，现在他们在新闻界支持下掀起了一场攻击福特总统的高潮。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说，福特总统没从赫尔辛基得到什么好处，“勃列日涅夫达到了他的目的，在铁幕上钉了一些新的铆钉。我们得到了什么”？《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6日刊登了罗·德拉蒙德的文章，标题就格外刺目：《赫尔辛基：完完全全的错误》。依他来看，福特和基辛格错就错在美国“同意了莫斯科对东欧的永久控制”。另一份在美国很有影响的报纸《华盛顿邮报》也以《缓和的限度》为题发表克拉夫特的文章，称“谁也不能使赫尔辛基会议除夸夸其谈外还有什么别的收获”，“缓和的战略可能已经到头了”，美国“需要考虑寻找一种可以替代缓和外交的办法”。甚至福特同意向因歉收正急于大规模购买谷物的苏联开放美国谷物市场的做法，也被指责为引起国内粮价上涨，从而损害了国内消费者利益。福特在此压力下，同意了农业部长巴茨的决定，暂时不再向苏联出售农产品。于是很快有人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上建议，美国应当“利用粮食作为它同这个共产党超级大国打交道的武器”。福特不仅受到舆论的抨击，而且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9月份，在加利福尼亚他两次成了刺杀者的靶子。面对意想不到的不利局面，福特自叹，在他以总统身份出国访问的活动中，没有一次像赫尔辛基之行那样在国内引起如此广泛的误解。

焦头烂额的福特曾希望多勃雷宁转告莫斯科，最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表示出某些松动，以使他手中还能有点东西用于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然而，莫斯科的领导人中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美国总统的处境，他们坚信——这大概也是一种冷战的思维定式，华盛顿的真实目的是要诱使苏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多勃雷宁对此的分析是中肯的：“克里姆林宫深信总统就是老板，他拥有独自作出决定的权力，特别是在他既有愿望又需要达成一项协议的情况下。结果我们并未试图向总统作善意的表示，而是因袭了固执地拖延争论的旧习惯。我们通常会在最后做出一些让步，但往往错过了时机。”可以想象，多勃雷宁所说的“旧习惯”，只能加大两国领导人的隔膜，直至产生敌意。结果，勃列日涅夫终于没能在他有生之年第二次踏上美国的领土；而美国人也因在遥远的非洲爆发的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对缓和开始失望了。

这个地方就是安哥拉。

位于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的安哥拉，在 1975 年 1 月前，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从本世纪 50、60 年代起，安哥拉先后形成三个民族解放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全国解放全国联盟（简称“安盟”）。“人运”领导人由于宣布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与拉美著名民族解放领导人格瓦拉建立了联系，因此在长期的反抗殖民统治者斗争中，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古巴军事顾问的指导。葡萄牙殖民统治结束后，“人运”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安盟”和“解阵”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很快，在外国势力的介入下，三方“两国”为夺取全国政权展开了内战。除了“人运”有苏联和古巴支持的背景外，北部的扎伊尔派出正规军同“解阵”并肩作战，而南非则派出武装力量越过纳米比亚边界进入安哥拉协助“安盟”。因此，“人运”若仅靠自己的力量显然是无法长久坚持，更不用说取胜了。它向莫斯科和哈瓦那求援是自然的。

苏联在安哥拉很难说有重要的战略利益，最初它对“人运”的支援与其说是为自己，不如说是为信仰。美国在安哥拉的战略利益也极为有限，但是安哥拉的内战正是发生在美国国内由对赫尔辛基会议的批评激起的对缓和疑虑日增的时刻，苏联和古巴的介入马上被新闻界宣传为是对缓和的挑战。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尽管此前他们根本不知道安哥拉在哪里，现在却关切起那里的局势和美国政府对此事的反应。受到舆论压力的福特总统向勃列日涅夫提议，两国联合呼吁安哥拉停止内战，并要求所有国家停止向那里运送武器和军事人员。基辛格甚至公开表示，美国 and 苏联的关系有可能由于安哥拉事件受到损害。

美国的反应从反面支持了苏联领导集团中这样一种看法，即美国人自己在全世界到处伸手，公开和秘密地卷入了许多内战，现在他们怎么能指责苏联破坏缓和呢？难道苏联应该屈从于美国人的双重标准吗？答案是清楚的。另一个，也是有待证实的原因是，古巴在于涉安哥拉内战中所起作用的程度有多大。按照多勃雷宁的说法，古巴军队介入安哥拉内战完全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单独决定，而苏联领导人从未考虑过在任何第三国使用古巴军队。卡斯特罗一方面“喜欢给美国人制造麻烦”，另一方面他也想“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演员，而干涉安哥拉事务是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在军事干涉开始时莫斯科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苏联从空中和海上向安哥拉运去大量武器和军火却是事实，在安哥拉有 1.2 万名古巴军人和几百名苏联军事顾问协助“人运”作战也是事实。而且，莫斯科基于自己的理由坚决否认上述事实是对缓和的破坏。这又使西方反对缓和的势力更有理由相信，苏联是要不顾一切地一意孤行了。他们大声疾呼必须要对此作出强硬的反应。

在这种呼声中，基辛格悄悄地转换了调门。他在 1976 年 1 月底说，只要苏联继续卷入安哥拉，美国政府就不会放宽对美苏贸易的限制，而且还“必将威胁到整个美苏关系”。2 月初，他又表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要“防止苏联的扩张”。福特总统的立场也发生了明显变化。3 月初，他连续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他本人及其政府人员，将不再使用“缓和”一词来说明美国同苏联的关系，美国今后谋求安全的政策将是“以实力求和平”。与此同时，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西斯科在国会作证说，苏联染指安哥拉表明，“苏联一有机会就要利用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谋求政治利益”。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说，他认为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是它在其他地区采取类似行动的先兆，并警告说“如果人们认为缓和意味着俄国人是我们的朋友……那就大错特错了”。3月15日，美国宣布1972年建立的关于贸易、住房和能源问题的部长级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延期。5月份，美国国务院迫于苏联一产联的压力，拒绝给已列入计划访美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发放签证。苏联政府在此之前曾两次向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斯托塞尔提出抗议，因为在纽约有人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寓所射击并组织示威。声明虽然说这些强盗行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为，但“美国有关当局实际上无所作为也助长了这种局面”，它“应采取紧急的有效措施来制止这种危害苏美关系的敌对行动”。这种敌对行动甚至让多勃雷宁也碰上了：他从莫斯科乘机返回华盛顿时，由于一名参加了反苏组织的塔台工作人员拒绝为苏联飞机导航，险些在这个异常繁忙的空港上空发生机毁人亡的灾难。

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苏联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关系中出现的这些变化，也感到了缓和进程遇到了近几年中从未有过的阻力。在1976年2月底、3月初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

近几年来，由于一些并非不重要的因素使基本上良好的苏美关系复杂化了。美国的那些既不热心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也不热心缓和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有影响的势力在竭力阻挠这种发展。他们曲解苏联的政策，以臆造的“苏联威胁”为借口重新鼓吹美国 and 北约集团搞军备竞赛。众所周知，他们也曾试图干涉我国的内政，而这种企图是同美国通过的贸易歧视措施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复杂情况也是同华盛顿政策中那些威胁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站在压迫势力和反动势力一边粗暴干涉各国人民内部事务的方面联系着的，这并不是秘密。

作为对此的回答，勃列日涅夫宣告：“当然，我们没有，也不会容忍这一点。这不是可以用来同苏联讲话的那种语言”。尽管这里没有明确安哥拉问题在美国反对缓和势力的活动中所占有的地位，但在后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某些人利用此事鼓动反苏情绪感到气愤。因为在他看来，而且差不多是政治局的一致看法，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是正义的，他只是在“帮助当地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并不是像美国人正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样是想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显而易见，勃列日涅夫虽然希望缓和，希望从缓和中为苏联争取更大的利益，但“他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多勃雷宁说，对此，惟一能够在勃列日涅夫面前谈谈美国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自己，也无能为力。

如果说缓和只是达到意识形态目标的一种手段或方式，那么当种种原因使运用它不怎么得心应手时，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变换的肯定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标。1976年，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坚持住了；勃列日涅夫不仅在二十五大后继续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且在他70岁生日时，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也是在这一年，曾经与他在缓和的舞台上共同制造出不少轰动效应的风云人物——英国首相威尔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及美国总统福特，都黯然神伤地退出了舞台。环顾左右，勃列日涅夫忽然发现，缓和孤掌难鸣了。

70年代后半期，尽管苏联在宣传上并未放弃对改善东西方关系、对推动缓和进程的呼吁，但是缓和的进程还是大大降低了速度。苏联从以前的缓和

中获得了不少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上的利益，因此不希望缓和就此终结。勃列日涅夫虽然在这一时期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仍然要为推动东西方关系的发展尽他的努力，因为他已成为苏联的化身，成为它最有权威的代表了，这是他无法推卸的责任。然而在一种大的趋势面前，他的努力往往显得那么力单势薄，那么苍白无力。1977年3月末，接替基辛格任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访问苏联，他带来的新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关于完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建议，但遭到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拒绝，理由是美方的建议背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用万斯的话说，这让“卡特政府中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失望”，所造成的“损害确实很大”。6月中旬，勃列日涅夫访问了法国。在抵达巴黎的前三天，他接替辞职的波德戈尔内担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国家元首。法国曾是他举着缓和大旗走向西方的第一站，现在当缓和进程明显减慢的时候，他也许希望在这块“福地”上重新找回昔日的辉煌，至少能给它注入新的活力。访问结束时，双方签署了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联合宣言及有关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但无论是双方领导人会谈的气氛，还是所取得的实际成果，都不能与法苏关系的高潮时期相比。虽然勃列日涅夫在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辞中使用不少美好动听的词汇，但观察家们还是从种种迹象中得出结论：“这次访问造成的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一样，冷淡而又乌云密布”；“它不大可能对事态发展的实际进程产生任何非常深刻的影响”。1978年，首先排上勃列日涅夫出访日程表的是联邦德国。5月上旬，他对波恩进行4天正式访问，与施密特总理等政府官员就裁军、西柏林及双边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双方在前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同样无法掩饰；关于后一个问题的谈判亦未取得结果。这一点，从勃列日涅夫在联邦德国发表的谈话中对此次访问进行的审慎评价上，不难感到。

1979年，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似乎出现了转机。4月下旬，法国总统德斯坦回访苏联。双方签署了《为了缓和与和平的利益进一步发展苏法合作纲领》及六个有关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文件，并决定延长1971年签订的两国发展经济、技术和工业合作协定。勃列日涅夫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两国今天达成了在目前世界形势下推动缓和前进的协议”，是“国际关系实践中的新篇章”。当然，他也承认，双方并不是在“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上都持相同的观点”。6月中旬，中断了好几年的美苏首脑会晤终于恢复，不过这次既不在莫斯科，也不在华盛顿，而是选在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四天中，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在各自顾问的陪同下举行了五次全体会议、三次个人会谈和一次正式签字仪式。会谈的中心问题是限制核武器问题。会谈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由勃列日涅夫和卡特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在这个有78页的条约中，规定了双方陆基、海基发射架和重型轰炸机的最高限额，每方最高限额为2250件；其中，把多弹头弹道导弹和运载多弹头导弹的战略轰炸机的限额严格控制在1320件。此外，对双方新的轻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限制某些核试验及核查等问题，也作出了规定。会议结束时，双方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原则同意两国领导人定期举行会晤，表示愿意为完成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在内的限制协定共同努力，同时保证继续保持和扩大合作。

这是勃列日涅夫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苏美最高级会议。当然他当时不可能清楚这一点，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要给缓和注入新的活力就必须做点

事情。与卡特会谈时，勃列日涅夫很少能像与尼克松、福特会谈时那样自如、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已经离不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了。但有一次他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向卡特表达了他的思想，尽管只有一句，却能让人体体会到，这个 72 岁老人在想什么。在参加完奥地利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后，勃列日涅夫忽然把手放在卡特的肩上，说：

“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成功，上帝是不会原谅我们的。”这话让笃信基督教的美国总统大吃一惊。

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取得就下一步谈判和继续维持最高级会议的谅解，无疑显示了缓和仍在发展。但当时绝大多数观察家都倾向于认为，这并不是缓和的第二个春天的到来。

它只是暂时充实了日渐稀薄的缓和空气，而未能在美苏关系的其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引起双方关系趋向冷淡的一系列问题上，如非洲、印度支那、中东等地的地区问题，人权、贸易最惠国等双边关系问题，以及围绕华约与北约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问题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甚至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当然，如果说双方完全放弃了弥合分歧、改善关系的愿望和努力，也是不公正的。他们协调与沟通的办法，与上述整体问题相比，显得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严重的是，就在 70 年代的最后几天，苏联对它的南邻采取了一次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把改善关系的企图与愿望彻底击碎了。西亚小国阿富汗，不仅成了 70 年代最后一个圣诞节之后传播媒介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而且也成了伴随着 80 年代到来的新年钟声飘来的一块阴云，长久地驱之不散。

地处西亚东端的阿富汗，东邻巴基斯坦、中国，南接克什米尔地区，西与伊朗接壤，北同苏联的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三个加盟共和国相连。长期以来，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阿富汗基本上奉行中立政策，在各大国争夺激烈的波斯湾地区，巧妙充当一个缓冲国的角色。但是由于它无法选择的地理位置与苏联接近，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被后者纳入施加影响的主要国家的范围。早在 1955 年，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之后发现，西方势力，首先是美国的势力正向阿富汗渗透，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逐渐加大了对经济援助的力度。1973 年，阿富汗国内发生政变，趁国王正在国外访问，达乌德宣布废黜国王，由自己上台执政。此后，达乌德政府仍然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同东西方各国都保持着关系。而苏联与西方国家也在阿富汗达成某种默契：首都喀布尔以南的所有援助计划由西方经办，以北则由苏联负责。这种相对平稳的局面一直持续到 1978 年 4 月。

当时，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在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乌德政权。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出任总统，并将阿富汗共和国改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苏联领导人仅仅根据他们以前对人民民主党的了解，甚至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表面上的了解，对这场所谓的“四月革命”表示支持。党内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和负责与外国共产党联系工作的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认为，塔拉基的阿富汗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年底，塔拉基正式访问苏联，在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进行会谈后，两国签订了为期 20 年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这个条约，一定程度上为日后苏军入侵阿富汗提供了依据。

人民民主党执政后，并没有消除该党内部原有的两大派别“人民派”和“旗帜派”之间的分歧。同时，由于新政权实行的一些改革措施脱离国情，

并未得到国内人民的广泛支持，反政府活动在各地都有发展。1979 年上半年，阿富汗 29 个省中除 1 个省外部出现了规模不同的反政府武装，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发生暴动和兵变，政府一度失去对该市的控制。到了 8 月份，形势越来越不稳定，首都喀布尔一个陆军团哗变，他们在其他反政府武装的支援下，在市中心同政府军激战，然后又利用首都以南的帕克蒂亚山谷的有利地形与政府军进行周旋。而苏联坚决支持塔拉基政权的立场，也使不少在阿富汗的苏联专家、顾问及其家属，成了反政府活动的受害者，而且数量还不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越来越深地卷入阿富汗国内动乱中去了。

早在 1979 年 3 月 18 日，塔拉基就曾通过电话向柯西金提出派苏军来阿富汗。柯西金表示他可以把这一问题提交给自己的同事讨论，但同时他本人对派苏军去阿富汗的可能性及是否明智持极大的怀疑。“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柯西金当时特别强调这一点。两天后，他把苏联领导集团讨论的结果转告给秘密来访的塔拉基：

“……我想再一次强调，我们从各种角度审议了关于出兵的问题，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一行动的各个方面并得出结论，如果派去我们的军队，你们国内的形势不仅不会改善，反而会复杂化。”

为了彻底打消阿富汗总统的希望，勃列日涅夫在会见他时，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也向后者直截了当地宣布：出兵阿富汗一事，苏联“不能干”。

但是随着阿富汗国内日益动荡，在那里的苏联人生命受到威胁，苏联还是向阿富汗派出了部分军事人员。先后到达喀布尔的有尹·梁勃钦科少将、一个“穆斯林营”及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的两个小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在阿富汗的苏联公民人身安全并把他们撤出该国。然而，苏联军事人员的出现，客观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苏联已经插手阿富汗事务的印象。而且，早已介入阿富汗政治斗争的苏联特工及后到的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无法在当地各种武装力量之间保持绝对的中立。与此同时，塔拉基与权势越来越大的政府总理哈菲祖拉·阿明之间矛盾激化。9 月 10 日，塔拉基出席了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后再次来到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对阿富汗形势表示担忧，并向塔拉基施加压力，要他与人民民主党中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联合组成新的政府，把阿明排除在外。然而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决定很快泄露，塔拉基回到喀布尔没几天便被阿明组织的政变推翻了，塔拉基被处死，阿明接任了他的党政权力。莫斯科尽管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但木已成舟，只得承认了阿明政权。苏联外交部指示驻喀布尔的苏联大使阿·伊·布扎诺夫，要把阿明作为国家的实际领导人来与之打交道，同时通过接触进一步摸清他的政治倾向。而要做到这些，仅仅依靠外交途径很难完成，于是，已经卷入到阿富汗各种力量之间争斗中的克格勃更积极地活动起来了。他们的活动也只能使苏联在阿富汗越卷越深，欲罢不能。

其实，阿明的政治倾向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执政不到一周，他要求苏联大使和武官离开喀布尔，并拒绝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见。与此同时，他开始与美国人接近，表示出愿意与美国更现实地改善关系。12 月，他在与巴基斯坦总统会谈时请后者转告华盛顿，建议美国对阿富汗局势进行干预。苏联在阿富汗的情报部门也把不利于阿明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莫斯科，怀疑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的阿明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转向美国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而美国对阿富汗也表示出不同寻常的兴趣。这一切都使苏

联领导人深感不安。

据 1977—1986 年任苏联副外交部长的格·马·科尔年科说，1979 年 10 月份，葛罗米柯私下与他讨论的问题中，涉及了苏军进入阿富汗是否合适的问题。给科尔年科的感觉是，葛罗米柯是被安德罗波夫和接替去世的格列奇科出任国防部长的乌斯季诺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才考虑这种可能的，由此说来，上述三人——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加上克格勃主席——在总书记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组成了具体操纵国家的“三驾马车”，他们在阿明上台不久就开始考虑出兵阿富汗问题了。然而，如果说在 10 月、11 月，他们中有的人还拿不定主意的话，那么到了 12 月，阿明有可能失控的消息引起的极度不安和对美国国会已不可能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失望与气愤，最终促使他们下定了出兵的决心。12 月初，“三驾马车”面见勃列日涅夫，向最高领导汇报了阿富汗令人不安的情况，说要“不失去阿富汗”，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也许还有别的种种理由，反正最终勃列日涅夫被三人说服了，他同意把这一决定提交政治局讨论，并要三人起草一份出兵阿富汗的特别报告。

1979 年 12 月 12 日，政治局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当时苏联最有影响的一伙人，坐在长长的会议桌前，听取和讨论了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三人的报告。报告的主题简洁明确：鉴于阿富汗的严重形势已构成对苏联南部边境地区安全的威胁，并极有可能被某些敌视苏联的国家利用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立即派出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稳定局势是十分必要的。安德罗波夫讲了克格勃人员在喀布尔获取的情报及克格勃可能在恢复局势稳定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乌斯季诺夫竭力使与会者相信，整个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葛罗米柯分析了国际上可能会出现反应；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重新强调了对第三世界国家中真正的社会主义力量进行国际援助的意义。勃列日涅夫没有进行长篇发言，他只是简略地建议批准上述计划。毫无疑问，与会者一致同意了这一将对苏联本身及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计划。12 月 26 日，“三驾马车”和契尔年科来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向他汇报 12 月 12 日通过的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时，部分苏军空降兵已抵达喀布尔待命，苏阿边境线上苏军的两个师也已集结完毕。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但不难推断，已经几乎成了苏联“囊中之物”的阿明的命运，最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第二天，12 月 27 日白天，全体政治局成员再次开会，决定派遣主力部队进入阿富汗。同时通过了一系列文件，有给驻各国大使及联合国代表的指示，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致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信，以及将由塔斯社播发的解释性文稿。这些文件强调的不外乎两点：一是阿富汗现政权无力控制形势，它已危及了苏联本身的安全；二是苏联的出兵是应阿富汗领导人的请求进行的。这天晚上，对阿富汗的大规模入侵开始。无论是对勃列日涅夫，还是对“三驾马车”，以及苏斯洛夫、契尔年科这样的“元老”来说，在他们表态支持出兵时，大概没有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他们是看不到派出去的部队“凯旋”了。

先期到达喀布尔的苏联国防部和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与阿富汗的特工一起，在 27 日夜间接占了阿明的官邸。阿明和他的卫队及亲信抵抗了约一小时，结果阿明被击毙，喀布尔也很快被苏军控制。同时，由安德罗波夫的专机从捷克斯洛伐克接回来的卡尔迈勒也到达喀布尔。28 日，卡尔迈勒正式就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首脑。

勃列日涅夫第一个向他发去了贺电。三天后，即 1980 年元旦，卡尔迈勒向勃列日涅夫致电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我被推选担任党和国家职位之际表示的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并相信，“有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兄弟援助和始终不渝的合作，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和克服过去给我们留下的一切困难”。他还特意强调：“我们将依靠本国人民保卫光荣的四月革命的成果，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

尽管政治局成员们讨论了出兵阿富汗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但他们显然低估了这一行动引起的反响和后果的激烈与深刻程度。12 月 29 日，卡特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称苏联这次冒险行动，将会产生严重后果。12 月 31 日，美、英、法、加、德、意六国政府代表紧急集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这种干涉行动远远超出了苏联以前在阿富汗以及在第三世界各国活动的水平，可能对未来产生严重影响”，强调“必须确保阿富汗目前的事件不会在其他地方重演”。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驻华大使被告之，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苏联的行动已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严重关切。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下令巴军作好保卫国家的准备，美国宣布将向巴提供军事装备、粮食和其他援助。欧美等国家还迅速终止或大幅度降低了对苏联的粮食出口。联邦德国政府开始考虑增加国防预算。埃及宣布驱逐所有仍留在埃及的苏联非军事专家，并向美国提供全面的军事基地及设施，以保卫可能遭到侵略的海湾国家。西德的《世界报》发表评论说：苏联对阿富汗采取的军事干涉行动，绝不是一个地区性事件，它使本来正在冷淡下来的苏美关系，“现在有结冰的危险”，它“猝然结束了那个被人们称之为‘缓和’的时期”。美国的《新闻周刊》表示忧虑，“入侵阿富汗的事件可能树立这样一个先例，即使得克里姆林宫在今后的危机中比较轻易地考虑采用军事选择”。在西方大国中，法国对此事的反应最为温和，法国总统德斯坦对记者发表讲话，认为苏联出兵阿富汗也许既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也不是预先策划的，而可能是由阿国内形势引起的。外长蓬塞表示，法国要求苏联撤军，但“没有考虑采取报复措施”，“法国决不采取可能恢复冷战的主动行动，也无意利用它的贸易关系为政治目的服务”。稍后，德斯坦对报界说，他“不赞成对苏联进行惩罚”，“重要的是同苏联保持对话”。与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私人关系很好的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也说，西方国家作出的反应“不应招致缓和的结束，因为这显然违背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耐人寻味的是华沙条约各国的反应。各国对卡尔迈勒上台反应比较冷淡，波、匈等国只是发了一份简短的给卡尔迈勒的贺电，在这方面与苏联做法有明显的不同。古巴则在相当一段时间保持沉默。三个月前，卡斯特罗刚刚在哈瓦那主持召开了不结盟国家第六次首脑会议，当时塔拉基是与会首脑之一。按规定，会议主持国领导人有权在下次会议前一直领导不结盟运动。卡斯特罗曾保证他不会用这种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运动。而且，他一直宣传对小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使用武力的惟一大国是美国。因此，如果这时支持苏联的行动，很有可能造成不结盟运动的分裂，这将使他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面对由于出兵阿富汗而突然严峻起来的国际形势，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感到必须有人出来澄清、或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好的人选是勃列日涅夫。1980 年 1 月 12 日，勃列日涅夫以书面回答《真理

报》记者问的方式，发表了苏联官方的看法。记者的问题是：

“您怎样评价当前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从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一些步骤来看？”

勃列日涅夫回答说：

“然而遗憾的是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交，国际形势明显地复杂化了。各国人民应当知道真相——谁要对此负责。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帝国主义势力，首先是美国某些集团的过错。”

接着，他简单回顾了阿富汗自 1978 年 4 月以来的事变进程，说有“成千上万名在国外武装起来和受了训练的叛乱分子以及完整的武装部队被派到阿富汗的领土上”，这是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对革命的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未经宣布的战争”。而阿明助长了侵略者反对阿富汗的行动，他的残酷统治，削弱了四月革命所依靠的社会基础。这种情况“有使阿富汗丧失本身的独立，和把它变成帝国主义在我国南部边界的军事基地的现实危险”。

“对我们来说，向阿富汗派遣苏联军事人员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但是，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采取的行动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并考虑了整个情况。对苏联人提出的惟一任务就是帮助阿富汗人民反击外来侵略。只要迫使阿富汗领导请求我们进入的原因不存在了，苏联人就将在阿富汗完全撤出。”

与此同时，苏联的各种传播媒介纷纷动员起来为出兵阿富汗进行辩护。

《新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革命运动史证实，对革命者的国际主义声援中包括在紧急情况下给予物质、军事援助，“都是合理的”。“不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所拥有的可能性，实际上就是回避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和使世界倒退到帝国主义能够为所欲为地肆无忌惮地扼杀一切革命运动的时代。”《消息报》著名的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写道：“白宫对阿富汗事件的反应也是极不负责任的。”“美国迟早将不得不承认世界的现状，并且回到缓和的道路上来。”《苏维埃俄罗斯报》还为出兵阿富汗找到了两条法律依据，即 1978 年 12 月缔结的《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后者规定各国有了为了反击侵略和恢复和平而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困境，苏联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缓和与外，界的紧张关系。首先取得突破的是在印度。2 月中旬葛罗米柯访问该国后，印度总理英·甘地表示，虽然印度不赞成苏联在阿富汗驻军，但也不会屈服于某些西方国家要印度用更强烈的语言谴责苏联的压力。之后，她又公开表示对苏联出兵阿富汗抱同情态度，认为解决阿富汗危机的办法在于使苏联相信它不会被包围。印度“现实主义态度”很快得到了报偿，5 月 8 日，苏印签订协议，苏联向印度提供 16 亿多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 T—72 型坦克、萨姆—6 式和萨姆—8 式防空导弹、米格—23 型和米格—25 型战斗机，等等。偿还利率优惠，且不要求用硬通货支付。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因其对阿富汗事件与众不同的态度，再次成为苏联外交的突破口。4 月下旬，葛罗米柯访问法国，这是苏联出兵阿富汗后苏联外长访问的第一个西方国家，虽然双方未能就阿富汗问题取得完全一致，但这毕竟表明苏联可以与西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一问题，苏联牢牢地抓住法国这扇没有锁紧的大门，全力打开通往西方世界的通道。5 月中旬，勃列日涅夫亲自来华沙出席华约政治协商会议，19 日在华沙会见了法国总统德斯坦。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举行各国最高级会议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办法。德斯但会后说，尽管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

分歧很大，但会谈为缓和紧张局势作出了积极贡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西方对这次会谈的反应：英国表示遗憾，欧洲共同体感到不快，加拿大称此为一次无益的行动，美国批评德斯但的单独行动削弱了西方盟国之间的信任与团结。只有联邦德国评价说是“有益的”。没过多久，人们才明白了联邦德国作出这种评价的原因：5月底，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吉洪诺夫访问联邦德国；6月底，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与外长根舍来到了莫斯科。原来，施密特对法国总统的行动不加抨击，是因为他要跨出的一步，比德斯坦还远。

苏联也不断做出姿态表示对缓和的诚意。6月22日，塔斯社宣布，近日将把某些目前无必要留驻阿富汗的苏联部队撤回国内。7月4日，苏联向美国建议着手讨论限制欧洲中程导弹问题，8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又亲自致信卡特、施密特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表示愿意就削减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同西方进行谈判。在苏联的一连串外交攻势之下，西方制裁苏联的联盟，渐渐松动了。加拿大政府7月底宣布它将退出抵制向苏联出售小麦的行动；11月，美国商业部批准美国履带拖拉机公司向苏联出售10亿美元的设备，用于铺设从西伯利亚到西欧的天然气管道；意大利也表示愿意参加上述工程建设；法国更是捷足先登，在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后，法苏之间签订了几项大合同，使两国贸易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0%。日本也不失时机地扩大对苏贷款，预计五六年内将向苏提供30亿美元银行贷款。到了1981年3月，西方国家已向苏联提供了上百亿美元贷款，用于天然气管道工程。

在1981年2月23日至3月3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作总结报告，回顾70年代后半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他承认这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暴的时期”。缓和进程的减慢，新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台后对苏奉行强硬政策，都使他感到一种难言的压抑，因此，他的调子，确切他说是苏联领导集团的调子难免不受到影响。他说：“到了80年代开始时，国际地平线上已是阴云密布。”像这样低沉的调子，在以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还很少听到。这是苏联领导人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变得更现实、更客观了呢，还是随着他们进入老年，生命之火的日益减弱而使他们很难鼓动起昔日的热情和把握未来的欲望了呢？虽然，已经74岁高龄的勃列日涅夫仍然被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还要作为苏联的代表和化身为党和国家工作，但是，谁又能指望一个已进入迟暮之年且病痛缠身的老人，再去完成什么鸿图大业呢？这年11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访，来到联邦德国，为推进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发展尽了他的努力。人们注意到他这种不辞辛苦的精神，但同时也发现，在不仅需要威望、更需要机敏和果断的外交领域，由他来掌握苏联这艘超级巨轮，在许多情况下是勉为其难了。不过，当时没人能想到，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在国际舞台上的“告别演出”了。

第十七章作为总书记与作为普通人

自1964年10月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后，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勃列日涅夫，被有意识地塑造的形象与真正的他越来越远了。当他从最初的集体领导制下的领导人之一，渐渐地“脱颖而出”，并最终在国内外奠定了苏联第一领导人的地位时，他头上也被悄悄地罩上了光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绚丽。它的光芒虽然尚不及当年斯大林、甚至某种程度上也不及赫鲁晓夫曾经具有的强烈，但却足以让人不容易看清他的真实面目了。受党的领导并由国家严格控制的舆论宣传机构，通过各种媒体，把这样一名总书记推到人民面前：他稳重、慈祥，为党和国家方方面面的工作不断地操劳，尽管后来年高患病，却仍然在为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代表、体现着苏联的强大和威望，是正义的化身。这幅精心制作出来的图像，所提供的都是标准的、千篇一律的正面像，就如同一帧照片，你休想从那上面看到后颅和背影。照片上的形象，也许不失真，但那终归仅仅是一个平面效果，是一个固定影像，与活生生的人相去甚远。

除了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减少活动外，勃列日涅夫并非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因此，能看到勃列日涅夫更多侧面的人也不少。然而，由于能把他们的所见所闻记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就不是很多了。我们也只有根据这些算不上丰富的材料，去为勃列日涅夫勾勒更真实的立体形象。

如果只看人们给勃列日涅夫出版的一大套、近千万字的文集和言论集，会以为这名总书记是个勤于动笔、擅长演讲的领导人。实际上，他既不善于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作正式、严肃的讲话，更对亲自起草讲话稿感到为难。无论是洋洋十几万党的报告，还是几十万字的回忆录，甚至是简短的祝辞和电报，一概由秘书或是临时组成的写作班子完成。前面我们提到过布尔拉茨基1965年在为勃列日涅夫起草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报告时遇到的情况，当时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不仅回避了报告起草工作，而且对“笔杆子”们向他介绍的不同观点及措辞上的微妙区别感到茫然而且没有耐心，曾在1976年至1989年任《真理报》总编辑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有机会在1976年二三月间，参加了为勃列日涅夫起草在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的工作，根据他的叙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总书记的工作方式和习惯。

起草报告的地点在扎维多沃。这是位于莫斯科以北、莫斯科至列宁格勒公路上101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也是以半官方方式存在的苏联国防部的军事狩猎营地。由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爱好，这里渐渐地成了他从事重要工作和休息的最喜爱的地点。被选中参加此项工作的都是有名的专家、学者和党务工作者，其中有总书记助理安德列·亚历山德洛夫—阿根托夫，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历史学家、哲学家瓦吉姆·扎格拉金，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组领导人、著名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苏联科学院院士、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据说，报告的起草工作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年，有关人员便向许多研究所、部委、统计机关下达了整理报告素材的指示，例如关于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程度，有多少人失业，有多少无家可归者；苏联生产规模扩大情况，劳动者福利，工资增长率，等等。收回大量书面素材后，第二阶段是按方面——国际、国内、党务——组成小组，用两三个月时间，拼凑起报告的各个“块块”，这是报告的最初原型，当然每

一部分都很长且粗糙。然后，当上述那些精英们来到扎维多沃后，第三阶段工作开始，他们集中精力对报告原型进行修饰、加工和润色，以使它变得相对紧凑并能赢得“雷鸣般的掌声”。参加最后加工润色的人每人分若干章节，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工作。星期五晚上，勃列日涅夫有时亲自驱车来到这里。第二天，他把上面这些人请到他住所旁的一间宽大的花房里，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大桌旁。先由每个人读一遍自己负责的那些章节，勃列日涅夫听着，然后在场的人提出意见，总书记最后给予评语：这段好，那段不怎么样，应该怎么修改，等等。就这样一页一页进行下去，直到全稿弄完。星期一勃列日涅夫回莫斯科，留下的人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继续修改，星期六又同前一次一样重复一遍。这次这份报告一共修改了 19 遍才最后通过。这已是 1976 年上半年，那时的勃列日涅夫虽然已患了中风，但还不像后来表现出那么明显的智力与体力的衰退，尽管他自己写不出这种报告，然而“他却有纯俄国式的直觉”，他能分得出什么地方写得好，什么地方表述不确切。当然，用阿法纳西耶夫的话说，这是一件“非常累人、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因为“并不要求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的那些人有什么新的思想，更不要说要求他们有什么更为独到的思想了。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你要善于给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

在阿法纳西耶夫看来，这时期的勃列日涅夫还是“讨人喜欢的”，对请来的修改加工报告的人态度友善，相处很好。而且，对素不相识的人，他也能以善相待。一次，他驾车从莫斯科来扎维多沃的路上，看到有两个提着网兜的妇女招手拦车，他停下车一问，原来她们想搭一段车。妇女们跟本没认出开车的是谁，她们也许根本没想到总书记会自己开车。勃列日涅夫爽快地让她们上了车，顺路送了她们一程。两名妇女下车后塞给这个好心的“司机”三个卢布，勃列日涅夫也没推辞，笑了笑，顺手装进上衣口袋里继续赶路。

不止一个人证实，勃列日涅夫另一个工作方式是打电话。在他执政的年代，电话虽算不上什么非常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了，但它仍不失为一种简便快捷的联络手段。相对来说，勃列日涅夫不如赫鲁晓夫那样喜欢全国各地到处跑，而地方党政领导人到莫斯科的机会和次数也有限，因此利用电话交流情况、联络感情就显得必须而且必要了。布尔拉茨基提供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工作习惯的一些情况。

勃列日涅夫坐上第一把交椅以后的最初时期，他的工作日是不寻常的：每天至少先用两个小时给其他最高层领导人、许多有威望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和州委书记打电话。他打电话往往都是一个腔调——比如，他说，伊万·伊万诺维奇，问题我们正在准备解决，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可以想象出，此时伊万·伊万诺维奇会感到多么的自豪和激动。这样，勃列日涅夫的威信也就提高了。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平易近人、非常稳健和态度温和的领导人，他在没有同其他同志商量和没有征得自己同事的完全赞同的情况下，从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个习惯看来一直保留下来了，至少在 70 年代中期还仍然如此。阿法纳西耶夫说，在扎维多沃期间，勃列日涅夫基本都是在早饭前给几个州党委书记打电话，询问地方上的情况，提出建议，发出指示。即便出国访问，他也非常注意与莫斯科的领导人们保持畅通的联系。1973 年 6 月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他就对苏联有关部门提出要求，要保证他在美国人面前决不能显出低

于美国总统的样子。而通讯联络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这就意味着要为勃列日涅夫提供同美国总统完全相等的电话服务，即要建立一个由苏联接线员操纵的专用电话交换网络，以便使勃列日涅夫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从他所在的任何地方与在任何地方的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取得联系。此外，还必须保证同莫斯科进行直接、及时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美国方面了解了情况后，破例允许苏联把某些内部通话设备安装在白宫，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对此感到特别高兴，于是开始频繁地与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与莫斯科的同事以及妻子通话，告诉他们他在美国的印象。

总体上说，勃列日涅夫的工作作风并不属于独断专行的那种。

遇到重大问题，他都召开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研究后决定。

在这种会议上，他几乎从不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别人先说。如果出现意见分歧，他便建议再进行研究、协商，然后在下一次会议上再进行讨论，直到与会者基本取得一致，才形成决议。

但是，如果所讨论的问题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会尽量把自己的观点明确地讲出来，并且竭力争取让与会者接受。而一旦总书记表了态，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很少再固执己见了。前面讲过，在讨论是否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有好几次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意见——当然他的意见得到别人的支持，出兵的时间才被推迟了。最后，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又同意了出兵，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决定的。这另一面就是他对针对他本人的批评非常敏感，仔细小心地加以对待。他可以允许领导层中其他成员之间出现意见分歧，彼此争得面红耳赤，但却难于接受别人直接向他提出批评。他更喜欢充当和事老的角色，而不能容忍自己成为受攻击的靶子。谢列平由于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问题上，反对他主张的政策，很快在政治上失势了；叶戈雷切夫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失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尼克松第一次来莫斯科前几天，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突然被免去职务，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人们普遍认为，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著称的谢列斯特，很可能是对缓和政策提出指责而被调离原职位的。而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实行民主化，报刊上出现了不少不利于苏联的文章和材料，其中不乏针对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据说，苏共中央办公厅有人专门收集了这些文章和材料，翻译整理后呈送给总书记，结果引起他的极大愤怒。很大程度上，这些文章和剪报促使勃列日涅夫作出了最后决定。

作为一个普通人，勃列日涅夫有他的爱好：收藏国内外名牌轿车、狩猎和足球。如果他是西方国家的一名亿万富翁，上述爱好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假如他只是苏联的一个州委书记，第一种爱好大概只能是一种奢望。现在，正是由于他是苏联的第一号领导人，拥有极大的权力，他才能够满足这些爱好，而这种爱好似乎也很难分清是不是业余的了。

收藏国内外名牌轿车的爱好始于何时已很难说准了，但勃列日涅夫有这种爱好并且达到世界知名的程度，恐怕是随着他举着缓和的大旗走向西方世界时开始的。谁若有幸在勃列日涅夫晚年参观一下他的车库，准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小高级轿车的博览会。这里有一辆绛紫色的罗尔斯-罗伊斯牌轿车，是英国女王的礼物；一辆雪铁龙——马塞拉蒂和一辆雷诺，自然是法国总统对总书记的“敬意”；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方面的支出比其他国家首脑毫

不逊色，1972 年他第一次来莫斯科，带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作为见面礼；第二年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同样没有空手而归：尼克松又赠送了一辆深蓝色的林肯大陆牌轿车。相对来说，西德人略显“节约”了一点，勃列日涅夫两次到世界知名的奔驰车故乡访问，第一次勃兰特政府花了 1.2 万美元买了一辆奔驰 450 轿车送给他；第二次曾当过财政部长的施密特总理，没有按惯例送一辆最新型号的轿车给已进入生命最后一年的勃列日涅夫，而是送了一枝古代的猎枪，这使后者失望至极。

酷爱汽车的勃列日涅夫也喜欢自己亲自驾车。在苏联是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每当他得到一辆汽车，他都要马上试一下，而且，不管当时的路面条件与莫斯科市区的柏油路有多大差异，一概用惊人的速度前进，因此屡屡使在场人惊出一身冷汗。访美期间，刚刚得到林肯大陆的勃列日涅夫兴奋之下，马上试车，而且拉着尼克松坐陪。勃列日涅夫的驾驶技术并不特别糟，但对这辆最新型轿车强劲驱动力他却一无所知。深知总书记习惯的多勃雷宁小心翼翼地提醒勃列日涅夫注意新车的特点，然而早已跃跃欲试的他根本没听进去，一上来就猛踩离合器，汽车“轰”的一声猛蹿出去。但他忘了，这是在戴维营，不是专门为高级领导人留出来的莫斯科中心车道，也不是通往扎维多沃的国家公路，车轮下仅是一条窄路，而且弯弯曲曲。勃列日涅夫驾车飞驰，前面是一个很陡的斜坡，坡顶上竖着块牌子，上面写着“慢行，前有险弯”。不认识英文的勃列日涅夫仍以 80 多公里的时速冲下斜坡，惊得尼克松侧过身不断地说“慢点开，慢点开”。冲下坡后，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急踩刹车，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差点在挡风玻璃上撞得头破血流。试车完毕，当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说这辆走得真稳时，惊魂未定的总统尽力敷衍道：“你真是了个了不起的驾驶员。”

勃列日涅夫的狩猎爱好至少在他在哈萨克当领导人的年代就培养起来了。那时，荒凉的哈萨克草原上，到处都能找到天然的狩猎场。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用于满足他这项“活动”的地方，也从哈萨克扩展到了全国，像阿斯特拉罕的国有狩猎经济特区、别洛维日斯卡娅的普沙禁伐区，以及高加索山脚下的林场等，都成了勃列日涅夫可以随时光顾的狩猎场所。当然到这些地方去，先得要乘飞机和在越野车上颠簸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所以勃列日涅夫还是更喜欢到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沃过射杀猎获瘾。不仅如此，由于总书记有这种爱好，扎维多沃还成了政治活动的场所。有时，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聚集在这里，射猎之余商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时，勃列日涅夫还把一些外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到此地，进行会晤和谈判。基辛格就曾被邀请到这里来，与总书记一同打野猪。

虽然说是狩猎，但与那种在茫茫密林中，在成群猎狗的引导下，纵马驰骋，追逐猎物的经典方式大不相同，扎维多沃猎场几乎是一种人为安排好的打活靶游戏。就拿勃列日涅夫最擅长打的野猪来说，这里野猪都是由猎场专门工作人员喂养的，只不过没有把它们放在固定的圈舍里就是了。工作人员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傍晚，把食物投放在固定的地点，这个地点附近就是为狩猎者专门准备的狩猎台。野猪们养成了定时定点进食的习惯，而且也不怎么怕人，这对又想过射杀之瘾、又不愿意费力搜寻猎物的狩猎者来说，简直太理想了。狩猎台建在树的半腰，沿木梯而上是一个木板铺成的小平台，台上有一张粗糙的板凳。一般狩猎台下都是一块林间空地，给野猪的食物就投放在空地上，这样当野猪按习惯从容进食时，狩猎者可以从很近的

距离开枪射击。除非狩猎者老眼昏花，很少有击不中猎物的时候。尽管如此，猎场为保证显赫的狩猎者每次一定都有收获，还仿效奥匈帝国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做法，派一名职业猎手为总书记“保驾”，他与总书记对同一猎物同时开枪，这样一来，即便是最强壮的野猪也经不住两枪的射击。

有意思的是，对狩猎的爱好在苏联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当中已经形成了传统。从托洛茨基、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戈尔巴乔夫，都对这项活动有着浓厚兴趣，区别仅在于他们的首选猎物有的是天上飞的，有的是地上跑的。一些在进入高级领导层之前并不熟悉这项活动的人，在进入这个圈子后也成了它的积极参加者，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与领导的一致。葛罗米柯原来的运动方式，仅限于早上举哑铃和偶尔散步。但在他成了勃列日涅夫在外交方面的首席顾问后，他开始学习打猎了。在扎维多沃进行的各种会见和谈判自然少不了他，而在总书记率领的狩猎者中，穿着猎装的葛罗米柯几乎总在其中。不知道他是否把狩猎当成一项“政治副业”看待的，不过学会打猎倒是给他带来了真正的乐趣。当他在1972年某个星期天早上，手里拎着一只刚刚猎获的羽毛蓬乱的鸭子走进扎维多沃的别墅、自豪地展示给人们看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极少在世人面前显露的真正快乐的笑容。

总书记还是个足球球迷。在他身体健康允许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落下一场观看在莫斯科举行的重要比赛。由于总书记对足球的痴迷，常常害得更多的球迷不得不锻炼自己的耐心，因为重要比赛总书记不到是不能开始的。而政治局或别的重要会议又很难保证在开赛前结束，所以成千上万人在足球场望眼欲穿地等上20—30分钟，在勃列日涅夫精力旺盛的年代并不是罕见的事。

从勃列日涅夫这些既有奢华的、贵族式的，又有大众化的个人爱好上，可以看出，他不属于那种生活刻板、清心寡欲的人。他嗜好烟、酒，虽然还没到如命的地步，但有时也难以自制。70年代中期，医生鉴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情况，曾建议他戒烟，但他明确表示做不到。结果找到一个妥协办法，人们给勃列日涅夫特制了一个装有定时装置的烟盒，它一小时或更长一点时间自动开启一次，每次只提供一支香烟。从此，勃列日涅夫无论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这个金光灿灿的新奇烟盒，并很乐意拿给国内外的朋友看。但是烟瘾极大的他根本等不了这么长时间，除了在固定的时间从这个烟盒中郑重其事地取出一支香烟外，他的另一个口袋里还有一个普通烟盒，这样他仍可以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直到那个特制的烟盒再次开启。有时候，如果那个普通烟盒忘了带或是没烟了，他会毫不犹豫地 toward 身边能要得着香烟的任何一同事伸过手去，没有哪个同事能拒绝总书记这个小小的要求。对勃列日涅夫喝酒的描述也有不少。有人说他极爱喝烈性酒，有人说他只喝格鲁吉亚产的红白兰地和白白兰地，以及摩尔多瓦的“开胃”酒，当然不只是喝一点儿，而是适度地多喝点儿。但至少有两次，这种“适度”差点儿给他自己引出麻烦。一次是在国内，1968年12月底勃列日涅夫到白俄罗斯参加庆祝苏维埃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成立50周年活动，宴会即将结束时，已经有点微醉的勃·列日涅夫向陪同的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彼·米·马谢罗夫和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吉·雅·基谢廖夫抱怨，马谢罗夫没有把倒在杯子里的酒喝掉，而其他的同志都在畅饮。“这不好，非常不好。”勃列日涅夫反复说着，而马谢罗夫和基谢廖夫则陪着笑脸竭力进行解释。这一切被一名

白俄罗斯党的工作者阿·菲·科瓦廖夫看在眼里，他简直不敢相信，党的总书记在不可能不知道酗酒已成为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号召下属酗酒！他气愤之下，想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信检举此事。但最终还是被朋友劝住了。另一次是访美期间，在到圣克利门蒂尼克松家中的第一天晚上，有点失眠的勃列日涅夫被尼克松请到自己的房间，主人端来了葡萄酒和威士忌。勃列日涅夫喜欢喝纯威士忌酒，他认为往酒里兑水会把酒糟蹋了，但不一会儿他就醉醺醺了。话也越说越不着边际，甚至把克里姆林宫幕后许多最隐秘的人际关系也对美国总统讲了。这让充当翻译的多勃雷宁极为尴尬，那些连他都不知道的内幕实在不能告诉尼克松。第二天，酒醒后的勃列日涅夫问多勃雷宁昨天他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当后者告诉他没有把话全翻译过去时，勃列日涅夫说：“做得对。该死的威士忌，我不习惯喝这种酒。我不知道我喝不了那么多。”

作为一个普通人，勃列日涅夫也有自己的家庭，在克里姆林宫或是党中央大厦履行党的总书记职责后，他还要在家庭生活中充任多种角色：儿子、丈夫、父亲、祖父或外祖父，等等。

勃列日涅夫的父亲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老工人没能看到儿子的飞黄腾达，在30年代不到60岁便去世了。勃列日涅夫的母亲纳塔莉娅·杰尼索夫娜要长寿得多。她一直看到儿子成为党的领袖和苏联第一号领导人。不过在1966年之前，这个据说粗通文墨的俄罗斯妇女，一直坚持住在老家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佩尔纳街上一幢旧楼房里，同勃列日涅夫的妹妹和妹夫住在一起。虽然最终搬来莫斯科住，但她对这里并不习惯，也不喜欢。儿媳的冷淡和孙女的放纵让她觉得与这个家庭总有一种隔膜，总书记一家豪华、气派的生活方式也让简朴惯了的老太太感到不自在。不过她还是有所安慰的：她的权力极大的儿子对她非常孝顺。勃列日涅夫承认，他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和待人接物极其谦和得体的态度感到惊讶。“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百忙之余能坐在妈妈身边，倾听她亲切的声音，并凝视她慈祥、亮晶晶的目光。”总书记这样写道。1975年1月上旬，勃列日涅夫的母亲在莫斯科逝世，当时正是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过程中发生中风后身体状况很糟的时候，身体状况不佳加上其他原因，使他推迟了原定对埃及、叙利亚等国的访问，但他还坚持到停放母亲灵柩的科学工作者之家与家人、亲属一起守灵。

《消息报》登出政治局致勃列日涅夫的慰问信，从而把此事公之于世。电视台也进行了报道，虽然只有一次，但在不主张宣传领导人私生活的苏联，这已经是很不寻常了。据外国记者报道，送葬那天，送葬行列中有好几辆政府领导人的轿车，勃列日涅夫的车开在最前面。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在用这些独一无二的方式，向母亲表达最后的情感。

勃列日涅夫只结过一次婚，妻子维克托莉亚·彼得罗芙娜在20年代末嫁给冶金工程师勃列日涅夫时，职业是护士。但她有犹太血统，这虽然没给她丈夫的升迁带来多大麻烦，还是多少给勃列日涅夫造成了影响，尤其是在其当政期间爆发两次中东战争时，苏联国内排犹反犹情绪在官方援阿反以立场的作用下急剧高涨起来后。传说一些苏联执不同政见者有如下说法：勃列日涅夫对妻子方面的亲戚持冷落与回避态度，甚至不允许他们来莫斯科的家中走动。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晚年，已经有人在广泛散布说，勃列日涅夫是政治局中头号“犹太复国主义者”了。1973年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时，按照外交礼仪和双方原来的商定，维克托莉亚和女儿要陪同前

往，但临行时苏联方面又取消了这一安排。考虑到当时美国国内的反缓和势力正抓住苏联限制犹太人离境大作文章，取消勃列日涅夫夫人的随行，恐怕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或“健康原因”了。维克托莉亚的血统是否影响到她与丈夫的夫妻关系现在不得而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第一夫人的身份直到勃列日涅夫溘然长逝那一天始终未变。

勃列日涅夫有一子一女。儿子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勃列日涅夫 1933 年出生，跟他父亲一样，最初的专业学的是冶金，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不过他并没有成为一名有造诣的冶金工程师，而是很快又进入了外贸学院，然后成为一名在当时的苏联人眼中最令人羡慕、又非常实惠的外贸干部。由于他精通英语和瑞典语，在 60 年代中后期，一直以苏联商务代表身份住在瑞典。1970 年回国任全苏工业原料进出口公司经理。六年后，任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79 年初升任第一副部长。他的夫人，即总书记的儿媳，是一名英语教师。据他们的小儿子安德烈说，他的祖父祖母曾“在物质上给我们帮助”。相对来说，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列昂尼德芙娜·勃列日涅娃是最让他感到头痛的家庭成员。加琳娜比尤里大 4 岁，虽然在塔斯社有一份工作，但她似乎从来就不习惯做个按部就班工作生活的职业妇女。靠着父亲的权威和地位，加琳娜生活放纵，性情古怪，桀骜不驯。1960 年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访问南斯拉夫，妻子和加琳娜一同前往。结果，在他的所有随行人员中，加琳娜的着装最为古怪奇特，引起人们议论纷纷。这让尚未最终奠定自己在最高领导集团中不可替代地位的勃列日涅夫感到非常尴尬和紧张，以后再也没有把她带出国去。加琳娜除了对奇装异服有兴趣外，更大的嗜好是那些闪闪发光的钻石。而要满足这方面的贪求，仅靠每月几百卢布的薪金是远远不够的。好在她有一个权势在苏联无人能比的父亲，她想要的东西总有办法达到目的。于是围绕着加琳娜，一张用贪污、盗窃、走私、受贿编织起来的黑网，在贪欲和私利的驱动下越张越大。勃列日涅夫也可能不知道加琳娜违法乱纪的具体细节，也可能人们有意识地瞒着他，或者真的如同安德烈所说，加琳娜“早就挣脱了他作为父亲的监督”，但是，这样的事发生在他的家庭成员身上，作为长辈他是无论如何脱离不开干系的。他的责任也许不在于为女儿的犯罪提供了直接、具体的帮助，而在于他创造了，或是允许别人创造了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环境，这种环境不仅对像加琳娜这样的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反而提供了事实上的足够的荫护。

严格他说，直到晚年，勃列日涅夫仍然在关心着女儿的生活，只不过这种关心是通过女婿身上折射出来的。加琳娜经过三次婚变后，于 1971 年 4 月与在苏联内务部任中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结婚。据说，这次婚姻是经过勃列日涅夫首肯的。从此以后，丘尔巴诺夫便在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内务部长尼·阿·谢洛科夫主持的部门内飞黄腾达起来：1973 年 11 月，他晋升为少将，1977 年又升为中将，1980 年 10 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行政职务也由政治部副主任升为内务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对这个女婿还是满意的。与加琳娜的前夫、马戏团团长叶·米拉耶夫相比，丘尔巴诺夫在岳父眼中“是干正事的”。何况，有一段时间他还能管得住让总书记头痛的女儿。丘尔巴诺夫火箭般的提升无疑得益于与总书记的特殊关系，因为这个副部长除了在内务部大楼里抓了抓军容军姿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突出政绩。这点看得越清楚，那些专靠已结奉承、行贿拉拢达到个人目的的人，就越在丘尔巴诺夫身上下功夫。加之丘

尔巴诺夫本人并不是一个意志品质俱佳、有能力在权力和金钱的围攻下把握得住自己的人，所以走上结党营私、行贿受贿的歧途就不足为怪了。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军事总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谢洛科夫、丘尔巴诺夫的贪污受贿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查出两人数额巨大的受贿和贪污事实。1983年12月13日，谢洛科夫在被削去军衔、开除出党和褫夺除在前线得的奖章外的全部国家奖赏后，开枪自杀。一年后，丘尔巴诺夫被降级使用，由于他的岳母利用老关系积极为他四处求情，对他的处理一直拖到1986年5月，他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清除出内务部机构。第二年初，他被逮捕。原来的法律的化身成了法律的囚徒，他时时刻刻都在怀念过去的岁月。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改革冲击下计划经济体制瓦解带来的供应紧张时，忍不住问监狱工作人员：

“听说莫斯科没有肉和香肠，这是真的吗？可是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当政时这些东西都有。这怎么解释呢？”

“但是，在你们的时代没有真理。这更糟。”人们这样回答他。

“也许，时间会证明的……”他沉思了。

在苏联，党的总书记无疑享受着最高级别的医疗保健，有一批医术高超的专家为他的健康操心。但就像无数普通人一样，身居高位的勃列日涅夫同样无法摆脱疾病的折磨与煎熬。

由于苏联严格的保密制度，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一直是不予公开的。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所有人通过电视都能看到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老态龙钟和无法掩饰的病容，但仍然没有一条官方消息对此作出过负责的解释；相反，苏联官方希图以此向人们证明，总书记仍然是这艘超级巨轮的强有力的舵手。然而刻意的宣传毕竟取代不了自然规律，也无法超过人之常情，在疾病的折磨下，处在权力之巅的勃列日涅夫体内的生命之火，慢慢地减弱了，耗尽了。

勃列日涅夫患有心脏病，它是在什么时候被确诊的现在无法知道，据他自己说，50年代中期在哈萨克领导垦荒运动时，曾犯过两次，当时他一度昏厥，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担架上。看来，这两次病情都并不怎么严重，或者如勃列日涅夫自己所说的“没有时间生病”，他只在阿拉木图的——不是在他这个级别完全可以随时住进的莫斯科最好的——医院里躺了几天，就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了。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垦荒的成败直接和他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

成为党的领袖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受到更加精心的监护。一段时间，他给人的印象是精力旺盛，常常不知疲倦地东奔西走，不仅在国内，而且还往返于东欧各国。直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他又一次病倒了。在7月底至8月初举行捷苏两国领导人切尔纳会谈中，在一次双方发生争执之后，勃列日涅夫突然病了，会谈中断，原定的宴会和记者招待会取消了。杜布切克到苏联领导人乘坐的专列上去探访他，第二天双方达成协议后会谈结束。对外，苏联方面仅说总书记感到不适，但心脏病专家很熟悉这种突友的不适：前胸和后背部感到憋闷性疼痛，并伴有出汗和眩晕。很典型，这是心肌梗塞，一个血栓堵塞了心脏顶端冠状动脉的一条小血管。从勃列日涅夫第二天又参加了会谈这点上看，坏死的面积似乎不大。按照最一般的治疗要求，患者应绝对卧床休息，而且要休息一段时间。但医生的建议看来没有被勃列日涅夫采纳，他有更强有力也更“崇高”的理由不让医护人员把他“关进”

医院。

在他的意识中，很早就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一落到医生手中，他们就会治起来没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他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政治舞台中心的，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心肌梗塞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很大关系，而后者又是过度吸烟和酗酒造成的后果之一。在发生心肌梗塞之后，医生曾建议他戒烟和不要酗酒，但全苏联这个最特殊的病人，并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眼里。尽管人们煞费苦心地为 him 制造了定时开启的烟盒，但谁都知道它起不到实际作用。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动脉壁弹性趋于降低，而过度吸烟、酗酒，更加剧了动脉的硬化。而脑动脉硬化，又容易引起脑出血或脑血栓形成。种种迹象表明，1974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首次“中风”，就是脑血栓形成的结果。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直奔乌兰巴托，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50 周年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举行的庆祝活动。回到莫斯科一星期后，又对法国进行了四天的访问，但他不得不取消了某些活动，在他身上显出少见的疲劳之态。回到莫斯科不到 10 天，他又要主持苏共中央全会，并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又过了 12 天，埃及外长和国防部长来访，勃列日涅夫会见了他们，但人们马上发现这次会见与以往不同，苏联官方媒介既没有进行电视报道，也没有在报上发布消息时配发通常必不可少的新闻照片，而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很快传出消息说，勃列日涅夫与两位埃及部长会见仅仅持续了 35 分钟，而且还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更令人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是在一所疗养院的病床上，躺着完成这次会见的！

苏联官方对此说法既未证实，也未驳斥。于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患病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世界。此后，勃列日涅夫差不多有七周没再在公开场合露面，包括上年由他亲自宣读的新年致辞，这次也是由播音员念的。

勃列日涅夫再次公开露面是在 1975 年 2 月 13 日，与来访的英国首相威尔逊举行的首次会谈。在众多外国记者面前，他大步走到威尔逊跟前，与他以前就认识的英国首相握手、拥抱，给人的印象是他情况良好。就座之后，他便开始接二连三地抽烟，并隔着桌子跟威尔逊打趣说：“吸烟是我的恶习之一。”英国《观察家报》的记者斯蒂芬斯当时距勃列日涅夫很近，据他报道，勃列日涅夫“有时看来很紧张，好像他尽力而为，大口大口地呼吸，拼命吸烟，靠着椅背”。这似乎证明了他在大病一场后身体尚很虚弱。但英国记者又说：“他控制着整个会谈的进程。”5 月上旬以后，他又“消失”了一个月，于是外国的新闻媒介又纷纷对他的健康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猜测。6 月中旬，他露面参加了俄罗斯联邦的选举，外国记者抓住机会问他身体最近怎么样，勃列日涅夫干脆地回答：“很好。”然后又轻松地补上一句：“难道你看不出我身体很好吗？”

不管勃列日涅夫本人和苏联官方如何努力打消人们对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怀疑，自然的规律终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年 7 月底至 8 月初，勃列日涅夫为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来到赫尔辛基，敏锐的观察家们没有放过他身上的微小变化。他们发现这次勃列日涅夫是乘火车来的，据他们分析，对于一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坐火车比坐飞机要明智得多。还有，他讲话有困难。尽管以前在公开场合勃列日涅夫都习惯念讲话稿，但这次他即便是在念，也时常出现断句方面的错误。而这又是脑血栓带来的一个比较常见

的反应。最后，以前非常喜欢出席大型社交活动的勃列日涅夫这次却竭力回避，他没有出席芬兰礼宾司为苏联代表团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而能说出的理由又不足以令人信服，反倒证实了人们对他健康状况欠佳的猜测。

正是从 70 年代后半期起，勃列日涅夫的健康每况愈下。心脑血管病变对他心脏及脑组织造成的损伤，使他逐渐失去了活力。以前那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有时还带有幽默感的勃列日涅夫不见了，变成了表情呆滞、动作僵硬、离开讲稿就无法准确表述自己思想的老人。1979 年 6 月参加了苏美两国首脑维也纳会晤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描述了勃列日涅夫当时的样子。他说，在勃列日涅夫参加的会谈中，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都陪在他左右。当需要勃列日涅夫发言时，葛罗米柯便凑过去，用一种低低的但却是坚定的声音，在他耳边告诉他该怎么讲，偶尔还指着勃列日涅夫的讲稿，告诉他读哪一段，读到哪儿为止。卡特总统在与勃列日涅夫单独会谈后告诉布热津斯基，他觉得勃列日涅夫似乎不适应这种直接的、不拘形式的讨论，他的译员身边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按问题分类编号，到时抽出一页合适的材料，勃列日涅夫就念一遍，作为他对总统发言的回答。

1982 年 9 月底，勃列日涅夫来到阿塞拜疆首府巴库视察。巴库的党组织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按习惯，他要在会上致词。电视照例对全国进行了转播。勃列日涅夫登上讲台开始按照讲稿念了起来。念过几段后，大厅里的听众骚动起来，他们发现，总书记念的稿子与今天会议的内容毫不相干！勃列日涅夫似乎并没发觉这一点，仍然照本宣科。他的助手们慌忙进行磋商，然后一个人半跑着来到讲台上，把另一份讲稿交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没有惊慌，甚至没有表现出窘态，他把错稿放在一边，平静地说：

“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并不是我的过错。我要从头再来。”说完，又庄严地念起了讲稿。

一个多月后，他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一步一停地登上了列宁墓上的检阅台，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节的庆祝仪式。寒风中，他那肿胀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他偶尔向游行队伍挥动的手臂，提醒人们这里站立着的不是—座雕像。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意识到了，这个 75 岁的老人，是在向红场，向莫斯科，向他统治了 18 年的苏联告别……

附录

勃列日涅夫年表

1906年12月19日，生于乌克兰叶卡杰琳诺斯拉夫州卡门斯科耶。

1921—1923年在卡门斯科耶冶金厂做工。

1923—1927年加入共青团；在库尔斯克农田耕作与土壤改良中等技术学校学习。

1927—1930年任自俄罗斯奥尔沙区科哈诺夫斯基镇的土地丈量员；在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区任区农业管理局农田耕作组组长；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比塞特任县执行委员会农业部部长，比塞特县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任乌拉尔州农业部副部长。

1930年在莫斯科农业大学学习。

1931年加入联共（布）；在卡门斯科耶冶金学院夜校学习，并同时在冶金厂做工，任冶金学院党组织组织委员。

1935年毕业于冶金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在卡门斯科耶冶金厂当工程师；服兵役。

1936年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厂任工程师，并任冶金技术学校校长；5月，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副主席。

1938年5月，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部长。

1939年2月，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主管宣传工作的州委书记。

1940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负责国防事务的州委书记，团政委。

1941年7月，入伍；同月，任南方方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团政委，旅政委。

1942年4月，在第十八集团军任政治部主任；10月，获上校军衔。

1944年获少将军衔。

1945年4月，任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7月，在伦贝格任喀尔巴阡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6年任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

1947年11月，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1950年3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6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7月任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

1952年10月，任苏共中央委员。

1953年3月，约·维·斯大林逝世。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任命为海军部政治部主任，领中将军衔。

1954年2月，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二书记。

1955年8月，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

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被选举为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7年6月，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1958年任苏联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局副局长。

1959年1月，出席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言。1960年5月，第五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五次会议，被任命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7月，因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免去了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1961年10月，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并发言；12月，获社会主义劳动英

雄称号。

1962年9月，出访南斯拉夫。

1963年6月，在苏共中央举行的全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4年7月，由于已任苏共中央书记，被解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10月，苏共中央全会，被选举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同月，在红场欢迎宇航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同月，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等人在波兰边境比亚沃维斯卡森林的普什哈会晤；11月，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12月，在第六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接任苏联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65年1月，出席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4月，访问波兰；5月，在克里姆林宫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大会上作报告；十月，再次访问波兰；同月，在苏共中央举行的全会上作《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0月，第六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六次会议，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1月，访问民主德国。

1966年1月，访问蒙古；2月，英国首相威尔逊访问苏联，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3月，苏共举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67年1月，访问波兰；同月，访问埃及；2月，访问捷克斯洛伐克；4月，率代表团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访问保加利亚；9月，率团访问匈牙利。

1968年1月，访问波兰；同月，访问民主德国；3月，与保、匈、民主德国、波、捷党政领导人在民主德国德累斯顿会晤；4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5月，与保、匈、波、民主德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7月，与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捷边境城镇切尔纳会晤；8月，与捷、波、民德、保、匈领导人在布拉迪斯拉发会晤，之后，苏共中央全会于19日决定对捷进行军事干涉。

1969年1月，在莫斯科红场发生枪击事件，据说，是针对苏联领导人的；6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长篇发言。

1970年5月，言论集《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一书出版；同月，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同月，在第八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了包括他在内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8月，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苏，与勃列日涅夫会见；10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苏，同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会谈。

1971年3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苏，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同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作了总结报告；4月，苏共举行第一次中央全会，选举他为总书记；5月，率团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6月，率团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8月，与保、匈、民德、蒙、波、捷党政领导人在克里木会晤；9月，与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克里木会谈；同月，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月，访问匈牙利、保加利亚；10月，萨达特访苏，与勃列日涅夫会谈；同月，访问法国、民主德国；12月，率团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1972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访苏，与勃列日涅夫会谈；同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苏，会见勃列日涅夫；同月，美国总统尼

克松访苏，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两项协议等文件；10月，言论集《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第三卷出版；11月，又一言论集，题为《苏共为一切革命力量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而斗争》出版。

1973年1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苏，与勃列日涅夫在明斯克附近的扎斯拉夫尔进行工作会晤；5月，获得“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同月，访问波兰、民主德国及联邦德国；6月，访问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同月，访问法国；7月，接受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同月，与东欧及蒙古各国领导人在克里木会晤；9月，1964—1972年的言论集《关于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出版；10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苏，同勃列日涅夫会谈；11月，访问印度。

1974年1月，首次访问古巴；4月，参加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6月，阿富汗共和国总统达乌德首次访苏，勃列日涅夫与达乌德会晤；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苏，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并签署了10项文件；7月，访问波兰，参加波兰国庆30周年纪念活动；10月，在柏林参加民主德国25周年国庆活动；同月，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会谈；同月，与来访的联邦德国总理举行会谈；11月，与美国总统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并第一次“中风”；同月，率团访问蒙古，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再次“中风”。

1975年2月，与来访的英国首相威尔逊举行会谈；3月，率团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7月，率团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第三阶段会议，会议期间与多国领导人举行会晤；11月，与来访的联邦德国总统谢尔举行会谈；同月，与来访的意大利总统利昂纳举行会谈。12月，率团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

197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代表大会结束时，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5月，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苏联元帅军衔；6月，率团出席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作长篇发言；11月，访问南斯拉夫；同月，访问罗马尼亚；12月，在70寿辰时，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合给勃列日涅夫写贺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第五枚列宁勋章、第二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和荣誉武器（短佩剑）。

1977年6月，会见来访的索马里第一副总统萨马特尔；同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解除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这一职务；同月，访问法国；8月，与来访的南共联盟中央总书记铁托举行会谈；11月，同芬兰总统吉科宁会晤。

1978年2月，会见来访的古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3月，会见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斯多夫；同月，被授予胜利勋章；5月，出访联邦德国；同月，访问捷克斯洛伐克；12月，会见来访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总理塔拉基。

1979年5月，率团访问匈牙利；6月，在维也纳同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会谈；9月，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举行会谈；10月，率团访问民主德国，并参加民主德国国庆30周年活动。

1980年5月，率团抵贝尔格莱德，参加铁托总统的葬礼；同月，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同月，与来访的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会谈；8月，致函美国总统卡特、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及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表示愿同西方就

削减欧洲中程导弹问题进行谈判；10月，与来访的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卡尔迈勒会谈；12月，出访印度。

1981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4月，率团出席捷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5月，与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会谈；11月，访问联邦德国。

1982年3月，在苏联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同月，在塔什干授勋大会上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并谈及对日关系问题；5月，在苏联共青团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同月，会见黎笋，黎笋授予他一级胡志明勋章和越南劳动英雄称号；9月，会见访苏的印度总理英·甘地；11月，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十月革命65周年招待会上发表讲话；11月10日，猝然去世，终年75岁。

